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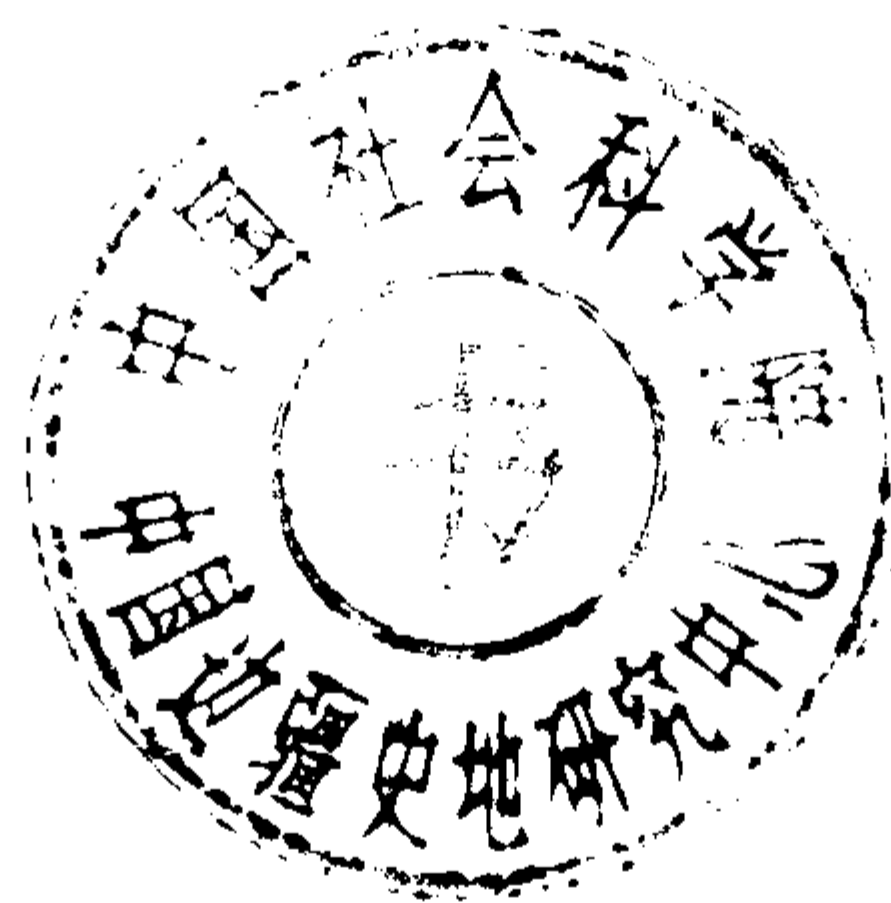


楊易辰回憶錄

中央文獻出版社

楊易辰回憶錄

薄一波



中央文獻出版社

杨易辰回忆录

作 者/杨易辰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谭德山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经营公司

850×1168mm 32开 14.25印张 285千字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平) 1—2000册(精)

ISBN 7-5073-0318-7/k·106

定价：20.00元(平) 30.00元(精)



楊易辰

我是一個入黨五十多年的老黨員，在黨的領導下，為民族的解放，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為國家的富強奮鬥了幾十年。不論遇到什麼困難，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終身的信念，從未動搖過。今後，我依然要忠實地履行共產黨員的義務和權利，盡到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責任。我衷心希望全黨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堅定地沿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正確路線走下去；衷心希望有七十多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堅定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揚優良傳統，始終保持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帶領全國人民永遠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

楊易辰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

宋任穷同志题词

一身正氣敢碰硬
兩袖清風不染塵

宋任窮題



段君毅同志题词

楊易辰同志實
事求是忠於黨
忠於人民的作風
是值為我們學習
的

段君毅



九五、二月

陈俊生同志题词

鐵骨铮铮
其心融融

陈俊生

一九五五年一月

鐵肩担道義

易辰同志

郑天翔

一九五五年一月

郑天翔同志题词

為楊易辰回憶錄題

中華精英

劉復之



刘复之同志题词

學習楊易辰同志堅持
原則敢於爭鬥的精神

張思卿
一九九五年

张思卿同志题词

荣高棠同志题词

易辰同志对党忠诚
无私无畏磊落光明
严于律已乐于助人
为人正直友善热情

一九九二年一月

荣高棠

为易辰同志回忆录题

历史与现实的纪录。
革命精神永放
光芒。

任仲夷



任仲夷同志题词

为易辰同志回忆录题

郭峰同志题词

(一) 太行冀南相連，
乾安長峯結緣。
“堅持”“建設”肩并肩，
相識、相知相援。

(二) 我因事件假煉，
君吸教訓更堅。
多年風雨常相念，
忘江、遼寧重見。

(三) 祖國邊陲北滿，
惟君支撐多年。
披荆斬棘勇开拓，
業績輝煌燦爛。

郭峰 1995.7.11

乔晓光同志题词

忆往昔峥嵘岁月
受教益慧
后来人

题易辰同志

回忆录

乔晓光



乙亥年

岳岐峰同志题词

发扬前人好传统

重振黑龙江雄风

乙亥年岳岐峰

回忆过去

为了未来

赵德尊

赵德尊同志题词

賀易友同志回憶錄出版

正 直 勇 敢
坦 誠 堅 定

史立德

陈雷同志题词

為黨為國為人
丹心一片對黨對
同志繼承未絕

九九五年史立德敬頌

史立德同志题词

为创建根据地
呕心沥血战斗在辽吉大地。

为改革开放无私奉献
献奋斗在北国边陲。

马骥

1995.5.25.

马骥同志题词

安福辰同志题词

安福辰同志题词
 献身革命 艰苦创业
 忠诚党的事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创建根据地 呕心沥血战斗在辽吉大地
 为改革开放 无私奉献 献奋斗在北国边陲
 八十年征程 辉煌成就
 马骥同志
 1995.5.25

1934年，在北平
中国大学读书时



1941年，与肖塞同志结婚照
(背景为当地老百姓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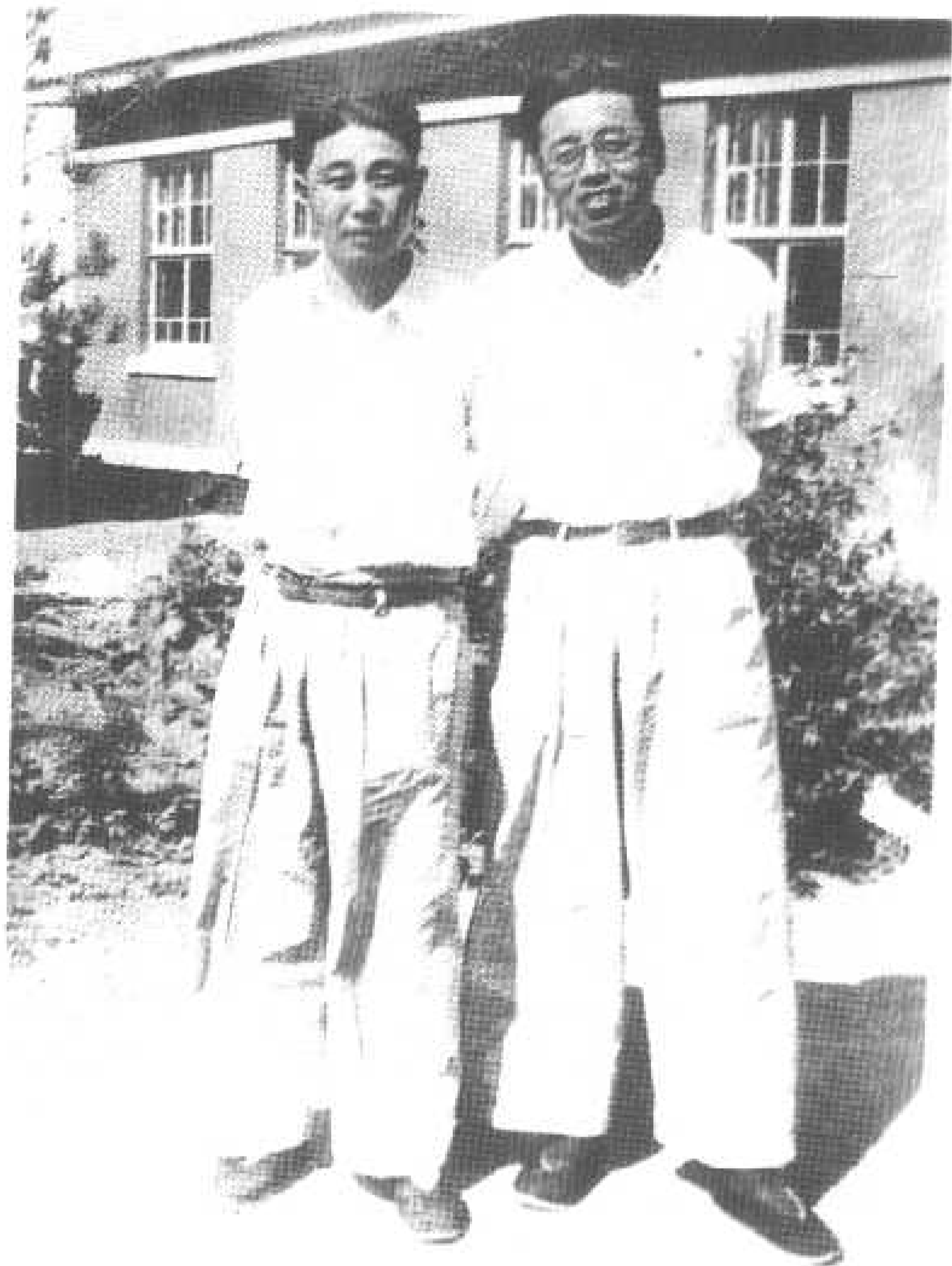


1950年，辽西省政府全体委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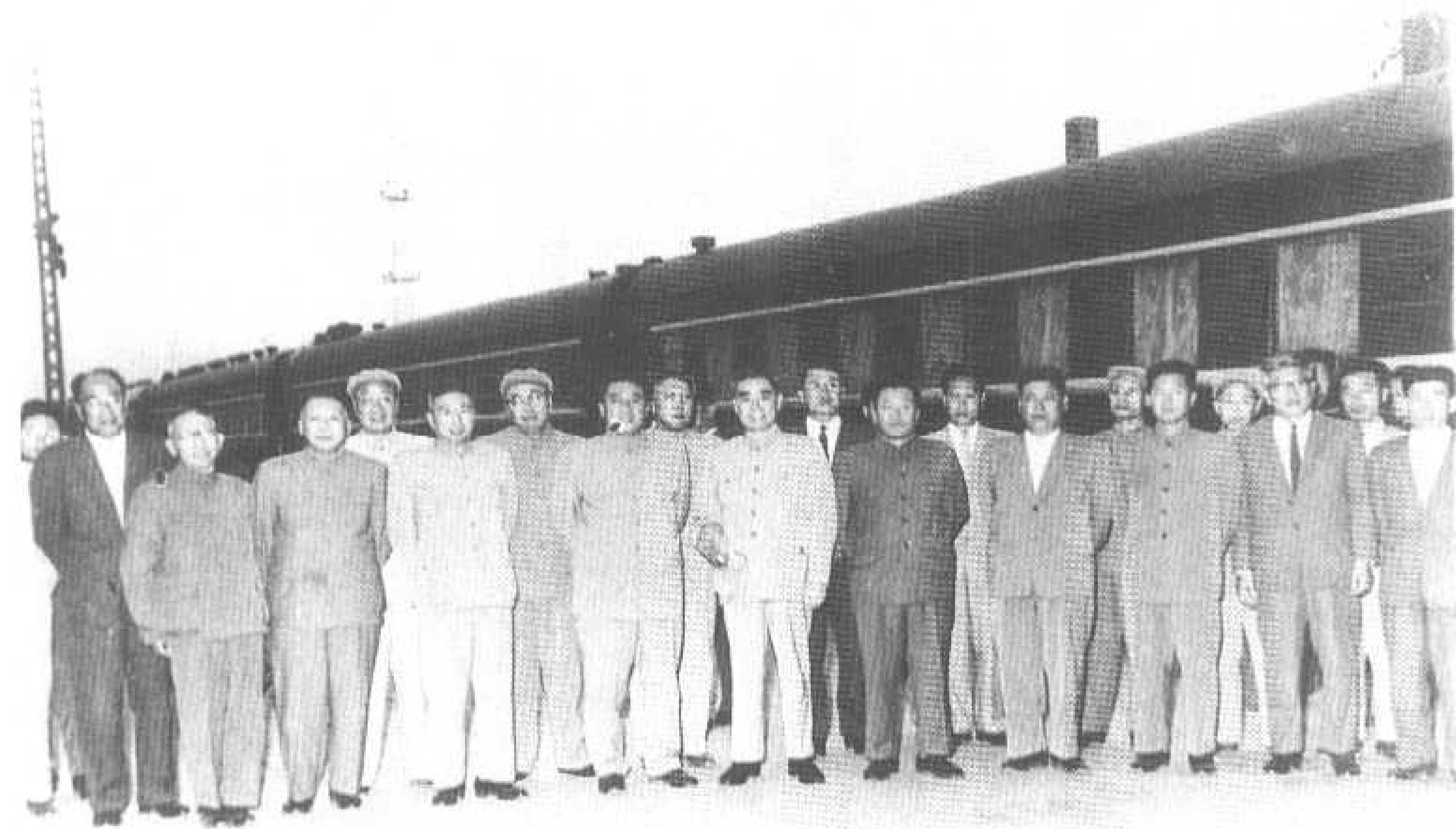


1950年，在辽西工作时

1952年，和郭峰同志在一起



1955年，和欧阳欽、任仲夷、
陈雷等同志在一起



1960年，中共黑龙江省委部分领导同志随周恩来总理陪同金日成同志到大庆参观



1962年，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与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同志在花园邨合影

1969年，在柳河
“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
和王任重同志
在哈尔滨



1982年，
和胡耀邦同志
在飞机上



和万里同志在一起



和宋任穷同志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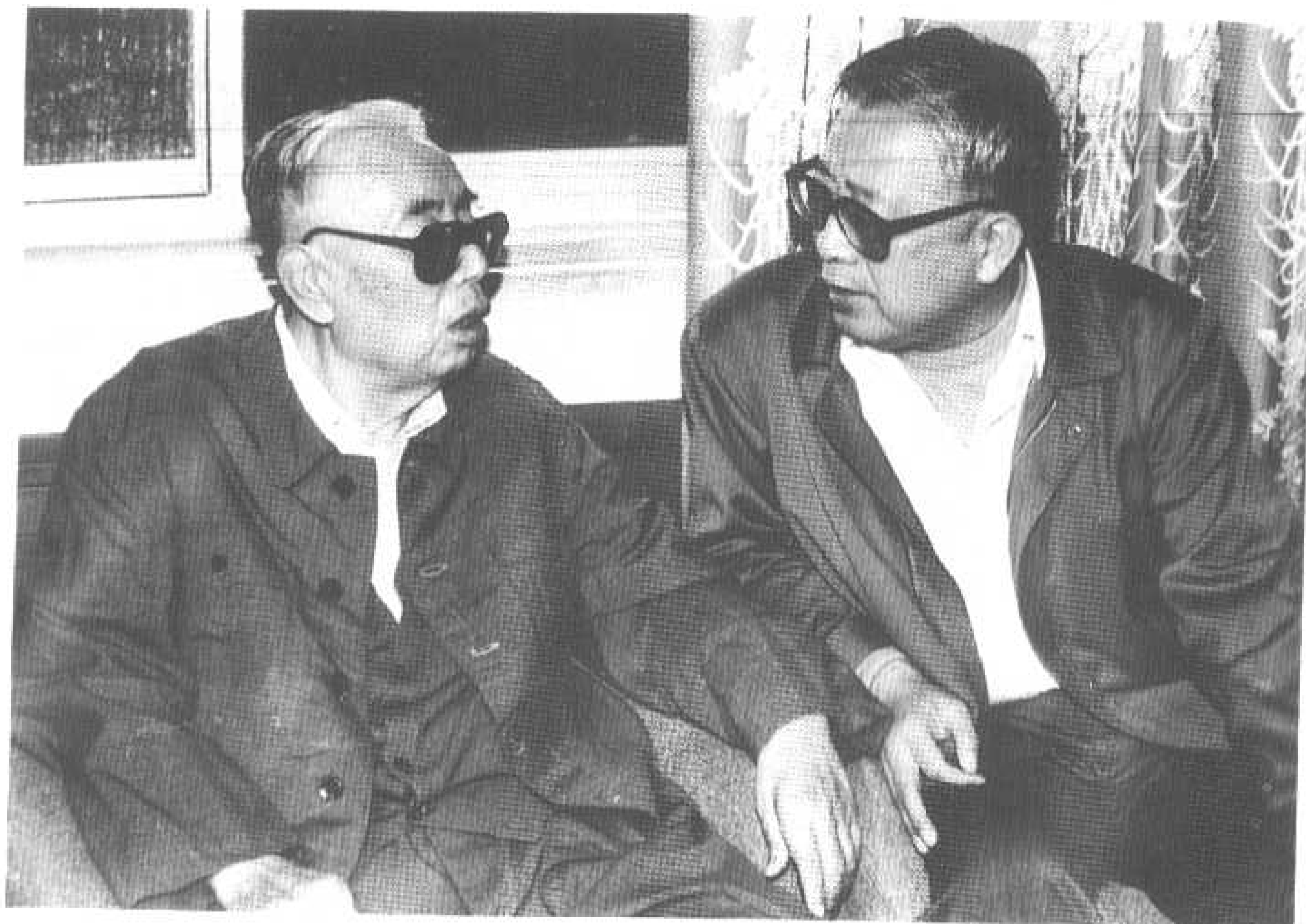
1984年，和郑大翔同志在一起



1993年，和任仲夷同志在一起



1994年，和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史立德同志在一起



1994年，和张思卿同志在一起



1994年，和荣高棠同志在一起



1991年，80寿辰时和肖塞同志在一起



1992年，和肖塞同志及子女们在一起

序 言

宋任穷

经过几年的勤奋工作，杨易辰同志的回忆录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易辰同志嘱我作序，高兴之余，欣然命笔。

我和易辰同志相识已久。在抗战时期，我和易辰同志一起在冀南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当时我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军区政委，易辰同志先在区党委宣传部，后到地委工作。1960年9月，中央重建东北局，我任第一书记，易辰同志在黑龙江省先后任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我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易辰同志1983年调最高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1986年以后我们两人都到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由此我们接触、相谈、相交，对他的了解自然也就较前更多了起来。

1960年，那正是我们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全国粮食供应紧张，中央决定从黑龙江再调出一部分粮食。黑龙江虽是产粮大省，但库存也并不宽裕，群众也开始吃瓜菜代。然而，接到中央指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沈阳开会直接分配任务，指示黑龙江多调粮食给国家，易辰

同志同欧阳钦等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做干部的工作，教育干部群众从大局出发，树立全局观念。在欧阳钦、杨易辰及省委其他同志的带领下，压低本省的供应标准，几乎将全部库存调出去，给了国家，受到了党中央、周总理的赞扬。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易辰同志的确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的好干部。

易辰同志在黑龙江工作了30年，由副省长、省长、省委副书记到第一书记，从主管一条战线到主持全面工作，始终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他坚持把中央指示与黑龙江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机械地照抄、照转，不搞“一刀切”。

“文化大革命”期间，易辰同志受到了严重冲击。他始终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对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犯了走资派错误”等，从不说违心的和违背党性原则的话，是条硬汉子。黑龙江成立“革委会”时，由于易辰同志的“顽固”态度而未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周总理、陶铸同志和我一起同易辰同志谈话，要他支持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的工作，易辰同志思想不通，但还是服从了。后来我的处境也不好，无法再为他说话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易辰同志表现了“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在全国率先响亮地提出：“黑龙江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

易辰同志的个人作风也是值得称颂的。不论“官”多大，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反腐倡廉的光荣传统。他反对大吃大喝，外出检查工作总是轻车简从，不给基层添麻烦。他待人以诚，坦诚直率，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不推过揽功。

易辰同志自参加革命，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60年，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也不管受到什么委屈，始终不退缩，不动摇，不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初衷，令人钦佩。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易辰同志也不例外。可贵的是他在回忆录中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对自己的一些缺点错误进行了分析批评，这就把错误变成了财富，留给后来者。这本回忆录，文字朴实无华，读来令人感到亲切、实在。

当前，我们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本回忆录，对于教育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对于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大有裨益的，我很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从“九·一八”到“一二·九”	(1)
一、少年时代	(1)
二、难忘的“九·一八”	(3)
三、投身“一二·九”运动的洪流	(6)
四、参加“民先”	(11)
五、加入中国共产党	(15)
六、反王驱祁斗争	(17)
七、参加“双十二”示威游行	(23)
第二章 到延安，进马列学院	(29)
一、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29)
二、在山东演出	(33)
三、马列学院的学习生活	(35)
第三章 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日日夜夜	(41)
一、奔赴抗日前线	(41)
二、反“扫荡”的艰苦岁月	(43)
三、开辟冠北根据地	(48)
第四章 转战辽吉三年	(55)
一、挺进东北	(55)
二、支援四平保卫战	(56)
三、坚持沿边区的斗争	(62)

2 2239 / 07

四、动员参军支前，全面开展土改运动	(66)
第五章 在辽西的日子里	(73)
一、辽西省成立	(73)
二、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75)
三、兴修水利，植树造林	(82)
四、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86)
五、镇压反革命	(88)
六、“三反”、“五反”运动	(90)
七、互助合作运动	(94)
八、担任省委书记	(95)
第六章 主管黑龙江省财经工作的十二年	(99)
一、能否顾全大局，是对一个共产党员 的考验	(99)
二、时刻关心群众痛痒	(115)
三、改造私营工商业	(125)
四、一个公式，三种方法	(135)
五、不上“纲要”非好汉，不到“黄河” 不死心	(145)
六、以猪为首，六畜兴旺	(152)
七、我是“蚕鱼”分子	(164)
八、且将集市作桥梁	(179)
九、让塞北人民食有菜	(186)
十、为了共和国的“两个新生儿”	(193)
十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1)
第七章 十年动乱的岁月	(210)

一、“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210)
二、在“揪斗”风潮中.....	(214)
三、被打成“黑帮”以后.....	(228)
四、柳河“劳改”	(236)
五、不为“乌纱帽”屈节.....	(244)
七、重新恢复工作.....	(254)
第八章 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	(263)
一、欢庆粉碎“四人帮”	(263)
二、挑起第一书记的重担.....	(269)
三、解放思想，落实政策.....	(272)
四、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美考察.....	(286)
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294)
六、重振雄风，加快农业发展.....	(308)
七、为使工业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346)
八、开创科技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357)
九、加强党的领导，搞好党的建设.....	(369)
第九章 出任共和国第四任检察长.....	(388)
一、念一本经，唱一台戏.....	(389)
二、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检察机关的 主要任务.....	(400)
三、把法纪检察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423)
四、建设一支忠于人民、秉公执法的 检察队伍.....	(434)
后记.....	(445)

第一章 从“九·一八”到 “一二·九”

一、少年时代

1914年3月31日，我出生于原奉天省法库县东火石岗子，即现在的辽宁省法库县红旗乡东火石岗子村。

先祖杨花系由山东逃荒来东北落户的，至今恐怕已有八九辈了。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我的父亲杨文山（字彦龙），叔父名杨庆山。

祖辈历代务农，多为文盲，最多的也只是念过几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后来，随着家业的增大，上升为地主，这时便深感没有文化的苦恼。于是曾祖父便让杨家比较有前途的人上学深造，这样，我的父亲和堂伯父荣幸地成为杨家第一代大学生。我父亲和堂伯父皆毕业于当时的北平中国大学。他们一个学经济，一个学法律。

我母亲则出身于石匠世家，由于家境较为贫寒，所以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嫁到杨家后，虽经常遭受妯娌们的白眼，但她能孝敬公婆、勤俭持家，故而赢得全家

上下的好评，也深受祖父母的青睐。

父亲读书，家庭只供给学费和伙食，至于衣服和零用钱家中一概不管。这就全靠母亲劳动所得，供给父亲读书。父亲为此很感激母亲，所以尽管俩人文化程度悬殊，但夫妻感情弥笃。

父亲大学毕业后，通过业师之婿何玉芳在天津税捐局谋到一个职业。不久，又调往哈尔滨市政管理局供职，任总务科长。

父亲在哈期间，具体搞过哪些事情，我不清楚。但后来据我所知，连接南岗区和道外区的“许公路桥”是父亲经手建造的。解放后，我曾专门去凭吊过，那是一座很普通的公路桥，但在当时也算作是一项大工程了。

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我的童年和少年是随祖父在法库老家度过的。刚满6岁，祖父就送我到本村一家私塾启蒙，学的是《百家姓》、《千字文》之类。之后又在本村念了几年初级小学。大约在我十二三岁时，到法库县第三高等小学读书。因为我对数学不感兴趣，怕上中学。为了逃避这门使我讨厌的学科，高小毕业后我又只身一人去路家房身念了一年私塾，读了《四书》、《五经》和《左传》。

这时，父亲来信，要母亲和我们兄妹到哈尔滨团聚。这样，我便随母亲于1928年底来到了哈尔滨，开始了新的生活。第二年，我进入哈尔滨第三中学读初中。刚学习了两年，父亲工作调动，离开哈尔滨。我没有随父亲到天津，而是转入沈阳启明中学补习班。在启明中学补习了半年，于1931年秋转入沈阳冯庸大学预科高中学习。

二、难忘的“九·一八”

这时的东北，已经弥漫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火药味。1931年四五月间，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中、朝农民土地纠纷，蓄意挑拨民族矛盾，一手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并借此大肆进行战争宣传。同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借口中村大尉“失踪”事件，疯狂叫嚣“武力解决”，煽动战争狂热。在制造战争舆论的同时，也加紧了军事部署，调兵遣将，运送物资。到9月初，就开始在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沈阳城里已是经常可以见到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了。看到日本兵耀武扬威的样子，我的心头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

经过周密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深夜，我们都已进入梦乡。突然大炮的轰鸣把我们惊醒。同学们拉开电灯，穿上衣服，跑到院子里。听到炮声震耳，警报凄厉，火光冲天。看方向，是北大营那边发生了战事。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街上一片混乱。日本兵到处抓人，砸毁店铺，乱抢东西。就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开来了几卡车的日本兵，把我们学校团团包围起来，然后端着刺刀，把学生和老师们统统驱赶到操场上，四面架起了机关枪。日本侵略军强令校方交出枪械。校方不答应。敌人就以学生为人质，将

人们围困在操场不准走动。当时天上下着大雨，大家又冷又饿，不少同学昏倒在地。就这样僵持了3天3夜。在残暴的日军的严密监视下，师生们滴水未进，病倒的同学不断增多。校方为了同学们的安全，被逼无奈，不得不交出训练用的枪械，日本侵略军这才撤出了学校，但同时强令学生必须于当天全部离校。

此后，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大好河山即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日本侵略军围困冯庸大学的3天3夜，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创痛，为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当时我还不清楚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我们丧失了东北大片国土，但是亲眼目睹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我的热血沸腾了！我们美丽的家园怎能容忍日本强盗恣意妄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已经是17岁的青年了，我要奔赴疆场，为国效力，决不当亡国奴！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撼了东北，震撼了全中国。东北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义勇军举起抗日的大旗，向侵略者宣战。这时，我的不少同学都在积极联络，准备加入义勇军，我也决定投奔义勇军杀敌救国。所以在日军强令学生离校时，我就和一些同学同赴北平准备找关系参加义勇军。当时路经天津，我是过家门而不入。

父亲知道了，就派人去北平接我回天津，我坚决不回家。于是，他又派我的表叔陈德昌到北平找到我，不由分说硬是将我拉回天津的家里。

回家后，父亲对我说：“你年龄还小，外面兵荒马乱的，

我和你母亲都不放心，你现在还是读书，过几年再说吧。”

我知道，我是一个独生子，父母对我十分疼爱，不愿让儿子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父母怕我私自出走，对我严加看管；在天津我又没有可以联系的同学。在这种情况下，我虽心系东北，也只好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屈遵父命在家复习功课。1932年夏，考入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插班在高中二年级学习，和任仲夷（当时叫任兰甲）是同班同桌又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

在法商学院学习两年，1934年夏毕业。时值河北省正搞会考，如果我还想继续上学深造，就必须通过这次会考，合格后方能升学。但与我一起在法商学院学习的同学却说，我们是法商预科，一般的会考我们是不参加的。于是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经过说理斗争，我们取得了胜利。结果法商学院的毕业生，未经会考，直接进入大学学习。

在天津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始终没有忘记北大营的炮声，没有忘记被围困的3天3夜，更没有忘记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我仍在寻求报国之路。

这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向前发展；而国民党政府仍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亡国危机迫在眉睫。

1934年夏，我与法商学院的几十个同学一起转入北平中国大学学习，一些人进了经济系，我则被分到法律系。

中国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培养建国人才而创建的。曾先后由宋教仁和黄兴任校长。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民党要员

王正廷担任校长，但由于他兼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公务繁忙，故不能经常到校视事，遂派亚洲司司长祁大鹏到校代行其职务。祁自知自己资历浅，又非教育界知名人士，未敢用代校长或副校长头衔，只以总务长之名代行校长职务。这个人思想反动，一切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旨意行事，呆板僵化、不苟言笑，同学们都非常讨厌他。

我在中大虽读的是法律系，但对此一点也没有兴趣，故而我经常到国学系、政治经济系听课。在这些系里汇集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学者教授，如李达、吴承仕、杨秀峰、黄松龄、吕振羽、齐燕铭等。他们在教学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来引导学生关心中国现实，并启发同学们怎样为改变中国的现状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三、投身“一二·九”运动的洪流

我在中国大学学习一年多，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5月占领了通州，并把矛头直指平津。可是蒋介石政府非但不下令抵抗，反而与日寇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这个开门揖盗的协定，不仅承认了日本强占东北的合法性，而且还将绥东、察北、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任凭日军自由出入，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中国政府的软弱退让，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1935年5

月，他们又以种种借口，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根据此协定，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驻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实际上承认了日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华北的控制。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扶植老官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与此同时，天津的日本报纸公然发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的消息，一小撮汉奸、亲日分子鼓噪呐喊，叫嚷自治。不仅如此，日本的特务、浪人等自由出入中国地界，日本军队恣意挑衅，整个华北地区已不复为中国人的国土！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对中国红军则倾其全部兵力进行大肆“围剿”，对报纸刊物上的反日言论严加限制、扼杀。1935年春夏之交，河北、山东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水灾，国民党政府听之任之，不予救济，使成千上万的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北平街上，每天都涌进大批拖儿带女的难民。尤为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的赈济官员非但不管不问，竟然将有限的救济款中饱私囊。

民族的危亡，噬咬着每个中国人的心，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无数中国人的仇恨。这时又有消息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初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为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北平地下党组织及北平学联毅然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举

行全市学生请愿大游行。

12月9日清晨，来自北平各大、中学的数千名学生陆续汇集到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他们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国家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6项抗日民主要求。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时，游行指挥部决定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在最前面。学生们高举大旗，口号声此起彼伏。当游行大队行至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指使大批军警和消防队用大刀、棍棒和高压水龙向同学们袭击。手无寸铁的学生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数九寒冬，学生们的衣服被水龙浇透，冻成了“盔甲”，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学生们的情绪，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怒火。如此搏斗达2个多小时，到下午5时，受伤者达40余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游行指挥部决定：撤走队伍，结束冲突，并决定从10日起全市实行总罢课。

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党领导的学生组织，所以12月9日这天的行动我未能参加。但是亲身经历了这场学生运动的同学们回校后，都以激动的心情向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我听了以后，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时也为自己未能参加这次活动而十分遗憾。但是我深信，救亡运动正猛烈发展，我一定要加入到这一洪流中去，实现自己几年来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愿望。

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日子，北平学联决定召开市民大会，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

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

这次的大游行我参加了。这是我革命活动的开始。当时的情景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当日拂晓，我和同室的几个同学还没有起床，中大经济系的任仲夷就把我们几个同是法商学院的同学召集在一起，他说：“今天我们还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你们是否愿意参加？”任仲夷是我在法商学院的老同学，他已是共产党员。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从“一二·九”以来他的表现，我断定他是一位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何况，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已是我久有的心愿。他这么一说，我立即毫不犹豫地说：“愿意，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任仲夷见我们大家情绪都很高，就把参加活动的方法告诉了我们。随后，我和几个同学就装着上街闲逛，仨仨俩俩地走出校门。由于有了上次游行的经验，这次北平学联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事先对外宣布要在天安门集会，以转移反动当局的视线。当大批军警正聚集在天安门警戒的时候，我们在天桥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集会。这次不仅有北平各大院校的学生，而且还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农民、市民、小商贩及东北流亡北平的同胞。他们与学生一起喊口号、贴标语、散发传单。人越聚越多，我们各校的学生就东一处、西一堆地站在高处向市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向大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蒋介石政府卖国罪行。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讲，最后带领群众高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爱国自由”等

口号。

大会当场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决定到外交部大楼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游行的原定路线是：沿前门大街进前门，经天安门、东长安街，转东单到外交部街。但当我们沿前门大街向北行进时，反动当局发现他们上当后，便急派军警前来阻止，并赶在游行队伍前面把前门关闭了。指挥部和军警进行谈判，要求入城。几经交涉，军警才表示可以分三批通过。指挥部经分析，决定分三批入城：一队从正阳门进入；二队绕道宣武门入城；三队留守原地，待第一、二队在宣武门会合后再回师迎接第三队。行进途中，警察和敌人的摩托车队把学生队伍夹在中间，但学生们毫无惧色，昂首前行。

我随第二队直奔宣武门，一路上群情激昂，口号震天。有的同学把嗓子都喊哑了。快行至宣武门时，突然几十辆摩托车冲进游行队伍，接着武装警察就挥舞着枪托和皮带抽打学生。这时有两个女同学被警察打倒在地上，可是她们还在抵挡着，呼喊。这样下去有被打坏的危险。我看到后，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猛地把警察推向一边，然后，拉起她们跑进一个胡同。警察并未就此罢手，而是跟着追了过来。见此情景，我一边招呼她俩快跑，一边顺手拿起砖头砸向后面的警察，也许是敌人看我个子大，实在不好惹，在挨了两砖头后，仓皇撤退了。

夜幕降临，狂风大作，反动当局熄灭了所有的路灯。爱国学生在与军警的搏斗中，被捕者数十人，受伤300余人。

慑于人民群众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四、参加“民先”

“一二·九”、“一二·一六”的革命狂飚很快冲出北平，波及全国各地。国民党统治当局极为震怒。不久，南京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北平学联，并宣布其为非法组织。

但是，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是扼杀不了的。为了进一步扩大“一二·九”运动的成果，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根据党的指示，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1936年1月初，宣传团在河北几个县的集镇乡村，向农民、工人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宣传团的基础上，于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此时，我因到天津办事，没有参加南下宣传。

当我从天津回到北平时，正值北平“民先”总部在师范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大学也于北平“民先”总部成立之日，建立了民先大队部。第一任大队长是吴承华。此后不久，在中大民先大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加入了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大民先队成立不久，就遭到了2月的大逮捕。当时国民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当局勾结起来，有计划、有预谋地对学生运动实行镇压。国民党蒋介石当然知道，学生运动是共产党发动起来的，镇压学生运动就是镇压共产党。因此在中大发生了“二月雪天”事件。1936年2月21日，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乘警车冲入中大，当时我们正在逸仙堂举行欢迎南下宣传队归来的大会，军警在学校当局和特务分子的带领下闯进会场，我和纠察队的同学见来者不善，便将他们挡在会场外。敌人急于抓人，用警棍驱赶阻拦的学生。同学们愤怒了，都不顾一切地与警察扭打起来，逸仙堂内顿时桌椅横飞，乱成一团，警察鸣枪恫吓，我和吕隆、鲁方明趁此混乱的机会，一边与警察厮打，一边掩护中大学生领袖董毓华、王同等从侧门脱身。等我们将他们送走回来后，鲁方明、孔震屏等另外几个学生骨干已被警察逮捕，当天夜里公安局又捕去国文系的胡述文等30余人。前后逮捕中大学生达60余人。

中大学生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但他们坚强不屈，不肯向反动当局低头。鲁方明在狱中还以饱满的激情用满江红词牌填写了一首《二月雪天》歌。这首歌很快在北平各大学传唱开来。歌词我还清楚地记得：

二月雪天，
被捕在中大门前。
一个个，
绳捆索绑，
警棍军鞭。

坐囚车到公安局，
审讯之后转军监。
问热爱祖国有何罪？
无人答。
在军监，
军法严，
戴脚镣，
卡手铐，
黑暗铁窗里，
折磨囚犯。
一天两顿窝窝头，
清水菜汤没有盐。
恨不抗敌寇害学生，
发冲冠。

被捕的同学在狱中遭受着磨难，我们必须想办法营救。但是反动当局已将北平学联明令取缔，中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也大多被捕。学校当局这时趾高气扬，认为这回学生活动该到此结束了。我们非常气愤，纷纷向校方提出质问：“为什么你们不保护学生，反而带领军警逮捕学生？”“学校为什么向特务提供学生的住址？”“你们如不立即保释被捕同学，将成为历史罪人。”但学校当局对我们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后经段尚卿（段君毅）、任仲夷和我及几个同学研究决定，为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应尽快把学生会恢复起来。不久，学生会冲破总务长祁大鹏的百般阻挠重新得以恢复。之后，我们开始四方奔走，营救被捕同学。1936年4月，在

党组织的努力下，数十名被捕学生终于获得了自由。返校时，他们受到中大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二月大逮捕之后，中大校园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全校师生都为被捕的同学而悲痛。但是学校上下课的钟照常当当地响，学校当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国难当头，反动派根本没有一点爱国心、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那钟声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是愤怒与气恼，哪还有心思上课呢！

这时，任仲夷和我悄悄地商量，决定把那个大钟搬走，以显示同学们决不向反动当局屈服的决心。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任仲夷悄悄摸到挂钟的大树下，抬头望去，树高三丈，而钟正好牢牢地拴在用木棍支起的树干上，要想把重达几十公斤的大钟搬下来，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任仲夷小声对我说：“老杨，你看怎么把它弄下来呢？”我想了一下：“这样吧，你在下面给我放哨，我上树设法把它解下来。”于是我用平时学的武功，飞身上树，很快把系钟的绳索解开。由于大钟被树干和支柱夹住，往下拿的时候着实费了一些劲。我用一只胳膊攀住支架，另一条胳膊夹住大钟，一点一点，使出全身力气，把钟搬了下来。接着我俩按照预定计划，抬着大钟准备把它扔进院后的一口深井中。但是当我们把钟抬到那里后，才发现由于天气寒冷，井口早已被冰封小了，放不进这口大钟。没有办法，我俩又抬着它绕道 150 多米，由我钻进校园西边的一个假山洞里，将钟藏了起来。翌日清晨，钟声不响了，同学们好奇地跑到树下察看，原来挂钟不翼而飞，好生奇怪。而有些同学

则深有所悟地说：“大钟也和我们一起罢课了。”

五、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6月，北平学生又发动了“六·一三”大游行。这次游行的时间较长，我们因为多次游行已有了经验，就是运用游击战的战术，敌来我走，武装警察从前边阻挡，我们就将后队做前队，把警察抛在后边。在游行中，我们向警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要他们不要充当反动派的帮凶。在学生们爱国行动的感召下，不少警察不再动手打人，但仍被迫执行驱赶学生的命令，因此有的警察和学生抱头痛哭，其景十分感人！当我们走到王府井一带时，队伍被驱散了。这时我赶紧卷起大旗藏于怀中，到北平大学法学院后队伍又重新集合起来，我也把旗帜再次亮了出来。

“六·一三”游行以后，中大民先队长吴承华由于工作过于繁重，党支部让他辞去民先队长的职务，并决定由我接替吴承华担任中大民先队队长之职。我认识到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在交接工作时，吴承华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民先工作的经验，之后还约我一同参加了西城区民先区队的会议。

自“九·一八”事变后，我就一直在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在“一二·九”运动的洪流中，我终于看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自那以后，我就产生了入党的要求。但那时党组织是秘密的，我一时还无法实

现这一愿望。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记得在我担任中大民先队长之后不久，也就是1936年秋，有一天中大学生会主席史立德和我在一起议论当前学生工作。他对我说：“老杨，你怎么还不参加党呢？应该参加了。”一听这话，我十分高兴，当即坚定地说：“入党是我早就有的愿望，现在我要求加入党组织！”不久，任仲夷和吴承华通知我和孔震屏接头。接头时手里拿着《大众生活》杂志作暗号。从此，孔震屏就成为我的党小组长。我入党没有预备期，没有写申请书，也没有举行宣誓等入党仪式。任仲夷和吴承华让我与孔震屏接党的关系，就是代表党接收我为中共正式党员了。这是由于当时我们处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白区的党组织大部分实行单线领导，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以免组织遭受破坏。我当时参加革命，参加党，是从要求抗日救亡出发的。国民党蒋介石拱手将东北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才是爱国家爱人民的党，所以我才投入共产党的怀抱。至于接受共产党的纲领，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那是入党以后，在进一步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特别是到延安学习，在党的教育下才真正明确了。

学校放寒假了，我还与往年一样，抬脚就走，没有考虑自己已是一名共产党员，要遵守组织纪律。从家里回来后，孔震屏立即找到我，他严肃地批评道：“你为什么不请假就走了，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这样自由散漫呢？”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此后，我才开始懂得共产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并牢牢把它记在心里。

六、反王驱祁斗争

1936年下半年，在中大党支部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校长王正廷和打倒总务长祁大鹏的革命学潮。

“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大同学曾多方做祁大鹏的团结工作，力求使他站到抗日方面来。但是他冥顽不化，在反对学生抗日救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参与制造了二月大逮捕事件后，他又以董毓华3个月不到校上课为由，将其开除。后虽经吴承仕、黄松龄等进步教授的反对而收回成命，但还是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进行防范，如学校的门前增设了警察，传达室多了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便衣警察、特务密布学校的每个角落，同学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下。

1936年9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来到中大，他对中大党组织指示说：“学生运动需要有更多的活动地点，清华、燕京虽对‘一二·九’运动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地处西郊，交通不便。东北大学活动频繁，已引起反动当局的严密注意，中国大学党的组织基础很强，地处城里，完全有条件为‘一二·九’运动再开辟一个活动场所，以分散当局的注视。”

当时中大在校的共产党员约40余人，是北平各大学中最大的党支部。民先队员约有130余人，也是人数最多的。党员和民先队员在全校学生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且与群众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大在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唯一的障碍就是来自祁大鹏的阻挠。所以要使中大爱国学生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并起到骨干作用，首先就必须搬掉祁大鹏这块绊脚石。经上级组织同意，以打倒祁大鹏为目标的革命学潮开始酝酿了。

正在此时，我们得到中大校长王正廷要出任中国政府驻美大使的消息。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驱逐祁大鹏的好机会。因为王出国前，要来校安排工作，我们就可以请他撤销祁的职务。王正廷到达北平时，学生会组织各班代表 50 余人到车站“欢迎”，并准备递上事先拟好的驱祁请愿书。但因王是国民党要员，随身护卫很多，又有不少军警在周围警戒，所以控告信没有递上去。第二天王正廷召集全体学生“训话”，他说：“我奉命出任驻美大使，但仍为中大校长，祁大鹏作为该校总务长，是尽职尽责的，他给学校申请了修建理科大楼的经费，又向中央请示给中大增加补贴费用，他还是给我们中大办了许多事的……”王讲完话，不管下面作何反响，便匆匆地从礼堂后门走了。同学们得知王去西苑厅召开董事会，便愤怒地把西苑厅包围起来。大家在门外齐声呼喊：“打倒祁大鹏！”“要求董事会把祁大鹏撤职查办！”高元贵、陆钦鑫在宣读完祁大鹏的几大罪状后，冲到会议厅，当面把控告信交给了王正廷和董事会。可是王正廷对学生的强烈要求未予理睬。学生会当即宣布全校从即日起罢课，祁不被撤职查办，决不复课。这样一直僵持到下午 3 时，王正廷走了，包围也没有结果。

祁大鹏因有王正廷撑腰，气焰更加嚣张。他不顾全校

绝大多数师生反对，开除了史立德、高元贵、陆钦鑫等几位学生会骨干，并不准他们擅自进校。祁大鹏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全体同学。一天清晨，夏英喆跑到宿舍找到我，与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当时考虑：同学们都发动起来了，形势很好。如果他们一被开除，我们就停下来，祁大鹏就会更加猖狂，对今后的学生运动不利。本来我做民先工作是不能完全公开的，但到这时也只好挺身而出。我和夏英喆分别到各班号召同学们坚持罢课，同学们很快地又被发动起来。

一天下午，祁大鹏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这时，全校七八百人突然齐集在他办公室的院子里，大家高呼：“打倒祁大鹏！”“祁大鹏赶快滚蛋！”可是任凭同学们喊声震天，祁大鹏就是赖在屋里不动。后来他看到同学们大有不答应誓不罢休的架式，只得同意我们派代表去谈判。大家推选夏英喆和我进去谈。我们进去后，强烈要求他立即离开该校，不然同学们是决不会离开的。经过反复争论，我们毫不退让。他见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被迫同意离开。临走前，他的狗腿子曹鼎襄替他请求我们，请大家不要伤害他。我们出来向同学们说明情况后，大家自动一字排开，没有一人乱动。祁大鹏在北平市公安局第二区署朱署长陪同下，从同学们面前弯腰低头而过。快走到大门时，他回过头来，向同学们连连作揖道：“你们是我的祖宗，我算认得你们了。”

祁大鹏走了以后，新校长人选又成了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中大学生运动的发展。不久董事会开会决定：由天津河北法商学院院长吕复出任中大代理校长。吕复是国民党

的顽固派，他破坏学生运动的手法比祁大鹏还高明，倒祁较易，拒吕则难。学校党组织紧急开会研究拒吕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派人去天津法商学院，与该校党组织和学生取得联系，让他们支援中大的行动。法商学院党组织和民先工作的基础很好，吕复在校很不得人心。所以一经中大提议，他们立即行动起来配合我们，他们把“吕复止步”的标语悬挂在校门。至此中大和法商学院联合起来开展了倒吕运动。吕复这个人很狡猾，面对这种形势，他认为坚持下去于己不利，便与当局密商，把法商学院解散了。

新校长人选还是没有落实。党组织经多次研究，决定请吴承仕、杨秀峰、黄松龄等德高望重的教授组成校委会主持校政。但吴先生婉拒了。他说：中大是私立大学，校长人选一向是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的。最后经做工作，何其巩先生出任校长之职。何其巩原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曾任冯玉祥将军的秘书长。学识才华都不在北平一些学者之下，况且他还与冀察当局的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私交很深，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1928年他担任北平市长期间，曾为“三·一八”反北洋军阀段祺瑞遇难的40余烈士立碑，并亲自撰写碑文；冯玉祥倒蒋失败后，他曾两次赴苏考察，对苏俄的十月革命深表钦佩。蒋在分化西北军时，曾想将其拉到自己身边，但何对蒋的言行很是反感，不为所动。后来他摆脱蒋的干扰，到北平担任华北大学校长，又兼中大的常务董事。

何其巩正式任职之日，全校师生举行了欢迎大会。何先生在会上发表了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的演说，得到了全

体师生的热烈欢迎。届时何还把宋哲元、秦德纯、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天津市长张自忠都请到中大。学生们也贴出了“欢迎宋委员长领导抗日！”“拥护二十九军”的标语。宋哲元应邀在逸仙堂向全校师生讲了话，讲话中他虽未提团结抗日，但他号召同学们要“勿忘国耻，自强不息！”第二天，北平各大报纸都登载了何其巩出任中大校长、宋哲元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前来祝贺的消息。中大的这次学潮，历时二月余，经过了驱祁、反王、拒吕、迎何的波折，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何其巩入主中大后，基本实现了他对学生许下的诺言，对中大的学生运动不予干涉。他还拨出5间教室作为学生会的办公室，出资给我们买油印机、纸张等。中大出现了较为平稳的局面。这期间，外校一些活动不便的组织都到中大来办公，北平各界救国会、全国和北平民先总队也经常到中大办公，学校里不仅白天人流如潮，夜晚很多教室也灯火通明，中大很自然地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

中大重新出现火热的斗争局面，这深深地激怒了反动当局。他们认为何其巩纵容赤色分子，是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不久南京教育部写信给北平市长秦德纯让他密切注视中国大学的情况。1937年1月，国民党当局经周密策划，将黄诚、吴承华、陆钦鑫、史立德、吉敏等5人抓进监狱。不久传出国民党当局已指示北平市长要将5名学生押往南京的消息。党组织闻讯积极进行营救工作。后来何其巩先生亲自出面，找到宋哲元，这被捕的5人才未送往南京，后又经何先生担保，使他们得以出狱。

敌人并未善罢甘休。1937年三四月间，教育部突然宣布委任陈希蒙出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中大学生闻讯找到何校长。何先生说：“我何某决不留恋校长的位置，但我是由董事会选举的，我无权交出校长的职务。”他接着又说：“同学们既然反对，那我们当共同奋斗。”

学生会在摸清陈的底细后，找到他下榻的旅馆，对他说：“中大为孙总理所创，一向以内除国贼，外抗侵略，振兴中华为办校宗旨。当前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华北，我们除完成学业外，更重要的责任是与全体民众一道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当中。不知陈先生对此有何见教？”陈自知自己是未经董事会选举的校长，不合手续，又看到还未进校门，就遭到学生的“训教”，于是他未敢到任便灰溜溜地离开了北平。

中大学生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斗争，粉碎了反动当局破坏学生运动的种种伎俩，保住了中大这块学生运动的基地，使抗日救国活动朝着更加广泛、纵深的方向发展。这时，中大的全体师生已形成了空前团结的局面，抗日救国已成为广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经常议论的话题。这就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一天，我们正在大教室（即逸仙堂）开一个抵制日货的动员大会，两个日本人化装潜入会场。同学们发现后，立即哄起来：“不要让他俩走了。”可是那两个日本人却旁若无人地向大门走去。大家这时不知怎么办好，我想不管怎样，也决不能叫他们这样走了，于是我跑到前边将大门关上，然后把两个日本人抓了起来。校长何其巩赶来后，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他责问日本人为什么偷偷摸摸

地跑到我们学校来，并说：就是客人来也得到门房打个招呼嘛！以后这两个日本人就由他交给政府处理了。

七、参加“双十二”示威游行

1936年11月，日寇进攻绥远和察东，当地爱国驻军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奋起抗战，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者和蒙奸德王的伪蒙军，收复了百灵庙和下庙。百灵庙大捷的消息，很快传到北平。青年们兴奋异常，积极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绥远抗战局面，实行全民抗战。北平学联组织数千名学生上街宣传，募集慰问品，并发起捐献皮衣的运动。各校还组织赴绥远前线慰问团，以极大的热情冒着凛冽的寒风前往前线进行慰问活动。

与学生的愿望相反，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意孤行，仍然执行对日屈膝投降的政策。绥远大捷不久，蒋介石即对绥远驻军威胁利诱，并派汤恩伯率军进驻绥远，对抗日军民则进行监视。与此同时，在上海，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7人。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立即激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愤怒。

消息传来，北平学生急切要求行动起来，学联及时发出号召：“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

1936年12月12日，北平再次爆发了抗日救国大示威。

由于有了前几次游行的经验，我们各校学生先不在学校集合，以免一出校就和军警打“遭遇战”，而是分别到几个地点集合，然后在东皇城根汇合。

当局得知学生活动的消息后，一清早便在大街小巷布满了军警，他们四处巡逻，寻找可疑动向。我们不动声色，按着事先约定，几乎在同一时刻汇集到东皇城根。示威游行开始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其中不断有小部队向它汇集，人越来越多，我们手挽着手，大声喊着口号：“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领袖”、“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示威中，我们还不时地停下来，向市民进行宣传，张贴标语，举行演讲。许多市民受学生的感染，从家里跑出来，先是在一旁观看，继之就与我们一起高喊抗日口号，有许多人还加入了游行行列。

在东华门前，游行队伍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车，我们立即围拢上来，要求宋下车接见学生，宋不予理会。同学们就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等口号。宋见无法行走，只得答复下午在景山与学生见面。

下午1时，示威的学生齐集景山。可是我们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宋的踪影。在同学们等得有些不耐烦时，秦德纯出现了。他说：宋委员长有事，派我前来与大家见面。当他说到“5年前政府丧失东北是因为准备不充分”时，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喊道：“不对，是政府不抵抗造成的！”秦德纯见无法与大家对抗，便转换了话题：“大家一早就出来了，一定很饿。我给你们带来一些东西，同学

们是不是先喝水、吃点饭，有话咱们改日再商量。”我们知道秦德纯这是在搪塞，于是都拒绝吃他的馒头，坚持不散。直到万家灯火时，我们才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高呼着抗日救亡的口号返回学校。

就在我们游行的这一天，在西安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了逼使蒋介石抗日，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一时全国群情激奋。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应张学良之邀，派出周恩来等到西安，经过艰苦努力，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第二天，西安事变的消息即传到北平。大家听说后，无不欢呼雀跃，好像全民抗日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从这以后，我们密切注视着西安的事态变化。当时我们比较年轻幼稚，头脑简单，同学们大都这样认为：蒋介石对日寇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却集中兵力大打内战，对民众的抗日救国不但不支援，而且还大肆镇压，这次被抓住了，如果不杀掉，实在难解心头之恨。可是不久，传来消息：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张学良还亲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

我和同学们一时大惑不解：蒋介石杀了那么多人，好不容易把他抓起来了，为什么又放走了呢？为了解决同学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北平地下党组织、民先队和学联开了多次讨论会，引导大家充分认识杀了蒋介石是否对抗日有利等问题。经过讨论，认识到如果杀蒋，就会给南京亲日

派以借口，从而挑起内战，这显然更有利日寇的侵略，而对形成全民抗日的局面不利；放了蒋介石，则能促使他放弃内战，走上抗日道路。中国共产党不念旧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英明决策，令同学们深为感佩。我从中也受到很大教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一些了解。

1937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18周年，北平地下党决定组织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北平学联委托北大和中大进行筹备工作，并拟聘请杨秀峰、许德珩等一些参加五四运动的前辈莅会演讲。正在这时，我们听说北平的“新学联”也要在同一天召开纪念大会。所谓“新学联”，即由国民党组织的官办“学联”，它是由极少数被收买的特务学生在陶希圣、杨立奎等操纵下，专事破坏学生运动的组织。他们要在同一天举行大会，无非是与我们搞对抗。为团结和争取群众，学联派代表与“新学联”协商，提出共同召开纪念大会。几经洽谈，他们无法拒绝。于是拟定双方各出7人主持大会。地点定在师范大学风雨操场。

5月4日下午1时，北平各大、中学学生4000余人陆续从四面八方齐集会场。中大的吴承华、史立德和法商、清华、北大等校代表共7人在主席台上就座。为维持会场秩序，学联组织了由各校挑选的200多人的纠察队，主力是中大的一些身强力壮的民先队员，并指定我担任纠察队长。

各校同学到达后，却未见一个“新学联”的学生到场，可是主席台上却坐满一些乌七八糟的人，有的还故意显露一下身上佩带的枪支，以此恫吓学联代表。这时志成中学的学生全部拿着童子军棍进入会场。一看这架势，我预感

到要出事。但由于我们事先并没有想到会发生冲突，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学和纠察队都是赤手空拳。

会议开始由老学联负责人史立德主持。当学联代表致词后，会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强烈的抗日救国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新学联”见此情景，立即提出由他们主持会议，同时还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为此新老学联的代表在台上争执起来。这时台下志成中学的学生在校长吴葆三的指使下，全体出动，大打出手，他们一伙人冲击主席台，要把史立德、吴承华等拉下台来，另一伙人则挥舞棍棒砸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总理遗嘱，接着又撕碎了国旗、党旗，企图陷害学联。我和中大的一些纠察队员站在主席台前边，全力将这群打手挡在旁边，让史、吴等人赶快脱身，但我们却陷入无数棍棒的包围之中。我指挥纠察队且战且走，眼镜被打碎了，衣服也被撕破了，有些纠察队员则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总算全部撤了出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有计划干的。幕后的指挥是师大的教授杨立奎、陶希圣和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等。在我们离开师大操场以后，陶希圣洋洋得意地说：“我们将共产党的崽子们打跑了。”

纪念五四的大会就这样被敌人破坏了。为此北平学联决定：向全国发出公告揭露陶希圣、杨立奎等人的丑恶行径；慰问受伤同学；同时向地方法院对陶提起公诉。

就在纪念五四大会前后，北平民先组织有一个变化，原来北平民先总队下面就是区队，基层是各校的民先队。到

1937年时，由于组织发展了，所以又在区队之上设立了大队。整个北平是3个大队，西城区范围组成一个第三大队，我担任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北平总队长是孙传文，副总队长是我的同班同学李萍。原北平民先总队长李昌担任全国民先总队长。

我的工作范围较以前扩大了，但主要工作还是在中大民先队。对外校民先队的工作我只是兼管，平时很少去。主要是靠华艺和女2中的几位女同学作交通员来联系。女同学作交通，不易引人注目，便于活动。这几位交通员是管振堃（后改名管莘）、朱亦筠（后改名许明）和朱伯良等。这时与我同在民先队工作的有吕世隆、吕潮、郎德荣、刘祖章、唐滔默等。

在此期间，为了配合抗日救亡运动，我还与校内外的同学排练了一些小型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我记得只在校内演出了几场，还没等到校外公开演出，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后来，我们就以这个剧团为基础，组织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第二章 到延安，进马列学院

一、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的全民抗战开始了。

战火在 frontline 燃烧，古老的北平沸腾了。7月11日，民先队、学联、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作家协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组成了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并在7月13日发表了市民拥护二十九军抗战宣言：（一）誓死反对日本武装侵略华北；（二）拥护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保卫平津；（三）立即驱逐日本驻军出境；（四）反对签订一切屈辱条约。

北平学联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的运动，学生和市民都踊跃响应。几天的时间，只中国大学校园里的麻袋就堆积如山。接着学联又为前线官兵发起了捐献一万件背心的运动；茶商也发起为将士捐献一万包茶叶运动；儿童们则发起捐献“一大枚”（铜元）运动；妇女界还特别出版了《妇女抗战》杂志，为抗日救亡做宣传。

这期间，我们民先队员整天奔走在抗日救亡的活动之

中。在北平学联和民先总队的组织下，各学校都先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有些学校还成立了联合救护队，上前线护理伤员。有几天伤兵下来很多，传说在廊坊打了大胜仗。我们中大的民先队员就夜以继日地奔赴前线搞慰问活动。可是十几天之后，北平便沦陷了。原来肩负着冀察军政重任的宋哲元，对抗战根本没有决心和信心。他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一方面不甘心接受日本的逼迫，让平津和冀东一样的“特殊化”；另一方面又总想在日本和四大家族的矛盾中保全自己的实力。日本侵略者也看透了宋哲元的心态，于是声称“只要签订和约，二十九军撤离北平，日军不进北平城”。同时，却在暗中调动援军。待援军调齐之后，日军便开始向我大举进攻，并于27日向冀察当局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冯治安师）于28日正午以前自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于28日夜弃城逃往保定，30日北平沦陷。这时，我们民先队并不知情，还在加紧进行支援前线的工作。一觉醒来，街上已布满日军的岗哨。北平城内混乱不堪，人们扶老携幼，如潮水般地向城外跑，可城外的人又成群结队地往城里拥。

北平已呆不下去了。这时我们就以中大的剧团为基础，组织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准备离开北平到外地进行移动宣传。这个剧团刚组建时有郝龙（艺专学生）、张楠、张瑞芳、管莘、赵启海、陈荒煤。我们将组织剧团的事报告了上级党组织，于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将荣高棠（荣千祥）派到这里，以加强剧团党的领导力量。经选举郝龙任团长，荣高棠任副团长。开始行动的目标并不很明确，只规定了大

方向，即先到济南，然后再作计划。由于形势紧迫，党的关系在北平也来不及办妥，便由黄敬写介绍信，让我们到济南去接关系。为活动方便，临走前黄敬另外又写了四五封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在上海的沈钧儒，说他会给我们帮忙的。于是我们经过简单的准备，在平津线重新通车后，便踏上了流动演出的征程。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立即封锁了平津、平绥、平汉铁路线。8月6日平津线开通，我们立即启程前往天津，准备再从那里从海路转道青岛或烟台，然后去济南。

到天津后，由于人生地不熟，我们剧团来的几个人只好暂时住在我家里。当时我父亲因时局变动，不愿在政界做事，已赋闲家居。家里连厨房在内只有3间小房，让出两间，我们这些人就挤着打地铺睡。剧团后来的人又陆续汇集天津，我家已没有地方落脚，这时我想起从前有个同学，是广东人，他有个叔叔是天津广东小学校的董事长，于是我找他，请他去动员他的叔父，将广东小学校的教室借给我们，作为剧团的居住地。开始他的叔父不太愿意，我就用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启发他。也许是我们的爱国热情打动了，最后他点头同意了。后来的同学便在广东小学住下。以后大批北平的流亡同学，有许多也是在广东小学落脚的。

天津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从海路到山东。于是找到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请他们帮忙运送中国学生到烟台等地，他们表示完全可以。于是我们剧团搭乘太古船顺利到达烟台。我们在烟台呆了一个星期。这

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并在这里学会了游泳。几天后，我们就乘汽车前往潍县，再从那里改乘火车到达济南。到济南时，市内各学校早已被先期到达的平津流亡学生住满。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团体，队员不能分开，只好通过熟人找到一个较大的住所——济南高中。我们的组织关系也在这里接上了。

在济南期间，经北平演出同学会的介绍，我们又吸收了陈光烈、曹叔铎、郭同震、胡述文等平津流亡学生参加了剧团。此外还有张楠的小妹张忻，她是来找她的两个姐姐的，也因此被吸收进来。同时，也有离开剧团的，如团长郝龙，他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抗战初期，我们除陕甘宁外，还没有其他根据地，所到之处，都是国民党统治区。这样活动起来很不方便，为了尽快地进行抗日演出，取得合法身份，我们带着黄敬的介绍信，在这年的八九月间从济南去南京找沈钧儒帮助安排。

到南京后，我们在位于中山陵附近的一幢花园洋房找到了沈先生。他看完黄敬的信后，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这事我不好出面，但我可以把你们介绍给邵力子。于是我们又拿着沈钧儒的信去见邵力子。邵力子耐心地看了我们的介绍信，他说：“没问题，国民党教育部正要组织一个宣传队到前线演出，我看你们非常合适，这样吧，你们直接去找陈立夫，他会给你们安排的。”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他看到我们是邵力子介绍来的，也没说别的，只是说我不懂宣传，你们还是去找张道藩，他对

这方面熟悉。

我们见到张道藩后，开始他对我们并不十分信任，可能又见我们是陈立夫介绍的不好拒绝，于是他说：“你们先演出一场，我看一看。从救国会给你们拨一点钱，把节目说明书印得好一些。”就这样，我们开始认真准备起来。届时，陈立夫和一些政府要人都赶来观看，还有许多抗日进步人士，如沈钧儒、王昆仑等。演出是在建国礼堂进行的。节目有陈荒煤写的《打鬼子去》、《七二八之夜》等短剧，歌曲有《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此外还有我写的一个大鼓词，名字忘记了。张瑞芳、荣高棠等都参加了演出，我也客串了几个角色。

演出结束后，张道藩认为不错，说教育部正要成立一个宣传队，你们就跟着我活动吧。我们一听，暗自叫苦：这可不行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社团，与他绑在一起将失去自由。但口头上只是对他说：我们是北方人，还是回山东活动比较方便。张道藩听罢也没坚持，便给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写了一封信，让我们去找他。于是我们剧团结束了在南京的活动，又返回济南。

二、在山东演出

我们回到济南后，住在大明湖旁的教育馆里。何思源很支持我们，还给剧团挂上了山东省教育厅移动剧团的名义，生活经费和活动费用都由教育厅支付。此外，还给剧

团派来一个叫钟志清的人当团长。据说此人是国民党的CC分子，因他对演出是外行，看样子也没有兴趣，所以他很少随我们活动，也很少到剧团里来。

山东当时还是韩复榘的地盘。韩任山东省主席、三路军总指挥。因他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所以蒋介石对他既是利用又排斥，而韩也明白这一点，表面上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但暗地里，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和日本人也是勾勾搭搭。故此如果日本人威胁他的政权他就抗战，反之日本人保留他的地盘他就投降。但在当时来看，他还偏重于抗日。既然抗战，那我党就支持他，广大爱国群众也支持他。所以，我们决定首先为韩的部队演出。

1937年12月，济南战事吃紧，我们立刻离开济南，到山东其他地方进行流动演出。记得曾到过兖州、济宁、金乡、单县、菏泽。后来我们又到了河南的柳河、开封、周村、信阳、驻马店和漯河。当时在这些地区抗战的有曹汝林、张自忠和冯治安的部队。此外还有东北军的刘汝明部队。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一个炸弹》等。演出效果很好，反响强烈。演出中有些士兵随着剧情的变化，时而愤怒，时而哭泣，场面很感人。

1938年5月19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侵略者沿津浦线南下，攻占了徐州。国民党在日寇进攻面前弃地而走，整个华北沦入敌手。这时，团里发生了较大变化，剧团的主力演员张瑞芳、陈荒煤、曹叔铎等去了重庆，剩下的同志演出水平差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队员们提出：我们还是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到那里学习提高吧。经我们几

个党员商量，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当然，我对延安也是早已心向往之的。于是，我们决定先到武汉找关系，然后把剧团带到陕北。

在武汉，我们找到在长江局工作的蒋南翔，经他介绍，接上了组织关系。后来长江局给我们写了一个介绍信，让我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说他们可以给我们办理到延安的手续。

在武汉期间，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那是在武昌召开的一次会议，说恩来同志在会上有一个重要报告，组织上通知我去参加。会议的内容我已记不起来了，但周恩来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深刻的，他睿智的目光、机智的谈吐和和蔼可亲的笑容，至今仍历历在目，铭刻于心。

不久我们坐火车经郑州到达西安，在这里由荣高棠同志找八路军办事处，办妥了去延安的一切手续，之后便启程踏上了前往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的路程。

三、马列学院的学习生活

延安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心脏，那里有党中央、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抗战后，大批革命青年怀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追求真理的赤诚之心奔赴延安。现在，我就要去延安了，就要见到宝塔山，喝上延河水了，就要来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了，心中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一行 10 余人，带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手续，一

路晓行夜宿，翻山越岭，大约徒步走了七八天，到了延安。当我抬眼望见那高高的宝塔时，眼睛顿时湿润了，不由自主地欢呼起来：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真像流浪的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到延安后，暂时住在城内的“西北旅社”。

我们等待着分配。原来的想法是继续保持这个剧团，至于分到哪里由组织决定。但不久下来通知，要把我们分到各个学校去学习。有到鲁艺的，有到陕北公学的，还有去抗大和组织部训练班的。我和荣高棠经过考试进入马列学院第二班学习。在去马列学院之前，我们将剧团的服装道具等物品交给中央。至此，活动一年之久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完成了它的使命。

延安马列学院是党中央创办的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校。成立于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主要是培养党的宣传工作和理论工作干部，院长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是王学文，总支书记为张启龙。学生的来源主要是延安各机关、前方及国内外有志于抗日且有影响的人物，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并具有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条件。我为能进入这所马列主义的高等学府学习而感到荣幸。

马列学院设置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洋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任课的教师都是有深厚学识的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如讲政治经济学的王学文、讲马列主义理论的吴亮平、讲中国革命近代史的王松、讲西洋革命运动史的陈昌浩等。院长张

闻天也经常来校给学员讲课。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曾到校作报告。刘少奇同志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对我以后的党性修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列学院的学习方法是听课、阅读、讨论相结合。课堂上，大家认真记笔记，课后结合课堂内容阅读原著。我当时能看到的书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两个策略》等。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等。讨论时大家都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各抒己见，发表看法，思想上毫无拘束。对于不明白的问题或僵持不下的意见，大家则拿到课堂上，请教师给予解答，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那时延安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我们的课堂就是几排窑洞，上课用的桌椅都是我们自己动手，用木板钉成的。个人坐的凳子，上课时自己拿来，下课再搬回去。冬天来临时，由于没有煤炭，屋里从不生火，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一套棉衣，白天穿在身上，夜晚压在被子上。吃的方面几乎顿顿都是小米饭、土豆和咸菜。只有到星期日才能改善一下伙食，这天我们都能吃上一顿肉菜和馒头。尽管延安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艰苦，但我们从来没有颓丧过，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这时大家都拥有一个崇高的理想，都有着一颗为党的事业和民族利益而抛洒热血的赤诚之心。

1939年春，学校为了解决粮食自给，同时也为培养大

家的劳动观念，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组织学员上山开荒种地，搞生产运动。每天清晨，我们肩扛锄头，踏着崎岖的山路，唱着歌曲来到山坡上。由于平时缺少这方面的锻炼，开始每人手上都磨出血泡，但没有一人叫苦喊累。我深深体会到，这样的劳动，对于像我这样学生出身的同志们来说，正是磨练思想和意志的好机会。几天下来，虽然腰酸背痛，但看到我们亲手翻的土地一片又一片，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播种了，我们仔细地把每粒种子埋到地里，祈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这期间，我们常到地里浇水、施肥，小心地拔除野草，真像侍候小孩一般。秋收时节，学员们望着满山遍野的粮食，别提有多么高兴了。我们一边挥舞着镰刀收割，一边唱着歌。因为这是我们劳动的收获。

由于我在生产劳动中比较积极认真，受到了上级的嘉奖。不久，我又被推选为“青年模范”，参加了青年团中央召开的颁奖大会。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我们发奖。当我从毛主席手里接过“模范选手”奖章时，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情景我永生难忘。

在马列主义学院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在我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是在“九·一八”事变中目睹了侵略者的暴行，怀着救国之心、报国之志走上革命道路的；在以后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我找到了党，加入了党。当时的想法就是：国民党不行了，要想抗日救国，光复东北，打回老家去，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对于党的性质、纲领、路线，并不十分清楚，对于怎样抗日救国，也是不清楚的。在马列学院，我如饥似渴地学习，

汲取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营养。我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听课、记笔记，认真地进行讨论。我联系自己“九·一八”事变后寻找救国道路的历程，不但从实践中，也从理论上认识了党的性质和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认识并接受了马列主义。我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还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不仅要实现党的最低纲领，还要实现最高纲领。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向着共产主义社会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这样的胸怀和志愿：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

通过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我对于唯物辩证法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开始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有一件事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开始时，马列学院的学风不好，教条主义比较严重，有的老师上课寻章摘句，是“引证专家”。1939年春，由李富春同志领导学习党的历史，总结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在马列学院开展了一次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使我深受教益。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始终比较警惕教条主义。

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我总结自己的革命经历，可以这样说：“九·一八”事变后，我从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思想出发，找到了党，并在“一二·九”运动的洪流中从组织上加入了党；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理论，则使我从思想上入了党，树立起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开始并逐步完成了从民主主义革命者向社会主义革命者的转变。这一年学习所打下的思想基础，使我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始终没有动摇过。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人民利益、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不动摇；一条是做任何工作、办任何事情，都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上级精神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两条我深感终生受用。

第三章 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日日夜夜

一、奔赴抗日前线

1939年9月，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到北方局报到，而后去冀南地区工作。当时在延安的干部都热切地希望到前方去参加战斗。我接到通知非常高兴，但又对一年来的学习生活非常依恋。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和同行的10人便告别宝塔山，从延安启程，向山西进发。带队的是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他也是我马列学院的同学。此外，还有艾楚南等人也与我们结伴同行。

冀南是指河北省南部，西迄平汉线，东抵津浦路，北至沧石路，南跨漳河的广大地区。七七事变后，我八路军一二九师组建东进纵队，于1938年1月挺进冀南，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东进纵队开进冀南后，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击敌伪，恢复和发展群众组织。1938年8月，在这一地区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行署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行署下辖5个专署，共51个县。至此，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将对国民党的政策由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因而国民党军队制造同我摩擦的事件逐渐增多。我们到西安后，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然后就开始徒步继续前进，过潼关，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丘陵地带，找到北方局。北方局组织部将我分配到冀南区党委宣传部。我顾不上连日来的劳顿，稍加休整，便与到冀南工作的刘白羽同志一起上路了。临行前，我们碰到从太行山民族艺术学院学习结业要回前方工作的朱丹、申伸、英才、肖塞等同志，也要回冀南。于是我们便结伴同行。就是这时，我认识了冀南平原剧团导演肖塞同志。几年后，她成了我的终生革命伴侣。

我们几个人下山后进入平原，夜间在地方武装的护送下，越过平汉铁路，到达冀南地区。分手前，大家留下自己的地址，互祝工作顺利，然后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我到冀南区党委报到后，区党委书记李菁玉找我进行了简单的谈话。他说：现在人员大部分都在下面，机关很需要人，你就留在宣传部担任编审科长。我没有说二话，坚决服从分配。从此，我就在中原大地开始了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一段工作。

区党委宣传部设在威县一个叫小南寺庄的小村子里，平时不随区党委活动。区党委机关同军区、行署在一起，因经常要躲避敌人，所以他们不断地转移，几乎没有固定的地点，而威县是区党委经常活动的中心区。我的具体工作，一是办区党委的党刊《平原》，有时也为《平原》和别的刊

物写些文章。同时，我还到区党委的党训班讲党课和阶级教育课。宣传部设有三个科：宣传科、编审科和油印科，没有宣传部长，是李菁玉兼管，他的工作很多，所以他让我代管宣传部的工作。半年以后，1940年夏我就离开了区党委宣传部，调到冀南三地委工作。

二、反“扫荡”的艰苦岁月

三地委领导的地区有：曲周、肥乡、广平、丘县、馆陶、永年、永肥、鸡泽、邯郸等县。中心区在曲周、肥乡、广平一带。我在三地委担任宣传部长，参加常委。当时地委书记是乔晓光，组织部长曹海波，社会部长李福祥。不久乔晓光调出，李福祥任书记。地委除了部门分工，还有地区分工。开始我兼过一段肥乡县委书记，后来为了坚持永北斗争，开展永年、永肥、鸡泽、邯郸的工作，组织了一个永北支队，我又兼过一段永北支队政委。

宣传部的的主要工作是：办一个油印报纸；办党训班。中心是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围绕中心工作写宣传提纲，指导宣传活动。

1941年，形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日本侵略者在正面战场停止了进攻，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日本侵略者感到，敌后战场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将正面战场一半以上的兵力调到华北。华北的汉奸王克敏政权也组织伪军，配合日军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抗日武装的作战。他们出动大批兵力，频繁地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所到之处，一律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一些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一些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华北平原的抗日斗争形势日趋严峻。

冀南与冀中一样是平原地区，岗楼林立，沟道纵横，抗日根据地被日寇分割成许多小块。由于敌人的频繁扫荡，我们很少能在一个地方睡一宿整觉，经常是一夜数移，有几次我就是枪林弹雨中冲出包围圈的。斗争环境极为恶劣。为了保存自己，打击敌人，有的村子挖了地道。这种地道开始时只是为了敌人来时隐蔽，后来我们总结了斗争经验，将群众发动起来，挖了许多地道，家家相连，村村相通，把单纯用来隐蔽的地道变成了战斗的地道，多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除了敌人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外，从1942年春开始，冀鲁豫地区又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旱、涝、雹、蝗几种自然灾害一齐向我们袭来。首先是旱灾，1942年春，天旱无雨，水井干涸，河水断流，夏粮几乎颗粒无收。旱灾之后，又连降暴雨，冀南大部分地区顿成水乡泽园，房屋倒塌，人畜浮没。大水退后，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许多老百姓为了糊口，卖妻鬻女，背井离乡，许多村子成了无人村。为了坚持抗战，帮助百姓渡过灾荒，我们开展了借粮斗争。当时有余粮的基本上都是地主，他们不肯拿出来借给群众。我们就发动大家，将最顽固的几户地主拉

出来进行斗争，这样其余的余粮户就老实地向外借粮了。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冀鲁豫中央分局（也称平原分局），下辖冀南区 and 冀鲁豫区两个地区。黄敬为分局书记。这时我已由三地委调到七地委工作。地委书记开始时是肖永智，不久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就由许梦侠任地委书记。我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因组织部长韩宁夫在太行山北方局参加整风学习，所以很长时间地委只有许梦侠和我两个人。直到1944年，地委机关才增加了民运部长桑荣轩、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和专署专员周持恒。

我到七地委时，是1943年夏季。这时鲁西北也同冀南一样闹灾荒，除了旱灾，还闹蝗虫。蝗虫飞来的场面至今想来还十分吓人。原来还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如闷雷之声由远及近，顿时天空一片昏暗，顷刻间，一阵沙沙声过后，刚才还颗粒饱满的春谷和春玉米，都变成光秃秃的细杆儿。蝗虫飞到村里，家家户户门窗紧闭，村民们唯恐蝗虫飞进室内，成为虫子的食饵。

这时政府机关也与老百姓一样，遭受着饥饿之苦。我们每天除了吃棉籽窝窝头和糠窝窝头外，还炒蝗虫吃。因为棉籽窝窝头虽经饿，但有棉短绒，在嘴里打转不能下咽；糠窝窝头不成个，用手捧着吃，虽好下咽，但不经饿，一顿吃七八个还不饱。后来我们就吃蝗虫，开始还好吃，但吃久了，也不行了。因没有油，干锅炒，吃多了粘呼呼的，直恶心。

1944年农历三月，春暖花开，田里的麦苗长势喜人。边区政府预料到今年还将有蝗灾，于是号召全区人民在蝗卵

未孵化前刨卵。为了鼓励人们灭蝗，政府还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拿出部分粮食作为灭蝗奖励，规定：刨一升蝗卵，换一升小米。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想吃白面，快刨蚂蚱蛋。”正当人们抓紧刨卵时，蝗蛹逐渐破土而出。蛹子是蝗虫的幼虫，开始像线头一样，不几天就长成麦粒大小，严重的地方密密麻麻铺了一地，绿油油的麦田，一会儿就变成黄虫地。

为了赶在蛹子变成成虫前消灭它，冀南区党政军机关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一齐动手，掀起了一场灭蝗之战。

但是在当地流传着一种迷信说法，认为蝗蛹从土里钻出后，就是“神虫”，不仅打不得，而且还要给它烧香磕头，祈求它口下留情，给人们带来好年景。为了将群众发动起来，破除迷信，我们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耐心地向群众解释蝗虫给人们造成的危害。恰在这时，一个村子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十分迷信的农民，他在一天夜晚来到地里烧香，祈求蝗虫不要毁坏庄稼。然而当他正祈祷时，蛹子蜂拥而至，刹时间把他地里的小麦全部吃光，后来他见人便说：“蚂蚱土里生，靠天一场空。”这个例子，很好地教育了群众，灭蝗工作也就顺利开展起来。

我们灭蝗的方法是：在蛹子的来路上挖堵截沟，蛹子前赴后继地向沟里蹦，群众就砸，砸死一层起一层，有的在地里的沟沿上，竟用蛹子的尸体堆起长长的一道堤崖。后来有一部分没消灭的蛹子变成了蝗虫，我们继续发动群众扑打，终于将这场大蝗灾基本消灭了。

自从1939年秋我与肖塞在冀南分手后，她便回到了八

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的平原剧团。后来剧团划归冀南区党委领导，我这时在三地委做宣传工作，彼此间就更熟悉了，互相也产生了好感。不久，我和肖塞同志共同向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递交了结婚申请，组织很快批准了。1941年8月的一天，我们在馆陶县南拐渠村准备结婚，买了一斤花生、一包茶叶、一包葵花籽和一些糖块招待来宾。孟福堂、王幼平、张潭等同志都前来祝贺。正当大家谈笑之际，突然枪声大作，我们赶紧跑出房门，分头撤离该地。我俩再见面时已是5天之后了。但由于敌情严重，还是没有办成婚事，直到第三次见面才将婚姻大事完成。现在想来，还颇有传奇性呢。婚后，肖塞仍到馆陶县任妇女救国会主任，主持全县的借粮斗争。从这村跑那村，而我则在地委宣传部忙自己的事情。所以俩人虽已结婚，但很少见面。

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异常危险的。几分钟前还平安无事，但说不定几分钟后便会遭遇敌人。我自己就曾多次在这种危险的时刻得以脱身，但肖塞有一次却险些被敌人捕去。事后，肖塞对我说：“多亏了那些老乡啊！”原来有一次肖塞到一个村子去做群众工作，当她完成任务正要离开时，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并把全村老少都驱赶到空地上，然后将大人、小孩分开。狡猾的敌人让每个小孩去认领自己的亲人，剩下的人一律被当作共产党抓走。肖塞当时住在一个农民堡垒户家里，这家的孩子不惧敌人的威胁，勇敢地走到她面前：“姑姑，回家吧。”就这样，肖塞化险为夷。类似的情况在抗日根据地经常出现，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根据地人民的恩情。

三、开辟冠北根据地

1942年，我党开始进行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其目的是要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1942年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最残酷的一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同时国民党也对根据地包围封锁。要克服困难，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广泛和充分发动群众，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全党端正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团结，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这次整风运动对我党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中央的精神，北方局于1943年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方、各部队把整风运动当作1943年最中心的任务之一。七地委于1943年夏成立了整风班，并让我具体负责。整风班的成员都是科级以上干部和区委正、副书记，大约五六十人。

整风班办了两个多月。这期间，我们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文件和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三个报告。这次学习时间很短，但对大家的教育却很大，主要是分清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弄清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就我个人来说，这次整风学习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马列主义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指导革命事业走向胜利；脱离实际，夸夸其谈，搞教条主义，

是肯定要失败的。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体会尤为深刻。

1940年以后，日寇加紧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蚕食，到处安据点、挖封锁沟，分割游击区和根据地。到1942、1943年时，我根据地大大缩小了，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当时地委和整风班驻在莘县王奉一带。这期间，有一次敌人突然扫荡，我们手无寸铁，无法反击，只有躲避。可是往哪儿躲呢？我们的根据地太小，在根据地是藏不住的。我们一商量，决定跳到游击区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躲藏。这样，我们就连夜行军，走了大约百十里地，到了冠北，在靠近敌人炮楼几里路的地方悄悄躲进一个小村里继续坚持学习。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就想，如果把冠北这一大片地区变成我们的根据地，活动就方便多了。我把这个想法向地委汇报以后，梦侠同志很支持。于是我和梦侠一商量，决定把整风班留下来，又从地方抽调一部分刚毕业的学生，正式成立了百余人的冠北工作队。我兼大队长，下设3个中队，一中队活动于原武训二区甘官屯一带，队长刘保勤；二中队活动于柳林镇一带，队长郭晓明；三中队活动于永智县清水镇一带，队长宋剑。每个中队都分成若干小组，分头到各村活动。在每个中队活动的区，都由中队长兼区委书记，以便和地方联系。工作队成立后，我们留下整风班的孙良材（原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和王海东（莘县县委宣传部长）继续搞第二批整风班。我就带着这百余人的队伍，徒步行军，从朝北到达冠北。武训县县委书记肖平、县长梁向明等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介绍

了本县的情况，然后就分头到各点上去了。我和工作队队长，由武训县委的民运部长张绍迪同志介绍，住到了小刘贯庄（农民英雄宋景诗的家）。这里是根据地的边缘地区，群众基础好些。

冠北的伪军、顽固派、枪会和封建地主势力很强。八区、六区是当时鲁西北有名的封建顽固堡垒。抗战一开始，地方势力与土匪如齐子修、吴连杰、周自忠等互相勾结，骚扰百姓，公开反对八路军。再加上1942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天灾人祸，使这一带的人民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我们工作队刚进村时，群众都不敢接近我们。相反，一些地主和狗腿子却主动向我们献殷勤。有一次，在种麦子时，有的村的地主突然大发善心，给农民发放了麦种，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召集各队长及工作组组长开会，大家研究认为，这是地主豪绅玩弄的新花招，对我们明顺暗抗。他们采用几手对付我们：一是接近我们，探听消息，迷惑群众；二是对群众施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三是威胁逼迫，使群众不敢起来揭发。这里的人民受剥削压迫本来就很深，加上地主恶霸的这些卑劣手段，群众心里自然有顾虑。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十分注意执行坚决地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路线和政策，强调深入细致地进行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由积极分子进行串连，做到“不熟不揭锅，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在每一片先搞一两个点，取得经验，扩大影响，全面发展；从一个村发展到几个村，进行联合发动和联合斗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

召开积极分子和群众大会，成立农会，选举我们的村长，建立民兵武装。接着，我们又趁热打铁，斗争恶霸地主，把他们手里的枪夺过来，在经济上则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贫苦群众生活。

我们工作队、组活动的村都是封建势力比较强的村，每个村都能找出一两个民愤大、有代表性的恶霸地主或伪保长。不把这些人的威风打下去，群众就不能真正站起来。于是我们决定斗争恶霸地主，打击敌伪的社会基础。清水镇最大的地主刘瘸子是地方上的一霸，又是伪区长。我们决定从这里开刀。一天，我们临时搭了个大台子，把刘瘸子抓来押在台上。刘瘸子被押的消息迅速传开，附近各村的人都来了，工作队员都参加了，真是人山人海。为了防备敌人扫荡，我们让民兵在各要道口派上岗哨。在斗争会上，我们把刘瘸子的罪恶一件一件地摆出来，有理有据，群众也纷纷上台揭发算帐。刘瘸子在地方上依仗日本人横行霸道，人民对他恨之入骨，有的人讲着讲着就动手打起来。如果不是工作队劝阻，刘瘸子肯定会被愤怒的群众打死。经过斗争算帐，我们让刘瘸子退赔了粮食、罚了款。当农民把粮食扛回家时，都非常高兴。

这次联合斗争会影响很大，大刹了恶霸地主的反动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其他各村的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

斗争恶霸地主时，我们严格掌握打击面不能太宽，斗争对象始终是很集中的，这就是民愤大的农村旧政权的统治人物、大恶霸地主。中小地主则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如清水一位地下党员同志的家是地主，通过这位党员做他

父亲的工作，使其主动退赔了粮款，主动减租减息，还积极为我们提供情况，成了开明士绅。在小刘贯庄，有一个地主，还是老中医，也主动向我们承认了错误。由于我们政策掌握得好，又利用这些开明士绅给我们做宣传，扩大影响，使更多的中小地主向我们靠拢了。

开辟冠北工作，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干部。有的同志曾感慨地对我说：工作队就像个熔炉。我们工作队从成立到结束，时间虽然不长，但斗争内容却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在复杂的斗争中，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批有能力有斗争经验的干部。

当时，工作队的成员都很年轻，那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就更小了，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姑娘、小伙子。他们单纯、幼稚，有一股子热情，都想在斗争中考验自己。但革命斗争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有些人满腔热情地去接近贫雇农，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可是群众见了工作队就躲，顿时像一瓢凉水浇到身上，思想产生了波动。我们发现后，及时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并让一些老同志带着年轻同志工作，边干边摸索经验。另外，我们还让青年学生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注意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经过几次这样的锻炼，年轻同志逐渐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开大会讲话也不怯场了，有的甚至不用讲稿也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

我们对这些青年学生要求也是特别严的。有些人向我们汇报工作时，一张口就是“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不见得”之类的字眼，我们就对他们提出批评。那

时斗争环境残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有自己明确的想法，丝毫含糊不得。在思想上要求也很严，一开会就强调群众观念、组织纪律，要站稳立场，要吃苦耐劳，克服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些队员特别是女同志，在外奔波时间长了就想家。如有个叫苏波的女学生，那时才16岁，是个很活泼的姑娘。她想回家，我们不让她走，她不高兴，闹情绪。我们及时找她谈话，并让她那个队一个年龄稍大的女同志在生活和工作上多多地关心、帮助、照顾她，后来又让她的姐姐，也是个工作队员，赶来劝慰她。这样一来，苏波感到工作队很温暖，同志们也非常爱护她，于是她就踏踏实实地工作，再也不提回家的事了。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队几乎每天都要东跑西颠，常常是一边走路一边吃饭，吃的是窝头就咸菜，有时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上。一般没有固定的住处，常常是好多人和衣挤在一起睡觉。但大家并不觉得苦，都认为在这个战斗的集体里非常快乐。因为大家在工作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互相关心，就像一个融洽和睦的大家庭。我们在挫折中总结经验，从幼稚到成熟，走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些在艰苦环境中走出来的同志，后来都成为党的好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1943年秋到1944年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发动群众，开辟冠北的任务。冠北大片地区都变成了我们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在我们经常活动的村子，都斗倒了恶霸地主，建立了村政权、区政权和民兵武装。民兵站岗放哨，小股敌人来了就打，遇到敌人“扫荡”，就掩

护群众撤退，和敌人打麻雀战。这也是敌人鼻子底下根据地的特点。以后我们的领导同志、抗日武装和侦察员等都可以到这里活动住宿了。

第四章 转战辽吉三年

一、挺进东北

1945年8月，平原分局决定我和司令员赵健民、政治部主任于笑虹去党校学习。党校设在八地委的濮县。这时根据地扩大了，我们七地委的冠县和八地委的濮县已经解放。在我们报到后没几天，日本就投降了。记得那天在操场上开了一个大会，校长张玺首先向大家报告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了，接着他说：由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面临新的任务，党校就此停办，大家都返回原地开展工作。回到地委不久，即接到上级通知，调我去东北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执意发动反革命内战。在这一新形势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和军队迅速挺进东北，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当时规定，夫妻有一方是东北人的就要一同回东北；在东北有关系的和愿意去东北工作的都要尽可能调到东北去。地委很快组织起两个干部团，一个是军队干部团，团长是张鸣夫，政委是杨大伦，政治部主任是陈法平；另一个是地方干部团，我任团长，队员有孙良才（地委组织科长）、王树仁（地委宣

传科长)、肖塞(地委教育科长)、岳仲轩(县长)、鲍廷干(县报社社长)、宋剑(区委书记)、魏敏(区委书记),两个团各有100余人。为了争取时间,地委直接给林彪写了介绍信,这就免去了层层转关系的繁琐手续。在这战略转折的重大关头,我作为东北出生的干部,带着全新的任务,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我们一行200余人,于同年9月底从冠县出发,经临清坐船到达冀中的献县,然后又从王庆坨越过京津铁路,昼夜兼程,以期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出山海关。谁知我们还是晚了一步,于是又折转从界岭口出关,不久抵达绥中。在绥中住了两天,稍事休整,又经锦州,坐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当时沈阳已有八路军的先头部队,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已在沈阳建立。辽宁省委书记是陶铸、副书记是白坚。我们到达后,白坚立即和我们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他说铁岭地区还没有我们的干部,你就带一些人到那里去开辟工作吧。于是我便接受组织的任命,担任铁岭中心县委书记,并于1945年10月到达铁岭县。

二、支援四平保卫战

我到铁岭工作仅一个多月,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根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我军被迫撤出沈阳等大城市及铁路沿线。辽宁省委从沈阳撤出后,一分为二,沈阳

以南、铁路东建立了辽宁省委；沈阳以北、铁路西建立辽西省委，省委书记是陶铸。他们第一步先撤到法库，并很快就找我去开会。这是我第一次与陶铸同志见面。当时正是秀水河子战斗刚刚结束，人马在法库的很多，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也在那里。会议决定重新组织地委：原铁（岭）、法（库）、康（平）一带组成一地委，由孔原任地委书记，调我到昌图组建中共辽西二地委，我任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

当我到铁岭时，得知母亲和妹妹在哈尔滨难以生活，便派人把他们接来，后又送回东火石岗子老家。此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在法库开完会赴昌图途中，我顺便到老家住了两三天，安排老母和妹妹生活。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我于1945年12月到达昌图，先后到的干部有专员胡子寿、副司令员左叶等。我随后即到昌北县八面城找原辽北省委的顾卓新（书记）、栗又文（省长）办理交接。当时规定：省一级机构由他们带走，县以下划归我们领导。不久他们就离开八面城到嫩江去了，二地委机关便移驻八面城。二地委领导的地区有：昌图、昌北、梨树、辽源、双山、怀德、四平市和辽源市。此时四平在国民党手里，我们只有一支武装在四平城外老四平街一带活动。

当时，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打击敌伪残余势力。东北人民被日伪统治长达14年之久，饱受日伪政权和军、警、宪、特、恶霸地主的欺压盘剥之苦。日本投降后，

劳苦群众纷纷要求政府严惩罪大恶极的敌伪残余势力，因此我们根据西满分局和省委的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奸清算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汉奸走狗、恶霸地主等敌伪残余分子。辽源、双山两县共清算斗争汉奸、特务和恶霸地主分子 110 人，其中把伪满特务王子璋、大汉奸王振耀等 7 名罪大恶极分子交给群众公审后，就地枪决；其他罪恶较小、认罪态度较好的，均给予从宽处理。梨树县人民政府清算了一贯效忠日本侵略者、欺压百姓的伪县长崔宝山和家在梨树县的伪满热河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永清，枪决了罪行累累的伪警察署警务特务吴振中，没收了他们的全部家产，分给人民群众。昌北县在八面城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了汉奸张振东、特务李凤阳等人，为老百姓伸张了正义，推动了全县减租减息和向地主借粮的热潮。农安县哈拉海区翻身会发动群众，检举坏人，斗争恶霸地主、匪首、特务、警察等多人，并镇压了罪大恶极的伪协和会会长兼劳工队长王振洲、伪警察署警尉朱千、伪甲长王金生等。

反奸清算斗争，不仅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使群众分到一些现款、衣物和粮食，更重要的是发动了群众，建立健全了区、村政权，扩大了地方武装。辽源县在 13 个区建立了区委、区公所和区中队，改建 8 个村政权，全县参加民主政权工作的干部共达 500 多人，发展党员 100 余名。四平市建立了 6 个区委、区政府和 150 多人的公安队。军分区直属部队和县大队、区中队共有 2000 余人，地方新老干部共达 400 余名。

四平市是连接东、西、南、北满的交通要道，也是国

国民党军队北犯长春的必经之路。1946年初，我党我军为尊重1945年8月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动撤出四平。国民党接收大员进入市区后，建立起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并收编了伪满“铁石部队”，招降大批土匪和敌伪残余分子，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其它靠近交通要道的地方，有些也被国民党和敌伪残余分子所占领。1946年3月13日，苏联红军撤离四平。

3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命令收复四平（即一战四平），并由三师十旅旅长钟伟、辽西军区保一旅旅长马仁兴和我以及二分区副司令员邓忠仁组成作战指挥部。钟伟任司令员，马仁兴任副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民主联军投入的主力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共6000余人。战斗于17日凌晨2时打响，中午结束，毙伤守敌1000余人。俘虏了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匪首王大化以下2000余人，解放了四平市。

四平解放后，中共辽西省委派二地委副书记刘瑞森任中共四平市临时市委书记兼市长。保一旅旅长马仁兴兼四平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还从二地委抽调30余名干部和专署公安分处的人员到四平市建立政府机构，维护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和建设。此外还调拨两万斤粮食救济城市贫民，拨10万元抚恤金给战争致残者，并给政府职员补发了国民党政府拖欠的一个月工资；打开敌伪仓库，将其中的粮食、豆油、被服等50火车皮物品运往后方。

同年4月1日，蒋介石公开撕毁东北停战协议，命令国民党军队继续向营口、本溪和四平大举进攻，妄图消灭

东北民主联军，与我争夺东北。敌军兵分三路，对四平街作弧形包围，形势严峻。我们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坚决控制四平街”的指示，命全区人民积极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来犯之敌。军分区十六团负责保卫四平至郑家屯之间的铁路交通安全。中共四平市委、市政府组织了数万群众挖战壕、修筑城防工事。昌图、昌北、梨树、辽源、双山、怀德、长岭等县积极主动地筹集粮食、赶制军服、军鞋，还组织了大车队、担架队等。

4月18日，中外瞩目的四平保卫战（二战四平）打响了。守卫四平的民主联军英勇作战，顽强抵抗，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进行最激烈的时候，前沿工事大部分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英雄的四平人民不畏牺牲，冒着枪林弹雨不断地往前线运送钢板、钢轨、砖石、木料等，帮助部队抢修工事。数以千计的民工手推肩扛，给战士们送弹药、食品，往后方抬伤员。在我军指战员顽强打击和四平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民主联军坚守四平31天，毙伤敌军1.3万余人。5月18日深夜，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总司令部指示主动撤出四平。敌人付出重大代价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我军撤出四平后，中共中央于5月19日来电，高度赞扬四平保卫战，指出：“这一战斗是有历史意义的……对配合东北的停战谈判，挫折敌军的进攻锐气，阻止敌军向北满东满大举进攻，赢得根据地建设的时间，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平保卫战结束之后，我们二分区部队随之也撤离四平市。当时马骥司令员奉军区邓华司令员之命于5月20日

抵达辽河边三江口地区，阻击进犯郑家屯之敌七十一军，掩护党政军机关向北转移。我从四平撤出后，即乘火车到公主岭听取了陈云同志传达中央紧急电令，组织全面北撤。同时，陈云同志简要地向我传达了中央《五四指示》，并把文件给了我，让我进行部署。之后，我即乘汽车到达榆树台，组织分区机关及从四平撤出的干部刘琦森等，于20日转移到双山县城。第二天我和邓忠仁副司令员、贾其敏副政委及王玉峰参谋长等开会，研究部署撤出四平后建立根据地的部署，特别是关于土改问题的部署，并决定会后根据陶铸同志的要求，由我去郑家屯向辽西军区邓华、陶铸首长汇报。

此时，我患了重感冒，高烧39度多。22日，高烧仍不退，但我决定不再耽误，立即出发去郑家屯。王玉峰同志安排了一辆十轮卡车送我，于是我带上电话员、警卫员出发了。一路上，由于敌人封锁，土匪骚扰，行进非常缓慢。23日在辽河边上遭到敌人阻击，其余同志都打散了，只剩下我和警卫员安福辰等三四人。我们几人好不容易冲出敌人封锁，渡过辽河，于25日到达郑家屯军区所在地，见到了陶铸同志。这时我的感冒稍好，当即向邓华、陶铸同志汇报了情况以及我们下一步准备土改的打算。他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随后，邓、陶首长和军区向白城子撤退，我于27日到达新安镇分区驻地。

三、坚持沿边区的斗争

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退守松花江以北。国民党军队则沿中长路、平齐路向北进犯，先后占领了八面城、梨树、郭家店、公主岭、怀德、双山、郑家屯等城镇。这样，原来辽西二分区所辖之昌北、梨树、郭家店、公主岭、怀德、辽源、双山等县已为国民党军队所占。二地委党政军机关和所属部队经榆树台、双山、杨大城子撤退至长岭县境内。这时二分区五分之四的区域已沦为敌占区，只有一个完整的长岭县和昌北西部仍为我们所有。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辽吉二分区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坚决响应中共辽吉省委（1946年6月撤辽西省，改建辽吉省）提出的“坚持辽吉”、“敌进我进”的号召，决心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持边沿区的斗争。但是当时有少部分县、区干部缺乏坚持残酷战争的思想准备，产生了恐慌和悲观情绪。有的县大队和区中队甚至发生了叛变、逃跑事件。面对这些情况，地委根据省委的部署，于1946年5月28日在长岭县新集场（今新安镇）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确定了“坚持阵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设根据地”的方针。31日，二地委又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小块根据地，加强武装斗争等任务。为了

贯彻落实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地委又于6月7日召开了二分区扩大的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代表地委作了动员报告，就土改问题强调指出：建立根据地的核心是发动群众，而基本群众的要求是土地；发动群众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而发动群众的首要内容就是分地。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清算分地时，对富农和大、中、小地主，恶霸与非恶霸要有区别，不要侵犯中农，保护工商业。要依靠农村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完成目前这一最基本的历史任务。6月8日，地委领导和党政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长岭县，同县委的干部一起组成工作团，分东、西、南、北4个片，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我和军分区司令员马骥、宣传部长李都等在长岭四区蹲点。

当时敌强我弱，局势动荡，群众怕“变天”的思想很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群众进行了“谁养活谁”等启蒙教育，号召大家吐苦水、挖穷根。干部和农民交朋友，培养农村中的积极分子。通过采取这一系列的措施，群众被逐渐地发动起来，于是我们就以分地为中心，由点到面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实施“分四种地，分给四种人”，即把日伪统治时的开拓地和农场及庙地、逃亡大地主的土地、敌伪残余分子的土地、勾结土匪的地主的土地（对一般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暂不动），分给无地的革命军人家属、无地的雇农、少地的革命军人家属、少地的贫农。土改之

后，群众的热情顿时高涨起来，干部“坚持辽吉”的思想也坚定了。地方武装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附近地区的土匪很快被肃清。

土改中，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我们从中发展党员1007名，征集新兵4000多人。到1947年3月，选拔区级干部150名，乡村脱产干部300名，不脱产乡干部700名，积极分子达1000余名。

1946年9月，中共辽吉省委决定将二地委和三地委合并为辽吉二地委。书记郭峰，我任第二书记。不久郭调任辽吉省委秘书长，于是由我任地委书记。11月末，国民党军队进犯长岭，二地委再度北撤，转移到乾安县。

这时地委领导的地区有：大赉、安广、郭前旗、长农（长春和农安）、乾安等市县，此外还有长岭、双辽一部分敌侧后地区。

在民主联军主力部队北撤之际，二分区境内土匪四起，活动十分猖獗。在长岭、开通、茂林和长农一带，土匪几乎遍地流窜。这些土匪在国民党“纵匪反共”政策的引诱下，与人民为敌，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破坏土改运动，有些被群众斗争过的地主、汉奸也铤而走险，组织“还乡团”、“大排”、“红眼队”等反动武装，进行反攻倒算。地委认为，不清除境内的土匪和地主武装，土地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于是，军分区各团和各县大队、支队、武工队一齐出动，一方面坚持边沿区的斗争，一方面大力清剿土匪和地主武装。仅在长岭境内就进行剿匪战斗50余次，毙伤土匪450余名，活捉300余名。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团

驰骋在乾安、赉广、郭前、长农等县旗，打得土匪闻风丧胆，望影而逃。1947年初，从北满三肇地区流窜到长农县的地主武装和土匪绺子“三肇队”400余人，盘踞在六股道屯烧锅院内，四处抢劫、残害百姓。旧历腊月二十九日，二分区十八团和长农武工队将这股土匪包围起来，经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将其全歼。由于我们采取了坚持不懈的剿匪方针，仅用10个月，就将二分区内的匪绺基本肃清，保卫了土改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军分区在清剿匪患的同时，还坚持在边沿区进行反蚕食斗争，相机打击分散孤立之敌。1946年5月底，十六团在怀德县杨大城子区伏击了敌保安队，紧接着又在新开河一带痛击了一支3000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打得敌人狼狈逃回四平街。同年11月17日，军分区的两个团配合辽吉军区保一旅攻打榆树台据点，激战一夜，歼敌700余名。

1947年初，军分区部队收复了长农县的伏龙泉区、哈拉海区，使长农西北部解放区连成一片。1月18日，军分区部队配合辽吉军区部队在新立窑歼灭国民党正规部队一个营。3月19日，十六团在长怀武工队的配合下，解放了长岭县城。

各县大队和武工队也战斗在斗争前沿，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长农武工队和长农支队在三面受敌的艰苦环境里，始终坚持游击战，活动范围由3个区扩展到6个区，并配合独立五师解放了县城。昌北县大队在敌后，以古榆树为中心，坚持游击战5个多月，受到了辽吉省委的表扬。长岭、怀德组建的长怀武工队，3个月作战17次，使长岭至

怀德间方圆 140 平方公里的广大农村成了武工队的天下。双辽武工队活动在面积达百余里的广阔平原上，保护群众，打击“还乡团”、“大排”和反攻倒算的地主分子。

四、动员参军支前，全面开展土改运动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连续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二分区是三大攻势的主要战场之一，全区军民承担了供应军粮马草、提供担架、组织运输等繁重的战勤任务。我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侧翼作战，保护桥梁道路，保证运输线畅通，恢复新收复区的社会秩序。

早在1946年底，地委就发出了《关于战争动员的指示》，以后又发出了《关于发展各县、区武装和补充主力的指示》。专署和各县、旗民主政府都设立了战勤科，区设战勤助理员，以区、村、屯为单位把青壮年组织起来，轮流参加支前工作。每个县有常备大车50辆、担架100副，一有命令即奔赴前线。各交通线上还设立了兵站，为过往部队安排食宿，提供粮草。1947年夏、秋、冬三大攻势中，双辽、梨树两县共出担架2311副、大车1729辆、担架队员和民工2万名，征集军粮210万公斤，割青草50多万公斤。怀德、双辽、梨树共为部队补充新兵2050名。

二分区所属部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夏、秋、冬三大攻势。他们主动出击，消灭了长春至四平之间孤立分散

之敌。这一年，分区部队与敌作战 152 次，配合主力部队收复新区 1.5 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50 万。

1947 年 6 月 14 日，四平攻坚战（即三战四平）开始，经过 15 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解放了四平五分之四的地方，歼敌过半，摧毁了敌人坚固的城堡工事，沉重地打击了四平守敌。但是，由于沈阳之敌前来增援，我军于 6 月 30 日主动撤出战斗。在四平攻坚战期间，分区党、政、军、民全面动员，支援前线。地委委员吴甄铎带领 160 名干部，在四平市郊海丰屯组织了中共四平市委、市政府，他们紧紧跟随部队前进，组织群众为部队运送粮草、弹药，抢救伤员，清理战场。军分区副司令员罗杰同志带十六团进入四平市我军控制区，担负卫戍任务。蒙古骑兵团分布在二分区境内各县长达 500 公里的运输线上，站岗放哨，保卫各兵站运送弹药、给养、伤员的安全。

1948 年 3 月 12 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同年 1 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再次攻打四平（即四战四平）。经一昼夜战斗，全歼守敌 1.9 万人，使四平这座英雄的城市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辽吉二分区全境获得解放。

1947 年 6 月，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先后两次给一、二、五地委写信，就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发出指示。二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于 6 月 27 日发出关于《对当前分区南部发动群众几个认识问题的意见》；7 月 22 日又发出《给各县委的一封信》。8 月 21 日，地委召开各县委书记联席会，我在会上作了《如何开展收复区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强调要抓紧时间，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并对老

区、半老区和新区的土改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当时北部老区经过一年的时间，土改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彻底性，与地委关于“熟透”的要求还有差距。中部长岭县和双辽县北部半老区，由于曾经出现敌我“拉锯”，以及地主“还乡团”的反攻倒算，距“熟透”的要求就相差更远，“夹生饭”问题很大。而南部新区怀德、梨树、昌北、长农等县的土改则刚刚开始。因此，地委提出，在老区彻底解决“夹生饭”问题；半老区从反对反攻倒算入手，解决土改不彻底的问题；新收复区从发动群众控诉“二满洲”的暴行入手，进行土地改革。不论老区、半老区和新区都要认真贯彻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倒地主阶级、征收富农多余土地予以平分政策。这就是说要巩固贫雇农的领导权，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要坚决联合中农，不分不斗；对地主阶级则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剥夺他们的统治权和所有权，但对地主本人要少杀或争取不杀。至于民愤极大，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则要予以严惩，但需经地委批准。

地委为了满足开辟新区工作的需要，从老区的前郭、乾安、大赉、安广等4县抽调干部100余人，与地委党校学员一起组成若干工作队（组），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广大群众认清了形势，基本上消除了怕“变天”的思想顾虑。特别是新区群众深受国民党统治之苦，更加相信共产党，热爱人民军队，拥护党的土改政策。广大贫雇农斗地主、分田地的热情空前高涨。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

1948年1月，地委召开各县、区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和省里的土地会议精神。会后，各县、区都先后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贫雇农代表大会，学习、宣传和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提高干部对土改的认识，坚定地树立依靠贫雇农的思想，揭露和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立场模糊、小手小脚、“分子路线”（光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官僚主义等阻碍土改运动的思想作风，并在区村贫雇农积极分子大会或代表会上进行查阶级、交权（把权交给贫雇农）、审干。之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区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全面铺开。

在急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中，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曾在一些地方发生了打击面过宽、侵犯中农利益、“扫堂子”等过“左”的做法。但这些现象只是局部的，发现后我们立即加以纠正，没有造成大的影响。

1948年春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和任弼时同志《关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讲话精神，全区开始进行了划正阶级、纠正偏差、缩小打击面的工作。据统计，原被斗22419户，占参加土改总户数的1.5%左右，打击面超过政策规定的一倍；特别是侵犯了中农利益，给一些富农和富裕中农错划了阶级成分。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各地在认真做好干部和贫雇农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重新计算了剥削率，给被错划户重新划正了阶级成分，打击面减少11655户，降至占总户数的8%。被错划错斗的中农或富裕中农，当众宣布了重新划定的阶级成分，并在经济上给以补偿。

通过这次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据不完全统计，长岭、双辽、梨树、怀德、昌北、长农等6县共有31.8248万户、107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共分得土地1600万亩，占全区耕地面积的78.2%。贫雇农分得牲畜5.9479万头、大车8328辆、粮食2882600公斤。同时起出地主、土匪等藏匿的各种枪支14292支、子弹18万多发。

土改后，翻身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区出现了参军、保田、参政和发展生产的热潮。据1948年11月统计，全区共7.4822万名农民加入农会，有9661名青壮年当上民兵，4.58万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党员总数达到1724名，占全区总人口近千分之二。

1948年4月，省委作出关于《解放区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指示，地委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农业生产和恢复工商业方面来，同时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

在春耕开始之前，地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和县长联席会议，专门研究和布置春耕生产问题。动员全地区党政军民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把全区的熟地全部种上；要尽可能多种地，恢复撂荒地和开垦新荒地，以争取农业大丰收。为实现土改后第一年的增产计划，我们广泛地向人民宣传形势和发展生产的意义，以解除部分群众怕“富了挨斗”的思想顾虑，并切实解决好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困难。同时根据“自愿互助”原则，鼓励农民换工插犋、互助互济，帮助农民大搞副业生产。为此，专署特发放了19.5亿元（东

北流通券) 农业贷款。专署和各县政府还从外地购进牲畜 3000 头, 军分区从部队精简牲畜 1500 头, 无偿地拨给贫困户和军烈属。此外, 在全地区内还普遍开展了户与户、村与村、区与区的劳动竞赛, 专区还拨款 1 亿元, 用于各县奖励劳模。在铲蹙阶段, 我们带头率领政府机关的干部下乡, 帮助农民进行生产。由于解放军对国民党的反攻作战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加之土改的顺利进行, 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全区耕种面积达到 1843 万亩, 比上年多种 171 万亩。秋后, 全区各县普遍获得农业大丰收。

在解放战争期间, 城镇是敌军争夺的重点, 因而损失更为严重。仅四平市就毁坏房屋 1200 多栋, 损失粮食 10 万余吨, 公营和私营工商业损失 129 亿多元。为了恢复和发展民族工商业, 地委加强了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制定了不准农民进城抓地主、斗资本家; 发放贷款、救济款, 免征营业税半年等保护和扶持工商业的政策。中共四平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 8 万多人民, 仅用 3 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民族工商业, 除因毁坏严重不能开业者外, 全市共有 1654 家工厂、商店、作坊开始生产和营业。

1948 年 9 月,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战略部署, 我军奔袭北宁线, 拉开了伟大的辽沈战役的序幕。

辽沈战役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略决战, 要取得这一战役的胜利, 不仅需要经过一系列重大激烈的战斗, 而且还要有充足和及时的物资供应作保证, 要动员成千上万人民群众做好支前工作。我们地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运力, 组织了大车 530 辆、担架 1120 副、民工 5500 多人, 为

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8年10月30日，中共辽北省委发来电报，决定撤销二地委、二专署，成立党政临时办事处，由我任办事处主任，郝治平任副主任，负责处理善后工作。二分区党政机关干部大部调往沈阳，少数留办事处。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中旬，党政临时办事处撤销，我奉调任辽宁省政府副主席，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第五章 在辽西的日子里

一、辽西省成立

194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沈阳，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9年4月作出重划东北行政区的决定，将原辽北、辽西两省合并为新的辽西省。全省面积为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为744万余人。省会锦州。辽西省管辖的地区有：锦州、阜新、四平、山海关和绥中、兴城、锦西、锦县、义县、北镇、黑山、阜新、彰武、新民、辽中、台安、盘山、铁岭、开原、法库、康平、昌图、昌北、梨树、双辽等共4市21个县。

1949年5月10日，中共辽西省委成立。郭峰任省委书记，喻平任副书记，常委共7人，我是常委之一。省委成立后，5月31日辽西省人民政府组成，阎宝航为省政府主席，我任副主席；因阎宝航未到辽西赴任，由我代理主席职务。同年9月，东北人民政府任命我为省政府主席。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新中国就要诞生

了。新成立的辽西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的“全力建设新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和要求，带领全省人民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生产救灾，组织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完成新区土地改革，加强政权建设，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1949年春，我们抓紧时间完成了土改。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从此，辽西省大踏步走上了经济建设的道路。

战争结束，新中国诞生，辽西省百废待兴。省委、省政府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战略部署，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根据辽西特产多、海产多、水患多、风沙多等特点，确定了“组织起来，改良技术，克服灾害，防治水患，扩大生产，发展副业”的方针。由于大力发展了工业原料作物的耕种，使1950年生产总值超过了历史最高的1943年的3.1%。在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上，省市县营工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也有了迅速的发展，不仅保证了各地的供应，也促成了物价的稳定。同时，随着国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得到了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省营工业的工人工资，1950年6月比上年12月增加了16.7%；在农村，大部分贫雇农生活有了改善，过去吃糠咽菜、卖被子、“当袄子”的悲苦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有了很大好转。在加强人民政权建设方面，我们一方面实行了人民民主，扩大了统一战线，团结了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镇压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辽西省已基本实现了从支援战争向生产建设、从农村向城市的工作重点转变。1950年12月25日至31日，辽西省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省委书记郭峰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目前辽西情况和今后辽西人民的任务的建议》的报告，我代表省政府向代表报告了政府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辽西省政府主席。

二、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辽西省是东北解放最晚的地区，城市和乡村都遭受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严重破坏。解放后，又连年遭受水灾、旱灾、风灾、虫灾，使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受到极大影响。

1950年4月，中共辽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省委书记郭峰作了关于《一九五〇年辽西省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号召全体党员要树立正确的经济建设观点，大力发展生产，学会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新方法、新经验，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建设的水平。

省委代表会议之后不久，1950年6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当前的中心任务。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省政

府更加明确了今后工作的目标。我们首先在工业战线上领导党员和广大职工群众，在工厂、企业组织开工，恢复生产，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因为我主要分管政府工作，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针对辽西省工业设施极端落后的局面，我带省政府有关部门有重点地扩建和新建了一些工厂，如纺织厂、印染厂、麻袋厂、果酒厂、陶瓷厂，还有几个机械厂等。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就是缺少技术人员，于是我们便派人到上海等地，与当地政府协商，招聘了一批技术人员，解决了困难。经过一段努力，辽西省的工业有了新的起色。

对于辽西省工业的恢复与发展，相当部分的原材料是具备的。辽西棉花产量占全东北产量半数以上，洋麻占60%以上，羊毛也很多。我们本着“就地取材”的原则，在女儿河投资兴建了一个大纺织厂。一开始，附近的农民都不相信能建起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参加建筑的工人，大部分是附近的农民，可以说对建筑业是很陌生的。为了学习技术，省政府组织了代表团到阜新和兴城实地参观学习，并大力推广了苏长有小组的分段砌砖、双手挤浆和仲志先的模板砌砖法、谢万福木工流水作业法、杨德重和李升华的抹灰法等当时建筑行业的先进方法。在建筑过程中，还改进了裁口刨子等工具，同时在工人中开展了增产节约竞赛，涌现出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小组。省政府在人力、财力上也千方百计给予保证，终于保质保量地如期完工。通过这一工程，为辽西培养了一支有相当水平的建筑工人队伍。为此，我曾代表省政府给工人们写信，勉励大家不要满足现

有的成绩，要再接再厉，为建设新的辽西继续努力奋斗。

辽西省盘山、梨树两大国营灌区，有丰富的稻草、芦苇和棉秆资源，这些都是造纸的原料。1952年4月，省政府开始兴建辽西第一造纸厂。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到1953年11月全部竣工投产。

我们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除积极发展国营工业外，同时扶助私营工业的发展。省营厂矿由1949年的10处，增加到1952年的34处；私营厂矿比1952年增加了18%，整个工业的公私比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就地方国营工业来说，1949年占29.9%；1952年则上升到60.5%。职工人数也迅速增加，省营工业职工人数1949年为2875人，到1952年已增至1.0649万人。由于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主要产品品种已由1949年的13种增至1952年的88种。地方国营工业完成的生产总值1952年是1949年的10倍以上；私营工业1952年完成生产总值超过1949年的3倍半以上。职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1951年职工平均工资较1950年提高17.4%，1952年较1951年又提高49.9%，有12个厂矿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

辽西的农业生产是在不断战胜自然灾害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1951年全省遇上多年不见的严重春旱，为了适时播种，争取丰收，省政府向各地发出指示，号召农民积极行动起来，浇水种地。为了抗春旱，保春种，全省共抽调近万名干部下乡，仅省直机关就抽调了1500名。省直下乡干部由我和副主席仇友文带队，分别到黑山、北镇、

绥中、康平等 10 余县，协助县、区、村政府，发动广大农民突击抗旱、适时播种。工作组出发前，召开了全体下乡干部动员大会。我在会上代表省政府作了报告。指出：自然灾害是当前农业战线上的最大敌人，特别对适合种特产的辽西，危害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战胜不了今春的旱灾，将使全年以至明年的工作陷于被动。为战胜自然灾害，争取全年丰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并打下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基础，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全体干部要发扬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全力领导群众的抗旱斗争。70%的干部要直接深入到农村抗旱第一线，与当地区村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凡事须通过区村政府，帮助区村，带动区村，反对包办代替。一定要做好点面结合，一个工作组深入到一个村，一有先进经验，要迅速向邻村推广。同时，要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鼓舞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

由于全省上下一心，一齐抗旱、播种、浇水催苗，“男女老少齐动手，人、畜、工具三不闲”，春播终于得以按时完成。棉花播种超过 24 万垧，洋麻播种 4.5 万垧，都超额完成任务，大田播种也基本完成计划。但是，老天似乎有意给新生的人民政权以考验。在庄稼长出来以后，全省又普遍闹起了虫灾。我们又发动男女老少下地，使用药剂和土办法，把虫子消灭了。真是“祸不单行”，七八月份，由于连降大雨，开原、铁岭遭受严重水灾，洪水危及新民、辽中、台安、盘山等县。省委省政府立即组织各级干部，领导群众奋勇抗洪。省委、省政府向各地发出紧急防汛抢险

指示，要求组织群众，加强防汛，战胜洪水。同时动员城市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救济灾民；动员灾区人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使灾情降低到最低限度。由于各地党组织和政府的努力，灾区人民没饿死一个人，这充分显示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强大威力。在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51年农业在大灾之年夺取了好收成。记得开原县兴隆台村民，曾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给我和仇友文副主席写信，报告他们抗灾夺丰收的喜讯。我和仇副主席写了回信，鼓励他们在今年的基础上，争取来年更大的成绩。

辽西的土质非常适合种植棉、麻、芋等经济作物。1951年全省棉田已达24.8万垧，超过1943年（伪满最高一年）的194%，棉花产量1949年是16476吨，到1951年已达109082吨，1952年更达109769吨。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可耕地，我们在农民中进行反复宣传，改变过去那种“一步三棵苗”、“棉花转开身，一棵捡半斤”、“有苗无苗，中间一条”、“七成苗不毁，八成苗不沾”等落后的耕作方法和习惯，推广科学方法。根据作物、土质等不同条件，进行适度密植，做到苗全、苗匀、苗壮，充分发挥土壤和粪肥的力量。事实证明，这是丰产的有效办法。绥中有一个农民叫刘宗林，开始不相信适度密植，仍然按照老办法种棉花，一尺三四寸远一棵，结果每亩只收40斤，而同村另一个农民张纯禄是和他同样的地，在接受了示范农场的技术指导后，棉花苗留得密，七寸远一棵，结果秋后每亩收获50斤。事实教育了广大农民，科学的耕作方法迅速得到普及。

由于充分发动群众，采取各种增产措施，生产总值1950年比1949年提高76.6%，1951年比1950年提高21%，1952年比1951年提高27.9%。其中粮食作物产量，1949年为179.4万吨，1950年为255万吨，1951年因遭受大水灾及旱、风、虫、雹等灾害，比1950年减产，为218.3万吨，1952年虽大部分地区发生旱灾、虫灾和风灾、雹灾，但产量仍达到290.9万吨。1951年我们主要发展了工业原料作物，故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1943年缩小了，但由于单产的提高，总产量仍大大超过了历史最高一年的产量。

根据党中央恢复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省政府在狠抓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又根据辽西的具体情况抓了畜牧业生产。我曾对全省畜牧业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步骤地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方针。1950年提出“保护为主、繁殖为辅”；1951年又提出“保护与繁殖并重”；到1952年则提出以“繁殖为主”。在此期间，着力抓了牲畜疾病的防治，使全省畜牧业基本摆脱了病疫的威胁，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52年耕畜较伪满时增加了一倍，畜产品也逐年增加。根据我的提议，全省重点建立了20处马、羊人工授精站和627处民有配种站。

辽西的农业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提及：一是大力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1951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在全省农村普遍发动了爱国丰产运动和增产捐献运动，推动了抗旱播种和夏锄竞赛，取得了当年的丰收。1952年在毛主席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下，

全省劳动模范交流丰产经验，各村都组织起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全省 1384 个丰产村，带动 1000 多个一般村；9714 个丰产组带动 8000 多个互助组，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空前规模的丰产竞赛运动。二是开始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辽西省设立技术学校两座，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为了使农业技术迅速普及，1951 年我们有计划地开展了技术培训，有 20 多万农民受到了技术训练。为提高经济作物的耕作水平，达到了每 500 垧棉田、每 2000 垧麻田、每 250 垧芋草，各配备一名技术干部的标准。1952 年挂锄期间，还分别召开了马拉农具、拖拉机、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 4 个训练班，训练专门人才 1200 多名。三是坚持贯彻组织起来的方针。1950 年农村通过组织起来，解决了农民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1951 年互助组织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全省近 50 万户农民参加了互助组。1952 年经过农业技术训练和省劳模会的两条道路和社会远景教育，互助合作运动获得了大发展。此外，全省还成立了 300 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集体农庄，有计划地发展国营农场 42 处。四是加强了技术指导。农村中普遍建立了技术传授站、技术委员会、配药站等，为有计划地推广新式农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2 年全省推广了综合号铲耧机 1800 台和新式犁 239 台，并建立了 63 处技术推广站。这些都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治水防汛也都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保证作用。

三、兴修水利，植树造林

辽西的河流很多，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但在建国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致使各河流上游水土流失严重，中、下游泥沙淤积，排水不畅，极易发生洪、涝灾害。辽河就是“十年一大灾，三年一小灾”，年年都有局部的水灾。1937年，伪满统治时期，辽河曾淹没了89.4万多垧地。解放后，为了迅速恢复经济，省委省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对各江河进行治理。仅从1949年至1952年的3年中，就有60多万人参加了修堤，116万人参加了防汛，总计培修了2600多公里的堤防，新修和补修涵、闸、渡槽、护岸等建筑物590多处，谷坊8300多座，完成土方5400多万立方，做工1900多万个。仅防洪一项就投资6.8万多吨粮食。另外还恢复和增加灌溉面积3.36万多垧。在短短的3年中，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水利建设工程就比过去反动统治时代几十年的工程总和还要多。

1950年辽西省政府决定对流经辽西境内的大河绕阳河进行综合治理。

绕阳河发源于医巫闾山脉，流经辽西的阜新、黑山、北镇、新民、辽中、台安、盘山等7个县，最后注入渤海。该河长571公里，较大的支流有东沙河、羊肠河、西沙河、黑鱼沟河。整个绕阳河流域面积约8500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山地。流域以内物产丰富，特别是中游地带土

地肥沃，盛产小麦、高粱、棉花、花生等农作物。但是在解放前，绕阳河上游树木被任意采伐，山地都变成了秃山，坡地上又任人开垦和放牧，水土严重流失，给绕阳河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害，每逢发洪水的时候，从上游带来的泥沙，淤积在中下游河道。绕阳河在新民县境内白旗堡一带的主河道，从1940年起到1949年仅10年时间已淤高了1米多，年年发洪水。汛期过后，大片土地立刻变成泥海，而且存水期往往是几个月之久。据1935年到1938年4月的统计，受害的耕地平均每年有320多万亩，原本肥沃的田地，由于受到泥沙的淤压，变得一年比一年贫瘠。两岸人民为了逃避灾荒，成群结队地外出逃难。绕阳河两岸还经常发生山崩，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绕阳河流域通过的铁路也年年被洪水冲毁，严重地影响了省内外的交通。

为了制服肆虐的洪水，使这条河流造福于人民，我们制定了彻底修治绕阳河的计划：一是在上游封山育草造林。二是大量地建筑谷坊等水土保持工程和小型拦河蓄水工程。这项工程从1950年开始准备，到1951年总共投资100亿人民币（旧币，下同），先后动员230多万民工，同时派出大批技术人员，完成土方工程550万方。三是在绕阳河左岸修筑了一座92里长的大堤，在适宜的山沟里修筑了500多座各种类型的谷坊工程。另外，还完成了绕阳河和辽河的分道工程，使得绕阳河左岸过去年年受涝的60万亩良田免去了水患。1952年，省里又投资170亿元，在羊肠河和西沙河上游修筑谷坊7700座。经过3年的艰苦奋战，绕

阳河的水患，除特大洪水外，一般可以得到控制，减少了洪水对两岸工农业生产的侵害。

在解放后几年的水利建设中，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方针，制定了换工互助，结合生产，厉行节约，保证质量，多劳多得的政策，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治水好比治家，防汛保田为大家。”1950年春修中，曾涌现800多名劳动模范。新民县的劳动模范邓云曾创造一天挖23立方土的纪录。为了保证堤、坊质量，民工们自动研究把堤夯改进为推夯、单绞夯、变绞夯、崩夯等，把堤上栽草改进为铺草皮；阜新民工周尚全还创造了挖草皮的“删刀犁”，极大地提高了效率，而且质量很好。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我们还发动群众挖潜力，找窍门，推广先进经验，1951年春修节省90多万个工，1952年春修节约了27.96亿元的工程费。

我在辽西省政府任主席时，下力抓的另一件事是植树造林。

由于辽西地区多风、沙、水、旱等自然灾害，给人民生活 and 地区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当地群众也认识到：“要想活命，就得造林防风”，“要想堤防牢固，就得多栽树”。但在伪满时期根本无法实现农民的愿望。所以，省委省政府便将治理水患和防风沙纳入到我们的重要工作日程。

在植树造林运动中，由我主持，省政府制定了奖励造林与护林护山政策，并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植树造林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由于党和政府的号召完全符合群众的要求，

因此一经动员，群众便立即行动起来。由零星的个人植树迅速发展有组织起来合作造林；由自发地分散地堵风口和栽防风林，迅速变成集中地有计划地营造防护林与水源涵养林。1949年春、秋两季，机关干部和群众一齐动手，共植树4000万棵，面积达5450垧。

辽西最大的造林活动要数防护林带的营造。这一防护林带是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一部分，它南起山海关，北到双辽，总共涉及16个市县，全长约570公里，造林面积约45万垧，受益面积约200万垧。这里包括一部分海防林和水源涵养林。这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最大的造林工程之一。这项工程由于得到了辽西人民的热烈拥护，头两年时间，便完成了省内全部护林面积的10%。

在造林工作中，由于采取了合作造林方式和建立了“保苗”、“保运”、“保栽”的三联单责任制，从种苗供应到实地栽植，每个过程、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科学技术的力量。因此，造林成活率逐年提高，1952年全省平均造林成活率达到80.2%，较之1951年提高了16%。根据造林的需要，采种与育苗事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到1952年，全省育苗面积已达392垧，育苗4.4亿株。

在大规模植树造林的同时，我们加强了护林防火工作。省政府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精神，执行分区分段的护林防火责任制，并对各种破坏森林的行为展开斗争，因此基本控制了乱采乱伐和盗伐现象，山火烧林的事件也逐步减少。为了恢复日

伪时期被破坏的森林，省政府有重点地结合群众利益进行了森林抚育与封山育林工作，到1952年抚育更新4357垧，封山育林86483垧，大片的荒山开始改变面貌。

四、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向“三八”线进攻。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并以武力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同时，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侵略朝鲜的非法决议，并以美军为主纠集法国等15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这种严重践踏联合国宪章、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立即遭到我国的严正警告。但是美国自恃武力，漠视我国对他们的一再警告，很快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样，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我国的安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缜密研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

由中国优秀儿女组成的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开始后，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热潮。辽西和全国一样，也积极地投入到支援战争的行列之中。

辽西军民在省委、省政府和辽西抗美援朝分会的领导和号召下，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清除一部分人头脑中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情绪，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打碎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以此奠定了抗美援朝胜利的思想基础。

随着全省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大家都纷纷以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活动。许多青年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农村组织担架队，城市组织汽车队，省卫生学校也志愿组成医疗队，要求到前线去。省直机关好多供给制的同志，都把积累下来的津贴、日用品、衣物等捐献出来。我记得省委宣传部的白遇阳同志还把自己保存多年的双筒望远镜也献了出来，要求送往前线。1950年11月，省抗美援朝分会发起“一信一袋”运动，只2个月时间，就收到各界慰问金7.6亿多万元、慰问袋1.8万多个、慰问信4.7万多封。

广大工人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提出了“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战斗口号，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竞赛，如工业劳动模范朱国华改进生产技术，给国家节省4700多万元，所得奖金全部捐献。工商界也响应号召，踊跃参加捐献运动。

广大农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普遍提出多铲多耖多打粮的口号。新民县刘家窝堡村300多户居民提出“后方多流汗，前方多杀敌，前方后方一条心”，全部订了增产捐献计划。抗美援朝仅几个月，梨树县就送猪肉4.2万多斤，慰问袋3400个；法库县送猪肉3.1

万多斤，慰问袋 1100 个，慰问信 1700 封；铁岭县献猪肉 3 万斤和大量日用品；新民五区的老乡不但献出了 38 口肥猪，还给前方的战士做了 200 多双鞋。

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第二年春季，义县四区团山子村的人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订出了爱国增产捐献计划和爱国公约。全村种 225 垧棉花，春天干旱，有 800 多人参加了抗旱播种，小苗出来后，又和虫害展开了斗争。到挂锄后，棉花长得过腰深。志愿军出国作战 1 周年时，上合作社交购买飞机大炮捐款的人接连不断，一个小时就收款 1000 多万元。有位苗大娘说：“给志愿军买飞机大炮，我成宿挑棉花也不觉累。”这一年，全村一共缴籽棉 1.05 万斤、高粱 2.99 万斤、洋麻 265 斤。全村捐献的提前完成，说明政治觉悟也得到普遍提高，也标志着辽西 700 万人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有力后盾。

五、镇压反革命

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辽西也和全国一样，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永远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然而反革命残余势力、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并不甘心灭亡，他们极端仇视新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千方百计地伺机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破坏和捣乱。朝鲜战

争爆发后，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于是明目张胆地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烧毁仓库；恶霸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要挟贫雇农退还土改的果实；潜伏的特务纠集散兵游勇，组织地下武装，举行暴动，等等。为了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巩固人民政权，1950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我看到中央指示后感到极其重要。省委会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分析辽西情况，制定执行方案时，我都参加了。我们认为：辽西地处关内外走廊，面临渤海，横跨北宁、中长两条铁路干线，是敌人活动和潜入的主要地区。辽西又是辽沈战役的主战场，敌人在溃退时有大批反动军官及土匪、反动党团和特务分子流散在这里，没有很好清理。而且辽西大部分地区的土改是在和平情况下进行的，不法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漏网者甚多，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刻梦想着复辟。加上我们过去在执行镇反政策上曾发生“宽大多于镇压”的偏向，有的当杀而未杀，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讨论中，我们都感到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专门机关的工作要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清查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要加强专门机关的工作，认真调查研究，掌握罪证，坚持打击重点，打准、打狠，对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予以严惩。当时辽西有个何乃英是国民党员，曾先后充任“新生活工作队”副队长、特种工作队副队长等职。1947年曾带

匪徒多次到古洞坨、果子园等村，杀害我村干部，伤害军烈属。解放前夕，受命担任潜伏组长，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另外还有一个惯匪出身的罗振远，“八·一五”后勾结土匪占山为王，无恶不作。解放后，为国民党效命，杀害干部和进步群众。这次镇反中，人民政府判处何、罗两犯死刑，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镇反”的方针政策，狠狠地打击了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对农村中那些祸国殃民的反动恶霸地主、匪首、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武装头子给予了坚决镇压，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从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进行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

六、“三反”、“五反”运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仅一年的时间，就在前线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但是，要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不断地改进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必须保证前线有充足的弹药供应，必须有畅通的运输线，所有这些，都要消耗大量的财力。当时，我们的新中国刚刚建立，正处在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时期，一方面要进行经济建设，一方面又要支持战争，显然是有困难的，解决唯一的办

法就是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为此，1951年10月，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陈云副总理说，东北地区1950年单从经济方面提倡节约和增产，就多创造了1000万吨粮食的价值，如果我们从全国范围的一切方面都实行节约，就可以找出大批的钱，用到经济投资和国防建设上去。他强调，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节约增产运动，各机关单位不但要将可用可省的开支全部加以节省，就是该用的费用也要找出节约的办法。不急的事务和设备，必须停办。重叠臃肿的机构，必须加以裁减。

为响应中央的号召，辽西立即展开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所有的工矿企业都深入发动群众找窍门、挖潜力、查浪费、堵漏洞，制定增产节约计划。同时还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生产竞赛活动，改进生产技术，推广先进经验，力争优质高产地完成生产任务。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涌现出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在农村，农民们在互助组和劳动模范的带动下，掀起了爱国增产竞赛，通过改进耕作技术，推广先进经验，多打粮食，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

在全国各地开展增产节约的过程中，中央很快发现各地各部门存在着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为此，同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

地进行的指示》。此后，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运动。仅几个月时间，全省就揭发出贪污 1000 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 10 名。其中，贪污犯于长海，是辽西盐务管理处的保管员，在担任兴城沙坨子、五里桥盐务主任时，用一票二运的办法，盗卖公盐，并利用职权包庇私人晒盐滩，包庇车户、盐户盗卖公盐等，总共贪污受贿人民币 1.2 亿多元，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但是，他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彻底坦白了贪污罪行，主动缴出了所贪污的绝大部分赃款，并能积极检举别人，有戴罪立功和真诚悔改的表现。为此，人民政府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其免于刑事处分，继续追缴赃款，另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而对犯罪情节恶劣，而又拒不坦白的贪污犯孙铁声则予以加重判处。孙犯原是锦州区批发站调拨股副股长，在工作中，不断与奸商勾结，合谋以高价买货，从中吃高额回扣；在加工订货中盗窃原材料，并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污人民币 1965 万元。在“三反”运动中，他不思悔改，还不断与同案人及奸商订立“攻守同盟”，后来在他们的“攻守同盟”被侦察突破后，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仍不认罪，企图抵抗到底。为此辽西省人民法庭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2 年，并追缴全部赃款。

1952 年 1 月，辽西省委召开了有省直及锦州市 5000 多名干部参加的干部大会。郭峰同志代表省委号召大家要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精神，展开群众性的坦白检举运动，向贪污浪费分子展开猛烈的进攻。我代表省政府在会

上表扬了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坚持制度的模范干部和领导三反运动的好干部。

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发展，揭发出大量党、政、军内部贪污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多数是和社会上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的。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全国一切城市，首先是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团结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和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与党政军机关内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相配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辽西省根据中央的指示，立即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1952年初，我在锦州市二届七次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在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暴利、反盗窃、反欺诈运动的报告。报告首先提出，人民政府是允许正当工商业存在和发展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追求暴利的目的，采取行贿、偷漏等手段，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拉拢腐蚀干部，人民政府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报告中说：大部分资本家在供给国家和人民必需品，在抗美援朝和捐献飞机大炮，在纳税方面有不少的成绩。但也有些不法资本家唯利是图，假公济私，投机取巧，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漏、反盗窃、反暴利、反欺诈结合起来，纯洁我

们的革命队伍，打退资产阶级向我们的猖狂进攻。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三反”“五反”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七、互助合作运动

辽西在建国后的几年里，根据毛主席“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指示，积极组织广大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可喜的基础，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952年，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合作化的决议颁布后，辽西省委和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农业合作化工作的力度，省里和各县都相继召开了劳模会，开展了以生产合作社与常年互助组为先导的“千村万组带头的爱国丰产运动”。1952年11月，辽西省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代表会议，省委副书记李砥平作了《贯彻中央、东北局农业合作化决议，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辽西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全省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教训，决定深入贯彻中央和东北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确定了辽西省农业合作化的远景规划和1953年互助合作任务，决定争取在5年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要达到全体农户的90%以上。

这次会议后，全省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既积极

又稳妥的发展局面。特别是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后，农业生产提高很快。但是，由于一些干部存在着单纯的任务观点，在不少地方产生了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的偏向。他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机械地为了完成组织起来的数字任务；不是去做农民的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而是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威胁与强迫群众编组。这些做法都严重地违反了自愿两利的原则，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例如新民县十二区从单干户中组织了两个生产合作社，都没有互助基础。后来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在互助合作工作中及时纠正了贪多冒进的做法，稳定了农民的情绪，使互相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得到顺利发展。

八、担任省委书记

早在1952年6月，东北局将省委书记郭峰同志调出，任命杨英杰同志为省委书记，我为第一副书记。1952年11月，由于中央调杨英杰同志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遂由我主持省委工作。1953年1月，中央正式任命我为辽西省委书记，辽西省政府主席仍由我兼任。工作任务的加重，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认为，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是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以加倍的努力，认真踏实的工作，才能对得起辽西700万父老乡亲。

1953年开始执行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同年8月，党中央又向

全国人民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了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省委向全省党组织发出指示，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同时要向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通过深入地学习和宣传，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条“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由于全党上下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党提出的总路线是强国富民之路，所以工作干劲空前高涨，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人们从总路线看到了社会主义美好的前景，各项事业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辽西的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大部分地区有针对性地克服了对互助合作运动中放任自流和急躁冒进两种错误做法，积极巩固和恢复互助合作组织。义县、梨树、兴城、绥中、锦县、北镇、法库、彰武等8个县，根据需求与可能，在原有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计划新建48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兴城全县建立了5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30多个常年互助组也积极要求办社，各种类型的互助组也有了发展和提高。过去散伙的互助组也大部分恢复起来。义县三区从1953年春批判了盲目冒进倾向后，对于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也不敢坚持，一度对互助合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精神后，区领导对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在工作领导上普遍得到了加强，除巩固原有的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外，又新建了2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解散的互助组也重新恢复起来。

在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是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

正当省委、省政府全力以赴带领人民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党内发生了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等待他们觉悟，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终于以自杀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

由于高岗原在东北局工作，所以东北局多次开会，揭露和批判高岗的阴谋活动。1954年4月7日在东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代表辽西省委作了发言。指出，党中央及时揭发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党，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罪恶阴谋，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我们要深刻记取这个教训，增强党的团结，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妨碍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谁知，回到省里后，我却遭到省里个别人的指责，毫无根据地说我是“五虎上将”的“外围”，对我批判了3个月。对这种平白无故的批判，我心里很不服气。

1954年8月，中央颁布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

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辽西省与辽宁省合并，我原以为我会去辽宁省，以后组织上通知我调黑龙江省分配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辽西省。

第六章 主管黑龙江省财经工作的十二年

一、能否顾全大局，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考验

1954年8月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以及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的实施方案》，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经中共中央批准，欧阳钦任省委书记，韩光、强晓初、冯纪新、王一伦任省委副书记。从1954年8月1日起，新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在哈尔滨市正式办公。

我是在合省后从辽西调到黑龙江省的。1954年8月10日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8月13日至16日，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韩光在这次会上当选为省长，我和李延禄、于天放、于杰当选为副省长。8月17日，省委决定成立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党组，韩光任党组书记，我任党组副书记。

当时对我的安排使用，同原黑龙江和原松江省委的主

要负责人的安排使用不一样，他们都担任了省委副书记，而我只担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原因是合省前后，全国都在批判高饶反党集团，高岗原来在东北工作，所以东北是批判和肃清高岗影响的重点。高岗手下有“五虎上将”，郭峰是其中的一员。当时说我是“五虎上将”的外围，是高岗的余孽，包庇郭峰，因而在辽西受了3个多月的批判。其实，我和郭峰只是工作关系，他在辽西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我担任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委副书记，当然要经常在一起研究和商讨工作。我和郭峰之间并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五虎上将”都得到平反，并先后恢复了原来的待遇或职务，郭峰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这说明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当时，在组织上找我谈话调我去黑龙江工作的时候，我表示坚决服从党组织分配。当我刚来到黑龙江工作，听到下边一些干部说我在辽西犯了错误，到黑龙江是降职使用，是“发配”到黑龙江来的时候，有些不快的想法。但我想的更多的是：我们参加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为了革命，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为了彻底消灭阶级剥削，进而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应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地位的高低，应该把党和革命的需要看成是自己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

应服从党的组织，为人民而努力工作，兢兢业业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一定的时间，党组织可能对自己了解不够，但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会作出证明。一个党员应该坦然经受党和革命对自己的考验，时刻维护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全局观念和党性原则。

我到黑龙江以后，省委决定让我分管财贸战线的工作。我管财贸战线抓的头一项工作就是棉布计划供应。中央决定从1954年9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并且制定了实施方案。东北商业会议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央的实施方案，并且提出了有关棉布配售的具体规定。

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全局的大事。我和省政府财委、商业厅研究，让他们依据中央关于棉布计划供应实施方案和东北商业会议有关棉布配售的具体规定精神，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尽快提出实行中央方案的各项具体规定和具体办法。特别是对各种各类人员的定量标准，一定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我说：有些人根据我省的情况，规定与东北不一样的供应标准，可能有一些小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们的标准变了，就会影响其它地方，对全局不利；至于某些特殊情况，只在我们省有这样的劳动和工作人员，还是要规定出切合实际的定量供应标准，但要请示一下才能最后定下来。此外，还要考虑到公用布、临时调剂用布的数量，要周密、细致、具体，不能有任何漏洞。这也是党和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全局观念。

1954年8月19日到20日，在省政府会议室召开了合

省后第一次市长、县长、专员联席会议。我在这次会议的总结中，着重讲了棉布计划供应问题和小麦征购问题。

关于棉布计划供应问题，我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点，对于棉布计划供应工作，不应该单纯地看做是经济工作，而应该从政治上理解它的重要意义。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还落后，工农业生产还不发达。如果不搞棉布计划供应，市场就不能有计划地运行，有钱的人就会囤积布匹，抬高棉布价格，没有钱的人就要发生困难，甚至买不到或买不起布，穿不上衣服，盖不上被子。实行棉布计划供应，私人资本家企业要经营棉布就得经销，这样可以有效地制止囤积棉布，稳定物价，也有利于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对广大人民群众是有好处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建设的利益。

第二点，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涉及面广，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周到。在公布之前一定要作为一条纪律严格保密。如果在公布之前走漏了消息，坏人一造谣，就会闹得人心不稳，私商争购，群众抢购，这样就会影响大局。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首先，要做好组织准备，由有关单位成立棉布计划供应筹备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业务工作。对于委员会的委员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要经过市委、县委审查，选确实可靠、能完成任务的人来承担。其次，各市、县要根据棉布计划供应的标准、工农业生产用布、调剂用布等供应的数量，由市、县委指定人

员检查年度库存情况，包括数量、品种、花色等等，不够的要立即督促商业部门迅速调运。要把棉布放在第一线，一开始就货物如山。再就是，票证的印制和发放手续都要准备好；还要做好了解掌握情况的工作，重点了解私商库存棉布的情况。最后，商店、供销合作社在未向群众公布之前要适当掌握，注意成匹买棉布的，有的可以限量卖，有的可以清理帐目、打扫卫生等理由关门停业，避免抢购。

第三点，要切实做好宣传工作。我强调，不能把棉布计划供应简单地当作单纯的经济工作，而是要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它的政治意义。因此，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使每个群众都知道，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它可以保证城乡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对于棉布的需要及其价格的稳定，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要通过宣传教育，解决群众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从根本上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次序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首先要在区委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和宣传教育，使他们自觉地把棉布计划供应当作关系全局、关系整个国家利益的大事来抓。

在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组织以及全省党员、干部的努力下，中央关于棉布计划供应的重大决策在黑龙江省贯彻执行的比较好、比较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群众满意，局势稳定，有效地维护了全局的利益。

棉布计划供应解决后接着粮食问题又提上了重要日

程。

1954年全国一些地方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大幅度减产，国家急需粮食。1954年10月20日到23日，东北局召开了粮食会议。我作为黑龙江省财贸战线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东北地区虽然有一些灾害，但粮食产量最低不少于去年，而且还可能比去年稍多一些，估计可达1950万吨，其中黑龙江的粮食总产量为700万吨。当时我在会上提出，九十月份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曾进行过3次产量调查，结果是虽无严重灾害，但轻灾面积较大，减产的地方较多，粮食总产量不仅达不到700万吨（合140亿斤），而且很可能只有500万吨左右（合100亿斤）。经过反复讨论，最后东北局确定分配黑龙江省的粮食征购任务是360万吨，争取达到370万吨。当时我想，完成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因为我省粮食产量很可能相当于去年，而征购任务又比去年增加36万至46万吨左右，除去农村消费和种籽330多万吨，余粮只有340万吨，全部征购出来尚有20—30万吨的差额。但是，我又考虑粮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的任务和解决灾区人民生活，恢复生产都迫切需要粮食；同时，国家也需要适当增加库存，掌握足够的粮食，才能应付意外，保持市场和物价的稳定，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和全国人人有饭吃。我们黑龙江省是全国的重要产粮区，有责任多征购一些粮食，支援全国，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因此，我没再提什么意见，把任务领了回来，向省委作了汇报。当时的省委书记欧阳钦同志说，在粮食问题上，

我们要以“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精神，全党动员、全力以赴地完成党中央和东北局给我们的征购粮任务。我很赞赏欧阳钦同志的提法，并把这个提法作为以后多年全省粮食工作的指导原则。

1954年11月3日，省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二次行政会议，集中讨论了粮食征购方案。会议由省长韩光主持，我在会上传达了东北粮食会议精神，并且讲了如何完成我省粮食征购任务的措施。会议确定，征购粮是农村在旧历年前的中心任务，强调要全党动员，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工作。会议还决定成立征购粮办公室，由粮食、财政、省联社、商业厅、银行、财委各抽一名厅长或副厅长，参加办公室工作，以便加强对征购粮的具体领导。

1954年11月4日到13日，省委召开了全省粮食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县委书记和专员、县长、宣传部长、粮食局长、财政局长、团县委书记以及大部分区委书记共1325人。会上，省委副书记冯纪新同志作了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工作安排的报告，强调了春节前要以征购粮为中心。我在会上就如何完成1954年的征购粮任务作了专题报告。会议开始时，对中央的“多征一点，多购一点”的方针不理解，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扩大灾情，低估产量，害怕多分任务影响群众生活的片面群众观点和局部观点。会上会下都喊粮食紧张，省里粮食征购指标迟迟落实不下去。欧阳钦同志了解到大家的想法后，向与会同志讲了一次话，集中阐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粮食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强调要树立“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

难”的思想。他说：“各县确实都有些困难，但国家的困难更大，国家形势不好，县里也不会好。我们应该厉行节约，为国家分担困难，这是一个全局问题。”他站在全局的高度讲得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解决了一些县委书记、县长的思想问题，但仍有不少人思想不通。有的说：“不能叫群众饿着肚子分担困难”；有的说：“现在根本没有余粮，还讲啥多购余粮政策”；有的甚至指名道姓地说我的报告本身就是“政策和任务矛盾，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贯彻政策，要贯彻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还有的害怕困难，说“购粮这一关最难过，去年买粮吃头痛片，今年购粮就得吃阿斯匹林”。针对这种情况，我和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又通过参加各组讨论和个别交谈等方式，打通与会人员的思想，反复向大家说明：国家手中毫无粮食储备，库存数字仅仅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周转粮食，没有机动的余地。1954年我国有些省份发生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大水灾，不但没有粮食卖给国家，而且国家还要供给他们粮食，帮助他们安排生活和解决恢复生产的困难，只有多征购一些粮食，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这是全局的需要，整个国家的需要，也是长远利益的需要。多征多购一些粮食是会给我们省带来某些困难，但这是发展中的困难，是暂时的小困难，不会影响我们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我们自觉地忍受和克服这些小困难，正是为了将来不困难。通过广泛细致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终于打通了大家的思想，澄清了各种糊涂认识，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县区干部主动检查了在征购粮问题上缺乏全局观念和分担困难的精神，比较合理地分

配和落实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表示要坚决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

这次会议后，省委又下发了《关于1954年粮食征购工作的指示》，全省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全党动员，全力以赴地进行粮食征购工作。省委和省政府抽调部、厅、处、科长以上干部180余人，三次下乡检查推动各地的征购粮工作。截至1955年2月末，征购粮已入库318万吨，占360万吨的88.33%，尚差43.6万吨未能完成，但全省日平均购粮进度降到1386吨。这时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完成当年的购粮任务困难了。因为1953年我省的粮食产量比1952年减少15.6亿斤，而1954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又下降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向中央和东北局打报告，另一方面继续抓购粮工作。这一年全省共完成征购粮329.7万吨，上调给国家148.25万吨，支援安徽、河北、江苏等省灾区人民16万多吨。既缓解了国家粮食困难，支援了国家建设，又没有影响我省农民的生活。

1955年，中央决定农村粮食工作实行定产、订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城市压缩粮食销量，实行“以人定量”，我们在3月份就把“三定”政策传达布置到村，七八月份进行试点，到12月底基本上完成了粮食“三定到户”的工作。城市从7月开始先搞压缩粮食销量、“按户定量”，9月以后又过渡到“以人定量”，既完成了中央给的压缩5亿斤粮食销量任务，又使干部和群众都比较满意。党的粮食“三定”政策受到了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在宣传“三定”政策和实行“三定到户”的过程中，农村出

现了开荒、旱田改水田、种植高产作物、积极办社和卖余粮的热潮。这一年黑龙江省的农业丰收，广大农民缴纳公粮和出售余粮踊跃，送粮入库时间提前，进度加快，全省共完成征购粮 352.5 万吨，上调给国家 169.25 万吨粮食，为缓和国家粮食紧张情况和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6 年 7 月，召开中共黑龙江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的省委会。省委第一次全会选出常委、书记处书记，欧阳钦为第一书记。这年的 11 月，经省委第三次全会增选和经中央批准，我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6 年，由于部分地区遭受比较严重的水灾和内涝，有 93 万多垧耕地大量减产，再加上庄稼贪青、霜雪来的早，不少地区的庄稼埋在雪里，损失浪费了许多粮食，黑龙江省的粮豆总产量比 1955 年减少 7 亿斤。当时我想，我们省虽然受了一些灾害，但仍要考虑到全国的情况。1956 年全国成灾耕地 22993 万亩，受灾人口达 7434 万多，灾区粮食减产 244 亿斤，灾害程度超过 1954 年，全国的灾情是严重的。作为一个省的主管财贸粮食工作的领导，应该首先考虑全国的粮食状况，关心全局的利益，尽量从本省多征购一些粮食，为国家分担困难。经过一番艰苦努力，这一年黑龙江省共征购了粮食 61.38 亿斤，其中上调给国家 26.53 亿斤。

1957 年，黑龙江省的粮豆总产量比 1956 年又减少 11.4 亿斤。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尽量多征购一些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省城乡人民的生活和农

业生产的发展？我想最主要的是，使全省干部和群众认识全国的粮食局势，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自觉地节约粮食，尽量多卖一些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支援灾区人民。1957年11月，省委召开了粮食统销工作会议，讨论压缩粮食销量，节约粮食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有些人认为“人是铁，饭是钢，粮食不够吃怎么能搞好生产和工作？压缩粮食销量有点理亏”；某些产粮地方有“可我用够，交多少算多少”，而用粮单位则有“要多少就得给多少，要啥就得给啥”的本位主义思想。我在会上反复强调，必须从全国粮食局势来看问题：1956年全国粮食收购完成821亿斤，支出891亿斤，挖了库存70亿斤；1957年全国又有7省粮田受灾，面积达1.7亿亩，主要是长江以北，特别是杂粮主要产区的山东、河北，历年均需调入粮食，在今年遭受重大灾害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大力支援。辽宁今年仍需调入，吉林往年可以调出一些，今年由于灾情较重也不能调出了。这就是全国的粮食局势。这个局势告诉我们，只有人人节约，才能够吃，才能保证生产；不节约就不够吃，不节约就会把工业化建设吃掉，把社会主义吃掉。从局部看，节约粮食、压缩粮食销量，可能感到有些理亏；从全国的粮食局势看，这样做正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为了我们明天的幸福美好生活，那就理直气壮了。这一年度，我们前后开了4次全省粮食会议，打通了各级干部的思想，提高了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树立了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良好风气。历史上黑龙江省农村的口粮按人计算都没有低于560斤，1957年我省各县的

留粮标准都在500斤以下。粮食征购和送粮入库的进度较往年提前了两个多月，全省共计征购粮食63.65亿斤，达到了先国后社、先公后私的要求。在全省农村留粮比往年都少的情况下，我省还上调给国家20.41亿斤（102万吨）粮食。

1958年，我到黑龙江已经5个年头了。这5个年头没过过舒服的日子，大家都不愿意谈粮食，压力都很大，但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要谈，每年都有点问题，都研究得很认真很细致，工作也都很吃力。1958年就好了，农业生产获得空前的大丰收，全省粮食工作会议开的不长，从10月5日到8日只用了3天多的时间。会上针对某些人认为“今年粮食丰收了，完成任务没问题，可以大撒手了”的麻痹松劲情绪，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在会上反复强调，粮食丰收，任务加重，农村工作异常繁忙，时间又十分紧迫，征购粮仍然是相当紧张的局面，在工作上是“缓不得，松不得，麻痹不得，撒手不得，宽日子要当紧日子过，紧起来才能完成粮食征购任务。”10月22日，五常县八家子人民公社一马当先超额完成了征购粮送交入库任务。我们抓住了这个典型，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到11月10日，又有五常、绥化、拜泉、呼兰等8个县做到深翻送粮双报捷。到11月15日，全省已超额完成黑龙江省80亿斤的指定任务，以后又认真地进行了粮食扫尾工作。这一年度全省共完成征购粮88.55亿斤，上调给国家27.41亿斤，既保证了国家的粮食需要，又使全省农村工作争得了主动权，腾出了整个一冬时间，一心无挂地转入水利建设、

冬季副业生产和明年生产准备工作。

1959年，黑龙江省的粮豆产量比1958年减少13亿斤，但总的来说全省的农业还是丰收的。上海会议中央分配给黑龙江省的粮食征购任务是85亿斤，以后又调整为82亿斤。这个任务是很重的，超过了1958年。当时，我想起了两年前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讲的一些话。陈云同志说，要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必须稳定市场，而粮食是稳定市场的核心，这是吃的问题，再就是穿，吃和穿都解决了，屁股坐稳了，才能大发展，才能顺利前进。李先念同志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丰歉的规律来看，5年中有一年是丰收年，2年是平年，2年是灾年，国家要解决一个灾年，就需420亿斤—440亿斤的库存粮食，若连着两个灾年，没有480亿斤到500亿斤的库存粮食，日子是过不去的。解决的办法是：少吃一些，丰收的年成要多征多购，普遍丰收普遍增收，局部丰收局部增收。我反复考虑，黑龙江的农业虽然比1958年减产了，但总的还是丰收的年成，理应尽量多征购一些粮食，缓和全国的粮食紧张形势，使国家把粮食储备搞起来，以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和省委都赞成我的想法，要求按照中央的精神尽量多征购一些粮食。我在这一年的夏收分配、征购粮工作会上强调，去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抓快、抓紧、抓狠、抓好、抓到底，全国粮食很紧张，我们也紧，但是我们是第一大粮户，留粮标准不仅不能高，而且要低；商品粮比例不仅不能少，而且要比往年多。这样，既能使国家多掌握粮食，又能使农民增加收入。我说，要教育广大

农民真正明白：我们是 6.8 亿人口的大国，一天一人多吃一口，就是个很大数目。一定要节约粮食，省吃俭用，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这样不仅可以吃饱吃好，而且苦几年就翻过身来了。这一年，在整个粮食征购工作中，全省各级党组织、政府和党员、干部，全力以赴，认真工作，到 1959 年 11 月底就完成粮食征购入库 100.73 亿斤原粮，折贸易粮 95.4 亿斤，超过国家计划 16.3%，每一农村人口平均向国家交售商品粮 1000 多斤。全省上调给国家 36.2 亿斤粮食。

1960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建立六个中央局。10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组成，第一书记是宋任穷同志，欧阳钦同志任第二书记，马明方同志任第三书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同志任书记，喻屏、强晓初同志任候补书记。1960 年到 1962 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经济形势异常困难。各地都发生饥荒，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黑龙江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1960 年比 1959 年粮豆产量减少 48.8 亿斤。各地都喊灾情大、任务重、困难多，送粮高潮也不那么大，全省最高日入库量只有 2 亿斤粮食，很快就降到一亿斤，甚至几千万斤，几百万斤。面对这种形势，省委组织了万人工作团，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亲自任团长，省委书记处的同志分地区包干，县县都有省的部、厅、局长和地委书记级干部，社社都有县委常委和地委的部、局长级干部，生产大队都有县的部、局长级干部，生产小队都有公社的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帮助群众打场送粮，安

排生活。我在全省粮食电话会议上反复强调，必须全国一盘棋和城乡兼顾。一再说明：1960年全国有9亿亩灾情，明年可能闹浮肿病，你是祖国的一个省、一部分，你不能比别人过的好，共产主义风格就在这时才要有；我们有困难，全国更困难，你拿出粮食，支援全国，才算共产主义风格。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顾全大局，决不能动摇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我们一定要多征购一些粮食，支援全国，稳定全国的局势。这一年，我们花费了巨大的力量，全省共征购粮食66.98亿斤。黑龙江省历史上的粮食消费水平最低为400多斤，300斤以下是没有的。可是，这一年农村的口粮，比留粮标准却差的很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全局出发，还拿出20.56亿斤粮食支援全国，自己少吃一点，紧一点，使全国过得去。我感到心情舒畅，认为这是我们全省人民的光荣。

1961年黑龙江省粮豆产量又减少10.2亿斤，是解放后黑龙江省粮食产量最少的一年，粮豆总产量才91亿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援全国，保证城乡人民的生活，全省共征购粮食48.17亿斤。征购粮结束不久，全省粮食供应就突破了“危险线”（全省城市周转粮20亿斤），接着又突破了“警戒线”（15亿斤）。粮食非常紧张，很多人以苞米瓢、豆皮、稻壳磨碎制造的代食品充饥。有的甚至将木本、草本植物磨碎掺和在糠面中烙煎饼吃。省委领导同志对此忧心如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渡过灾荒。我作为主管粮食的省委书记，每日忙着生产自救，调剂各地粮食供应，生产代食品。同时，我们也为中央和全国忧虑。周总

理为了全国人民的生活，说服各地同志多上缴一些粮食，日夜操劳，不肯休息。1962年3月，周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部署粮食问题。我和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总理提出，黑龙江已经调出28亿斤粮食，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全国的粮食危机仍很严重，还要再增调两亿斤支援外地。那天欧阳钦同志因病没去参加会议，我当时思想不通，就同周总理争了起来。我主要考虑省里已经十分困难，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再多调出两亿斤粮食，困难和压力实在太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我作为主管的省委书记，难以向全省人民交待。周总理耐心地同我谈，黑龙江有困难，其它省份更困难，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国家要帮助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散会后，我向欧阳钦同志汇报了会上争论的情况，欧阳钦同志也给我做工作，要我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周总理和欧阳钦同志的帮助，使我深受教育，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省的利益多了，想全局的利益少了。现在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服从全局的思想是否坚定的时候了。随后，我向周总理表示困难再大也要执行中央的调粮计划，维护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省里，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如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增调粮食任务。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和省委领导同志，从大局出发，竭尽全力多征购一些粮食，支援全国，确实加重了全省吃粮的困难，因而受到了一些人的责难。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

人大会议，不少基层同志认为省里征购了“过头粮”，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是“杨过头”。当时，欧阳钦同志主动地承担了责任，说：“不是他过头，而是我过头。”那时我想，过头与不过头也是相对的，不能离开时间、地点、条件孤立地看，要从实际出发，要同当时的粮食情况相适应。1960年、1961年全国和我省的农业都受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央提出低标准、瓜菜代，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在全国粮食异常紧张的情况下，照长年看我是征购了“过头粮”，为国家分担了困难，也加重了本省人民吃粮的困难，但是在省委的领导下，经过努力工作，精心安排，黑龙江省城乡人民的日子虽然紧一些，还是能够过得去的，因而我心里还是安稳的。

二、时刻关心群众痛痒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穿衣问题，疾病卫生问题，等等。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要使广大群众从这些事情出发，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把党和政府提出的各项任务，把经济建设当作自己的生命，自觉地去努力奋斗。

1956年4月，中共牡丹江市委向省委送来的《关于牡丹江市职工生活调查报告》说：几年来广大职工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仍有一部分职工的生活存在程度不同的困难。其中有占被调查职工总数13.87%的职工，按家庭人口计算，每人月平均收入只有9.67元，实际消耗10.27元。这类职工在生活中除主食按粮食定量购买外，副食绝大部分是蔬菜类，并在春、冬季节多以咸菜下饭，穿戴需采取父子传递和取下棉花穿单衣的方式换季。还有占被调查职工总数12.78%的职工生活最困难，这类职工按家庭人口计算，每人每月平均收入7.31元，实际消耗8.66元。他们经常处于顾吃顾不上穿，顾穿没有烧的局面。当时，我认为这个调查报告很好，并同省委领导同志商量批转到各地、市、县委和厂矿、森工、企业、基建、农场党委，提出必须把关心职工生活问题当作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认真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地逐步加以解决。省委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通过扩大计件工资面，建立经常性的考工晋级制度，建立质量奖，节约奖，技术革新和新产品试制奖等办法增加职工收入；搞好集体福利事业，降低职工食堂的伙食成本，建立互助储金会及时进行困难救济；充分发挥劳保基金的作用等措施，帮助有困难的职工解决生活问题，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1959年春节前，黑龙江省各大中城市的节日用品不足，猪肉、粉条、白面、大米、蔬菜、副食、鱼，都不能满足群众过春节的需要。当时我想，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广大群众忙了一年，都盼着过一个欢乐的春节，搞好春节的物资供应是关系群众生活的大问题。过去这类问题都由有关业务部门来解决，今年必须由党委来抓一下。我和省委领导同志商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我在电话会上要求各地、市、县委和政府，都要把春节的物资供应当作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来抓，要集中时间，集中运力，突击抢运，切实保证群众过节的物资需要。结果，这一年春节的物资供应比较好，群众比较满意。

1959年下半年，东北三省市场紧张状况加剧，从副食品到轻工业品，到生产资料都奇缺。开始是城市紧，到八九月份农村也紧。商业靠吃库存过日子，有出无进，或出多进少，商店没有东西卖。黑龙江的工人由于营养不良，相当普遍的患“雀蒙眼”，重工业工人营养不良，劳动效率降低，因此厂里就想办法到农村换副食品。有些私商小贩、懒汉、二流子借走亲戚之名倒卖一、二类物资。这样一来物资更显得不足，由于市场上开始不稳，自发抬价的现象在发展。猪肉高到2元一斤，鸡蛋2.6角一个。饮食业抽条降质，而价格不下降。服务行业更不稳，补鞋的由于钉子缺，他有一点钉子就漫天要价，钉一双鞋有的比买一双新鞋还要贵。市场紧张，物价不稳，直接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为了缓和 market 紧张状况，妥善地安排城乡人民生活，省委召开了会议。正在省里开会的时候，中央也召开了财贸书记会议，研究市场问题。我在省里和中央的会上都讲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市场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应该当机

立断，机不可失，现在就断，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缓和市场的紧张状况。一要压缩供应，实行限量。首先要安排好人民生活最低的需要，多少“保护”中第一条应是“保户”，要叫人民过得去。二要控制购买力，发公债，搞储蓄。1959年黑龙江省城市储蓄和公债计划共1.36亿元，建议银行调整存款利息，至少要把定期存款由现在的4厘恢复到过去的6厘。农村储蓄潜力很大，应积极利用银行和信用部，大力开展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宣传，动员农民储蓄。要大力节约行政事业费开支，压缩集团购买力；同时还要大力开展服务性业务，扩大非商品的现金回笼。三要清库查帐，搞出一些东西来，能解决一些问题。四，最根本的是解决生产问题。机关、企业、学校、部队都要搞自己生产猪、禽、菜的小型生产基地。农村要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市场的商品供应量。发动农村妇女、老人养猪、养兔，采集山产品和野菜。多种经营要采取多种形式，不要光靠集体的万猪场、万禽场，可以采取公有公养、公有私养（承包到户），私有私养等多种办法。现在把弦子拉得太紧了，应该适当地退一些，有退才有进，退是为了进。五要有分别、有计划地积极搞县、社工业。如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原材料加工业，农具、机械修理业，等等。六要加强基本建设投资的管理，各部门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原则上不建。

我的上述意见受到中央的重视，并且被省委采纳。按照省委的要求，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原来提出的《关于控制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意见》、《关于工业品和副食品供应

工作进一步安排意见》、《关于饮食服务业工作的安排意见》、《关于当前粮食油脂问题的安排方案》，并且立即行动起来，狠抓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由于1958年农业大丰收，再加上省委、省政府采取的措施有力，1959年黑龙江省市场紧张情况逐步趋于缓和，人民生活得到妥善的安排。1959年城市储蓄完成1.27亿元，农村储蓄完成了1.27亿元，日用工业品供应量大大超过1958年的水平，市场形势良好，物价稳定，到1960年七八月份，粮食一直压住阵角，蔬菜自给有余，广大群众比较满意。

那时，我经常考虑，财贸部门既要成为人民生活的组织者，又要成为人民的指导者。1960年1月8日，我在给“欧阳钦同志并报省委”的信中，提出了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几项内容：（1）在春节前切实安排好农村粮食消费。做到安排落实，留有储备，保证不出问题。（2）实行“一条龙”服务和 service 到底的办法。各商店要实行从买到卖，从组织安排生产到出售分配商品、修理商品、收回废品、以及废品“复活”“一条龙”负责到底的服务办法。各商店都要做到小的商品品种全，大的商品能修理，卖什么修配什么，商品损坏后还可收回利用复活。同时整顿提高并适当发展街道服务站，建成以国营网点为核心的店站结合的服务网，实行分片包干“服务到底”的办法。通过送货到门，服务到家，代办家务事，更新补旧，拆缝洗浆，无微不至地为人民生活服务。（3）指导消费，安排生活，精打细算，节约储蓄。要使财贸部门成为人民生活的组织者和消费的指导者。

这些意见，得到欧阳钦同志和省委的赞同。于是，我便组织财贸部门从第一季度开始实施。全省财贸战线的广大工作人员，态度积极，工作认真，雷厉风行，到1960年3月中旬，据9个市的不完全统计，已办起居民服务站4543处，各种类型的服务网点1.4506万处，在全省各个城市一个以国营商店为骨干，以群众性的服务站为基础的人民经济生活服务网已经形成，做到了街街有店，委委有站，院院楼楼有组有员。有些机关、企业、工厂还做到吃饭、洗澡、看电影、做衣、拆洗缝补、修理、理发等不出门。全省农村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社社有部、区区（管理区）有店、队队有站、屯屯有组初具规模的服务网，为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服务。

1960年农业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市场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农村普遍缺少吃粮和马料。城市粮食也很紧张，6月末全省粮食库存仅剩2.6亿斤，不打周转，库存全数卖出，也只够半个月销售，那时全靠中央调粮接济过日子，万一调运不及时就会发生大面积脱销。城乡人民储蓄和持币量上升，商品供应紧张，市场上排队成龙的情况增多，有人见队就排，雨伞、凉鞋冬天也抢购，糖果七八元一斤、饼干5元一斤也摆不住。市场一个季度不如一个季度，人吃、马喂和穿的、用的、烧的全面紧张。当时我和省委领导同志都认为，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活跃市场，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一生活、二市场、三建设的方针。

那时我脑子里想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安排好群众生活，保证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就是最实际的为人民服务，也是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我作为主管财贸、粮食工作的省委书记，应该主动承担起这项重要任务。1961年1月，我主持召开了代食品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大搞代食品，解决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2月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3月召开了地、市、县委财贸书记会议，都是讨论安排好人民生活和活跃市场。4月我到合江地区的佳木斯市、富锦县、宝清县、双鸭山市，检查生活安排、春耕生产和市场问题。5月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又讲了安排生活问题。5月底再次召开地、市委财贸书记会议，进一步安排人民生活。8月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小夏收、小秋收的指示。9月又召开地、市委财贸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以粮食为中心的农副产品收购和以物价为中心的市场安排问题。10月省委再次发出《关于安排生活和市场的指示》，对于解决吃、穿、烧、用紧张状况，保证安全过冬，提出了具体措施。十一二月份，又同各有关部门具体研究解决了大中城市、工矿、林区的吃菜问题和过冬物资供应等问题。总之，这一年，每天都忙着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市场。当时有两句流行的话：吃的不够蔬菜代，用的不够修配补。这一年，在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财贸战线的广大职工，在安排城乡人民生活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六项工作。

第一、安排好生活，保证生产。在安排生活中首先要把吃饭问题安排好。在农村要保证达到每人每天吃四五两粮的“生命线”，争取一天吃六七两的“生产线”。实现这

个目标，国家必须拿出一些粮食返还农村。省里倾其所有，给农村 9.4 亿斤返还粮，使农村在 4 至 9 月的 6 个月中每人粮食安排 80 多斤，每人每天平均吃粮 5 两上下。这样，就保证了“生命线”，接近了“生产线”。为了保护好有生力量，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我们还在农村做了五件事：一件是大搞“小春收”、“小夏收”、“小秋收”，把秸棵拣净，把场院打净，把地收净，不论好粮次粮、瞎谷水稗、菜根菜叶、土豆甜菜，统统收拣回来，谁拣归谁，不归大堆。二件是大搞代食品，全省农村共搞出 100 万吨淀粉，每人 100 斤。三件是春暖花开，青草发芽以后，组织群众，特别是学生、妇女等非主要劳力，挖野菜、撸树叶，争取每人每天吃到一斤以上，以弥补粮食、代食品之不足。四件是，大抓早熟作物和春夏菜的种植。除集体种植外，还发动社员利用自留地、沟边壕沿等零星地自种自食，力争做到家家一个人自种自食，户户有余粮，家家有余粮。

粮食工作，职工和居民节约的粮食一律归己，每家每户都能有半月 20 天的储备粮。我们搞代食品的做法得到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的大力支持和表扬。

第二、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种好早熟作物。全省各级财贸部门，都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小农具、化肥的生产和供应；在支持农民多打粮食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落实经济作物生产。首先安排好蔬菜生产，发动集体种、个人种，不仅补充了农村吃粮的不足，而且还保证了城市的蔬菜供应。城市全年每人每天大体上可吃到 7 两左右的毛菜，旺季一斤左右，淡季不到半斤。

第三、大力开展“修配补”工作。普遍建立了国营修补网，在城镇每个商店都开展修理业务，有条件能够自修就自修，没有条件的就和有关工厂挂钩，接活送厂修理。农村供销社普遍建立了修理服务部或组，组织“五匠”（铁、木、罗、成衣、洋铁）下乡开展“修配补”业务。全省到 11 月底共修补棉服 2000 万件，棉鞋 3500 万双，基本上做到了：衣服“五补二”，鞋子“十修八”，生活用品应修尽修，解决了穿用之不足。

第四、敞开供应优质高价商品。对某些非广大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实行优质高价，如高价糖果、糕点、清凉饮料、茶食、高级饭菜、高级日用工业品、高级工艺品和美术品、高级服务网点等等。优质高价商品的品种和价格，由省统一决定。这样做是为了解决货币多、物资少的问题，其结果是既活跃了市场，扩大了货币回笼，又满足

了部分消费，安定了人心。

第五、发展小商品生产和日用工业品生产。1961年，黑龙江省的购买力增加15—20%，日用工业品省外进货却比1960年减少14%左右。解决的办法，除请中央有关部门给予帮助外，只有自力更生，补缺补短，增加省内自给比重。我们先安排小商品生产，同时把能立即见效、马上能投入生产的日用工业品安排下来。

第六、增加收入，减少支出，扩大货币回笼。当时市场货币流通量很大，居民手里平均每人有三四十元，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力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反复宣传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整顿预算外资金，降低企业留成比例，节约非生产性开支，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和财政支出，凡是应控制的集团购买力，财政不批预算，银行不拨款，商业不卖货。同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扩大货币回笼，动员城乡人民积极储蓄。

在抓生活和市场安排的过程中，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反复教育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怕困难，从来都把困难做为发展的动力；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是没有用的；革命热情、革命气概、革命精神永远是克服困难取得革命胜利的首要因素；只要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在困难中学会过穷日子，鼓足勇气，坚定信心，把工作做到家，就一定能够把生活搞好，把市场搞好。1961年由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把全省城乡人民的生活安排下来，没有出大问题，既保护了有生力量，又保证

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1961年，农村由于贯彻十二条、六十条，家家都有园田地、小开荒，生活情况比上一年略好一些。

1962年，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当作经常的中心工作，坚持全党抓，常年抓，一抓到底。在征购粮过程中，强调要把征购粮同生活安排结合起来。征购粮结束后，又集中一段时间，一个队一个队的安排落实，一户一户地访问和帮助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了安排好群众生活，我们在国家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又从紧缩城市粮食销量等方面挤出4.15亿斤粮食返还给各地区，安排农村人民生活，同时发动群众，挖掘粮食潜力，增加粮源，补充口粮、马料之不足，并且组织社、队、户之间余缺调剂，切实做到保人、保畜，过好日子，搞好生产。1962年全省城市和农村的群众，都有节约渡荒的思想准备，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帮助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他们主动同党和政府相互配合，与困难进行斗争，因而群众的吃、穿、烧、用都安排得比较好，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改变。

三、改造私营工商业

我来黑龙江工作后，省委除了让我主管财贸战线之外，还分管统战部的工作。1954年10月24日，省委决定，关

于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由省委统战部负责。我在分管统战部工作期间，主要抓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它工作都由当时的省委统战部长张瑞麟和副部长杨子荣等同志来管。

黑龙江省的私营工商业在1953年以前，有过很大发展。但是，从1954年起开始下降，到1954年末全省私营工商业呈现出比较严重的萎缩现象，因而造成失业、半失业人员增多，工人生活困难。

1955年1月，中央召开了计划会议，2月召开了财经会议，都确定了全面安排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政策。我认为私营工商业在增加工业产品的供应，增加国家工业化资金的积累，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劳动者就业，训练技术工人和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把私营工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要把它变成人民的财富，就必须使之维持下来，继续经营。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统筹兼顾，统一安排”的方针，省委和省府于1955年3月8日到12日召开了财经会议；1955年3月31日，省府下发了《关于把私营商业维持下来的初步意见》；1955年4月5日，省委又发出《关于积极安排私营工业生产问题的指示》，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作了合理的安排。在工业方面，采取了对公私任务的合理分配和对公私之间的生产任务的合理调整，帮助其解决原料，按行业召开产销平衡会议，解决销售问题。在商业方面，采取了调整批发和零售的差价，调整批发起点，加强对私营商业的批发业务，适当地让出一些品种和

搭配一定的热销货等等办法来进行安排。经过半年多的工作，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困难已经有所好转，经营额有显著上升，全省私营大型工业的生产总值，1955年第三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3.5%；私营商业零售额占商业零售额的比重，1955年第一季度为9.96%，第二季度上升为10.95%，第三季度虽是淡季，但仍上升为11.16%。这就使大多数私营工商业可以维持下来，不少户还有盈余。

1955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省委召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我在这次会上作了《关于加强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前段工作的成绩，指出前段工作的主要缺点有两个，一个是对私营工商业安排的不够好；二是安排与改造脱节。我在报告中说，我们安排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目的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不能设想在安排中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必须安排与改造相结合。可是我们这一段工作中，却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重安排轻改造”或“只安排不改造”。如果不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改变其盲目性，为安排而安排，那是永远也安排不下来的。在今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上，将步子迈大一些，切实把这项工作加强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有些同志有一种顾虑，说是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我们就会背包袱，这因为“没有原料，没有任务”、“一改造就靠上我们了”。这些同志不敢挨近私营工商业者，造成改造工作迟

迟不前。因此，我在会上强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说：哈尔滨市 1954 年预定合营一家糖稀厂，但在进行工作的时候，因为没有原料就把它放下了，不合营了。后来领导上坚持，实行合营，原料也解决得很好。这说明你要改造它，就要深入调查研究，没有原料找原料，没有任务调整任务，就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如果你怕背包袱，离它很远，不敢靠近它，就不能了解它，也就无法安排与改造它。退一步说，不进行合营，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它没有原料，没有任务，要倒闭，工人要失业，你不也得背包袱吗？今天不是背不背的问题，而是如何背的问题，是被动、盲目地背，不安排改造、不纳入计划而造成混乱；还是自觉、主动地背，积极安排改造、纳入计划呢？我们当然应该采取后一个办法，这样就会将包袱变成社会主义的家底，变成人民的财富。

这次会议，确定在 1957 年末在私营工业方面，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将大型工业全部进行公私合营，对中型户也要通过联营并厂，基本上达到公私合营，对小型户有的引导其走合作化道路，有的亦可经过联营并厂用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发展为公私合营。对私营商业将发展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使之达到 90% 以上。对农村小商小贩将通过各种合作形式使之纳入合作商店的轨道，达到 90% 以上。

1955 年 10 月 27 日和 29 日，毛主席在北京两次约见全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座谈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

题。他针对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动荡不安的心理，系统地阐明了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希望资产阶级人们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陈云同志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提出了六点计划，即统筹安排，生产改组，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广定息的办法，组织专业公司，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1955年12月2日，我在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上所作的《关于黑龙江省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中提出：我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陈云副总理提出的六点计划，把对私营企业中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公私合营提高到在一切重要行业分别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水平。我说：整个行业的合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需要的。因为既然生产是从整个行业来安排的，既然整个行业的各个工厂要加以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或基本上全行业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从原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955年12月9日至14日，省委召开各地、市、县、镇主要负责干部和省直单位、业务单位的党员干部共1885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17条指示、陈云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决议（草案）》以及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专题发言，讨论修改了10月份省委制定的“私改”规划，提出了完成规划的六条措施，强调要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决定在现有做“私改”工作的1355名干部外，再抽调3000名干部做这项工作。

1955年12月10日至23日，黑龙江省工商联筹委会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共380人。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10月份两次约见工商界代表人物时的谈话精神、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执委会的精神以及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我和省委统战部长张瑞麟同志都到会讲了话。通过这次会议的学习和座谈，提高了大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也增强了他们带头接受改造的自觉性。

在省工商联筹委会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期间，哈尔滨、佳木斯、勃利县的工商业者就要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会后，各市、县工商联立即贯彻会议精神，广大工商业者表示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纷纷酝酿全行业公私合营，而且有不少工商业者已经行动起来，要求政府派人去领导。1956年1月6日，哈尔滨市已有33个行业、1159户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有些私营工商者向当地党、政领导讲：“咱们的改造速度太慢了，应该快些，不然就落后了。”一些顾客不愿意买私商的东西，有的买了又把东西退给私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形成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局面。

1956年1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席卷全国。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今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做法，也就是在工作步骤上实行先公私合营，后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的方法。

1956年1月15日，听到北京市各界在天安门庆祝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胜利联欢大会的实况广播后，我省的高潮也推向了顶点。哈尔滨市于1月15日已有44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万余名私营企业职工和工商业者举行庆祝游行，分别向市委、市政府和工商联报喜；1月20日全市101个行业中的4440户私营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1月22日，哈尔滨市20万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同一天，齐齐哈尔市15万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1月24日，佳木斯市各界6万人集会，庆祝全市私营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1月25日，牡丹江市举行了完成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庆祝大会。1956年1月27日，黑龙江省宣布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全省55144名工商业者分别纳入国营、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其中公私合营的占72.3%，并入地方国营企业内的占12.4%，通过合作化改造的占11.6%，并入老的合营企业内的占3.2%，淘汰的占0.5%。个体手工业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这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来势很猛，发

展很快。由于领导思想没跟上，准备工作很不够，所以不少工作做的比较粗糙，遗留了不少问题。1956年2月17日至24日，省委召开了第三次“私改”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成绩是很大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应在今后工作中注意解决。

我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强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转为深入的巩固提高阶段，深入阶段的工作比前一段轰轰烈烈的工作更加复杂，必须进行细致的工作才行；我们不能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了就万事大吉，产生松劲思想。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中还遗留下来一些问题，必须逐步解决，很多思想工作、组织工作都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一种阶级斗争，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由于合营就消灭了，而是斗争形式改变了，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更加繁重了。

为了巩固提高私改工作成果，充分发挥公私合营企业的作用，这次会议确定在今后必须做好下列工作：

第一、进一步搞好清产核资工作。前一段，由于赶进度、急于求成，未能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在清产估价上，一般抠得过紧，出现了偏低问题，甚至个别的把生活资料也动员入股。当然也有的估价偏高。会议决定，估价偏低的要适当调整，偏高不大的应以不动为好，过高者群众意见多的也要调整。对于资本家入股生活资料的要纠正，献产的都不要接受。对于清产核资中有关公私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央“从宽从了”的方针，尽可能予以了结。

第二、做好经济改组工作。工业一般的应着重于有利生产，根据需要与可能来组织合营工厂或车间，条件好的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并成一个工厂，条件差的可组成一个工厂的若干分散车间。商业上，大户可以带进一些附近小户组成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集中经营，统一核算，实行定息。在网点问题上，百货可在主要街道，不宜大变；连家铺一般不宜过分集中，要适当地分出一些杂货铺到街巷，实行独立核算。关于工资制度问题，真正公私合营了可以挣固定工资，合作户和经销小组可以分别采取计件工资或基本工资加奖励等办法。服务业一般过去实行计件工资的，今后还实行计件工资。

第三、关于人事安排问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决定采取“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和“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按照先上层人物，后一般业者，先大企业，后中小企业，分期分批进行安排。在工作上要注意小户和对妇女的安排。

第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出了六条要求：（1）迅速把任务布置到基层，发动职工讨论，提出保证条件；（2）发动搞倡议，搞挑应战，搞厂际店际竞赛，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商店中搞人和人的竞赛，在职工、店员中搞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商业工作者活动；（3）建立与各方面的经济联系，要把原企业中旧的产、供、销联系带到新的企业里来，并扩大这种联系；（4）组织参观学习，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5）立即恢复生产经营秩序和责任制，逐步建立新的制度；（6）领导上要深入检查，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

第五、对资产阶级分子加强思想改造。我们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始终坚持双重改造的方针，既要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又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在黑龙江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过程中，不少资本家积极带头，主动串连。当时，全省的进步核心分子达到60%，中间的30%左右，落后的10%左右，由过去的中间大两头小变为倒过来的宝塔式了。我们要对资本家、职工、业者家属等思想觉悟有充分估计：确实很多人是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但也有的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掉眼泪。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改造是长期的，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分子都成了合营企业的工作人员而麻痹起来。要结合实际进行教育；要建立正常的教育和学习制度，注意对其家属和子女的教育，并要有一定的机构和干部来抓这项工作。

关于城乡小商小贩的问题。1956年末，黑龙江省共有小商小贩5.9万名，其中已经组织起来有4.3万名，对尚未组织起来的1.6万名小商小贩，我们采取在自愿的原则下分期分批地组织成为“分散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作小组或根据需要组织一些“共负盈亏”的合作商店，实行基本工资加劳动分红制。1956年11月6日至13日，黑龙江省召开了城乡小商小贩代表会议，进一步解决了对小商小贩的改造和发挥他们的作用问题。会议强调，对小商小贩要加强政治学习，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树立社会主义经营思想；要公平交易，不投机取巧，要童叟无欺，秤平

提满；要大家团结一致，发挥每个人的专长，共同办好企业；要保持农村肩挑小贩“以货易货”，服务行业服务到门，货郎担子“串乡游街”等分散服务方式，保持小商小贩的经营优点和特点，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60年代初期，哈尔滨市为了解决市场供应不足和贫苦市民的困难，提出在城市开设一些由私人经营的店铺，并允许收入低微、生活极为困难的职工，利用星期天和业余时间，走街串巷，为居民修理各种家用器具，藉以增加收入，并缓解一些人的就业问题。当时我认为，哈尔滨市的这种提议是几全其美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会出现一些个体的店铺、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但对人民生活、对市场都有好处。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也不能在一个早上就全部进入社会主义。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完全赞成和支持哈尔滨市提出的做法。因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哈尔滨和省里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曾发展了不少私人经营的缝衣、补鞋、修理自行车的单干户、杂货铺、小饭铺和小商小贩，从而解决了一部分贫苦市民的生活困难，并且满足了部分群众的生活需要，起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

四、一个公式，三种方法

我从主管黑龙江省财贸工作的那天起，脑子里就经常考虑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财贸工作的特点是什么，怎

样才能做好财贸工作，有哪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学习了有关的马列著作，特别是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的科学论断。经过三四年的实践，特别是在宣传贯彻陈云同志提出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过程中，总结全省财贸工作的经验教训，使我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财贸工作的基本特点是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1958年以来，我在一些会议上，多次提到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要搞好财贸工作，就必须坚持一个公式，三种方法。

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贸工作的一个公式就是：“从生产出发，通过流通和分配，促进生产的发展，保证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这里的关键是财贸工作和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以及财贸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所以，我有时又提：“从生产出发，开展财贸业务，促进生产发展”或“从生产出发，做好财贸工作，促进生产发展”的方针。

从黑龙江省的情况来看，有些人对毛主席的话说起来是熟悉的，但并没有真正理解，做起来又常常把这些话忘掉了。特别是商业系统的一些干部，认为商业工作只能是“你买我卖，你卖我买”，“生产，那是生产部门的事，与我无关”。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往往不是从生产出发。当物资不足时就叫喊脱销，拼命加工订货，盲目刺激生产；而当

产品稍多时，就又叫喊积压，挑肥拣瘦，压缩库存，限制生产。一时说煤多了（1956年），就要限制生产，扩大推销，在农村发动改换锅灶；一时又说煤不够了（1957年），就限制出售，在农村停止供应。一时说纸多了（1955年），就限制纸的生产，压缩库存；一时又说纸脱销了（1956年），就到处去抓。人们说商业上不是脱销就是积压，反正没有正相应的时候。也有人摸到了一条规律，说当商业上叫喊什么多了的时候，过一阵子就一定要少的；而当商业上叫喊什么少了的时候，过一阵子就一定要多的。但商业部门自己对这个规律却发现得很慢，少了也喊，多了也喊，少了也紧张，多了也紧张。这样一冷一热，一起一伏，对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供应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几年来的经验证明，从市场上看，有些产品确实是有时少，又有时多，有时脱销，又有时积压；从库存来说，商品时多时少在客观上常常是难于避免的，既不积压也不脱销，完全做到不多不少正合适是很难的，即便有这种情况也是暂时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宁可在一个时候多收购一些，使我们经常处于有储备的状态呢？归根结底是因为生产观点不强，是因为单纯的追求商业利润，只计小利，不计大利，只讲自己部门的经济核算，不管整体的经济核算，是因为不从生产出发。

能否坚持从生产出发，是有斗争的。经过斗争和事实的教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从生产入手，做好财贸工作，通过流通和分配，促进生产的发展。

1955年，有些同志曾片面强调我省工业品质次价高的

缺点，在进货上主张本地产品和名牌货一律同质同价，或者主张不管成本多少、出厂价多少，一律和名牌货一样照加商业利润，作为零售价，任凭顾客选购。他们说这种办法可以刺激地方工业的提高，但事实和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由于那时我省是新兴的工业地区，日用轻工业都才新建，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须有一个过程。轻工产品靠外运，主动权操在别的地方手里，人家给点就有点，人家不给就没办法，干着急。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那就是名牌货不够卖，地方货无人要。这不利于地方轻工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培植货源，保证供应。我们批评了这种看法，坚持商业要为地方轻工产品打开销路，做到工业有利，商业微利，以刺激生产。另一方面，对工业则要求限期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来解决工商之间的矛盾。这样，经过二三年的努力，我们的地方工业发展起来了，产品质量也大部分接近或赶上国内先进水平，有的还赶上国际水平了。从商业方面来看，也培植了货源，保证了市场的供应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1956年由于合作化初期对副食品和副业生产安排不够，曾发生副食品生产不足，市场供应紧张和物价波动的情况，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抓紧了蔬菜、生猪和其它土副产品的生产。到1957年上半年，市场供应情况就从紧张到缓和，市场物价也随着从波动转向平稳。这个由紧到缓，由波到平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生产入手还是只从市场供应入手的一反一正的证明：忽视生产安排就引起问题；重视生产安排，从生产入手就解决了问题。

从生产入手，为生产服务，培植货源，开展购销业务，搞好流通和分配，促进生产发展，才能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这个道理越到后来就越发看得清楚了。特别是经过对财贸系统中贯彻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检查，生产观点加强了，从深入群众、参与生产的过程中更加了解了：从生产入手，扶持生产的发展，财贸工作的路就越走越宽；反之，从单纯的业务观点看问题，见己不见人，见业务不见生产，只从市场和库存出发，财贸工作的路就越走越窄。

经过实践的教育，很多干部懂得了供产销是不可分割的经济过程。商业工作一头掌握着原材料的供应，一头掌握产品的销售，供产销的两头，拿在它的手里，对生产的作用甚大，没有商业工作的支持与配合，生产的发展也是困难的。生产是根本，商业工作只有从生产出发，配合与支持生产，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就会不断地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说：财贸部门把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放在支持和促进生产上，经常主动地关心生产，协助组织和指导生产，通过流通和分配扶植生产，以及直接参与某些生产活动，不仅不是“不务正业”，而恰恰真正为搞好财贸工作所必需，是搞好社会主义财贸工作的根本途径，这是已经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的。

我在黑龙江省主管财贸战线期间，财贸部门是经常采取扩大购销业务，做好物价工作，参与生产、指导生产这样三种方法进行工作。在实践过程中，也还是遇到一些

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问题，而工作也就是在不断的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中得到进展的。

第一，从扩大购销业务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我们要这样做，就有主张“以销定产”或“依销定购”的人出来说话了。他们说：“生产出来或购进来的东西，是要销出去的，销不出去，积压起来就等于浪费，与其这样，不如能销多少，就生产多少，就购入多少。”听起来这种主张似乎也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产销“平衡论”。他们往往把购买力作了偏低的估算，再用这种偏低的估算，去“订购”“定销”，实质是不知只有积极发展生产，才能保证供应，才能积极的求得产销平衡，因而顾虑重重，不敢放手促进生产，不敢大胆扩大购销，束缚了生产的发展。我们对这种主张进行了批评，采取在合乎规格、质量的前提下，通过产销合同的办法，增加采购数量，既支持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又满足了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这里拿蔬菜作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了。1956年，黑龙江省的蔬菜供应非常紧张，依靠从几千里外调运大量蔬菜也不能保证供应，原因就是过去销路不稳定，生产没有保证，生产少了就提高价格去抢购，生产多了就压低价格，挑肥拣瘦，使大批蔬菜腐烂在地里，因此蔬菜的生产日益下降。1957年，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坚决实行了按产销合同全部包下来的办法，生产就发展了，供应就缓和了，基本上能够自给了。这样，土副产品的收购量1957年比1956年提高23.8%，1958年比1957年提高130%多；地方工业产品的收购量，1957年比1956年提高了31.8%，1958年比

1957年提高60%多。结果，农村的多种经营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地方工业发展了，工人的生活有保证了；市场的商品量增加了，基本上满足了消费的需要。当时也发现有的地方出现盲目采购的情况，把不符合规格的残次品和不适销的产品也收购进来，造成积压。对此，一经发现，即加纠正。

第二，运用价格政策，指导和推动生产发展。对物价工作，我们开始是注意得不够的，经过1955年工商之间在价格上的一段争吵和1956年由于副食品与一部分工业品涨价所引起的一度物价波动，才逐步加强了对物价工作的研究和领导。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是由于对物价和生产的认识不深，而重视不够；也有的人相当注意物价问题，但他们注意之点，则是从赔钱赚钱考虑的多，从财政收入上考虑的多，而很少从生产出发去考虑价格政策。事实却给我们作了回答。拿黑龙江省的猪价和牛价来说，1956年合作化之后，农民养猪要和参加农业劳动的工值来作比较，他们比较的结果，养猪的收入是不如做劳动日合算的，而集体养猪又要计算劳动日的价值，养猪的成本就显得有些高了，加之原来生猪的购价就有些偏低，这样一来社员家庭养猪不合算，合作社集体养猪还要赔钱，因此生猪生产就发展不起来。牛的问题比生猪的问题还大得多。黑龙江省原来牛价就偏低，原来养牛主要是为了肉食，合作化之初追求高头大马的倾向抬头，用牛耕作的更减少了。但是我们也和关里主要用牛耕地的省份一样，一是不许杀牛，二是降低牛皮牛肉的价格，说这是为了保护耕牛。结果是既

不用牛耕地，又不许杀牛吃肉，卖了还要赔钱。群众反映：“养牛简直等于养个老太爷。”所以有的丢牛也不找，有的拿两头活牛换一头死牛，养牛的积极性大大下降了。几年来，牛的发展从90几万头下降到50几万头。1956年下半年，经过国务院批准，我们调整了猪和牛的价格，放宽了杀牛的限制。1957年生猪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牛也停止了下降并开始有了发展。同样，小杂粮、油料作物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价格不合理就减产，调整合理了就增产。经过几年的体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不仅对集体所有制的经济起作用，对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也是有影响的，忽视价格政策的研究，放松物价工作是不行的。关于物价工作，我们始终按照在稳定的基础上，根据促进生产发展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则，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合理的调整。但物价的调整，关系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涉及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必须综合研究，瞻前顾后，全面安排，慎重进行。决不能只从一时、一事、一地考虑，贸然从事。

第三，财贸部门参与生产和指导生产。在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是：

(1) 对商品性大而又比较分散的山产品、土副产品的生产，在农业部门集中力量开发农田水利、发展粮食生产

调查需要，勘查资源，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门径。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财贸部门通过供销合同，既可根据销路来组织与指导生产，又可以直接帮助解决生产资料和资金的困难，还可以就地收购产品，使群众放胆生产，不必担心销路。二是增加了指导生产的力量，克服了农业副业生产领导上某些顾此失彼的缺点，可以更有力的实现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

(2) 为了指导生产的发展，逐步建立生产指导网。如把服务部门的生猪采购站和农业部门的牧畜技术指导站合并成为畜牧生产服务站，已经基本上做到县县有畜牧繁殖场，乡乡有指导服务站，社社有指导小组，他们既指导畜牧生产也进行采购，既传播与交流经验也培育优良种畜。

(3) 财贸部门还直接经营了一批与自己业务有关的生产，作为群众生产基地网的核心，起典型示范和指导作用。1957年到1958年7月，共建立了木耳营310处，菜籽场11处，鱼场62处，果树试验场14处，种兔场39处，蜜蜂基地39处，种植示范场49处；此外，各县还建立了黑白瓜子生产基地，凡有柞林的县都建立了一至三个柞蚕试养场。1961年12月，经过调整、巩固之后，全省财贸部门直属商品生产基地还有152处，其中省直属基地43处。这些商品生产基地的任务是出技术、出经验、出品种，促进群众生产的发展。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边远地区，财贸部门还结合采购网点建立一批加工或半加工网点，这些网点既担负采购和供应的工作，又就地收鲜、就地加工，以吸引群众开发山区和边远地区。在这些基地的带动下，全省各地出

现了：十大养（猪、马、牛、羊、禽、鱼、蚕、蜂、兔、兽）十大种（黑白瓜子、药材、果树、菜籽、油料、木耳、蘑菇、蔬菜、苇子、柳苕条）和向山野要药材、活鹿、活貂，向动物要皮、毛、肉，向野生植物要油、酒、纸、纤维，向水要鱼、蛤蟆、蛤蜊、麝鼠、海狸鼠，向森林要农具、化学原料的群众活动，对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财贸工作的繁荣起了良好的作用。

财贸部门这样做，在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也是有顾虑的。他们怕参与生产、指导生产，会牵扯力量，影响本身的业务。但实践中不断证明，这些顾虑是多余的。财贸部门参与生产、指导生产，完全可以结合本身业务进行，不但不影响业务，而且培植和增加了货源，扩大了业务，既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市场增加了大量的商品，又提高了财贸部门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质量。正像有的同志说的那样，要培养货源，开展业务，就不能“等食吃”，而必须是“找食吃”。

一个公式，三种方法，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抓财贸工作的做法。在当时市场基本上是供小于求的条件下，采用一个公式，运用三种方法，目的是力求使财贸工作同生产紧密结合，为生产服务，促进生产的发展；做好财贸工作，以保证人民生活和市场供应，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五、不上“纲要”非好汉， 不到“黄河”不死心

1965年11月19日召开的第502次省委常委会议，强调突出抓农业，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各行各业都必须自觉地支援农业，特别是工业部门要把支援农业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重要任务。这次会议决定成立支援农业领导小组，由我和张林池、于杰、陈雷、陈剑飞等5人组成，我为领导小组组长。

1965年12月上旬，黑龙江省召开三届二次人代会。那时我刚从乡下调查回来，由于省长李范五同志有病，临时决定由我代他向省人代会作报告，这时离开会只有几天了。我看了一下原来起草的报告稿子，感到这个稿子各方面的问题都讲到了，反映了中央和省委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由于我刚在农村做过调查，对如何把农业搞上去，有些新的感受，觉得需要在大会上讲。因此，根据我的意见，并经省委同意，把原来起草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勇前进》的报告草稿，发给与会代表，请大家审查修改。我又组织了几个同志，在吸收原报告的基础上，又起草了一个稿子，在省人代会上，我以《发扬大寨革命精神，上“纲要”、到“黄河”》为题，作了报告。

我的报告中心是强调要集中力量大办农业，把农业搞

上去，多打粮食。第一，粮食是基础，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要备战就要备粮。第二，要准备灾荒，就要搞储备，要藏粮于民。真正有了储备粮，有了灾荒就处于主动地位了。第三，东北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煤、木、油、机发展很快，工业基地建立起来了，人口多了，需要增加粮食供应。现在，我们黑龙江、吉林两个省拿出来的粮食还填不满辽宁的嘴巴，辽宁工业多、人口多、地少，所以粮食还不能自给，造成南粮北运。周总理说东北三省光自给还不行，还要往关里拿粮食，争取北粮南调，当粮食仓库。这个任务是光荣艰巨的，也是能够做到的，我们要抓住农业生产，集中力量把粮食搞上去。

我在报告里提出，黑龙江省农业产量不稳、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只耕耘不建设，靠吃老本过日子。不搞农田基本建设，稳产高产就没有保证，而且产量还要越来越低。因此，我们必须改造自然，培养地力，搞好治旱防涝工程，达到稳产高产。我们的主攻方向是，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发展多种经营，以副养农做到逐步升级，分批上“纲要”到“黄河”。全省要搞10几个县先上“纲要”；东北农垦总局要搞800万亩样板田；省营农场也要跟上去，九三、查哈阳农场要达到400斤；城市郊区要提前上“纲要”；每个县要集中力量搞几个公社先上去，每个公社也要有几个大队、小队先上去；层层打歼灭战，把歼灭战和麻雀战结合起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就是：“不上‘纲要’非好汉，不到‘黄河’不死心”。上“纲要”到“黄河”达到亩产300斤、400

斤，这是第一个战略阶段；第二个战略阶段就是“百万雄师过长江”，向江南的亩单产看齐。

我说：抗战时期有一句话，叫“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现在我们要大办农业，各行各业都要想出道道来支援农业，特别是工业要千方百计地支援农业；各级领导要抓思想落实、组织落实、项目落实、措施落实、物料落实。首先是思想落实，把思想搞通，把群众发动起来，大家有了要求，再搞那几个落实，就可以为明年农业大丰收，五年上“纲要”，迈出胜利的第一步。

1965年12月11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力争农业“上纲要”的大讨论的通知》。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力争在“三五”计划期间，一部分县“上纲要”（中央、东北局提出我省亩产达到300斤即算达到了纲要的要求）、“到黄河”（即达到“纲要”所规定的黄河以北地区亩产400斤的要求），以进一步发挥我省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业基地”和“粮食仓库”的作用。《通知》要求，在大讨论中要普遍学习、宣传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树立为革命种田、用科学种田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苦、不怕困难的革命勇气，提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以大寨和小寨式的样板为榜样，比条件、比产量、比干劲，找差距、找原因，挖潜力，定措施，落实明年和五年农业生产建设规划。

根据省委通知精神，我提出抓农田基本建设主要是抓

好土、水、林、肥。土就是水土保持，全省水土流失面积有6000万亩，其中严重流失面积3000万亩。我们首先要把土保持住。水就是兴修水利，旱能灌，涝能排，我省易旱面积2000万亩，易涝面积2600万亩，要进行防旱治涝建设。林就是植树造林，我省林子是既多又少，有大小兴安岭、张广才岭等林区，大片林子很多。但林多的地方无人无田，而在有人有田的地方，林子却很少，“光腚屯”很多。这种情况对治理水土流失、防风护田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抓紧植树造林，迅速把林带林网搞起来，做到队队有苗圃，屯屯有树林。肥就是肥料，要抓厩肥、绿肥、化肥。经过省委讨论确定，我们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搞水浇地1000万亩，包括400万亩水田，600万亩旱灌；搞排涝工程2000万亩，达到五年一遇；治理严重水土流失3000万亩；植树造林1000万亩，迹地更新1000万亩，抚育次生林1000万亩。

1965年冬，在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发动下，农村有几十万人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整个严寒的大地已经变成了热气腾腾的战场。

1965年12月17日，省委召开了挖掘物资潜力，支援农业的电话会议。我在这次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群众性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冬季积肥高潮已经开始出现。现在的问题是缺少物资。水肥电机哪一项也离不开物资，而物资的来源主要是靠工业支援。没有工业就没办法控制大自然，也不能稳产高产。当前农业最紧迫需要的物资，无非是设备和原材料，如钢、铁、铜、铝和机、泵、管、

带、线等等。要求工业部门、物资部门都要面向农业，主动支援农业。

这次电话会议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并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到1966年2月末，全省水利建设已完成工程量5200多万立方米，占计划的53%。经常投入的劳力26万多人，比上一年同期多7倍。已经落实的造林面积180万亩，超过计划的80%。

为了保证粮食高产稳产，还制定了农业机械化的十年规划。1965年9月14日，谭震林副总理在北京饭店同欧阳钦等同志谈关于黑龙江省农业四化问题时提出：要全盘机械化，过去这里给几十台，那里给几十台，这里建一个站，那里建一个站，不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一片一片的搞。先把黑龙江省机械化，第三个五年计划可以化两三千万亩，第四个五年计划黑龙江省就全部机械化了。这样干10年就搞出一个样板了。谭副总理说：黑龙江省首先搞是因为农场多，机器多，东西两片，加上黑河一共三片，能搞40亿斤商品粮，呼、海、巴、拜、绥等重点产粮县20亿斤，这样就有60亿斤，其它县的上交不动，也可能拿出近百亿斤商品粮来。谭副总理还说：机械化不光是搞粮食，要多种经营，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办点工业，要搞排灌机械化；再加上肥料，养猪养羊，秸棵还田，亩施化肥20斤，还有电气化。

在那个时候，我深深感到中央对黑龙江省是非常重视的，中央决定用10年时间先在黑龙江省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天大的好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

于农业机械化问题,我同有关部门和同志进行过多次研究,认为农业机械化必将促进水利化、电气化、化肥化的全面发展。从黑龙江省的情况看,水利化是稳产的基础,肥料是高产的重要条件,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可腾出更多的劳力、畜力从事农田基本建设、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应当包括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肥化等方面。而农业机械化则是农业四化、农业技术改造的杠杆和核心,制定农业机械化的十年规划,必须全面考虑这些问题。

黑龙江省农村从1950年试办农业机械站开始,到1966年初已经16年了,为了制定好全省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十年规划,我们首先回顾了16年来推行农业机械化的过程,总结了全省推行农业机械化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从黑龙江省的实际出发,于1966年5月,提出了一个《黑龙江省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初步设想》,交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初步设想就是十年规划,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基本情况和奋斗目标。当时全省拥有拖拉机27162标准台,机耕面积占37%,其中大型国营农场有1.347万标准台,机耕面积达90%以上。全省90%的人民公社、80%的大队程度不同的使用机耕作业:机翻地占耕地面积的21%;机械播种占播种面积的10%;机械中耕占中耕面积的4.4%;机械脱谷占20%;粮米加工等非田间机械化程度为30%。上述情况说明,农村社队的农业机械化,耕地作业比重较大,机器不配套,播种、中耕和收割

等生产环节还很少使用机械。

初步设想到今后 10 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对水、肥、机、电“四化”的配套必须进行统筹安排。主要奋斗目标有以下几条：

(1) 全省机械化水平，到 1970 年达到 50%，到 1975 年达到 70% 左右。

(2) 水利化的建设，到 1970 年解决大旱、大涝和严重水土流失问题。灌溉面积达到 1000 万亩，坐水种面积达到 2000 万亩，治涝面积达到 2000 万亩，水土保持面积达到 3000 万亩；到 1975 年在提高防御标准的基础上，基本完成治旱、治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3) 电气化的建设，到 1970 年有电源的生产队由现在的 20% 达到 35% 左右，1975 年达到 50% 左右。

(4) 化肥化，目前主要依靠大量增加农家肥料。1970 年每亩施化肥由 1965 年的 2.5 斤达到 15 斤左右，1975 年达到 30 斤左右。

(二) 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贯彻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的方针。办农业机械化的形式，除全民所有制的机械化农场外，为集体经济服务的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国家办站，为群众服务，实行站社结合，将农机站的拖拉机固定在生产队使用，群众参加管理；第二种形式是社队自营，国家辅助，即将国营农机站的机械设备卖给社队，由社队自营，逐年偿还国家投资；第三种形式是由社队自办。上述三种形式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同时并存，并以第一种形式为主，随着经济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根据需求和可能，逐步向

社队自营为主、国家辅助的形式过渡。

(三) 农业机械化，必须分期分批，分别轻重缓急，由点到面，由低到高地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放在双城、呼兰、五常、肇东、拜泉、龙江、绥化、海伦、德都、集贤、宁安、望奎、嫩江、讷河、甘南等 15 个县和其它县的 100 个重点公社。初步估算全省人民公社 10 年共需增加拖拉机 2.6 万—3.2 万标准台（更新 1.1 万台），达到 3.7 万—4.3 万台。

(四) 为保证农业机械化的顺利发展，必须使农业机械的制造、修理，原材料生产和供应，逐步立足于省内。大型拖拉机的制造，由国家和东北区统一定型、定点生产；其它各种机械、配件等在省内要逐步形成制造修配的体系。

(五) 要进一步加强和办好国营农场的机械化，充分发挥现代化大型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

(六) 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并组织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重大历史任务。

这个十年规划，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原则通过，要求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充实和完善。但由于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规划没有能够贯彻执行。

六、以猪为首，六畜兴旺

1954 年初秋，我一到黑龙江，就被那如茵如烟的大草

原震惊了。好空阔啊！用广袤无垠来形容大片绿野，是最恰当不过了。没有山峦阻隔，没有树木遮掩，汽车放胆撒欢，噙噙狂奔。瀚海茫茫，柔波细浪，看去是那样怡神爽人，弥漫着生命的活力。纵观黑龙江省地貌资源，拥有草场 1.2 亿亩，差不多相当于耕地的 70%，也就是说，黑龙江省既是天然大粮仓，又有“天然大牧场”。

仓廩实，安天下。可是，说起“吃饭”，不只是粗细粮，米与面，也包含着肉、蛋、奶。我走到哪里都讲，服务“三农”就是农村、农业、农民，须求“三实”就是想实招、办实事、出实效。为了让农民快一些过上好日子，光搞种粮不行，还得大搞多种经营，发展畜牧业就是来钱路。农民说：“老母猪，小银行”，“牛是农家宝，无牛富不了”，这都是有理的。我下乡，农民对我说，你不能光当羊（杨）书记，还要当牛书记、马书记、猪（朱）书记。省委、省政府也早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把发展畜牧业也挤进了“大办”的行列了，提出以粮为纲，农牧业并举的方针。

事实上黑龙江畜牧业发展的历史很久远。我从资料中看到在公元 700 到 900 多年间的渤海时期，黑龙江省饲养各类家畜，并有部分商品向外交换或出售，曾培育出有名的“率宾之马”、“鄴颀之豕”。19 世纪末，俄人从境外带进了一批奶牛，开始在中东铁路沿线及北部边境地区饲养，后来逐步发展到全省各地。从这时起，黑龙江有了奶牛。但是，黑龙江的畜牧业真正得以发展还是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我记得，1954 年我刚到黑龙江省工作时，那一年

全省家畜存栏数：马 152 万匹，本地黄牛 92.4 万头，驴 5.5 万头，骡 5.4 万头，奶牛 1.8 万头，绵羊 32 万只，山羊 1 万只，猪 261.7 万头。当时养大牲畜，大多是为了种地，养猪也多是自养自吃，外调商品不是太多。但确实看到了念好畜牧经，发展畜牧业，不单单为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提供了动力和优质肥料，而且也为城乡人民提供了肉、蛋、奶等营养食品，为轻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

黄牛是黑龙江发展畜牧业的当家品种。我在农村看到农民饲养的黄牛有本地牛、延边牛、秦川牛。农民说养牛有三得：得牛肉牛奶，得牛皮制品，得一个“小化肥厂”。养一头牛的粪肥可够一亩田使用。但是，1957 年农村实行高级合作化之后，耕畜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把农民自家养的牛作价归了大堆。可是由于农民缺乏集中饲养管理经验，在饲养管理上滑坡，加上“吃大锅饭”的弊端，造成了本地牛不断瘦弱死亡。有的地方还出现了随意宰杀黄牛，萨尔图成了“杀牛图”。因此，到 1957 年本地黄牛仅存 53 万头，比我刚到黑龙江的 1954 年减少近 40 万头。这个下降幅度使我大为震惊，也很痛心。1958 年 7 月 29 日，省委在拜泉、龙江两县召开了全省畜牧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市、县和公社的四级代表 600 多人。在这次会议上，我代表省委申明大牲畜是我省现阶段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在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过程中，也必须采取机马牛相结合的方针。同时，大牲畜又是畜产品和农家肥料的重要来源。为了满足农业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和发展大牲畜。会议上宣布了安

民告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经营的大牲畜，可采取包头数、包繁殖、包工数、包财务和超产奖励的“四包一奖”制，并允许社员饲养少量大牲畜。对于大牲畜饲料粮定量也作了明确规定：每匹马留 500 公斤饲料粮，豆饼 100 公斤；每头耕牛留 200 公斤，牧牛 75 公斤；每匹种马留料 1250 公斤。会议明确提出财贸部门要与畜牧业紧密配合，抓商品流通最根本是抓生产源头。后来，经省委同意，县以下的基层单位都配置了专职畜牧书记。

1958 年 9 月 20 日，省委批转了拜泉和龙江畜牧现场会议的报告，要求今明两年基本实现牧畜全配、全准、全生、全活、全壮、全改良的“六全省”。到了 1959 年 12 月 7 日，国家农业部公布的全国 27 个优良品种牛之中，就有黑龙江滨洲牛、本地牛两个品种。这一年本地黄牛增加到 63.6 万头，比下降最多的 1957 年增加了 10 万多头。这一事实使我深感发展畜牧业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还必须落实到实际投入上，才能把资源优势变成商品优势。

三年困难时期更加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不以农业为主不行，而以农业为主就“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不搞多种经营，不搞全面发展也不行。中央指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省里有些地方只要农业光杆司令，连耕马也不保了。1960 年的一天，省畜牧厅厅长刘潜反映说，全省动力耕马存栏仅有 129.1 万头，比 1955 年的 158.3 万头，下降了近 30 万头。下降原因固然有“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等原因，但主要是在自然灾害中，人挤畜粮，加上马传染性贫血病流行，造成马匹显著减少。省委、省政府迅速组成万

人畜牧生产检查团，由我担任团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田澍、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关舟、省畜牧厅厅长刘潜等为副团长，有关厅、局长及各地、市主管畜牧的书记、专员为分团长，对全省畜牧生产进行了检查。到各地检查的同志确实发现马匹开始成批死亡，原因就是粮食一紧，第一个挤的就是牲畜饲料，人与畜争嘴，畜是根本排不上号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对于平调的牲畜不论是国营、集体和个人，一律物归原主或作价退款。对于畜禽基地，好的保留，差的关停并转。我的态度极为坚定，就是在粮紧情势下，既要保人，也要保畜。因为我们是靠马吃饭的省份，农机没有多少，就是将来有了机械，马也不够。现在我省地多人少，产粮多，除了人的功劳外，还有马的功劳，所以保畜就是保护生产力。当前粮少，人吃的多了，畜吃的就受挤了，这是矛盾所在。但不能杀鸡取卵，再损失，想恢复就不容易了。小牲畜如猪禽没有两三年恢复不了，大牲畜如牛、马至少得3年到5年才能恢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拼命也要保住。我再三强调，要特别重视稳住马的阵脚。马的活重，负担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78.8%，连孕马、小马都上阵，但吃的很差，在乡下我看到死马的胃里没有一粒粮，全是草，眼泪都流下来了，实在太不公平。像我们这样靠畜动力吃饭的省份，这怎么能行呢？我的态度是要采取坚决保护发展的方针。在口粮上有一条死规定，人一定不能吃马料，人吃马料犯法。在使役上，也定下约法三章：实行牲畜劳动保护，宁可搞“人力代”，也坚决实行孕畜不上三台，孕畜放产假，保护幼畜，孕畜休养生息。

对于五六成膘的耕马，实行专人饲养，加草加料，限期复壮。足足用了5年时间，到1965年全省马匹上升为134.5万头，其中可繁马匹40.3万匹。

当时我见到一份珍贵资料说，马是家畜中的大力士，重挽马拉力的世界纪录为16626公斤，相当于3辆解放牌汽车的载重量。它还是家畜中的长跑冠军，现代最快的乘骑马，1000米径赛最佳成绩是57.5秒。由此，我想到了要引进外国种马，改良马匹。全省选调了从苏联引进的奥尔洛夫马，把200余匹纯种和杂种奥尔洛夫马集中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建立了大山轻型马场进行纯繁，每年向全省提供60匹左右种马。国营红骥马场培育的黑龙江“175”号马，挽重7000公斤。“嘎斯号”1000米赛跑成绩为65.4秒，均创全国纪录。由于马的改良，结果提高了马的身价，“黑河马”选进了国家名马品种行列，成为马市上的抢手货。

发展畜牧业要有主力军的国家队挑大梁，这就是发展国营畜牧场。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支持。1963年5月，农垦部长王震在上海电召农场总局副局长刘伯增、畜牧处长张源培，谈建立畜牧基地问题。这年12月农场总局决定：在852农场建立以养猪为主的种畜场；友谊农场建立以猪禽为主的种畜场；曙光农场建立以养羊为主的种畜场；8511农场建立以奶牛为主的实验基地，并选定该场为农垦部实验基地，委派生产处长张源培兼任场长。仅仅几年时间，国营畜牧场就成了气候，属于国营农场总局建立的就有7个大型专业畜牧场。属省畜牧系统的畜牧场达60多处，经营

规模虽较小，但为商品生产开辟了主渠道。一般养大牲畜的牧场，牛、马在百头左右；以养猪为主的场有基础母猪50头左右；养羊专业场有羊千只上下。已载入史册的国营五星羊场培育的东北细毛羊“311”号种公羊产毛量达21公斤。特别是“56752”号种公羊体重达137.5公斤，创全省有史以来最高纪录。1960年我到杜尔伯特畜牧场检查工作时，看到他们畜牧生产呈现勃勃生机，心情振奋不已，欣然把该场命名为“绿色草原牧场”，与国营“红色草原牧场”竞相媲美。

在黑龙江省畜牧业发展的道路上，也留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足迹。1960年4月24日，小平同志一路风尘来到国营红色草原牧场视察了培育中的黑龙江马。当他得知从1950年开始先后从国外引进轻、重型种马，本地马杂交改良，育成了省内第一批力速兼备、乘挽兼用的马匹新品种时，高兴得连连称赞说：国营畜牧场的建立和养畜基地的形成，改变了畜牧业小生产、家庭副业的地位，开始使畜牧业向大生产的独立产业转化，要扶持和大力发展。小平同志高兴地与在场有关人员合影留念。可是，后来草原受到破坏，不少地方蚕食草原，开荒种地，任意到草原打草放牧，造成草场退化，生态环境恶化。我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欧阳钦同志汇报后，1964年5月9日，他到安达视察时严厉指出：“红色草原牧场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型牧场之一，要保护好草原，破坏了就是给子孙后代造孽。”

在发展畜牧业的里程上，重头戏是发展养猪事业。我国是世界上养猪最早的国家之一，起码已有5000多年历史

了。在汉字中，家是由“门”和“豕”相合而成。意思是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饲养猪。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养猪经验，《易经》上就载有关于养猪的催肥方法。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就引进我国猪种，而育成了“罗马猪”；19世纪，英、美等国又利用我国猪种提高了他们猪种的肉质和繁殖力。如今分布最广的约克夏、巴克夏和美国的波中猪，都是由我国猪种改良的。猪肉历来是我国人民喜爱的副食品之一。一头猪又是一个小型的有机化肥厂。猪皮制品耐用美观，不亚于牛皮。猪鬃、猪毛、猪骨都是轻工业原料，可制成多种生活用品。从猪身上还可以得到几百种内分泌和化学物质，可用来制药，延长人的生命。可是，到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我提出“猪、马、牛、羊、禽、鱼、蚕、蜂、兔、兽”的十大养中，要以猪为首，保“天蓬元帅”升帐时，却有人摇头不赞成。他们认为“猪”为首是“本末倒置”，主张“马”为首。还认为“畜牧业和粮食争嘴”、“发展畜牧业必然挤农业，影响粮食生产”等等。我在多次召开的畜牧业会议上，对持这种观点的人说，他们不了解农业和畜牧业的辩证关系，看不到两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为“祖宗和孙子”的关系，也看不到养猪能为农业提供大量粪肥，为工业提供原料，为“四化”积累资金，为农民增加收入，为城乡人民提供肉食品，为市场和出口提供货源。这实质上是一种小农经济思想的反映，不懂得田养畜、畜养田、田畜都养人的道理。

1961年1月省人委召开全省畜牧会议，会议学习了毛

主席对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关于大养其猪的批示精神，确定了“以猪为首，以耕畜为中心，全面发展畜牧业”的方针，要求“以公养为主，公养私养并举”、“商品性生产和自给性生产并举”，实行“国家、公社搞基地，机关、企业搞自给，家家户户养猪禽”，开展一个全民性养猪运动。经过一年多时间，全省养猪出现的“大发展、全改良”的新局面表明，发展畜牧业生产并没有挤掉粮食生产，恰恰相反，发展畜牧业促进了农业，增产了粮食。

小小一头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牵连着城与乡、个人与国家、生产与市场之间的诸多关系。1961年6月26日，林口县城乡全体社员给周总理上书，反映黑龙江省养猪留肉标准不合理。省委责成我直接处理这一通天的御状。我了解到有些下乡收猪的收购员，强迫命令，收猪时强抓硬要，压等压价，农民称他们是“猪阎王”，伤了农民的心。由此我在一次专业会议上，向与会同志讲了清朝皇帝乾隆下江南的故事。一天，乾隆爷见一农夫扛着锄头，就向身边的宰相张玉书问道：“这是什么人？”张玉书回答说：“是个农夫。”乾隆帝又问：“农夫的夫字怎样写？”张玉书详细回答说：“农夫的夫字，就是两横一撇一捺。”乾隆皇帝听了摇摇头说：“你这宰相有经天纬地之才，怎么连个夫字的写法也辨别不清？”张玉书遭到皇帝的责问，额上淌出汗珠，随即奏道：“主公圣明，小人才疏学浅，夫字还应怎样写，微臣实是不知，请我主指教。”乾隆皇帝回答道：“农夫是刨土之人，上写土字，下加人字。农夫把苍茫大地都顶起来了，还有什么人能顶得上他。”张玉书连连点头称是，称

赞皇上把农夫高看一眼。一个封建君主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应时时把农民的疾苦挂在心上，做到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真正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城里人每月吃半斤肉，有时还保证不了，也是直骂娘的。经过多方面协调和工作，在省委二届二次会议上出台了一个农民卖猪留肉的新规定：由原来的卖一口猪留10斤肉，卖两口猪留40斤肉的规定标准，改为卖猪一口留一半，卖两口留一口。8月4日由省畜牧厅代表省人委函复林口县城乡全体社员。农民双手赞成，这个政策得人心，体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结合。

由于实行多养多吃，少养少吃，不养不吃，超额卖给国家给奖励的政策，调动了城乡群众大养其猪的积极性。至1960年底，全省城乡养猪户人均养5口猪的占相当大的比重。养猪近几十万头的就有拜泉、海伦、安达、讷河等4县。养母猪超4万头的就有10个县。为了发展猪源，增加母猪群，1964年5月13日省人委发出关于发展城市郊区养猪补助饲料规定：饲养公猪每头全年补助精料和糠麸100公斤，母猪补助精料120公斤、糠麸100公斤。结果这一年全省可繁母猪达到48万头，比1960年增加了13万头。同年生猪收购了133万头，比1960年多收近一倍。为了进一步发展养猪生产，扩大商品量，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市场和出口需要，1966年省委决定再打生猪翻身仗，并成立了生猪生产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至此，我真正当上“猪官”了。还抽调省直商业系统干部组成200个“生

猪翻身仗工作队”分赴各地工作。可惜这场翻身仗没有打多久，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把它打翻在地了。

悠悠岁月，几度拼搏，世代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人们惊喜地看到昔日黑龙江“粗毛羊、长腿猪、矮小马、疙疸牛”的面貌开始改变了。1961年12月10日至18日，省人委在安达县召开了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会议，我看到全省养畜的大好形势，心里涌动情思，写出了一支颂歌《大力发展畜牧业》：

粗毛羊，长腿猪，
本地马，疙疸牛，
把公的全骗，
把母的全留。
精选良种公畜，
推行人工授精，
加快大发展全改良的速度。

我们要——
从畜养地、地养人的现状，
向畜养地、地养畜，
畜再养人的水平过渡。
不要说：
“快机械化了，
发展牲畜没有前途。”
要知道：
现在是马、牛、机相结合，

将来也是机、牛、马各有用处。

难道你——

不愿意吃肉？

不愿意穿毛？

不愿意喝乳？

在这里——

草原无边，饲料充足，

有着多么雄厚的基础，

只要依靠群众，多好并举，

定会有丰硕的收获。

过三年五载，

到那时——

白羊身上翻细浪，

黄牛变种乳流长，

马壮拽万斤，

猪肥肉更香。

接着省人委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赛畜大会。抓典型，树标兵，只见各路英豪尽显风采，人有明星，畜有名种。一个个“猪状元”、“牛大王”、“鸭司令”、“鸡皇后”、“羊魁首”、“马大帅”等养畜模范披红戴花；一头头“哈白猪”、“黑龙江马”、“东北细毛羊”、“黑白花奶牛”等名优畜禽挂彩多锦。这次大会犹如催化剂，吹绽了全省畜牧战线的百花园枝繁叶茂，花团锦簇。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全省人民花了

10年多一点时间，硬是从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跨进了全国先进畜牧省的行列。

七、我是“蚕鱼”分子

水，生命之源。有水就有鱼。我一到黑龙江，有人就对我说，这里曾有“棒打獐子瓢舀鱼”之说。古人也有“鱼乐人亦乐，水清心共清”的佳句。

实际上地球就是个“水球”，70%多是水的天下。三千里江山的黑龙江，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水域面积1210.1万亩，占全国内陆水域面积26390万亩的4.6%，列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9位。此外，还有低洼沼泽地1600多万亩，其中多数是宜渔之地。真是“天高日朗芳草绿，一片山光接水光”。在全省总水面中，可供养鱼水面近700万亩，仅列内蒙、安徽、湖北之后，居第4位；在可养鱼的水面中，湖泡为367.6万亩，也仅次于内蒙，为全国第二，显示了大中水面占优势的特点。

为了发展蓝色产业，我对全省鱼类资源作了多次调查了解。全省已采集到的鱼类有105种，属于72属21科，其中鲤科鱼类59种，占56.2%。全省鱼类区系组成呈现南北交界的特点，寒带、亚寒带和温带、亚热带的溯河回游型、河流型、山溪型、湖泊静水型鱼类均有分布，好多水产品驰名中外。具有食用价值、个体较大，形成捕捞群体的经济鱼类就有50种。鲟鳇鱼、大马哈鱼及冷水性鱼类的哲罗、

细鳞等鱼，都是本省的特产鱼类。

大马哈鱼本来分布在北纬 35° 以北的太平洋水域、亚

多公斤的鲤鱼，是我国淡水中的大型鱼类，属于低层鱼，平时栖息在大江夹心子、江岔等水流缓慢、砂砾底质的地方，不合群，喜欢独来独往。但当大风起、水涨时，游动活跃，觅食旺盛。其经济价值高，“鲤鱼籽”尤为名贵，是饮誉中外的生猛水鲜。龙江名鱼，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龙江美，最美要数水”，这话一点儿不假。世世代代的龙江人，在这片黑土地上拉网捕鱼，辛勤耕耘，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满洲里录泉矿出土的鹞镖捕鱼工具，距今已有一万年之久。在大小兴凯湖之间湖岗上的新开流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除骨制的鱼镖外，还有鱼叉、鱼卡子、鱼钩和带网纹的陶器、骨制鱼鹰头及留有成堆鱼骨的10座鱼窑，表明五六千年前，我们祖先已经使用鱼网和驯养鱼鹰捕鱼。在近3000年前的肇源县白金堡遗址中，发现了长12至15厘米长的大型陶网坠，告诉我们那时已使用大型鱼网捕捞了。《元史·刘哈刺八都鲁传》中记载：肇州宣慰司“一日得鱼九尾，皆千斤，遣使来献”，说明当时已能进行捕大型鲤鱼的生产。黑龙江人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捕捞经验，他们能准确地掌握不同季节、不同场地、不同水文条件下各种鱼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创造了适合于不同场地的捕捞工具和打鱼方法。据统计，到1949年建国时，全省共有渔民13525人，渔船5831只，梁子387处，各种网具5140镗（片），年产鲜鱼18564吨。

靠吃天然的现成饭，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随着工业发

展，江河水质受到污染。污染源主要来自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等城市和上游吉林省一些工矿企业向江中排放含酚、氰化物、硫化物、汞、铅等有毒物质和大量皂化物的废水；农业生产施用化肥和农药，通过降水迳流也使江河受到污染。1958年春季，我省首次发现嫩江受含酚废水污染而大量死鱼。之后由于工业废水排放量有增无减，死鱼江段，严重时长达400多公里。昔日的大鱼群再也见不到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以鱼代食”，各地盲目增船设网，酷捕滥捞，大小鱼一齐抓，结果捕过了头，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到了60年代以后，江河自然捕鱼产量就减少了34532吨，张网基本捕不到鱼了。

严峻的事实教育了我们，要想食有鱼靠自然捕捞的一把扇子是扇不起来了，必须走自繁、自育、自养之路。我对鱼真有点偏爱。鱼的问题不可小视，这不光是渔民能赚钱，还有一个满足城乡人民需要的问题。

为使渔业靠自然捕捞为主改为人工养殖为主，省委决定把全省水产企业生产、收购、加工、销售划归省商业厅统一领导，实行产、加、销一条鞭。这在全国是独一份。为了加强领导，决定让省商业厅副厅长原野兼水产局长，屁股坐在省水产局。财贸口不光卖鱼，也养鱼，这就是生产为了流通，流通促进生产。由于上下齐抓共管，形势发展超出想象。到1959年8月，全省省管渔业生产企业已发展到20余家，建起大水面成鱼放养场71807亩，鱼种池2842多亩，本年度产鱼4848吨，人工养鱼在全省水产业生产中已占主导地位。三年困难时期，鱼救了驾，那年省人委在

泰来县和杜尔伯特蒙族自治县开会，粮食不够吃，给参加会的人每顿一碗鱼，虽吃的大家直上火，大便干燥，但由于吃饱了肚子，大家还是直乐呵。为了发展养鱼业，这次会议定了几件事，给全省几万渔民落实了口粮和布票供应，吃穿都解决了。省商业厅水产局，变成了水产事业管理局，升格为正厅级单位，管国营和集体渔场生产，也管群众养鱼。省编委会给增加了编制，地、市也都成立了水产局，并约法三章：不论机构怎样精减，水产部门不能动。

位于杜尔伯特蒙族自治县境内的连环湖，是第四纪冰川后期地形沉积和风蚀而形成的冲击平原洼地的内陆湖。原名叫“泰康野泡子群”，18个湖泡中万亩以上湖泡17个，湖湖相连，形如连环，总面积近80万亩。1959年我到这里研究发展渔业生产时，给改名叫连环湖。水源主要是乌裕尔河丰水年的泄水，因水源不充裕，历史上曾几次干涸。为增加水源，经省委、省人委决定，先后投入700余万元，从1958年开始，泰来和杜蒙两县用了几年工夫，修建了“八一”运河，引嫩江水进连环湖，从此有史以来烟波浩渺的大湖再也不闹水荒了。1965年鱼产量上升到1735吨，比1960年增加一倍多。人们说，连环湖真正成了“摇钱湖”，成为全省最大水产养殖企业。后来以主带副，农业、牧业、林业及芦苇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在发展养鱼业上，只几年时间，给水产投资就达2000多万元，同别的战线比较起来不算少，可以说是吃了偏饭的。

有投入才能有商品。50年代末，在苇河召开促进多种经营、扩大商品生产财贸现场会议上，我讲了要理直气壮

地大讲刺激生产，在满足自给外，还要发展商品经济换钱，换来钱才能提高生活。可是有人说，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谁说谁不光彩，好像谁一说商品交换谁就是落后分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商品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远在奴隶社会就有，商品经济寿命比资本主义要更长些。所以商品经济，还有相当一段光辉灿烂的前途，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须的，没有什么不光彩。

为了发展商品鱼生产，决定在镜泊湖水产养殖场搞规模示范。这个渔场历史较早，是建国前建成的。为了扩大生产规模，1958年11月，水产养殖场与省供销社所属的镜泊湖果树场合并为省商业厅镜泊湖养殖场，场长是省供销社下放干部刘中范。那年秋天我去看他们在东大泡养鱼，刘中范说，这个东大泡是利用湖湾改建的，2700多亩水面，我们一年就把鱼养起来了，一网能打4000斤鱼。我说眼见为实，你打一网我看看。他又喂窝子，又拉大网，费了很大劲，结果一网只打了200来斤。就在刘中范又要下第二网时，我忙对他说，别打了，你这里第一有鱼，第二不多，明年我再来看。第二年他真的把鱼养多了，一个东大泡就产了10万斤鱼。后来他到省人委来办事，我见到他说，你能不能再搞几个东大泡，把商品鱼规模搞得再大些。他们真的干大了，从1956年到1965年，镜泊湖水产养殖场养鱼总产达47.25万公斤，9年平均亩产175公斤，成为全省同类水面养鱼单产较高的典型。尤以1965年产鱼最多，这年冰消雪融后的3月初，他们用大拉网一网捕鱼12万公斤，

这在省内外淡水养鱼中是不多见的。1994年夏天，我回到工作过多年的黑龙江，刘中范来看我时说：

“杨书记，你还认不认识我？”

我细细打量这个满头白发、细高挑个子说着胶东话的人说：

“你不是在镜泊湖养鱼的小刘吗！你让我去东大泡看打鱼，一网只打了几十条，你还要打，我说你别胡弄我了，等养多了我再来看。”

说着，他乐我也乐了。他又笑呵呵地说：

“老书记，你记性真好。还小刘呢，我都往70上奔了。”

全省先后建起国营渔场47个，但我认为养鱼不能靠单腿蹦，还要进入千家万户。1958年，省人委在宾县和呼兰县召开了群众性养鱼生产现场会。这次点火会，起了里程碑作用，全省很快出现了群众性造池养鱼的新高潮。国营与群众相结合，当年共造鱼池1.134万亩，其中群众造池7470亩。一年造池面积超过国营企业前6年造池总数的一倍。到了1960年，全省修建鱼池3.333万亩，其中群众建渔塘1.9425万亩，全省历史上出现了群众性修塘养鱼的新纪录。《大公报》发表文章说，黑龙江淡水养鱼，是走在全国前头的。我非常高兴，当即赋诗一首：

一沟一壑皆蓄水，
江河湖泊作池塘；
万民竞比解放养，
塞北江南谁更强？

马克思有句名言我永志不忘，这就是：“思想的闪电一

旦刺破地表，就会引起地壳运动。”黑龙江省发展水产养殖业，执行了“以养为主，捕养并举”的八字方针，从水层到水面都急剧地运动起来了。全省除群众修池养鱼外，还从1957年以来兴建了658座大中小型水库。这些水库绝大多数以灌溉、防洪为主，兼搞养鱼。有的建库后就未用作灌溉，而专门养了鱼。1959年秋天，我到密山全省最大的青年水库调查养鱼情况时，放眼看去，这里的山不高，没有令人目眩的险峰危崖，但处处郁郁葱葱；这里的水不壮，没有撼魂动魄的跌宕腾挪，但碧波浩荡，涟涟无垠。你站在堤岸上看去，那万顷碧水与蓝天相接，水天一色，气韵无穷。密山县同志告诉我，青年水库主要养殖经济鱼类，有鲫、鲤、鲢、鳙、雅罗鱼和黑鱼等，最高年产鱼213吨，当地自给有余。

黑龙江历史上没养过鱼，一旦养起鱼来就碰到了一个问题。以前都是“南鱼北运”，但远水不解近渴。我下村屯，进渔场，听到渔民嗷嗷叫，一片要鱼苗声。

“南鱼北运”是件费钱费事的营生。1955年5月，正是撒鱼苗时，省水产局派出27人，第一次从长江一带选购3火车叫水花的鱼苗，共949万尾。他们从汉口起运，经过7天7夜，分别运到喇嘛寺、镜泊湖、兴凯湖，入池793万尾，成活率达87.2%。成火车长途运输鱼苗，这在全国是一大创举，这以后他们又连年运了几次，成活率有高有低，最低时仅有30%多。1958年4月，省水产局又大胆创新，首次用8架次飞机，从武汉、安徽芜湖两地运回2759万尾水花，成活率77.7%。1961年他们最多时用过33架次飞

机，运进鱼苗 1.6 亿多尾。我到哈尔滨马家沟机场，看到全省各地鱼场来接运的大小汽车都排成队，单等飞机一着陆，立刻像抢险似的装上车就跑，路上一点也不许耽搁时间。这种南北大跨度运鱼苗，虽缓解了买鱼种难的问题，但终归不是长远之计。水产局提出自己繁养，采取专群结合，搞商品鱼种。从 1958 年开始兴建社队及国营鱼种基地，到 1965 年全省已建成 30 多个鱼种场，年产鱼苗可达近 1.5 万尾，渔民就地买鱼苗养殖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人工养鱼成了大气候之后，又提出人工繁殖甲鱼、河蚌育珠和养河蟹。就拿甲鱼来说，经济价值高，吃肉、入药都是珍品。我刚到黑龙江时，见到市面有卖松花江甲鱼的，认为能养，省水产公司很积极，投入一万元，扶持肇东大似海水产养殖场在省内首次试养甲鱼。他们从抚远、饶河、嫩江、无锡等地购进 151 只甲鱼，放进大似海泡子边的围栏中饲养，由于围栏是用高粱杆做的，不结实，到秋后跑得只剩 108 只了。冬天移到越冬鱼池和鱼一起过冬，由于结冰缺氧，第二年开春时全军覆没。实践为他们交了学费，以后终于养成了，最多时年产甲鱼 2500 多只。

我平生爱水，性喜游泳。游过大江，游过湖泊，总不忘水对人类的奉献。《水浒传》里有“打渔杀家”的故事，我记得肖恩的女儿桂英有这样的唱词：

江水照得两眼花，
青山绿水难描画，
父女打鱼作生涯。

我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时代变了，要把“打渔杀

家”，变成“打鱼发家”。桂英应唱：

父女打鱼作生涯，

水中求财发了家。

养鱼走过了一段艰苦奋斗、曲折前进的道路，养蚕也是如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个很有影响、也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功过、是非史家自有评论，不说也罢；倒是他的“处诚守拙”之道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很赞成。古往今来，成大事者，无一不是得益于“诚”、“拙”，都是“做”出来的，而没有“说”出来的，更没有“吹”出来的。黑龙江人圆了养蚕的梦，就说明了这个真理。

1960年初我在宾县召开蚕、鱼生产会议，一进会场就听有人悄悄说“蚕鱼分子”来了。我听了很自豪，到台上讲的头句话就是：

“我们大伙都是蚕鱼分子！”

大伙鼓掌欢笑，表示赞同。我认为，干事业得有一大批“处诚守拙”的热心分子，这就是笃信笃行，脚踏实地，说到做到，不说空话，不务虚名。1958年我提出放养柞蚕的打算时，有人极力反对，说我是空想派。他们反对养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翻开老黄历看，清朝末年在绥化地区，民国初年在逊克，都发现有柞蚕的生长，但后来不知何故都夭折了。1927年日本人汤川秀夫在哈尔滨附近也试养柞蚕，结果又以失败而告终。从此，都认为黑龙江气候寒冷，不宜养蚕。

我始终不信黑龙江就注定飞不起来蚕蛾，长不出“蚕

姑娘”。“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的黑龙江，东部山峦起伏，柞林茂密，坡度平缓，5至9月气温大体在19到22摄氏度之间，据我在辽西工作的经历，这都是柞蚕生长发育最适宜的温度。黑龙江养蚕的条件并不比蚕乡辽宁差，同样可以大有作为。省商业厅曾从辽宁省请来两名养蚕专家到黑龙江考察，他们从天到地，有理有据地说出养蚕的可能和前景。我把专家的看法、意见连同我的信，一起送给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批阅。那封信上说：

“蚕，不与人争地，不与人争粮。吃的是柞叶，吐的是蚕丝。自古男耕女织，有了蚕丝，就有了工厂，就可以生产花绸、白绸、格绸、凉绸，把男女打扮得更美丽，让他们从蓝布褂子中解放出来……”在省委会讨论养蚕时，欧阳钦同志第一个表态赞成。后来我到东部一带实地考察，发现早有“敢吃螃蟹的勇敢者”。他就是密山县新农公社农民王明祥。1951年他就在虎林县放养柞蚕“一把剪子”，收茧3万多粒。蚕农放柞蚕是论剪子的，一把剪子，就是指一个劳力放养柞蚕的工作量，约4000粒种茧，需柞林3至4公顷。1956年我到穆稜县，又了解到该县向阳公社，由辽宁省西丰县引入7000粒春茧，放养后收茧两万多粒。东宁农垦局同志还告诉我，1957年他们试养柞蚕，收成也不错。这一切都证明，北纬45°以北地区养蚕不成问题。

在充分论证基础上，1958年省委、省人委作出了放养柞蚕以发展丝绸生产的决定。省商业厅新增蚕业处，承担养蚕工作。这年初，省商业厅从机关和直属单位抽调180多人，分赴养蚕重点县安营扎寨，勘察养蚕地址。

我赶到现场，看到蚕业大军，穿山越岭，露宿风餐，把心与力都聚焦在新的事业上。他们发出“蚕蛾不飞我不归”的誓言，使我很受感动。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当年5月，草木吐翠，万山染绿之时，他们已在密山县连珠山、林口县马鞍山、宁安县平顶山、伊春市浩良河和东宁县小乌蛇沟，共建起5个养蚕试验站，这些养蚕场都统一归省商业厅领导。在这同一时间里，全省34个市、县的商业部门，也相继抽调400多名职工，建起本县养柞蚕试验场。这时，省商业厅从辽宁省聘来3位养蚕专家，举办养蚕训练班，学习有关蚕场更新、种茧保管、饲料调配、防治病虫鸟害等养蚕技术知识。辽宁省老大哥很够意思，送来最好蚕种，派来58位有经验蚕农，分赴各蚕场当先生、作指导。全省39个地、县的养蚕试验场站，从5月中旬开始试养812把剪子，这个从零开始的速度，连辽宁养蚕的老把式都震惊了。他们连说：太快了，了不起！

枝绿蚕肥壮的6月，我沿张广才岭、完达山脉东行，只见那连绵起伏的山岭，虽不很高，却层层叠叠，郁郁葱葱。车行树闪，路也不险，使你辨认不清林深几许，山恋几重。当听到柞林中蚕农驱鸟吆喝声和放炮仗声时，我立刻停下车来。走进柞林，只见一个个身上嵌着金线、绿中泛黄的肥蚕，时而沿叶蠕动，时而伏首如眠，蚕农说：“快要结茧了。”我高兴的不得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这话一点不假。6月下旬，蚕老叶残，柞树枝头挂满串串的蚕茧，果实累累，盛景喜人。当年收茧2000担，平均单产2.4担。历史的奇迹，燃起我心

中的激情，我于1958年9月2日赋诗作证，并向世人宣告：
《谁说“北大荒”不能养蚕？》

谁说“北大荒”不能养蚕？

请他到这里来看看！

夏日气候多温暖，

很少连阴霉雨天，

干爽适宜无病害，

不冷不热好养蚕。

谁说“北大荒”不能养蚕？

请他到这里来看看！

千里缓坡柞林满，

万顷空地变桑园，

这是蚕儿新大陆，

饲料充足不愁餐。

谁说“北大荒”不能养蚕？

请他到这里来看看！

三十多县初试验，

蚕肥茧大佳音传，

万绿丛中添艳色，

桑柞林里结金线。

谁说“北大荒”不能养蚕？

请他到这里来看看！

群众干劲势冲天，
农业闲时闹养蚕，
学会技术省劳力，
养蚕并不误农田。

谁说“北大荒”不能养蚕？
请他到这里来看看！
今年是点明年面，
三五年产百万担，
丝厂机奏交响曲，
不种棉花穿丝绢。

谁说“北大荒”不能养蚕？
请他到这里来看看！
蚕儿引渡到龙江，
犹如鱼儿入海洋，
从此历史开新页，
丝绸不只产南方。

这首诗起到了新闻传播作用，近至省内，远到省外，知道“北大荒”能养蚕的人越来越多了。直至30多年后的今天，有些人见到我还说，你写的《谁说“北大荒”不能养蚕？》的诗，至今我们还能背上几句。

“北大荒”放养柞蚕成功后，一个新课题摆在眼前，这就是扩大放养。1958年8月末，省商业厅、农业厅、林业厅，在林口县联合召开了养蚕现场会，总结和推广了试养

柞蚕的经验，确定 1959 年在林口、密山、嫩江、龙江、北安等 11 个县大面积放养。这一年全省实际放养 3.1 万把剪子，收茧 4.4 万担。1960 年虽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心向粮，但今年还收茧 7 万担。3 年来全省养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培训了一批养蚕技术人员和蚕工，建立了一批专业队伍，建设了 32 万公顷蚕场，新设了养蚕机构，开展了养蚕科学研究，初步形成规模养蚕体系。

谁知收购环节却拖了后腿。1959、1960 两年中，全省平均有 50% 蚕茧没有收上来，出现了伤农的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主持协调会议，确定缫丝厂担负所在地的市县蚕茧收购任务；放养 400 把以上蚕剪子的市县，都要建立专业蚕茧收购站；任务较小的县也要有专人负责，做到哪里有蚕茧就到哪里收购。为了保持养蚕好势头，省商业厅又出台了卖茧给予丝绸优待供应的办法，就是每收一担蚕茧卖给 7 市尺丝绸；每放一把柞蚕剪卖给一尺长毛绒，并宣布这个政策几年不变。1964 年和 1965 年，连续一把剪超过 3 担以上的高产点，全省就有 200 多个，养蚕收入与农田相等，有的地方还略高些，这就保证了养蚕业逐年发展。

全省养蚕业的悄然兴起，带动了丝绸加工业蓬勃发展。从市场需求出发，1958 年和 1959 年的两年间，由省商业厅承担，先后在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密山、东宁、林口、宝清等市县，建起 15 个丝绸企业。同时，由工业部门投资建起鸡西、富锦、巴彦 3 个丝绸厂。从此，龙江大地第一次响起丝绸的织机声。到 1965 年全省丝织品产量达到

176万多米，相当于1962年32.1万米的5倍半，缫丝厂生产的17吨柞蚕丝，大部分由辽宁省丝绸公司包销，并向日本出口。世世代代的龙江人，终究结束了一向靠外埠供应丝织服饰的历史，姑娘们穿上了地产印花丝绸连衣裙，小伙也穿上了龙江纺织的丝绸面料衬衫。黑龙江“蚕姑娘”的千丝万缕，织就绚丽的彩霞，把龙江人打扮得更漂亮了。

八、且将集市作桥梁

五六十年代的集市贸易，有人说它像大海的潮汐，涨涨落落，飘摇不定。也有人说它似跋涉中的旅人，深一脚浅一肢，举步艰难。但不论如何，集市贸易是客观需要，它像一座高架桥，紧紧连着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局部和整体、内销和外销、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个人与国家等多方面利益和关系，不是哪个人想取消就取消得了的。

自古以来，市场乃商品交换之场所，亦是商业之起源。生产发展而始有市场，市场之扩大和繁荣，又促使商业的兴旺发达。

我对集市贸易情有独钟。小时候就爱逛市场，家乡古镇老城，三日一小集，五日一大集。农历四月逢八的庙会集市，百货骈集，交易活跃。有柴草市、骡马市、鲜鱼蔬菜市、廉价劳力“工夫”市、油酒米面市，也有“五行八作”的“八杂”市，练武卖艺的、唱曲演戏的、说书的、变

戏法的、耍把式卖药的、代写书信和状子的、算命卜卦的等等。书本上对这种集市贸易写道：“商贾云集，南北珍货，十备六七，车骑照耀，街市充盈。”我在北京念大学时，同任仲夷住一铺炕，有时早晨我们起来晚了，赶不上饭，就到早市上花一角钱买10个熟鸡蛋，两人一顿早饭吃的挺好。由此看来，推车摆摊、挑筐挎篓，集市贸易，最大特点就是物美价廉，买卖方便。

人们把集市贸易也叫自由市场。所谓自由，并非如入无人之境，而是宽严有度。小时候逛市场，就看到一些处罚规定：对私充牙行，以冒名顶替问罪，枷号一月，发附近充军，地方官同徇纵者，一并参处。对哄抬物价、贱买贵卖的，杖八十。将马匹私贩到外省发卖的，贩子处绞。对私造斛斗秤尺，或短斤缺两的，杖六十，工匠同罪。对揭发检举人赏银十两。可见，管是为了活，活才能买卖兴隆。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在我记忆中，5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走进拜泉县城时，很不显眼的马路，平平常常的小巷，唯一喧闹的地方是集市。人来人往，有买有卖，可以挑选，可以讨价还价。商品优劣的仲裁人是买者，也就是消费者。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从匮乏走向较丰富的时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集市的各种流通功能，是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这样说，流水不腐。流通而后活。人们生产了产品，能够变成钱，就有了积极性。在买卖过程中，人们就要挑一挑，选一选。这一挑一选就是竞争，就有淘汰，就有压力。人们把这种始终朝千家万户敞开大门的集市，称为国营流通领域中的一

种补充。这个补充，对促进生产，活跃经济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对于集市，我发自内心的赞美道：

集市繁华景，
处处叫卖声；
东西南北客，
集散在此中。

摊档赛长龙，
一片郁葱葱；
赤橙黄绿果，
买卖甚兴隆。

但是，这种繁荣景象没多久，就受到了严重冲击。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流通领域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计划调拨商品几乎一统天下。集贸市场的世袭领地，有的被国营和合作商业所挤占，有的被当做资本主义扫地出门，全部取缔。商品流通出现了“大通小塞”的现象。我对这种情况很重视，在地市委财贸书记座谈会上，着重讲了发展集市贸易问题。我明确地说，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市场的补充，有小自由的生产，就有小自由的贸易。对农村集市贸易的方针，是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在目前应该放手活跃农村集市贸易，不要过多的限制。1957年2月，根据国务院有关城市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精神，经过调查研究，极力倡导在省内大中城市进一步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城乡经济又开始活跃起来。1957年7月的盛夏季节，我到齐齐哈尔市检查集市贸易时看到，这个市已有

领导地在铁东、南市场、北大桥、富拉尔基等地开放 23 处固定农贸市场，三类物资开放，有干鲜蔬菜、瓜果、鱼蛋禽、淀粉粉丝、乳制品、野生动物肉、牲畜、儿童玩具、手工业产品等等。老百姓说，活繁劲又回来了，买啥卖啥都不难。

方向对头，就要因势利导。1957 年省委下发了《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农村自由市场若干问题的指示》，规定：凡属国家统购统销的农产品和统一收购的一二类物资，在完成国家统购和派购任务后，允许生产单位和农民自由处理剩余部分，但不准中间贩运。三类物资，允许农业社和农民自产自销，允许公私合营企业和小商贩个人在市场上自由购销。买卖双方自由议价，对重要商品由市场管理所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参照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牌价、市价、挂参考价格牌。允许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自由出售自己生产的、属于开放范围的小土副产品和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后的剩余产品。凡属农民自产自销的产品，不论近销和远销，一般不许限制。农业社兼营手工作坊，应以自产自销为主，一般地不应从事商业贩运。由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开放，对于促进全省工农业的发展，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增加农民收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自由市场开放不久，无证商贩增多，一些商贩套购倒卖统购统销物资，一些统购统销的农副产品和计划分配的工业品也进入市场等等。这时有人又出来横挡竖拦，大喊赶快关闭自由市场。我不赞成这样做，主张要疏，不要堵，不能泼脏水连孩子也泼出去。要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

清主流，坚持办好不可替代的自由市场。为此，省人委又公布《黑龙江省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对上市品种、价格、贩运等，开始严格管理。对探亲访友随身携带的农副产品也都作了限量规定。到1957年末，全省农村集贸市场有540处，成交额为5500万元。人们又一次目睹搞活一方流通，方便一方人，也富裕了一方人。

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跃进”期间，在商品流通领域里，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在“一大二公”声中，无论集体所有制商业，还是供销社集体经济，都一律向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过渡，城市集市贸易也都全部关闭。但有些集市从地上转入地下，“黑市”虽遭严厉打击，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股风同样波及到了农村，“公社化”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农村集市贸易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1958年全省农村集市比1957年下降了17%，成交额下降32%以上。由于工作中的失误，加上后来的3年严重自然灾害，“天灾人祸”严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造成生产下降，农副产品极为缺乏，肉、蛋、禽、鱼凭票供应，黄烟、蔬菜等农副产品则有价无市。

为了搞活农村流通，发展农村经济，1961年3月省委召集地、市、县三级财贸书记会议，重申继续开放集市实行“三放、三管”的原则。三放是：在产销直接见面的前提下，对三类物资全放；对社员园田地生产的产品，除粮食外全放；对完成派购任务后的二类物资也要放。三管是：对一类物资和没有完成派购任务二类物资以及工业品要

管；对“二道贩子”和长途贩运要管；对机关、团体、学校、工厂要管。“三放三管”原则实行后，由于政治、经济和行政三管齐下，不仅保护了正常贸易，而且取缔了投机行为。

1961年12月6日，李先念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财贸工作座谈会。先念同志在总结报告时说：中央少奇、陈云、小平同志把市场问题提出来了，我们认真地讨论了一次，应该说他们提出的是恰如其时。现在自由市场要有，要考虑恢复，问题是要恢复到何种程度。要比1956年小一点，比1958年大一点。为何要小一点？因为我们力量少，不可能开的那么宽，那么大。城市是否关死，还是也可以有点？菜烂掉了，有人说国营不能经营，如烂30%，都扔掉了。所以要开放自由市场。中央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政策。省委、省人委根据中央精神，发出了“关于恢复与开展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地把集市贸易工作抓起来，首先要解决某些干部怕恢复与开展集市贸易会发展资本主义，会扰乱市场，影响国家收购的各种思想顾虑，把资本主义和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区别开来，同时要广泛宣传和讲解组织集市贸易的重要意义。

省委、省人委指示中规定上市商品交易范围：第一类是国家统购的物资，有粮食、大豆、小油料等3种，不许自行交换；第二类是属于国家统购物资，有猪、牛、羊、甜菜、亚麻、烤烟、大麻等75种。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后，其余部分可上市

出售，社员自留地产品也可上市交换；第三类产品是除上述一、二类物资以外，允许生产者自由出售的各种产品，有木制品、草席品、编织品、野生动物肉、旱獭皮、旧家具、估衣、鹿角等 82 种。这个指示还要求各地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由物价、商业、税务、农业、公安等部门负责组成。其任务有六条，如贯彻执行和宣传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市场管理办法；组织与安排集市贸易购销活动和修理、缝补、饮食、理发等各项服务项目；保障合法贸易，进行价格管理，维护国家计划，取缔市场一切违法活动等。对商品价格规定，原则上围绕国家牌价进行。公平议价挂牌公布，但最高不得超过国家收购牌价的 30% 到 50%。这一指示下达后，农村集市贸易形势不错，上市品种一般都在百种左右，成交额也很可观。价格稳中有落，重现勃勃生机。一位老太太说，市场大门关得紧紧时，俺连小鸡都不敢养了，零花钱可困难了。这回上面有说道了，俺也不怕鸡蛋卖不出去了。

到 1963 年，神州大地初渡困难关，全省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城乡市场也开始由紧张转向缓和。随着商品货源的增加，有些凭票商品先后敞开销售。城市集市贸易在中央“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指导下，也开始复苏。1965 年，高价商品又恢复平价，控制供应商品也大大减少。这一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突破 30 亿元大关，比 1957 年的 19.5 亿元，增长 57.4%，城乡流通出现了新的活跃景象。特别是以前城市每人只有在节日才能吃到 2 两肉、一两蛋的紧张状况彻底

改变了，不仅可以敞开供应，而且还动员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吃“爱国肉”。

九、让塞北人民食有菜

在我一生的60多年革命生涯中，分管财贸工作有10多年。1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虽弹指一挥间，但我却觉得这是最操心、最伤脑筋的差事，它集中体现在一个“吃”字上。这就是要保障人民既要吃到粮食，又要吃到副食，而菜又是副食中的主力。我自1954年8月10日18时，在省

手管 这全全上造为少手光手 以不后古任即思印以印位

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已成为人心向背和社会安定的晴雨表,一时间菜给我们的压力并不比粮食差。

在蔬菜青黄不接时,我曾动员城乡在山野菜上打点主意。我省各地都有大片野菜,什么韭菜甸子、黄花沟、柳蒿塘等等。把这些野菜采集回来,就可以解决大问题。安达县就搞了几十万斤野韭菜花,不是很解决问题吗!但是,真正解决蔬菜的数量问题,还得从生产入手。

黑龙江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城市人口多,工业比重大。1958年全国农村人口6.8亿,城市人口仅8000多万,农村与城市人口比是8.5:1。而黑龙江省则不同,农村人口是980万,城市人口就有670万,农村与城市人口是1.3:1。城市人口如此迅速增加,这些人又都是挣钱多嘴巴大的人,出路何在?就在于发展郊区蔬菜生产。1959年省委提出了“国家、公社搞基地,机关企业搞自给,普遍发展群众性生产”的方针。当年蔬菜的种植面积增加到91.9万亩,比1957年增加43万多亩。1961年我再次主持召开大、中城市和工矿林区蔬菜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近郊以菜为纲,主要种春、夏菜;中郊粮菜并举,以菜为主,主要种夏、秋菜,适当种植土豆和菜豆(黄豆);远郊以粮为纲,积极播种蔬菜,以种植菜豆和薯类为主,适当播种秋菜”。这一年蔬菜面积增到了180万亩,基本上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即三分之一左右面积种菜豆,三分之一面积种春夏菜,三分之一面积左右种秋菜。这样使10个城市全年平均每人每天吃到7至8两左右毛菜,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事实证明,城市郊区是蔬菜生产的主力;

机关企业自给性生产和居民的零散种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辅助力量。由于这两把扇子一起煽，适应了蔬菜生产具有鲜嫩、不便于长途运输的特点，做到了及时供应。

可是，随着基本建设的发展，城郊占用老菜田越来越多，把菜田赶得到处跑。全省 1957 年老菜田 65 万亩，到 1961 年就被基建吞掉 46 万亩，给蔬菜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由于老菜田减少，单产也随着下降了。春夏菜是一亩老的水园，可以赶上 10 亩新的旱田。秋菜肇东就比哈市搞得多，一垧地至少 7 万斤，它是省内历史上的老蔬菜基地，管理、技术都有一套。欧阳钦同志明确指出：像肇东这样的基地，谁也不能侵犯。我和财贸部门同志研究，要把蔬菜基地建设提高到战略意义上来认识，不仅要寸土不让的保护老菜田，还要建立扩大新的蔬菜基地。1960 年是全省历史上蔬菜基地建设得最多的一年，全省 18 个基地，年商品量 6.5 万吨。同时，又发展了 34 个土豆生产基地县，1965 年收购土豆近 41 万吨。1964 年又根据生产品种、商品率和交通条件，拨款加强了阿城的大蒜、白菜，肇东大白菜，宁安大蒜、白菜，呼兰大葱 4 个基地的建设。这些基地，在供应城市蔬菜上都立下汗马功劳。不仅迅速增加了商品量，而且经得起风吹草动。仅肇东每年上调大白菜就达 2.5 万吨。呼兰每年给哈尔滨上调 3000 多吨上等大葱。

1962 年初春，在一片备耕声中听到市县反映：菜农口粮不足，影响种菜和售菜积极性，我和商业厅同志到哈尔滨和佳木斯等城市了解情况，认为菜农口粮标准不宜低于农民，略高于农民也是应当的。因此确定：近郊区菜农口

粮不超过 360 斤皮粮，马料 600 至 800 斤；远郊按附近农业生产队标准留粮；中郊可低于近郊，高于远郊。生产基地一般要做到口粮、饲料自给，个别老基地纯菜区的口粮、饲料标准，可比照城市近郊办理。这一政策调动了菜农积极性，郊区菜农积肥送粪，打井修渠，整修农具，挑选母根，选留种苗，出现了蔬菜备耕高潮。

俗话说：能种 10 亩田，不种一亩园。种菜是“描龙绣凤”的功夫活，要科技领先。首先是解决种籽问题，白菜出挺、萝卜串苔就是因为种籽退化，品种混杂。为此，经协调蔬菜生产单位和农业科研部门联合攻关，确定了自繁、自选、自留、自用和辅之以调剂的“四自一辅”的方针，以市、县为单位在一二年内就建起蔬菜良种培育基地，并做到自给。结果新培育的黄瓜、甘蓝、茄子、豆角、柿子等品种，不仅上市早，而且产期和保鲜长，经济效益好。

蔬菜的销售形式走过了曲曲折折的路。总的说来，它像梅雨天和小孩脸，说变就变。根本原因是省内丰歉不稳，而且变化最多的是秋菜。1957 年以前蔬菜由供销合作社经营时，收购形式是各市建立批发市场，商贩产销见面，收取 5% 的手续费。这种渠道，由于周转环节少，农民出手快，市民能吃到水灵灵鲜菜，城乡皆大欢喜。后来由于秋菜产量少，1957 年下半年省里决定哈、齐、牡、佳等 8 个市和 13 个蔬菜基地县，秋菜中的白菜、萝卜、大葱等主要品种，由国营商业“包下来”统一收购。1959 年进而采取城郊和蔬菜基地县按面积定额收购，丰产多卖，由国家包下来，蔬菜实行指令性计划。1961 年改为在坚持派购的基础上，大

中城市实行“大管（统）小放，以管（统）为主”，小城市采取派购或订购，管淡不管旺，一般县城产销直接见面。所谓“大管”也就是“大统”，主要是大路菜，对春、夏菜统购70—80%；秋菜，包括土豆、菜豆，除留下籽种和规定的自食部分外，统购至90%以至全部。这就是说春、夏、秋菜，大部分拿在国家手里，由国家调控。同时也要统购一定数量的细菜，以保证“春节见绿”等特需供应。所谓“小放”，主要是指生产队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后的剩余部分、超产部分和社员自留地产的蔬菜。对有的市在运力、零售网点和人员等方面确有妥善安排的前提下，也可实行“全统”的办法。但不许“大放小统”或“全部放开”。为了鼓励菜农种菜售菜的积极性，还实行了交售给国家商业的蔬菜奖售亚麻布、胶鞋、大车轮胎等工业品，以及在保证菜农基本口粮基础上实行以粮换菜的办法。

但这种统的过多的办法，也有弊端，主要是像李先念同志批评的那样：只许国营商业一家卖菜，结果出现了烂菜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4年对全省蔬菜基地生产的商品菜，改省统一安排为产销双方直接挂钩，原则上地方自找销路；城市工矿区蔬菜收购也由定额派购，改为实行产销合同办法。合同内容包括品种、数量、质量、上市时间，并规定丰收时，按品种交售量超过20%以上的不包，计划外的不包。各市以农民送菜为主，直接运菜到店到场，实行计划上市、净菜上市。加上集市贸易另一渠道的填平补齐的辅助作用，蔬菜经营主渠道也见了活气，但还是有笼子的。

秋菜是整个蔬菜供应中的重头戏,也是最伤脑筋的事。据我所知,实行秋菜供应始于1961年,规定了“以机关、企业包职工家属为主,市场供应为辅”的办法。每到10月初秋菜供应季节,大小会动员,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出人出车,按蔬菜公司开出的分配调令,直接到菜地拉运并分配给职工。对居民实行一次性供应。这个时期,城乡车辚辚、马嘯嘯,男女老幼倾城出动,挑灯夜战,大小单位基本停止工作,全力以赴搞秋菜。外地人此时基本不到黑龙江出差,因为忙活秋菜找不到人。贮、渍、晒各种招法齐用,大体上要忙活一个月。这一个月,差不多要备好半年多一点时间的吃菜,所以上下必保,雷打不动。这种办法人力与财力都耗费太多,对生产和工作影响太大,但在当时的短缺经济条件下,也只好如此。

1963年,我同有关部门商定,以前按地区包干,区与区之间供应不均衡,此多彼少,缺乏调剂,不利搞活市场,改为以市为单位,统一筹划,统一调剂,敞开供应,取消划区包干的供应办法。对各市秋菜供应,原则上以地产地销为主,调入为辅,丰收的市多收多供应,地产不足的市,省和地区根据货源情况适当安排调入。后来省里还成立了秋菜分配会战办公室,各地市和一些大的工矿企业也相应成立秋菜分配的专门班子。以贯彻统筹安排,计划分配,合理供应,保证重点的原则。在抓秋菜消费者自储自食外,同时认识到必须组织菜农、商业部门均搞秋季窖储冬售,以减轻消费者自储的负担。由于多渠道解决蔬菜储藏加工问题,基本做到了调剂季节淡旺,常年上市供应。

在发展蔬菜生产时，我不主张全盘否定南菜北运。因为南北天时地理的不同，造成季节差。利用各自优势，就可解决季节差的不足。在南方，西瓜、西红柿进入淡季时，正是我们盛产的季节。因此，从五六十年代始，我们就曾成列车地往长江以南调运。相反，当我们大雪封门，正是南方青菜旺季，南菜北运解决了我们几个月见不到绿的问题。

我很赞成哈尔滨市的办法：就是借地生菜。

他们从60年代起，有计划在省外产区建立蔬菜生产基地。全国商业劳模、哈市蔬菜公司采购员陶金柱同志，1962年首先在广东湛江地区7个公社进行了青椒生产试验，他从哈尔滨、长春、锦州等地搜集了一批青椒良种，又从外地运去骨粉肥料，与当地菜农一起试种，经过努力，终于使寒带青椒品种在南方扎了根，产量翻两番，为黑龙江开辟了菜源，从过去年进货千吨，增加到3000多吨。青椒生产基地也由湛江的7个公社，发展到湛江全地区及毗邻的茂名地区各县，几乎家家户户都种青椒。由此而延伸的蔬菜品种，也由原来单一的青椒扩展到黄瓜、豆角、芹菜、韭菜、小青椒等10几个品种，使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人，坐在家里也能吃到鲜绿青菜。哈尔滨借地生菜的经验已在全省开花，为全省蔬菜常年供应增加了新的菜源。

1965年早春，冰雪尚未消融，我在哈、齐、牡、佳几个大城市商店菜场转了转，见到翠绿的黄瓜、紫亮的茄子、嫩黄的韭黄……满满登登摆在菜床上，任顾客挑来挑去，面露喜色。我问他们贵吗？

一位中年妇女笑答：“一冬春净吃白菜土豆了，隔三差五换换口味，贵点也认了。”看来，有就好，老百姓还算满意。

十、为了共和国的“两个新生儿”

50年代末期的中国龙江大地，犹如一张巨大产床，降临了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巨子：一个姓工，叫大庆；一个姓农，叫农垦。

“大庆”这个原在中国版图上找不到的名字，地处距哈尔滨100多公里的安达县境。清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开始放荒并设安达抚民府。民国二年，即1913年改设县制。但大庆境内，即现在的萨尔图、让胡路、龙凤等直至油田开发前，仍是茫茫草原一片。1955年8月国家地质部开始在松辽盆地勘探石油，1959年9月26日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位于肇州县境大同镇西北高台子附近的第三号基准井第一次喷出工业性油流，辽松油田从此揭开了大会战的帷幕。在出油的第二天，松辽石油勘探局的关跃家同志带队从安达赶到哈尔滨向省委报捷。当时省委常委正在中山路107会议室开会，常委们看到从地下1000多米深处喷上来的原油，高兴的不得了。欧阳钦同志问能点着吗？关跃家赶紧用纸条蘸了点原油，用火柴点着了。大家高兴得直鼓掌，都在议论起个啥名好。欧阳钦同志说：人家老百姓给心爱的小孩子起名，都挑选个有意义的名字，现在正

好是共和国 10 年大庆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油田，我看就叫大庆吧！省委同志都表示赞成。从此，这个油田以大庆闻名于世。省广播电视文工团李高柔唱的东北民歌《大庆子》，就是指这个大油田。

在大庆这片土地上，青天一顶，草原一片，条件极为艰苦。冬天，零下 30 多度的严寒，风雪“大烟炮”肆无忌惮。夏天，蚊虫小咬劈头盖脸。加上当时正处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吃不上，住不上，特别是肉、蛋、禽和蔬菜等副食品更为奇缺。这一切都给参加会战的 3 万石油大军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支援大庆会战，省委义无反顾地提出“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的方针，会战前线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物有物。省委成立了支援大庆会战领导小组，组长是强晓初同志。责成我负责安排解决会战队伍的吃、住、烧、穿等物资供应。

沉睡了几千年的荒原，突然闯进千军万马，工程浩大的开发区人吃马喂的供应网点还是个零。油田单位和工人需到几十里、上百里外的商业网点购买日用品。有的井队常常因酱醋、蔬菜供应不上，只用盐水煮黄豆下饭。为了送货到第一线，会战大军走到哪儿，供应网点就设到哪儿。商业职工在临时帐篷、牛棚、地窖子里营业，用土坯和木箱搭起来当柜台，没有宿舍就睡在柜台上。没有运力就人背肩扛扁担挑。在会战的第二年，省里在安达县设立了百货、工业器材、医药、煤建 4 个二级站，实现了商业供应网点零的突破。接着安达县在油田会战前沿的大同、杏树岗、萨尔图设立了百货、工业器材、煤建、食品杂货、畜

产、蔬菜等三级批发站，同时在萨尔图、大同、龙凤等油区作业点又分别建了 19 处国营商业零售点。到 1963 年 9 月，各专业公司由安达镇迁移到萨尔图。至此，油田的商业供应体系正式形成。随着油田的发展，油田商业经营机构及基层网点也得到相应发展。1965 年全市商业机构达 125 个，其中零售网点 94 个，职工近 3 万，百货、纺织、糖酒、食品、五交化、饮食服务、粮油、医药、石油等商服门类已近齐全。

可以说，三年自然灾害为油田开发雪上加霜。从玉门、青海、四川、新疆云集到百里油田的 3 万多会战大军吃饭成了大问题。黑龙江省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下，粮食连年减产，从城到乡，很多人以苞米瓢、豆皮、稻壳磨面掺甜菜渣的代食品充饥。有的甚至将木本、草木植物磨碎拌糠面烙饼吃。我到明水、青岗一带看到老百姓吃榆树叶，有的连杨树叶都抢光，肿的连眼都睁不开。在这种情况下，省委的态度是宁肯自己勒紧裤带，也要支援石油会战大军。决定全省每月再节约 15 万斤粮食支援油田，并责成我落实此事。这任务难度太大了，但粮食部门的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定地说：大庆是共和国的大庆，我们要顾全大局，甘愿自己挨饿，也要解决石油会战大军吃饭问题。就这样在粮食部门的定量外，又每月给大庆调拨了 15 万斤粮。石油部长余秋里对我说，龙江的风格太高了。我们虽尽了最大努力，但粮食还是不足，我到油田了解到工人由于劳动量大，吃不饱，不少人患了浮肿病。省委很着急，再次责成粮食部门为大庆会战职工，每人每月增加 3 斤黄豆。如此

关怀，石油工人对党感激不尽。

人烟稀少的大草原，突然增加几万人，也给住房带来极大难题。大会战打响的第一年，几万职工没处住，过不去冬。油田会战指挥部决定建筑“干打垒”（用碱土打墙，房顶用木料覆盖后用碱土和泥抹平），来解决燃眉之急。可是，圆钉、木材、玻璃等物资解决不了。我找到商业、物资等部门协调，想方设法组织调剂货源供应，保证了当年建30万平方米“干打垒”的需求，使职工们渡过严冬。

在油田所在的一抹平川的大草原上，生长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牧草，是世界上少有的百万亩优良牧场之一。早在解放初期，根据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的指示，就在这里建立了“红色草原牧场”。随着油田开发延伸，石油工人及家属开始在沿路村屯，建起家属新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油田副食供应，利用当地土地及草原资源，商业部门的同志帮助油田工人及家属开展农牧副业生产。既养猪、鸡，又种菜，逐步把家属区变成半自给小型农副产品基地。1960年，龙凤、喇嘛甸、大同等村镇蔬菜生产基本自给。1966年油田职工年人均吃菜达300斤，比1964年的145斤，增加了1倍多。这条路走对了，不仅食有菜，而且还增加了职工收入。

当百里油田会战打响后，商业服务到第一线又出现了一个突出矛盾，就是人手不够，特别是缺干部。我与谢云清、关舟等同志商量，在全省财贸部门挑选了近千名最能干的职工，披红戴花送到油田的商服战线，为油田及时补充了新鲜血液。

1961年8月，我到大庆检查工作，走在新城，吸着油田清香，满目壮丽景象，那巨人般的钻塔，长龙似的管道，连同望不到头的建筑群，在荒芜的大草原上织就一幅新的画卷，真是美不过，看不够。油田同志告诉我，从会战到1961年7月底，共打深井113口，大体摸清了喇嘛甸子、萨尔图和杏树岗地区的油田边界，已探明油田中心部分面积约520平方公里，可采储量约5.2亿吨，这是最肥的一块。再加上油田四周油水混合带，总起来说，已探明油田面积800平方公里，可采储量7亿吨。具备了年产原油1500至2000万吨的资源条件。这个速度，称得上是世界级的奇迹。人们忘不了油田开拓者的创业功勋，更忘不了大庆人高速度、高标准、高水平拿下大油田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1964年4月5日，省委召开全省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地、市、县委财贸书记和专员、县长，及财贸部长、财贸办主任等105人，专程赴大庆学习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足足看了一天，谈了半天。许多同志反映：过去从报纸上看到“上有青天一顶，下踏草原一片”这句话，印象总不深，这回一看真是不得了，大庆人真是革命的人，大庆的风真是正气的风，确实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不少同志还用大庆精神对照自己找差距，把进一步支援大庆当成了自己的天职，处处主动，服务当先，促进了全省财贸战线踏踏实实学大庆、为大庆。全省20多万的财贸职工，从大庆魂的反哺中吸取了成长的营养。

50年代末黑龙江省另一件大喜过望的事。就是戎马一生的王震将军脱下军装，主动请缨，亲率10万转业官兵，

奔赴北大荒，创办农垦事业。王老将军豪气感人，是个有真性情、大气魄的革命家，胸怀坦荡，个性鲜明，追求坚实。1955年，王震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授上将衔。对这样的职位，他毫不留恋。一年后，便主动离开军界，为了农垦事业，他转业了。1956年任农垦部长后，他甚至建议过把部机关迁到北大荒。在广袤原野草丛里，是他点燃了开发北大荒的第一簇星星之火。正是这火光，诞生了有名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

广阔的三江平原，到处青葱葱、绿油油。汽车在原野上奔驰，跑上大半天，仍冲不出“绿色世界”的包围圈。在这一片土地上，茅草没顶，狼嚎虎叫，方圆几百里没有路、没有人烟，只有一顶苍天，还有隐没在茅草之下的“吃人”的沼泽地。由此可以想见垦荒战士的艰苦生活。这块宝地，过去因未开垦，遍地沼泽，荒草丛生，人迹罕见，北大荒因此得名。50年代末的一个初春，中央农垦部长王震将军，率10万转业官兵来到这个沉睡千年的北大荒，成为荒原的新主人。

这块方圆达10万平方公里的漠漠大荒，同江苏省面积不相上下。在这里尽管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它那肥美土地，紧紧吸引着这批创业者。土壤学家断定，三江平原的土地如此肥沃，同那里的特殊气候条件有关，冬天特别冷，夏天并不十分热，因此蒸发量小，对植物生长有利。当秋去冬来时，大量枯草和落叶变成有机质，积存于土壤中，这样日积月累，便形成黑油油的沃土，真是攥一把都能捏出油来。尽管天老爷在气候上很苛刻，只给黑龙江120天的

无霜期，每年只能种一茬粮食作物，但在地利上却给予了补偿。这为 10 万拓荒者锲而不舍、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大舞台。

中国有句老话：患难见人心。在王震将军亲率 10 万转业官兵驰骋北大荒、艰苦创建国家商品粮基地时，省委发出了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号召，责成财贸部门做好后勤支援。由我负责组织协调，及时为垦区送去了大量粮食、木材、农机具以及生活用品，还输送了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并随着垦荒大军的脚步，建立了大量商服网点，当好北大荒人衣食住行的好后勤。

成功之花为强者盛开，胜利之果属强者收获。北大荒这块宝地属于拓荒者。王震将军赠联赞颂：

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

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

密虎宝饶，指的是密山、虎林、宝清、饶河 4 个县，完达山脉横贯其境内。10 万拓荒者在此安营扎寨，踏上了征服北大荒的旅程。从此，滔滔三江映出他们青春笑脸，巍巍完达山育出风尘硬汉。

垦荒者、建设者和身后的服务者，在龙江大地上，前仆后继，拼搏开拓，经历了无数个难忘的日日夜夜，齐心谱就了一首北大仓新歌。其中就包含着我和几位同志在 1959 年春节合写的一首《欢送你，北大荒》表达了激越之情！为忆伟绩，追怀厚情，略引数句：

北大荒，北大荒，

十几年前你曾带着遍体鳞伤，

流着愉快的眼泪，
迎接来了共产党。
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
用劳动的双手，医治了你的创伤，
在你肥沃的土地上，
换上美丽的新装。
今天，
你已改变了模样。
北大荒的帽子，
不应再戴在你的头上。
你应该另起一个相称相配的名字啊！
——繁荣、幸福、美丽的黑龙江。
欢送你“北大荒”！

.....

烟囱林立插云霄，
工厂相接遍城乡，
矿井深处桃源洞，
一片繁荣代荒凉。

风吹麦海千层浪，
日照稻田万点光。
粮豆高堆成山岗，
北大荒变“北大仓”。

云树遍山复浓绿，

花果满园飘清香，
山川纵横织锦绣，
万紫千红绘华章。

水深池宽任鱼跃，
绿草碧波载牛羊。
柞桑林中蚕结茧，
谁人还识北大荒？

.....

十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57年3月18日到24日，黑龙江省商业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了。当我兴高采烈地走进群英聚会的会场时，被那一株株凝翠聚绿的大叶青，一棵棵争奇斗艳的杜鹃花所吸引，但我看到大会主席台两侧挂的具有特殊的感染力量的条幅，更充满了振奋之情。那条幅写得既有文采，又富有哲理：

历史长河浪打浪后浪推前浪

人生岁月年复年后人胜前人

好一个后浪推前浪，后人胜前人。在我面前的一位位普普通通的财贸工作者，在平凡岗位上，毫不吝惜地倾注自己的精力，以他们那亲人的情感、细腻的服务、忘我的劳动、卓绝的才智，诠释着中国当代商业尖兵丰富的人生，

成为人们爱戴的群星。纵观他们功勋图谱，真不知如何赞美他们才好。在我耳畔始终萦绕着一种强音，那便是毛泽东的词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由此而发，在这次群英会上讲了“万丈高楼平地起，百年大计人第一”的根本大事，提出商业战线要贯彻陈云同志的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没有人的锲而不舍、永进不衰的忘我精神，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本来，人是生产诸多要素中的第一要素，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必须发展劳动者，必须发展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质。而且发展也是为了人，不仅为了当代人，而且要惠及后代子孙。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同志的眼里，发展生产力只是发展物，“忘”了发展人。最突出的就是“只管粮钱物，不管人政思”。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伟大民族。如果说，我国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是无穷无尽的宝藏，那么，古代重视人的思想便是其中闪耀奇光异彩的明珠。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一条规律：大凡有作为的统治者，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人的开发使用。历史上的强盛时代，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他们能够治国安邦，同他们重视人和善于使用人都直接相关。古人留下不少重人、选人和用人等经验，比如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教化为先、用人如器、赏罚严明等思想，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而且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古人

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取其科学性民主性精华，弃其封建性糟粕。

我又从财贸工作三大特点的客观要求，讲到坚持用人的革命精神、革命方法和革命作风，去做好财贸工作。这三大特点是：

第一、财贸工作是桥梁、是纽带，它可以促进生产，也可以阻碍生产。做好了，就能促进生产发展；做不好，就会阻碍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

第二、财贸工作联系面广、政策性强，是经济工作的前哨和窗口。差不多人人管钱物，事事离不开钱和物，时时接触钱和物。能不能经得钱与物的诱惑，就看人的工作抓没抓上去。所以，财贸工作不只是做经济工作，很重要的是做政治工作，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的素质。

第三、财贸工作和广大群众时时刻刻都在直接发生联系。政策执行好不好，服务态度好与坏，广大群众看得明明白白，藏不住，躲不开。我们的职工每天都和广大群众打交道，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直接反映在群众之中，甚至婆媳打仗、夫妻吵嘴，都会直接影响服务质量。没有革命化的人，是不容易做好这个工作的。

这三个特点，就是要求我们把人的工作放在诸事之首，要求我们的职工有很高的思想觉悟，有很好的革命作风。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贯彻一个方针：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搞好两个服务：即为生产、为人民服务；体现三个观点：即

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实行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我认为把人的工作摆到第一位，就必须抓好教育。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这个精神的支柱。在会议上，我提出由我带头，同时要求各级领导都要到群众中去，了解下情，联系实际，生动地给群众讲课，并以爱国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影响和教育职工。

1963年4月17日至19日，我连续3天到哈尔滨市第一百货商店、秋林公司、妇女商店等8个基层商店，为第一线营业员讲了3课。我调查了解到的大量事实表明，在财贸队伍中，无私地为人民服务虽是主流，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就像“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队伍袭来。这些都证明人的工作、队伍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还了解到，这些年全省财贸职工队伍变化快，变化大，新成分多，全省在现有38.9万职工中，1958年后参加工作的就有12.2万多，约占总数的35.2%。其中许多人对“人究竟为什么活着”的人生观还没解决。再从1.1591万名省、地、县三级干部排队看，较差的干部还占15%左右，个别单位还要大大超过这个数。一些干部滋长了较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官办作风、特殊风和享乐风。官办作风的主要表现：有些基层单位不以经济办法完成任务，借口依靠党的领导，强迫命令；在收购上，不等价交换，剥夺农民，侵犯群众利益；在供应上，不合理分配商品，乱

定规章，任意发票，随便作废；在服务上，以官家买卖自居，不平等待人。特殊风主要表现：某些干部和职工借管钱管物的实权，随便动用计划供应和凭票供应商品，对好少新商品“私分”、“多买”、“走后门”，“卖次留好”、“以物易物”。群众反映：“前门紧，后门松，前门不买，后门私分。”群众称这些干部是“后门经理”、“三方便”干部。享乐风主要表现：好的先穿点，香的多吃点，方便多用点，损公肥己，徇私舞弊，追求个人享受。

针对种种思想表现，我反复强调对职工进行爱国、爱岗教育，是一辈子的必修课。我给营业员讲课的主调就始终定在这个基本点上。我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源远流长。正是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支撑着一批又一批爱国人士和爱国英豪前赴后继。例如，战国时期屈原的爱国情怀；西汉霍去病保卫边疆屡立奇功，在沙场度过一生；南宋岳飞“精忠报国”；明朝戚继光奋战10年，荡平倭患；郑成功依靠高山族人民打败荷兰殖民主义者，使沦陷38年的台湾回归祖国；文天祥英勇就义，“正气歌”响彻云霄；清朝林则徐禁烟抗英，保卫祖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关天培、邓世昌、冯子才等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视死如归，以身许国，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等等。这些爱国行动和思想，传颂千古，为人敬慕。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付出重大的流血代价，涌现出如刘胡兰、江竹筠、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等无数爱国英雄，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精神鼓舞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以后，财贸部门一些领导同志也到基层讲课，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59年12月24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到哈尔滨视察“三八”饭店。这家饭店的全国名厨盛英杰，设计和编组了“四凉四热”大菜单，准备招待总理吃饭。“四凉”体现了龙江飞禽走兽珍品特色：“虎啸声威”、“丹凤朝阳”、“松鹤延年”、“孔雀开屏”。“四热”一展宫廷名菜风味：“宫门献鱼”、“红娘自配”、“金鱼卧莲”、“金鸟穿玉裙”。总理感谢这番好意，但拒绝吃这样的饭菜。他让盛英杰做东北家常菜，不然就不吃了。盛英杰很受感动，立刻做了炒绿豆芽、炒酸菜粉、炖冻豆腐、茄子炖土豆四样北方家常菜，得到总理称赞。周总理详细了解了饭店情况，同服务人员一一握手问寒问暖，看了饭店一火多用万能灶和包饺子机等革新工具，并勉励职工说：“服务事业是崇高的事业，是很光荣的，你们一定要好好为人民服务。”这一切，对我们教育很大，感受至深。我抓住这一活教材，在全省财贸系统中，开展以周总理为楷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系统教育。

盛英杰是解放前饭馆里的一个大师傅，解放后参加了工作。他刻苦勤奋，钻研技术，进步很快，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连选省、市劳动模范。1964年12月，他受党与国家委派，任烹调专家组组长，远渡重洋，赴古巴进行饮食文化交流活动。在哈瓦那住了近一年的时间，原计划讲授3个中国名菜，经古巴政府热切要求，先后讲授了烹制鱼虾的糖醋鱼、棉花鱼、四川辣鱼、燕尾虾、罗汉虾等32个菜，

受到古巴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回国后，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等省市领导，在省委中山路107（现改为和平邨宾馆）招待所亲切地接见了，并希望他广收弟子，传授技艺。他创办的南岗烹饪技术培训班很有名望，连日本国都派人来学习。他先后编著的《家常菜谱》、《烹饪讲义》等书，发行全国，成为今天国家特一级名厨。盛英杰的动人事例又一次说明，注重人的培养，“红”、专不能偏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本身就包含着良好的精神风貌、过硬本领和劳动技能。1960年初，我到绥化县政府招待所时，又认识一位叫“隋大马勺”的厨师，他的拿手戏是做汤菜，有“无汤不成席”之说。哪怕是一碗清汤，在他手里也风味别具，堪称一代水席名师。由此我又想到人要有一点精神，还要有一点本事。一招鲜，吃遍天，是朴素的真理。所以，我在财贸系统中，提倡广泛开展大练基本功活动。

1960年4月，全省财贸部门召开“一把抓”、“一勺准”、“一刀成”、“一口清”等技术能手比武大会。其中40名参加了全省财贸部门“双革”表演大会，他们精湛叫绝的技术表演，使人们不仅看到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而且也是一种艺术美的享受。女售货员曹桂云分别捆扎两瓶色酒和6瓶啤酒，只有22秒，观众说真神了。出纳员王玉芝捻点百张钞票，仅用20秒。卖布营业员韩秋萼，量一匹花布时间才27秒。更令人叫绝的是自行车装配工杨云海，把一台零零散散的一大堆零部件组装成一台骑上就能跑的自行车，总共才5分27秒。从这时起，群众性大练基

本功和操作技术大比赛，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前。

我觉得抓人的工作，还要从根本上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装群众头脑。在大庆的“两论”起家的启示下，1958年哈尔滨市第七百货商店的4名营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成学毛主席哲学著作小组，自觉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指导柜台服务工作，服务质量和商店面貌大有改观。这个典型很快在全省财贸战线引起共鸣，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涌现出一大批学“毛著”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为了推广他们的经验，1960年上半年，在哈尔滨召开了青年学“毛著”现场会，让群众现身说学理论尝到的甜头，得到的实惠。会上，哈尔滨第七百货商店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的营业员魏淑琴、王洪华，双鸭山市一百营业员金国云，鹤岗市新街基国营食堂厨师武树芬，被光荣评为全省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标兵。这之后又有哈尔滨市机工商店营业员于清贤、哈尔滨市香坊“三八”理发馆理发员查桂民、哈尔滨市妇儿商店营业员顾仁莲等，既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又当选全国劳动模范，10年大庆时又都出席全国群英大会。黑龙江省财贸战线群众学毛主席著作在全国是挂号的，后来这群众性学理论运动又与学雷锋、学王杰等英雄人物结合起来，使这个运动一直沿着学有目标，赶有榜样的健康轨道向前发展。

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万紫千红总是春。有了样板，就要突破一点，推动全面，把面的工作提高到点的水平。我省财贸战线有了一大批典型，如肇东向阳供销社、尚志苇

河供销社、哈尔滨市妇儿商店、哈尔滨煤炭一商店、哈尔滨“三八”饭店、双城副食品商店、伊春市五营综合商店毛皮部、青岗县医药商店、佳木斯国营浴池、哈尔滨百货采购供应站第二仓库、哈市食品公司等；先进生产者有：哈百吴桂兰、第七百商店女营业员王洪华、学理论标兵魏淑琴、阿城一百女营业员王淑珍、哈市道外联营饭店服务员刘巨茂、哈妇儿商店女营业员顾仁莲、海伦县畜牧站赶运员周福才、绥化百货批发站保管员浦海滨、爱辉县副食品商店女营业员刘慧芝等。在把典型经验变成社会财富时，我强调必须狠抓两个反对：即一要反对不服气。不能你树你的，我干我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承认差距，才能学而后知不足；二要反对形而上学。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典型也不可能十全十美，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样才能常青不衰。

第七章 十年动乱的岁月

一、“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1962年中共中央就提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同年冬，河北省反映农村存在“四不清”，他们在农村社队开展了“四清”运动（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中央吸取了这个经验，将“四清”列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中共中央于1963年5月，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当时简称“前十条”）这个文件中已指出要点是阶级、阶级斗争。省委讨论后，决定于当年6月开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那时主要是在生产大队和公社搞试点。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当时简称“后十条”），对贯彻执行“前十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在具体政策方面作了补充规定。同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制定了从1964年起，用3年时间搞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规划。要求党的第一书记挂帅，县以上机关，除老弱

病残者外，都要参加这一运动。

1964年5月，我在省委会上听到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毛主席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四不清”分子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危险性最大的在上层。还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而且把原来的“四清”范围扩大为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当时感到很惊异，很不理解，为什么把问题估计得这么严重，还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但因对全国的情况不了解，不敢妄加猜测。

1964年9月9日，省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东北局第七次委员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全省社教运动部署。当时，按照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要求，会议确定第一批社教在绥化地区的庆安县、哈尔滨地区的阿城县、嫩江地区的拜泉县、合江地区的集贤县、牡丹江地区的宁安县、黑河地区的爱辉县等6个县铺开。省、地、市、县共抽调3.3万多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10月份就先后进村了。

按省委常委的分工，我负责联系拜泉县。先后在拜泉县兴华公社和华光公社蹲点，住在老百姓家里，吃百家饭。当地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经常吃的是小米饭、苞米楂子粥和咸菜。我还坚持和社员一起下地参加劳动。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桃园社教经验”，要求整个运动把基层干部甩在一边，全由工作队领导，采取土改时“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办法开展工作，运动搞得比较“左”。我和社教工作团的同志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桃园经验”要学，但不能

照搬照套。要从黑龙江的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做法。从拜泉县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干部、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我们党看问题、分析问题一贯坚持的观点和方法，不能把拜泉看成“洪洞县里没好人”。经过在蹲点的公社调查研究，提出要坚持依靠群众和干部两个大多数，采取“蹲、带、派”，即重点蹲薄弱生产队，带动周围队，定期派工作队指导好队的办法，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不搞工作队包办代替和人海战术。要求工作队不要隐姓埋名，闷头劳动，搞“傻把式”。明确指出工作队所以要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为了更广泛、更深入联系群众，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社教运动搞深、搞透、搞好。

1965年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我感到这个文件中，许多规定都很好，如肯定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尽快解放干部等，特别是强调“四清”成果要落实到生产建设上，很对我的心思。但也有一个新的提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不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含糊地以为是给“四不清分子”戴的一顶新帽子吧。常委会对社教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强调运动中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工作。

春节过后，拜泉县从县委班子做起，逐步扩展到公社

和生产大队，用自我革命的办法“洗澡下楼”，很快把全县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解放出来。对违法乱纪的干部及时予以处理，处分面总的控制在5%以内。为了巩固和发展社教成果，我们提出了坚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粮食生产，抓好畜牧业和多种经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拜泉的奋斗目标。社教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经过一年的奋战，全县高产稳产田增加7倍，共修蓄水量50万—100万立方米水库9座，建立小塘坝112处，蓄水池184个，治理水土流失的水打沟207条，修排水沟132条，植树造林8万亩，为实现农业大丰收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还派调查组专程到拜泉县总结巩固社教成果的经验，在东北地区推广。但所有这些，在“文革”时统统遭到了批判，被斥为搞“唯生产力论”的典型。

现在把社教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回忆，事情就明白得多了。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就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阶级斗争。中间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二十三条”又进一步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认为这种当权派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而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但当时我对它的严峻意义和后来形势的发展演变，认识不足。根本没想到

时过一年，毛主席认为通过社教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因而在1966年5月16日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并由此发动了一场远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规模更大的、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二、在“揪斗”风潮中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接着就发出了《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6月2日，又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还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很快掀起了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自命为“革命派”的组织蜂起，大字报贴上大街和机关、团体院内；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黑龙江省的形势也是如此。天下大乱啊！我的同年级同班老同学、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

长邹问轩，是入党多年的老干部，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和大学党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他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于1966年6月19日吃安眠药，走上了自杀之路。他哥哥邹韬奋是死后入党的，他却在死后出党。邹问轩的死使我非常悲愤和惋惜。这个血的教训使我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那么简单，特别是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任何情况下要坚定、自信、抗争！为了应付骤变的形势，我和我的老伴肖塞在家里自我宣誓：第一，在任何情况下，不走绝路，不自杀；第二，自己错自己担，绝不上推下卸，嫁祸于人；第三，党需要时就挺身而出，打倒了就靠边站，打不倒就站着干，在任何情况下，说真话，不说假话，更不能胡说乱说，坚持实事求是，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要做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

“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运动，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一切。5月27日，哈尔滨话剧院的造反派首先起来批斗该院院长刘相如为首的“反党集团”。我知道后很气愤，曾说：“这是李立三路线，是天真的过火行动，是低水平！”

我主张运动不能乱搞。6月4日我在省直、哈尔滨市和松花江地区负责干部会议上讲，不要上街游行，上了街不一定斗争就有劲，甚至可能影响生产和斗争。要争取在不上街的情况下，把群众发动起来。大字报不要贴在公共场所，也不要贴在大街上。工厂企业不能停止生产，商店不能停止营业，理工科学生不要停课，交通也要保证畅通。大字报不要涉及中央领导人，有意见可以从内部反映。我也

向主管的财贸口提出了要求，搞运动决不能影响工作。我说：“当前运动重点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我们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抓好扭亏增盈，保证人民生活。”

7月29日，潘复生从北京来急电，传达毛主席对不派工作组的指示和康生对北大工作队的批评后，他对我省的“文化大革命”下了4条指示：（一）坚决撤销工作组；（二）让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三）明天召开群众大会，省、市委要检查错误；（四）省委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省委常委会传达潘复生指示后，我立即表明：“干么这么急，非要明天开大会！关于撤工作队问题，人家欢迎的就不撤，人家反对的就撤，不要把工作队搞得灰溜溜的，像败兵溃退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要的就是天下大乱，我还怕乱，真有点不识“时务”。

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方式的反感，我又不想说违心的话，所以我就成为造反派批斗的对象。特别是当我看到造反派无法无天，更使我气愤。8月11日，当我到商学院作“检查”时，我激愤地说：“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经过时了，‘七·一八’大会（即7月18日省委召开的“哈尔滨市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有1万多人参加，会议强调学生要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错就错在牛鬼蛇神刚化好妆，正要登台表演，刚走到台角，我们就开了会，把牛鬼蛇神吓跑了，这不是一个大错误嘛！”我的话刚落音，台下就大喊

大叫：“杨易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好下场！”“杨易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气得造反派狂呼乱叫。

8月中旬以后，形势越来越乱。游街示众、抓人批斗接连不断。8月24日，大中学校、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在八区广场召开“哈尔滨市各界文化大革命点火大会”，有30多万人参加。大会斗争对象是李范五、王一伦、李力安。我和陈剑飞等几名省委常委也到了会场。会上宣称“七·一八”大会和“八·一六”通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罢李范五、王一伦、李力安的官，并把他们几个人揪出来批斗。我和陈剑飞站起来要去接受批斗，主持会场的人不让我们去。我对那人说：“你们批判的问题都是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大家都有份，怎么能专批他们几位？要错我们都错了，一起批斗嘛！”这时，劳动模范苏广铭从主席台跑过来把我们拽住，说：“没有你们的事，还是回台上坐着吧。”8月26日，省委机关的干部职工在八区广场开“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有10多万人参加。会上点名批判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等省党政领导人，还给李范五、王一伦戴了高帽。潘复生在会上讲话，竟对造反派表示支持。我对这次会很反感。省委机关是黑龙江省的首脑机关，应该是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为什么要这样干？我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那次省委机关发起的炮打司令部大会是失败的。省委机关干部不带头执行党的政策，给李范五等人戴了高帽，影响很坏，以致把戴高帽的做法传到县里去了。对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态度鲜明地予以制止。”

9月4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在八区开

“炮打司令部、揭发批判省委问题大会”，有11万人参加，揪斗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和陈雷陪斗。会上有一个人“揭发”陈雷“杀害抗联战士”时，10多个军工造反团的学生蜂拥而上，拳打脚踢，打得陈雷鼻青脸肿，血流满面。在会场上，哈尔滨第二工具厂的工人、干部就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和学生发生了争执。当晚第二工具厂工人到军工贴出抗议违反政策的大字报，喊口号示威。5日，南岗、道里大街上出现了职工、市民同学生辩论的情况。会后，我立即找省党史研究所所长王景问有没有“杀害抗联战士”这回事。王景说：“哪有这个事，纯属造谣诬蔑！”我当即告诉他：“你们要出来说说话呀，不然陈雷会被打死，要出人命的！你们要如实反映情况，主持正义呵！”党史研究所的王景、金字钟他们找了潘复生、李力安和军工造反团，如实谈了情况，据说以后就没怎么打陈雷。“文革”后，有一次我见到王景，对他说：“你们在‘文革’中立了功，不然陈雷就没命了！”

9月7日晚8点多钟，我正在北方大厦搞接待，张瑞麟和郭伟人二人匆匆忙忙来找我，说一、二工具厂的工人已到省委门前，非要求潘复生接见不可。我考虑：不能让潘复生出面。他是省委第一书记，就是我们省委的人都打倒了，只要他不倒，还有省委在嘛。何况潘复生出面接见，有些问题不好马上回答，没有回旋余地。想到这里，我就坐车直奔省委大院。原来哈尔滨一工具厂和二工具厂2000多人在晚5时半就来到省委大楼门前，要求潘复生亲自接见，解答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意见。他们提出：第一，要求省委

领导同志敢字当头，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态度明朗；第二，要求把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一切坏人都交由本单位处理，省委的几位书记交省委机关红卫兵处理；第三，军工造反团不按“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办事，坚持武斗，要求省委查处；第四，被军工造反团控制起来的人要保证安全；第五，军工造反团不准干涉任何单位的“文革”运动；第六，潘复生为什么只见学生不见工人？要求潘复生立即出来接见。张林池、于杰、谭云鹤，还有省委工交政治部的鲁光、“文革”办的肖杰、总工会的常一彬正在省委大楼门前为工人们做工作。我提出让工人推举代表反映意见。大约有三四十人到省委一楼组织部会议室。我对代表们说：工人同志这种维护“十六条”的精神很好，对军工造反团的缺点提出批评也很好，但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要造成工人和学生的对立。潘复生现在有病，明后天一定到工厂去接见大家。我要求代表们说服工人回去。可是工人说啥也不走，在省委门前又坐了4个多小时。最后他们提出：明天一、二工具厂停产一天到各工厂去串连；后天下午开大会，要求潘复生参加。我当时向工人们拱手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有博大的胸怀和带头执行党的政策的气魄。既不能串连，也不能开大会，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向省委提出来。对学生要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去解决，这样相持下去没有好处，很容易引起冲突。”这样一直相持到半夜1点多钟，工人才回去。当夜，我立即组织省委的同志分头到两个厂子去做说服疏导的工作。鲁光和常一彬去

一工具厂，约下半夜2点多钟返回；陈剑飞和省工交政治部的王广军去二工具厂，约3点多钟才返回。我和张林池、于杰、谭云鹤去潘复生家汇报。经过工作，第二天没有停产。

9月8日，事态仍然在发展。军工造反团20几个学生到锅炉厂和工人辩论，被越聚越多的工人团团围住，市委书记石青赶去解围。哈尔滨医科大学几名学生在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楼前贴大字块，被市民围住辩论，交通堵塞，车辆不能通行。当天晚上10点多钟，省委常委们集中到阿什河街省委俱乐部会议室开会。会议气氛相当紧张，潘复生刚坐下来就很激动地说：“当前运动形势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运动中发生的某些打人、戴高帽游街等问题，是激流中的浪花，绝不是主流！”他还说：“有的人想抓住学生打陈雷这一点攻击群众运动，挑动工人斗学生，是不能允许的！”我当即插话说：“不能只讲大方向，学生有缺点也得讲嘛！”潘复生对着我说：“现在有的同志思想、立场没有彻底转变过来，如果还这样下去，是要出大问题的！”我说：“乱揪乱斗，动手打人，这浪花可不小啊，都快把人淹死了！应该制止嘛！”他眼睛盯着我似有所指地说：“工人的问题，是干部问题。我很怀疑，现在有人就是要把我弄倒，就是要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对这种情况，有些人就感到高兴！现在是大局不看，主流不顾，硬是抓住陈雷问题大作文章。如果工人明天真的开大会，到处广播，就要发生更大的问题，比‘八一六’更严重！”潘复生一边说着，一边从桌上拿起一张纸。这是省委机关红卫兵一个战斗组写给省委的

信，指责潘复生“九·七”晚上为什么不接见工人。潘复生气冲冲地说：“你看，我们这是什么干部，逼着我去镇压学生！”他又当众晃了一下那张纸。“让他们写吧，就是送到北京去我也不怕！”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我说：“杨易辰，你就想不通！有些人遇到问题不表态，反而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就是要孤立我！”听了他这些不顾事实的讲话和指责，我心情很激动。我当即反驳说：“我们不敢批评军工造反团，这个问题我开始想不通，现在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对学生这样放任！陈雷还没有定性，就这样打对吗？”他闭口无言，默不作声。我直率地说：“学生有缺点为什么批评不得？有人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什么不听工人的话？难道就是学生革命吗？学校随便押人，这不合法！我看这些话讲得很有道理嘛！”我接着说：“省委机关炮打司令部大会开得很不好，起了很坏的作用，影响到全省有多少戴高帽的！我们这些人不行了，就大换班好了，可以换人嘛！”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2点多钟，不欢而散。

9月9日上午10点钟，在省人委四楼会议室召开了一工具厂、二工具厂、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和松江拖拉机厂6厂工人代表座谈会，潘复生、陈剑飞、李瑞和我都参加了。会上有10多个人给省委提意见，中心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问题。我们几个人都强调要正确对待和支持学生运动，工人阶级要带头执行党的政策，一不能动手，二不能上街，一定要稳住形势。下午，我亲自到一工具厂和工人见面。吉普车刚到厂门口，只见满院都是工人，正打着旗准备出发，声言要到花园邨去要被关押的几位省委

领导人。我便站在临时搭的几只木箱上大声向大家说：“现在工人阶级应当任凭风浪起，稳定如泰山！如果我们控制不了形势，就会被坏人利用，那将会给党造成极大的损失！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派代表开座谈会，但一定不要出厂。对学生运动要看到他们的大方向。工人阶级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做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接着到厂党委办公室召集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开会，动员大家一定要做好工人的工作。这样把工人的情绪稳定下来，没有上街，防止了一场冲突的发生。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提出“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用任何形式，来挑动工农斗争学生”，学生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工人农民，应当热烈欢迎他们的革命行动”。社论一播发，造反团的学生像打了气的皮球，顿时膨胀起来。谭云鹤连夜向我打招呼，他已得知明天军工造反团要揪斗我的消息。第二天，哈市大中学校造反团大约有5万多人上街游行，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省委有鬼，把省委的鬼揪出来”等口号。晚上，我正在省委工交政治部开会，突然闯进一伙穿灰色军服的军工海军系造反团的学生，不由分说，把我和谭云鹤以及我的秘书王克用军用卡车拉到军工学院，分头审问。围攻我的一伙有40多人，一边喊口号，一边逼我讲省委是怎样挑动工人镇压学生的。我如实地告诉他们：“省委根本没有发动工人镇压学生，而是千方百计地做工人的工作，不让工人上街和学生辩论。省总工会、省委工交政治部、文革

办都组织起来做工人的工作嘛！”一直闹哄到下半夜1点多钟，实在没有捞到什么把柄，便把我和谭云鹤送到花园邨“黑帮”室关了起来。

9月15日傍晚，哈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在北方大厦广场开了“深入揭发省委问题大会”，被揪斗的有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陈雷和我。我的罪名是“‘九七’事件的罪魁祸首”。戴高帽、挂牌子，绕场游斗一周。接着18日、19日军工造反团、八八团连续开了“揭发斗争杨易辰大会”，批判我所谓“挑动工人围攻学生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嘛，对被揪斗我早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出乎意料的是，没过几天，省委竟派车把我接回来了。事后我才知道，原来9月21日，周总理和陶铸在北京召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八八红旗战斗团和东方红战斗团的代表开座谈会，东北局的宋任穷、马明芳、顾卓新和黑龙江的潘复生都参加了。总理说：“对黑龙江省委要一分为二，黑龙江省委也有好同志，可以做工作。要挑选出一批同志组成临时省委嘛。运动中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的人要统统放出来，交给省委。你们要把杨易辰放出来，他这个人是为工作、顾大局的。他很熟悉生产，让他抓革命促生产嘛。这样的人你们不用，用什么样的人呀！”陶铸和宋任穷也都直接给潘复生打过几次电话。我被放出之后，针对当时全省在工业交通和农村工作中存在问题，于9月29日主持召开了全省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电话会议和农村工作电话会议。分别由陈剑飞、于杰代表省委讲话，要求全省工交战线广大职工一手抓革命，一

手抓生产，保证全面、超额完成生产建设计划。外出串连的职工、科技人员应迅速返回生产、工作岗位，要坚持业余闹革命。农业要集中全力抓好秋收、秋翻、秋粮征购和明年生产准备，认真做好秋收分配。地、市机关要分出抓运动和抓生产两套班子，实现生产、运动两不误。

10月9日至28日，毛主席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电报要求每省去两人，其中一人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省委领导，一人是“文革”初期不理解，以后又理解了的。黑龙江除了潘复生参加外，总理指名让我去。王观潮是哈尔滨市的。我自然是属于“文革”初期不理解的了。我记得，在会上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他点起来的。要支持学生闹革命。要正确对待这场革命运动，不要如丧考妣。刘少奇、邓小平在京西宾馆礼堂作了检讨。周总理在会上讲“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欲罢不能，是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要理解，要正确对待。总理在讲话中还举了我的例子说：“在座的杨易辰不是戴了高帽，打了花脸，游了街，现在不是也过来了嘛！”在进入会场时，总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等候在那里。见我来了，便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会后请在河北厅留下，有事谈。”散会后，有人领着我到隔壁会议室，只见周总理、李先念、陈毅都在那里，潘复生也在场。一见面，陈毅就说：“你小子行了，高帽也戴了，街也游了，我们还没戴呢！”总理说：“你不突出政治应该受到批评，要认真检查。黑龙江是反修前哨，又是重要工业基地，一定要搞好。潘复生刚去，不了解情况，你要协助潘复生多抓些工

作嘛。潘复生是支持学生的，你要支持潘复生。对文化大革命你不要不理解嘛，现在理解了就好嘛。”听了总理这番话，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眼睛也湿润了。总理那么大年纪，在“文革”中为党为人民日夜操劳，比以前消瘦多了。可是他还是那样地惦记着大家，关怀、体贴、保护下边的干部，我还有什么理由不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呢！我表示：请总理放心，回省后，我一定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运动，多抓些生产工作。总理点头说：“这就好嘛。”会议期间总理还找我谈过一次，一再让我正确对待，回去好好抓工作。回省后，11月14日至12月6日，省委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到会近300人。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因潘复生有病，我代替他作了《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我和于杰、张林池还分别就个人在“文革”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作了检讨。

自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决心不辜负总理的殷切教诲和爱护，一定要挺起腰来。一面参加运动，一面抓全省的生产建设。实际上这段时间潘复生一直住院治病，我是一边挨批斗，一边站在第一线工作的。据我的记忆：11月中旬，哈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在哈工大开“揭发批判杨易辰大会”，我在会上作了检查；下旬，我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部署了全省工交企业和农村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工作。12月上旬，省委机关职工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和李力安到会，作了检查；同时，我狠抓了“十二·五”在工人文化宫门前

拦路劫车、阻断交通、包围工厂、殴打群众、破坏生产的严重政治事件，坚决贯彻省委《重要通告》（通告规定不准任何厂矿、学校、机关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抓人拷打），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12月中旬，我一面参加哈尔滨市东方红公社开的“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一面我又主持召开全省地、市、县电话会议，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陈剑飞、王操犁分别就工厂、农村工作讲了意见，要求坚持8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利用业余时间闹革命。同时，还发布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给全省人民的一封信》，号召全省人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指向省委、市委、大专院校党委和其他县级以上党委，对基层干部不要进行批判；要坚决执行《重要通告》的各项规定，严厉打击别有用心的人；要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力争超额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

这里要提及的是，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一部分人借“文革”之机，打着“造反”旗号，闹福利、闹工资、闹待遇，刮起一股“经济主义”歪风，几乎天天成群结队到省委大楼，围攻我，逼着我签字批条子到银行提款，有时半夜冲到我家用去揪人。我被迫转入地下，东藏西躲，花园邨、颐园街1号、哈尔滨铁路局招待所……这蹲一夜，那躲一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困了和衣躺下睡一会，饿了就买点面包啃一啃。有的会议不能在机关开，有时在组织部招待所，有时甚至在哈尔滨车站贵宾室。参加会议的同志会后无处可去就用帽子把脸一盖睡到车站候车

室去。一位同志感慨地对我说：“过去没有做过‘白区’工作，现在在我们执政的天下倒干起地下工作来了。”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苦笑着打趣地说：“现在让你补上这一课不很好吗！”但是，我看准了这股歪风是错误的。12月20日，我主持常委会议决定，坚决顶住这股歪风。指令哈尔滨市委将随便批条子的第二商业局局长撤职（后来因情况有出入，未办）。我还召开了二三十个大工厂的负责干部和省直有关部、局负责人会议，接见了文革办和接待站的干部，做了全面部署。在讨论临时工、合同工转正问题上，我坚持不能将这些人变为长期工和固定工，到期的临时工、合同工应该允许辞退，坚决顶住泡着不走、没活干照拿工资的错误倾向。令人气愤的是，12月29日中央劳动部竟发来电报，支持给合同工、临时工转正。据说，这件事得到了江青的支持。我虽同意将电文转发下去，但一方面与中央有关方面联系，要求中央尽快表态；一方面安排下边先等一等。并以省委名义发了电报，明确表示“不好安排”，用以阻止劳动部电报的执行。1967年1月初，中央财政部分发来电报，说有关改变待遇、增加工资的问题都要等到运动后期解决。我立告省委财贸政治部向下边打招呼，用财政部的电报顶住劳动部的电报。又过了几天，国家银行来电，说中央就要发指示。我觉得事关重大，十万火急，没等中央指示来到，当即令财贸政治部和省银行马上印几万分通知发下去，终于把这股歪风刹住了。

三、被打成“黑帮”以后

1967年1月31日，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并发布《第一号通告》，宣称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归省革命委员会，停止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从那时起，我就靠边站了。既没结合，也没打倒，只是通知我停止工作，检查自己的问题。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我天天在省委机关楼上接受审查和批判。平时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运动中又被冲击得焦头烂额，现在能有时间静下来，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利用这段时间通读了“毛选”四卷，精读了第一卷。还读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时，也清理了前段群众揭发批判我的问题。从1966年9月到1967年2月，在揭发省委问题大字报管委会编的《大字报汇编》中，“揭发杨易辰材料”共有10本，250多个问题。有些大字报揭发的材料纯属编造，毫无事实根据，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在这段日子里，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份对大字报中一些不同认识的长篇申辩材料，交给了专案组负责人王传洞。

时过不久，张林池、于杰、陈剑飞、解云清、陈俊生他们都先后到革委会那边安排了工作，省委这边只剩下我和李力安了。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带着省革委会的条子，叫我跟他走，说是要批判我的“经济主义错误”，并让我准备

10天的粮票和饭费。随后把我和孙西岐（原副省长）带到省委当时统战部楼下一个小房间里，不准回家，就睡在地板上。当时我思绪万端：1966年底闹“经济主义”，一开始我就顶了，自己是领头反“经济主义”的，怎么这个错误又栽到我的头上？我觉得很不公平。现在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造成天下大乱，在那时要找公平也难。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认为顶多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是因为运动初期我很不理解，但那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九·七”事件那天晚上，为了不使潘复生被动，我挺身而出，向包围省委的工人讲话。但我绝没有挑动工人斗学生呀！而且我还积极组织力量，连夜劝阻工人上街，动员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呀！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那么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弯腰、挂牌子，隔离反省，不准回家，一连10来天，批判斗争八九次呢？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觉得过去自己一贯积极工作，有时病得比较严重，医生叫休息，我还且上班坚持工作，这么多年来，自己只是重视过人民福利。

拥护“文化大革命”，如何支持学生闹革命。他说原来的省委有错误，批评我们这些人“三个正确对待”解决得不好，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群众运动有抵触情绪，让我们要深刻检查错误，跟他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和造反派携起手来干革命。这次谈话使人内心很不服气。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我不想和潘复生辩驳，我当即说：“要说有情绪，是我有情绪，我不理解。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已经作了检查，为什么至今不安排我的工作，还揪住不放呢？那就审查吧！两年不行就5年，5年不行，那我就甘愿当20年黑帮！但是我不认为我是黑帮！”临走时，我也没有和潘复生握手，拂袖而走出门外，回到家里。我对肖塞说：“潘复生公开站出来支持军工造反团，说黑龙江省委是黑的。省委都是黑的，就他潘复生是红的？都跟他走，往哪走？谁知道他跟造反派搞什么名堂！”这次谈话之后，潘复生说：“杨易辰这个人死不改悔！”紧接着他两次找原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负责人，指令要将我揪出来打倒。随后很快在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杨易辰”的大字报和“大字块”。原省委机关造反团怕说保我，就与省直财贸系统造反团串连，在7月份召开了一次批斗大会，宣布打倒我。7月29日把我送进省委总团“鬼队”看押反省。

从8月5日开始，对我进行轮番批斗。大会批斗17次，小会批斗就不计其数了。挂牌子、戴高帽、大哈腰、“喷气式”，甚至拳脚相加，骂声不绝于耳，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点也不过分。有一天把我用汽车拉到兰西去批斗。回哈尔滨的路上，恰好有一群牛在路中间站着，任凭汽车

怎样鸣叫喇叭，老牛就是不肯让路。我想起刚开完的批斗会，倒觉得好笑。我对跟车押送我的人说：“你看，这才真正叫顶牛呢！”说得他也无可奈何。

说到“顶牛”，专案组和看管我的人常说我总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好“顶牛”。其实，我认为对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尊重事实，服从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只顾眼前，信口承认。批斗我的问题不符合事实和真理，即使有时逼着我弯腰，不许我讲话，我在心里也要和他们进行无声的辩驳！我曾公开说过毛主席和刘少奇“两个主席都伟大”的话，这在“文革”中是“罪该万死”的问题。可当时我说的是心里话呀。我认为刘少奇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意推荐，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是我党的第二号人物，怎么能说打倒就打倒？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制哪里去了？即使再吃苦头，我也不能改口说违心的话。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既不能说违心话、说假话，也不能上推下卸，要敢于承担责任，否则是愧对党性和良心的。有一次，批判我征“过头粮”，说我不把黑龙江3000万人民当人看，要把大家都饿死。王玉说，他是粮食厅长，是他的责任。我站出来说：“这和你没关系，是我定的。”“我是收多了一些，但没有超过中央要求。国家缺粮食，非常困难，有多少人眼看就要饿死嘛。我们要看全局，不能眼睛只盯着黑龙江。多收一点粮食，全国解决了问题，使缺粮食的地区不饿死人，我们的日子也过得去，难道这样做不对吗？”还有一次，批判我反对引用毛主席语录。我辩驳说：“我在报告、讲话中确实引证毛主

席语录少一些。党一向教导我们的是要善于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并没有教我们死记硬背条文。毛主席著作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书中也没有引用多少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徐寅生关于打乒乓球的一篇文章里，有很高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也没引用多少毛主席的话呀！”有一次逼着我揭发“欧阳钦搞叛国集团”，我明确表示：“1956年还是中苏友好、牢不可破的年代，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到我们省委学习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作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能不接待吗？根本谈不上什么里通外国，更没有叛国集团。”运动中，不少大字报揭发我在拜泉社教时搞划资本家试点，把100多个原定的资本家划剩20几个，这是“为资本家翻案”。1968年7月初，专案组在省委一楼接待室对我进行提审。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对划成分问题的看法我至今没有本质变化。我记得当时规定2000元以上算资本家，以下的算独立劳动者。批判我有60%划错了，这不是事实。我认为把劳动者和资本家混在一起是不对的。有些铺子，本来是劳动人民，一下子给划到资本家那里去了。这不仅涉及他本人，而且包括他的子女问题。一个小县城哪里有100多个资本家？把劳动人民和资本家混在一起，我至今反对。至于划错的，我要负责，有多大责任我负多大责任。关于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问题，我说过，政治挂帅得挂到业务上，火车头得挂在车皮上。政治得有个落脚点，否则就是空头政治。

至于批判时给我戴的几顶大帽子：“假党员”、“国民党

少校”、“高饶反党集团余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对这一大堆罪名我不屑一顾。因为我心里明白，这是没有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是真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也不是“高饶余孽”，把我打成“黑帮”，我也泰然处之。历史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硬往身上抹黑是抹不上的。我只要能直着腰板走路就行了，其它在所不计！

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消息，重申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还指出，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接着10月21日，《人民日报》以《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重大任务是，让大批革命干部，包括一些犯了错误不再坚持而又认真改正的革命干部，参加到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大胆地使用他们。”据我后来所知，10月下旬，省革委会专案组6号组（即调查我的专案组）在学习讨论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时，认为从我的现实问题看，工作中出了一些“坏点子”，也出了一些好点子，敢抓工作，有干劲，生活俭朴，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应该先解放出来，一边抓工作，一边接受群众批判。省委机关造反团召开两次原省委机关的有关部委副秘书长以上干部揭发我的问题大会，没有揭出什么新问题。专案组在原财委、财政厅、银行、粮食厅、商业厅开了5个座谈会，不仅没有揭发问题，反而还认为我

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打倒，应尽快解放出来抓工作。专案组到北京了解我的问题，李先念说，杨易辰这个人有些地方主义，但几年来还抓了不少工作。姚依林说，从全国来看，黑龙江的财贸工作还是比较突出政治的。外市、县也不断有人打电话询问。要求解放、使用的呼声越来越高。那时，我在“黑帮队”也感到批判的次数明显减少，看管也渐渐松动。

但是，潘复生在1968年三四月份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他还发明：“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并指令省革委会文革组8个人调查我的“翻案”问题。4月29日，在他主持的第34次省革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决定：要彻底揭发杨易辰的“三反罪行”和“历史罪恶”老底，打退“右倾翻案风”，查清为其翻案活动的集团情况，揪出“黑手”。

1968年的5月，对于我是个黑色的5月。省革委的专案组长王传洞被打成“翻案急先锋”，带上手铐，投入监狱，对王传洞家也进行了搜查。直到现在，每当我回忆起王传洞维护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都表示敬佩！我的老伴肖塞被打成“翻案集团总指挥”，也被隔离反省，交待问题。原省外贸局长张锦伦、原商业厅副厅长宋月涛等10多人被打成“翻案黑干将”。此外，还牵连我的司机、秘书、保姆等共80多人。张锦伦在反翻案风揪斗中被逼含冤自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残酷的岁月啊！大约是8月份的一天，开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批斗“翻案集团”大会。肖塞和王传洞

等也被押来陪斗。一进会场，又是录音，又是摄像，电台、电视台全来了。我明白这又是事先排练好的一场丑恶的闹剧表演。举拳头，喊口号，发言者的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既不准辩解，也不准直腰，只能在台上当“靶子”。但是，我相信闹剧总有一天是要收场的，真理和正义是会得到伸张的。在批斗我“右倾翻案”这段时间里，我利用5个多月的“反省”时间，写了《我的历史》，从“九·一八”事变，到投身“一二·九”运动；从参加移动剧团，到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从八年抗战转战冀南、鲁西北，到挺进东北四战四平，一直写到在辽北、辽西工作，长达3万多字。我要用自己从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历史事实来证明我的清白无辜，证明我是一直跟着党干革命的。

1969年夏，天气炎热。原省委机关学习班的人都到松花江去游泳。我和学习班的一位同志说：“请你和造反团说说，我们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江里去游泳。”那位同志回来告诉不同意去。我说：“你们去游泳，我们黑帮不能去，这是爱护我们吗？是怕我们把松花江的水染黑吧！”由松花江水，我想到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家里，我曾和肖塞说过，现在林彪、江青这帮人被举得那么高，我不相信永远会这样。现在有意见谁也不敢提，总有一天，会有人说话的，他们兔子尾巴长不了。而且我认为，一切整人、陷害人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真正赤胆忠心为人民、为党的事业献身的人，才会像川流不息的江河那样万古长存。

四、柳河“劳改”

1969年3月，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入侵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从那以后，战备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进入10月，到处在挖防空洞、防空壕和地道，防空演习的警报声此起彼伏，民兵们都荷枪实弹，连秋林公司的楼顶都筑起了工事，架上了高射机枪。大工厂在往山沟里搬迁，城市居民被强行向中、小城镇和农村疏散。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这些被关在反省室里的“黑帮”们，虽然不准随便出去，但那紧张的备战局势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后来才听说，这是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紧急指示”（即所谓第一号命令）搞的鬼。

10月末，突然通知我们抓紧准备行李、衣物，“14队”（从1967年开始，被打倒的原省委书记、部长们中的所谓“三反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土匪”等“黑帮”，都被关押在省委机关大楼财贸政治部114号办公室里，由此而得名“14队”）要从哈尔滨市转移出去。11月初的一天，刚吃过早饭，便让我们捆行李，收拾东西。院内停着三四辆敞篷军用大卡车。被押上车的有我和王一伦、李剑白、谭云鹤、李瑞、王操犁、陈冰岩、骆子程、汪洋等，足有二三十人。

汽车穿过哈尔滨市，越过松花江大铁桥，便向北方

驶去。天灰蒙蒙的，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迎面扑来的西北风，很快打透了身上的棉衣，刮得面颊和耳朵火辣辣的疼。车过呼兰、兰西、绥化，约摸走了6个多小时，便开进庆安县境内，驶进了乡间土路。路面坎坷不平，汽车忽快忽慢，左摇右晃，尘土飞扬，浑身上下除了眼睛和牙齿，都是土色。随着车上的颠簸，我的脑子里翻腾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人急急忙忙地从城市往山沟里赶呢？噢，原来我们是被清理出来、被打倒的“囚犯”，他们是担心“老毛子”从北边打过来，怕我们这些人不保险，投降“老毛子”当“二鬼子”，当“维持会”呀！这时，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30年前抗日烽火年代。那时，我在冀南根据地打游击，日本鬼子岗楼林立，沟道纵横，我们冒着枪林弹雨反扫荡，出生入死和鬼子作战，解除日伪武装，打击汉奸、维持会。没想到建国20年后的今天，人家却担心我们当“维持会”了！我不由得在内心里发出了无可奈何的苦涩的笑。

车到离哈尔滨500多里的柳河停住了。此地原来是省委机关附属农场，也是省委战备基地，地处小兴安岭余脉的浅山丘陵地带。自1968年开始，名噪一时的柳河“五七干校”就办在这里，大部分省委、省人委的干部在这里下放劳动。但我们这些人和光荣的“五七战士”不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牛鬼蛇神”，因此被安置在校区最北边一个旧马棚旁的破土房里。大约有三四十平方米，几铺对面土炕上铺着发黄的炕席。因年久失修，烧炕时满屋是烟，呛得喘不过气来。这里不通电，只有如豆的

油灯照明。晚上躺在炕上，身下挺热乎，可屋子四处透风，墙上结着白花花的冰霜，寒气逼人，只得蒙着脑袋睡觉。

我们这些“囚犯”安顿下来之后，被编成拉车、伐木、割草、炊事等几个“劳改”小组。早晨5点钟，天还黑洞洞的，就得起床。晚上8点多钟熄灯。白天上下午两班，要步行到离驻地三四里路以外的东山坡的山林、野地里去伐木、割草。从此，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涯。

由于1969年黑龙江农业遭到早霜，受灾严重，早饭吃的是巴掌大的两个连“苞米胡子”磨在内的玉米面饼子，午饭和晚饭是黑面馒头。早晚吃带冰碴儿的咸菜，中午喝土豆白菜汤。好在每月还发给30元钱的生活费，吃不饱就偷着到校部五七商店去买点饼干充饥。如果管教人员知道谁偷买饼干，就会批判，说你“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文化生活”是一名“囚犯”自带的小半导体，晚上被允许放在煤油灯下的木桌上，听听新闻和那几出“样板戏”。此外，禁止我们阅读一切报刊，原因说是我们这帮人已“定性”属于敌我矛盾，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想：劳动本来是神圣的字眼，劳动创造一切嘛。1939年我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由于我劳动积极认真，还受过奖励，得过手巾之类的奖品。我在冀南打游击时，很少在一个地方睡个整觉，经常一夜数次转移，无论冬夏，常在野外露宿。后来挖了地洞，才睡得安稳些。1941年冀南大灾，蝗虫遮天蔽日，我们和根据地的老百姓一边对敌人作战，一

边生产自救，吃的是棉籽窝头和糠皮窝头，有时还炒蝗虫吃。那棉籽窝头有棉短绒绒，嚼在嘴里打转转，很难下咽。但那时，我一点也不觉得苦，反而觉得为抗日、为人民的解放、为祖国美好的未来就应该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吃点苦、受点累是光荣的、革命的。而今天，我们赶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本来一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更应该受到尊重。可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非常时期，劳动这个神圣的字眼，也被扭曲、亵渎了。硬是把劳动当成惩罚人、迫害人的手段。

当时，我们的主要劳动任务是在东山坡干校新砖厂的旁边盖房子。因是冬季，天寒地冻，不能破土动工，就先上山伐木、打草备料。

12月的柳河，早晨霜凝山野，寒风刮面。我们身穿破旧的棉衣，足登棉胶皮靴或大头鞋，腰间扎着麻绳，带上斧子、刀锯和镰刀，扛着撬杠，徒步进山。我们两人或是三个人分成一个小组，由懂点伐木知识的人先进林选树，留出间隔，实行间苗式砍伐。树定准后，按分工，掌锯的蹲下来拉锯。锯到树快断时，便高喊：“闪开！”“顺山倒！”大家朝树倒相反的方向散开，被伐的大树吱吱呀呀地倒下了。我们这些年岁大和身体弱的，便围上去动手砍掉大树的枝丫，截掉树头。在山上伐的有榆树、柞树、杨树、桦树，粗细不等，有的准备做梁柱，有的做檩子，有的做门窗和炕沿。一上午伐的数量够了，就分头将木头归楞。我和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骆子程编在一个小组。小一点

的每人扛一根，中等的树，我俩抬，大一点的3人抬。因为我块头大，有力气，常常是我抬大头。下山时，肩上扛着沉甸甸冰凉潮湿的大原木，穿过树林，雪很深，又有许多树茬、野藤、榛棵绊腿、扎脚。为了统一步伐，大家齐声喊着号子，打气鼓劲。从山上抬到盖房子的地点，有好几里地，虽是数九隆冬，也累得浑身是汗。途中临时歇气，坐在雪地上，山风一吹，冷飕飕的透心凉，很不好受。但是，仰头望望那无际的蓝天，低头看看那林间皑皑的白雪，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拍拍那躺在身边用自己双手刚伐下来的粗大原木树干，虽身在逆境之中，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产生一种欣慰亢奋之感。比起那大楼里的“14队”禁闭室，整天无尽无休的反省交待、提审批斗好得多了。这林海雪原使我的心胸也明朗多了，不知不觉地哼起了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段唱词。伐木开始时，手脚常被树枝刮破出血，有时崴脚，可谁也不吱声。为了锻炼意志嘛，吃尽苦也要有志气。后来越干越熟练了，“操作规程”不练自成，一个上午伐上10几棵树也不成问题了。

转年春天，三四月的天气，乍暖还寒，可是盖房子的工程已经开始了。谭云鹤心灵手巧，可以干些上窗户、做门框的木工活。我和李剑白、李瑞、骆子程等只能干力气活。大风天筛沙子，一扬一身灰，累得满身大汗。特别是和大泥，脱大坯，对我们这些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来说很不适应。一套程序，挑土，做穴，打麻刀；倒水，踩，或用锄头、二齿子在水、泥、麻刀里搅和，要搅和到足够的

均匀为止。要达到这个程度，须付出艰辛的劳动。柳河是山区气候，4月天气，水还结冰碴，天冷手僵，可和上一阵就是一身汗。有一次看管我们的人故意刁难李剑白，命他脱下鞋子和袜子，光脚站到泥水里用脚踩。这不明明是肆意搞变相体罚嘛！当时李剑白坚毅不屈，二话没说，脱下鞋袜跳到泥里，踩起大泥，神情泰然。这一幕情景，我至今犹历历眼前。蹲在地上脱土坯，先把地面扫干净，再放好木框模子、填进和好的泥，再用手掌压实、磨平、磨光，两手把模子稳稳拿起，一块土坯便脱了出来。这活过去从未干过，而今经过摸索，逐渐学会了，坯脱出来了，心里也很高兴，感到又学会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农家活。可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两腿蹲得时间一长，又酸又痛，晚间上炕腿都抬不起来。

经过一番艰辛的“创业”，在东山坡上盖起了一座面积有120平方米的4间平房。大玻璃窗，里面有4铺土炕，炕上铺上新炕席。省委来的“黑帮”都住到这里。坐在炕上，睡在席上，心里涌现一股“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的欣喜之情。可谓“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乐”吧。由于这座土房盖在地势较高的东山向阳坡上，又修了土梯磴，旁边用杨木杆钉上了栏杆和扶手，大家都把它称做“钓鱼台”。柳河的农工、“五七战士”和“知青小将”却把它叫“书记楼”。那时，我不由得记起鲁迅曾写过一首题为《自嘲》的七言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那时也

和鲁迅当年一样交了华盖运，只好身居“小楼”，不管“春秋”了。天长日久，我对那经过自己双手、洒满汗水建造起来的“书记楼”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至今仍在怀念着它。

在山上安居之后，我被分工从山下往山上挑水和拉车。对长期在领导机关工作的人来说，这是重体力劳动，基本上由我和骆子程两人包干。一挑水四五十斤重，从山坡下一二里地之外挑来，一步一步走上二三十度的斜坡，一担水，一趟爬坡，一身汗。我常对骆子程说：“老骆呀，他妈的一裤兜子汗哪！”每天坡上坡下七八趟，供几十人饮水、做饭、洗衣服，但我们保证水缸天天总是满满的。可肩膀头由起初的红肿直到压成一层厚厚的老茧，走起路来，脚腿腰板也觉得硬实了。往返运输东西用的板车本是用牲口拉的，可那时偏要用人来拉，“劳动改造”嘛！“黑帮队”下山劳动或是到校部运东西派车，中间驾辕这个最吃力、最关键的差事就由我这个大块头“壮丁”来干了。体质较弱的王一伦、谭云鹤、李剑白等人或是在两边拉前套，或是在后边帮着推。驾着几百斤重的板车，一趟就是四五里路。夏天烈日炎炎，浑身浸透了汗水，累得背痛腰酸腿软，可是我从不吱声，也从没有后退过。我总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敌人面前铁骨铮铮，面对劳动惩罚，也要毫不示弱。为了磨练意志，蔑视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就是吃尽千辛万苦，也决不折腰。

按照看守的规矩，我们这些人平时只许干活，无事不准互相说话，怕订“攻守同盟”。更不准单独下山买日用品或喝酒。有一天傍晚，趁看守不注意，我支持骆子程溜下

山，到校部五七商店去买酒。因为他的大女儿作为“可教育好子女”也在柳河劳动，恰好在商店当店员。看在父女的份上，总是能买到的。老骆把药瓶子洗干净，用来装酒。如被看管人员看见，就说是止咳药水，其实患的是“胃亏酒”。买回放在隐避的地方，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炕上脑袋朝着同一个方向，摸黑把酒瓶拿到手，每人轮着喝上一口。我还把肖塞偷着捎来的花生米分给大家。躺在炕上嘴里小声哼着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的一段唱词：“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到了八九月份，我们到山上采蘑菇、猴头，偷着弄两个罐头回来就着吃。

当时，虽然劳动是紧张繁重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但我们这些人的思维却是十分活跃的。我常想，有战争时期的生与死的考验，有和平时期的各种困难和斗争的考验，“文革”把我们“打倒”、“强迫劳动”，失去了一切自由，这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考验啊！人在困难的时候就是要挺起来，要用时间和实践来说明一切嘛！难道他们说我是“假党员”、“高饶余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就是吗！我总相信一条道理：是的跑不了，不是的也安不上。宁肯再蹲上20年“黑帮劳改队”，也要分清是非曲直啊！你们可以一时剥夺我的权利与自由，但你们决不能永远“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坚信到头来，党还是要给我们平反的。虽然当时并不清楚什么时候能结束这场苦难，但我决不相信林彪、江青之流和一切倒行逆施的人会有好下场！

在柳河，除了劳动，也不断地写“反省交待材料”，写

“证言材料”。“五七战士”和农工、“知青小将”对我们这些“黑帮”也搞过批斗，但我仍然坚持一条原则：实事求是。

1970年9月，中央“庐山会议”，林彪阴谋捣鬼，事情败露。1971年刚过完春节，就开展了“批陈整风”。接着从3月开始，省里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揭发批判潘复生在“文革”中所犯错误。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5月15日，突然省里派吉普车来接我，来的军人说：“请您带着行李回哈尔滨，首长要找您谈话。”我们这些难友虽然过去都是老熟人，可是在柳河相处一年多，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要分开，真有点难舍难离。临走时，大家都出来相送，我向“难友”们挥手道别。

汽车飞速地向哈尔滨方向驶去。从此，我结束了在柳河的“劳改”生活。

五、不为“乌纱帽”屈节

从柳河回到哈尔滨，就让我参加中共黑龙江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的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这个会3月份就开始了，为了解决潘复生的问题，沈阳军区陈锡联、毛远新、江拥辉等都到了会。并告诉我，有什么意见在会上都可以讲。

对潘复生我是有意见的。“文革”初起时，我们大家都不理解，可潘复生在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以

后，对毛主席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事只字不提，使我们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后来我们还是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关于开展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通知（即“八·一六通知”），明明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的，这个问题在群众中可以讨论，也可以不讨论，潘复生个人却在北方大厦广场向军工造反团宣布这个通知是错误的，带上了红袖标，把几个书记一下子推上了审判台。党中央、周总理亲自指示我们省要组织临时省委，潘复生却说：“中央的决定有问题，如果成立新省委，客观上表明造反团不要揪斗了。”……这样做无非是想把省委推到运动的对立面，统统打倒嘛！后来，我还听说，1971年5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黑龙江问题时，周总理当场批评了潘复生。总理气愤地质问说：“1967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我和先念同志就找杨易辰谈过话，要他支持你。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不大理解，但我们谈了以后，他就按中央指示办。回去以后，是杨易辰在第一线主持省委工作，你就到医院去了，大部分时间在休息。可是建立革委会时，你就一脚把他踢开，甩到一边去了，这样干，干部能服吗？你这个人就喜欢听小话，小话最容易传错的。杨易辰这个人比较爽快，有什么想法公开讲出来，不背后搞鬼，争论起问题来，在我面前也敢吵，但是中央定了以后，他是坚决照办的。这种干部你不喜欢，你就是喜欢说你好话的人。”

会议期间，省革委会政治部专案组的同志跟我谈了审查情况。关于历史问题已搞清：我确于1936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中国大学的学生运动期间没有被捕

过；1937年在“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工作期间，没有参加国民党的CC组织；“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去延安是我党武汉长江局批准并介绍的，并非特务所派；1937年到1938年在“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工作期间，正值国共合作，确曾为工作需要和剧团成员一起接受了国民党当局口头授给的少校军衔，到延安后就向组织作了交代，未有其他问题；1946年5月在辽西二地委时，从双山镇去郑家屯到省委开会途中遭到敌人伏击中未发生问题；在1947年至1948年辽西土改时，对家庭被斗、被分没有包庇行为。经调查证明，在辽西和郭峰的关系没有问题。至于郭峰同志，中央已有明确结论。1980年2月20日黑龙江省委作出决议，建议中央撤销1954年6月30日原中共辽西省委扩大会议对我所作的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9月17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复：经中央批准，同意撤销1954年6月30日《关于杨易辰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党组织对我的历史和为人还是了解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是的跑不了，不是的安不上。

关于我在工作中的错误问题，专案组的人向我透露的意思是：只要肯于承认犯“走资派错误”，就可以获得“解放”，还可以参加领导班子工作。我觉得这可是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我既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谈犯“走资派错误”？至于我在过去的工作中犯有错误，我可以承认，怎么检查都行。做为共产党员，不论在历史问题，还是在工作错误面前，都应该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绝不

能含糊。我一边参加会议，一边写材料，6月13日写出了《我的检查》。7月上旬一个晚间，我正在北方大厦开会，一位军人来找我说：“首长请您去谈话。”我走进房间，见刘光涛、傅奎清和于杰都在那里。刘光涛说：“易辰同志，按照中央领导的意见，打算请你出来工作。”他又接着说：“在运动中专案审查小组对你的政治历史和所犯错误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全面地看，历史是清楚的。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直是积极的，有革命干劲，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对党对人民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黑龙江工作的10几年当中，所犯的错误也是很严重的。在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批判教育，你还能够认识错误，有悔改表现。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讨论，你定为犯走资派错误。只要你在审查结论上签了字，我一个，奎清一个，你一个，还有于杰，组成领导小组。新省委成立，考虑你进常委，做书记。”既然是组织找我谈话，就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坦率地说：“在过去工作中，我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然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运动中批斗了我好几年，我没有承认是‘走资派’，不是‘走资派’，怎么能说犯‘走资派错误’呢？”刘光涛见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便调转话头说：“易辰同志，你别上火，那就给你一段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我回到家，和我的老伴肖塞商量，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在下次刘光涛、傅奎清找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第一，我不是走资派，因此谈不上犯走资派错误的问题。第二，既然中央领导同志点了我的名，让我出来工作，我听中央的。第三，进不进领导班子，请你们研究，请中

央决定。对于审查结论签不签字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在审查结论上签字。”

7月12日下午，安排我在生产指挥部及直属各局的群众大会上作自我检查。我本着毛主席讲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道理，进行了认真准备，会上说了心里话，作了自我批评，并挖了根源，总结了经验教训。据生产指挥部整风领导小组的同志告诉我，大家对我的检查总的反映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检查的比较实在，态度也比较诚恳，说了心里话，触及了灵魂，没有因为潘复生打击、迫害而推托错误，对自己的问题敢亮、敢斗、敢暴露活思想，有改正错误的决心。许多单位要求尽快落实政策，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来抓工作。通过这次检查和评论，使我很受感动，很受教育，进一步认识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的心是公道的。

8月6日，经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我为省革委会常委。8月16日至1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我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汪家道代表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了工作报告，陈锡联参加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会上，选举了由87名委员、2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三届委员会。在“文革”中被砸烂了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经过5年之后，重新组建起来，恢复了工作。我被选为省委委员。

会议之后，没有马上安排我的工作。过了一些日子，忽然有一天刘光涛、傅奎清又找我谈话。刘光涛对我说：“易辰同志，你前一段的表现不太好。你要正确对待自己，不

要把自己估计过高，对过去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要有足够的认识。要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他看了看我又接着说：“对表现不好的同志，不能按原来的计划办。经过研究，准备让你到基层去蹲点，搞一段调查研究工作。”我说：“我做领导工作的时间很长了，现在让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下基层蹲点也很好嘛，没意见。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无论到任何时候，对什么问题都得实事求是。”开始我打算到财贸系统去蹲点，因为那里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后来决定让我到工业去，到汽轮机厂蹲点。过去没到过工厂，原想多找几个人一块去。可是，说是工作组，实际上只有我和毛颖两个人，因为毛颖当时在省机械局工作。于是我也不再提了。我心里想，签了字就是省的三把手，不签字就下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下子说不清楚，那就下去吧。

时值隆冬，滴水成冰。大街的路面被车轮碾压得像溜冰场一样光滑，早晚上下班要挤公共汽车。“文革”前有专车接送，如今上汽轮机厂该怎么走法，到哪里去乘车也不知道。开头几天都是肖塞送我到公共车站，时间长了，我就自己上班了。有一次没过马路我就坐上车了，到终点一看，不是汽轮机厂，我顿时不知所措。“老师傅，你把车坐反了吧？再重新坐回去吧！”一位年轻的女乘务员觉得我很好笑。这时，有一位司乘人员问我：“你是省里的杨书记吧？”我不禁有些愕然。“你怎么认识我呀？”那位工人师傅笑着说：“‘文革’批斗时，我在大街上见过你！”于是围上许多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关心地把我送上了回程车。

我每天都带着饭盒上班。由于经常乘这趟公共汽车，便

在车上结识了两位汽轮机厂的工人朋友，一位姓梅的小师傅和一位老王师傅。他们两个人天天在公共车上和我作伴，看我年纪大，还给我让坐。下班时在厂门前等着我一块走。上车人多拥挤，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帮着我挤车，时间长了，就成了老朋友。假日我和肖塞请他们到家里做客，过年时请他们到家吃年夜饭。我们房子坏了，他们俩主动来帮着修理，小梅还特意打了一把切菜刀送给我们留着作纪念。至今我还在想念着他们。

作为个人来说，我这次到汽轮机厂蹲点补了三课：一是“文革”5年来没有工作了，这次蹲点补上了工作课；二是过去高高在上，深入基层也是走马观花，这回无牵无挂，在工厂实实在在地蹲下来，真正到群众中，了解基层工作情况，应该说是参加革命以后最深入的一次，补上了深入基层课；三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工人接触，互相师傅相称，彼此无拘无束，补上了接触群众课。前两个月，我在车间扫扫地，干些零活，接着又学了切工、刀工。刚去时，一些人不敢和我说话，厂领导也很少谈话。时间一长，大家熟悉了，都管我叫杨师傅，工余休息时间，主动地和我拉家常，反映厂里的问题，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慢慢地我也了解了这个厂的一些真实情况。

哈尔滨汽轮机厂，是我国生产汽轮机的重点工厂，是国家“一五”期间156项工程之一。1958年10月建成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汽轮机110万千瓦。共有职工8300多人。“文革”中1967年6月成立了厂革委会，由于潘复生直接插手搞派性掌权，把汽轮机厂搞成全国出名的“老大难”单

位。先后派过3次军宣队进厂。1970年在一机部召开的41厂会议上，周总理严肃地点名批评了汽轮机厂，指出“问题在下边，根子在潘复生那里”。一机部部长李水清还专程来我们省解决汽轮机厂的问题。1970年11月，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来汽轮机厂检查工作，十分痛心和气愤地说：“船体都造好了，就等主机，而你们的机床都吃了安眠药，在那里睡大觉，这怎么得了！”12月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中央领导又严厉批评汽轮机厂影响了上天，影响了下水，影响了战备和外贸任务，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拖了国家的后腿。“文革”中厂和车间两级就揪斗了540多人，班组触动了200多人，全厂清队中非正常死亡9人，1人逃跑，至今下落不明。在整党过程中，全厂17个单位，整党领导小组成员64名，其中非党造反派27名，占42.1%。仅49%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把党员搞得灰溜溜的。基层班子分裂，常年打派性仗。迟到早退无人过问，有些人签个到就回家，有些人在班上打扑克、做私活。最严重时，只有2000来人上班，机床停了将近一半。近几年全厂积压、损失浪费物资的价值达1200多万元。生产指挥系统失灵，生产事故不断发生，全厂基层班子的群众代表占基层班子总人数的77.5%，群众代表中一二级工和徒工占73.4%。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下放到农村去插队，不懂生产的人抓生产，懂生产的不让抓生产。周总理听到这个情况，曾气愤地说：“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把工厂的人拿到农村去，这样做是不对的！”加之安全无人管，质量不检查，造成大量的生产事故。仅加工“947”产品一个部件

少车了一刀，就损失 14.5 万元。厂革委会成立后，年年完不成国家计划。从 1967 年到 1970 年国家给的主要军工产品任务，只完成 16.5%，下海的产品只完成 14%，逼得国家不得不进口 200 万千瓦汽轮机。工人愤慨地说：“我们是汽轮机工人，让国家进口汽轮机，我们感到痛心、耻辱！”从 1971 年批判潘复生，抓了落实政策工作以后，厂里的形势有所好转，是抬头的趋势，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厂里是干好干坏一个样，来早来晚一个样，技术高低一个样。长期没有党的活动，没有核心队伍，只靠几个老干部孤军作战。有的干部说，过去是一呼百应，现在是百呼不应。不少积极分子说，现在是没靠头、没奔头、没干头。

经过两个多月的了解，我认为这个厂存在的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的关键，是没有抓住厂内的主要矛盾。我觉得当务之急，是从整党整风入手，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抓厂和车间两级领导班子建设，抓整个厂子的领导体制建设。工厂是搞生产的单位，不是部队，搞“营、连、排”，“司、政、后”是不行的。厂里的领导同志有时也找我商量些工作。开会也让我去参加，会议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同志还说：“杨师傅，请你发言。”因为我是作为革命对象到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没有工作任务，所以在厂子里一听二看，不想说三道四，很少说话。现在既然知道了一些情况，又有些想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应该对事业负责任的，应该帮助厂子做点事情。因此，征得厂领导的同意，我便深入到二车间去帮着抓整党整团，同时结合解决车间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把车间的核心队伍建立起来，车

间领导拧成一股绳，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纪律，使车间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然后，用他们的经验推动全厂的工作。同时，我也和厂领导交换了一些意见，酝酿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下设科室，适应领导生产、管理生产的需要；还将下放农村插队的工程技术人员尽快调回工厂，以应人才短缺的急需。另外，还提出解决活工资问题，以便调动全厂职工的积极性。

我正在厂里忙着工作，1972年刚过了五一节，便通知我到省委去开会。5月4日我到常委会议室，见刘光涛、傅奎清、张林池、苏民、张多树、关舟都在坐，原来是在开常委会。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以为他们是要听我到工厂接受再教育的汇报。刘光涛说：“老杨到汽轮机厂蹲点已经半年了，谈谈经验、体会，对省委工作有什么反映、意见。听说你下去联系群众，主动帮助厂里工作，自己打饭打水，给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接着他又说：“现在，生产指挥部的工作很吃力，经过我们几个书记研究，请示陈司令员同意，想请你回来把生产指挥部的常务工作管起来。”我当时觉得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厂子里的工作刚抓出点头绪来，怎能撂下不管呢？于是我在会上表示：“这次来开会，自己没有思想准备，以为是研究厂子问题。现在对这个厂心里有点底，又正是厂子整党整风需要人的时候，还是继续帮助他们把工作抓下去，‘七一’后再回来，善始善终为好。”会上决定，生产指挥部的任务比较重，急需抓工作，让我在汽轮机厂再留半个月，就回来上班。

六、重新恢复工作

1972年5月8日，我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主管常务工作；同年11月15日任命我为生产指挥部党委书记、主任。据说，对我的任命“是经过长期的反复酝酿考虑，多方面征求意见，请示过陈锡联等，最后又到中组部业务组汇报，征求他们的意见”，才最后定下来的。同时我也听说，当时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对我不太满意。除了1971年7月那次谈话之外，还认为我至今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足，有许多路线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对形势的看法也有问题，骄傲情绪严重，马上进班子会影响省委内部团结。刘光涛在找我谈工作安排时说：“对你的安排使用是非常慎重的，几位书记酝酿3次，向汪家道同志汇报过两次。觉得安排你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抓生产工作，职务低些，实权大些，经过一段实践的考验锻炼再上来，这样更好一点。”那年，我已经58岁了。我需要的是工作，是为党多做些事情，至于职务高低，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由于1971年的经济建设盲目地追求“四五”计划纲要中规定的高指标，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大大超过预定的计划。到1972年，“三个突破”的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挖了国家的粮

食库存。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恶果。到1972年12月份，眼看来到年关，黑龙江的新年、春节市场出现了空前的供应不足，猪肉按新年半斤、春节1斤的标准供应，尚欠800万斤；鸡蛋月需1万多斤，收购只有6000多斤；奶粉月需63吨，只有37吨。煤炭短缺，日产平均仅5.1万吨，大风雪以来日产下降至3.5万吨，已有7个县告急，没有煤烧。煤炭库存仅有6万吨，而铁路运输车皮紧张，入不抵销；粮食库存下降，调入不好，只能维持20天销售。群众心里紧张，抢购存粮，大量迁出粮票，糕点、饼干、豆制品摆不住柜台，给市场造成很大冲击。粮食征购缓慢，出现“爬坡打误”状态。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解决办法。我在会上讲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当前市场的形势确实紧张，但要看到黑龙江市场的潜力很大，完全可以挖潜应急，关键是工作没有跟上去。猪肉问题，既要抓紧收购，又要保猪保畜。母猪不保，今后就要出大问题。粮食问题，中央分配给我省的征购任务是全局的需要，任务完成好坏，事关全国。农村过得去，城市也要过得去，黑龙江过得去，国家也要过得去。应摆正三者关系，顾全大局，厉行节约，分担困难。应该先开粮食局长会议，再开全省电话会议，做进一步动员，一定要完成征购任务。农村抓征购，城市要抓统销，整顿粮食市场；小麦收购抓紧一点，大米可以拿出些豆饼去换，还要发动群众节约一点粮食。煤炭问题，要好坏煤搭配供应，把大庆30万吨落地油利用起来，掺油烧煤。这些意见被省委采纳。我回到生产指挥部

迅速组织各方力量，很快落实下去，使冬季市场形势有了较大的变化。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看到了这个决定，看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检查，我感到很亲切，很受感动。小平同志的检查是诚恳认真的，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实实在在，不是躲躲闪闪、牵强附会。他站得很高，更多的是想党的问题。他40几年来，经过革命的风风雨雨，在党内担负重要工作，对党是有贡献的。小平同志是我的榜样，我一定要向他学习，相信群众，相信党，正确对待自己，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1973年4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我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3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着重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整顿粮食统销工作；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首位；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将“四五”计划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降低；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到1973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很快扭

转了局势。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注意落实政策，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还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他的这些决策，促使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精神为之大振。在邓小平领导下，有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同心协力配合，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在这抓调整、抓整顿的几年中，我所做的工作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我分管的工作范围内，“文革”前期受到批判的东西，只要是对的，我都坚持搞下去。运动中批判我最多的是不突出政治，搞“唯生产力论”。可我一直认为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上，坚持发展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所以恢复了我的工作之后，我仍按照这些观点办事，狠抓生产。

在我省国民经济发展中，有许多矛盾，其中影响全局的、带根本性的矛盾，是农业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是基础，农业上不去，其它各方面谁也上不去。所以，在黑龙江抓生产的发展，首先就是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落实国家提出的要加速把龙江建成一个高产稳产的

商品粮基地的战略要求,实现粮食总产量达到300亿斤、向国家上交50亿斤的奋斗目标。

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矛盾是单产不高,总产不稳,经营单一。要实现高产稳产,就必须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可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田基本建设则是农业的基础。在黑龙江真正下力量搞农田基本建设,应该说是从1973年开始的。从那以后,我反复强调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个思想。还逐步摸索形成了一套符合龙江农业生产规律的农田基本建设体系和套路。就是以“土、水”为中心,“土、水、肥、林”相结合,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方针。为了促进改土和治水相结合,根据我省的地理特点、自然条件和水系分布情况,提出大搞“三田”建设。即:在平川易旱地以灌溉为主建设方田;在低洼易涝地以排涝为主建设条田;在坡耕地以保土、保水、保肥为主建设梯田。要破除“土地肥沃没必要搞,地多人少没力量搞,天寒地冻没条件搞”的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依附自然的懒汉懦夫思想。要使全省的干部群众都知道,不搞农田基本建设,就摆脱不了“旱盼下雨,涝盼晴天,秋天盼个自老山,产量随着老天变”的被动局面。还总结出冻前搞“三田”,冻后搞改土,春秋两季搞造林,常年积肥干水利的规律,使我省的农田基本建设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从此打破历史上农村冬季“猫冬”的旧习惯,变“半年闲”为“半年忙”。

从1973年到1975年,几乎年年都有程度不同的旱、涝、风、雹、冻、虫等自然灾害,但在受灾甚至大灾之年,

粮食产量都在连年不断地增长。据我回忆，1973年粮豆总产为210.2亿斤，1974年为248.5亿斤，1975年为271.7亿斤。历史事实证明，农业要大上快上，必须在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上下苦功夫。这个功夫下得越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就越强，靠天吃饭、依附自然的落后状态改变的就越快，农业高产稳产就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贯彻好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龙江建成国家的商品粮基地，推动全省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不就是最大的政治嘛！

第二件事情是，在我分管的工作范围内，“文革”前期被取消的东西，只要是好的，我都坚持恢复过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有许多事记不得了，但有几件事我记忆犹新。

一件是恢复供销合作社。黑龙江省供销合作社，是1948年土改结束后，在党的领导下，农民为了恢复、发展生产，避免中间剥削，自己筹资创办起来的农村商业组织。20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全省的供销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在积极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大力组织和扶持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农副产品收购、组织工业品下乡、安排好农村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供销社在“文革”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一度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了供销社、食品收购站、银行营业所和粮站的所谓“四合一”；在基层供销社搞了支部书记、主任、会计“老三位”退位，贫下中农进驻，领导靠边站，人员大换班；从省到县砸烂了供销合作社的管理机构。1969年退掉了全部社员股金1300万元。1970年又与国营商业合并，使供销合作社丢掉

了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供销合作社支援农业生产的思想淡薄了，官商作风滋长了，同农民的关系疏远了，企业管理水平下降了。1971年全省基层供销合作社净亏144万元。1972年在我主持生产指挥部工作期间，把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重新分开。潘复生说“过去干啥还干啥是复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熟悉什么工作的不让他去干他那一行，那不都成了“白帽子”（外行）吗？那还要培养专业干部干什么？我们应该用干部之所长，干哪行的还应该干哪行。我借整顿之机，把“老三位”请回来归位，把全省的供销系统重新恢复并健全起来。

再一件是关于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黑龙江省的信用合作社，是在建国初期由农民群众入股集资创办起来的。它在组织调剂农村闲散资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抵制高利贷活动，发展生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文革”中信用合作社被砸烂撤销。我也同样借整顿之机，把全省农村的信用合作社统统恢复起来。在全国农村是恢复得最早的。

还有一件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在“文革”中把牧民们的自留畜和草原、苇子都归了大堆，把房前屋后的泡子都归了农场，这就把牧民致富的路给堵死了。牧民们反映，养一头奶牛的收入相当于一个科级干部，一致要求让“牛科长”回家。我听到这个情况之后，进行了反复调查，认为牧民们的意见有道理，应该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广开牧民致富之路。于是按政策重新划分了草原、苇地和泡子，并让“牛科长”真正回到牧民家，

从而调动了牧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关于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生产的问题，我记得在我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听说呼伦贝尔盟草原鼠害严重，我带着治鼠害的专家们即刻赶到那里。呼伦贝尔大草原平展展、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是世界上少有的草质最好的大草原呵！可是一种叫“大眼贼”的老鼠遍地皆是，它们专从底下嗑草根，把好端端的大草原咬得像生了秃疮似的，一片片的草原都没草了。如不马上根治，草原沙化，刮起黑风暴，整个草原将被破坏殆尽。这在国外是有教训的。于是我就召集当地的老牧民、“土博士”和省里来的专家一起开“诸葛亮会”，研究用氢化钠和油拌在一起做成毒饵。一面组织人排成大队，把玻璃瓶子装的毒药，往鼠洞口放；一面用飞机播撒。同时还拨治鼠害专款400万元，以应急需。经过几番努力，终将这场严重的鼠害消灭，保住了呼伦贝尔大草原。此后，每年拨1000万元给他们“吃小灶”、“吃偏饭”，帮助呼伦贝尔盟恢复生产，发展畜牧业。另一件是为了帮助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改变面貌，搞了乌双引水工程，把乌裕尔河、双阳河的水引到自治县来。有水皆活嘛。“小引嫩”灌溉了农田、苇塘、草原，救活了连环湖水产养殖场，发展了养鱼水面，使一向干旱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有了重要的输水源泉，大大促进了当地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十年动乱的岁月，风风雨雨，给我们的祖国、人民以及我个人造成的灾难和创伤至今历历在目。共产党员的天职，就是改造世界，造福人民，否则，要我们这些共产党

员干什么呢！我常常想起唐代诗人杜甫的两句诗：“白头唯有赤心存”，“每依北斗望京华”。1976年，我已经是62岁的人了。我要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抢时间为党、为人民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情，奉献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奋斗不止。有一条幅，是宋任穷同志1987年亲笔手录郑板桥的《题竹》赠于我。诗中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很喜欢这首诗，便一直挂在书房里。让它成为砥砺我迈步人生的座右铭。

第八章 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

一、欢庆粉碎“四人帮”

1975年后，周总理病情加重，“四人帮”急于抢班夺权。毛主席发觉后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主席让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党政日常工作。但是，“四人帮”仍不死心，以造谣诬蔑的恶劣手段，蒙蔽毛主席，又把邓小平推了下去。周总理逝世后，江青一伙又想让张春桥掌权，毛主席又没有听他们的，把权交给了华国锋。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明显地觉察出“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党夺权。在许多报纸、刊物连篇累牍地大叫“遵照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而且“要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路线斗争”。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四人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四人帮”的横行，使我心情很沉重，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担心“四

人帮”上台，担心党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1976年10月9日，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让当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刘光涛和省委书记张林池于10日去北京开会。当时在家的省委书记、常委尚不知道会议内容。后来才听说这次会的内容是“除四害，讲卫生，大快人心，人心大快。”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的心情无比激动，高兴万分。其实6日晚中央政治局隔离了“四人帮”，七八日北京就普遍传开了。我们地处边陲，消息比较闭塞，还不知道。当时北京一些人不好明讲，见面就说，大快人心，人心大快。有的打电话问，你们干什么呢？对方说正在“除四害讲卫生”，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

12日，刘光涛回来，先开了书记碰头会。13日，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刘光涛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的打招呼会议精神。他说，10日到北京，当晚22时通知开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等12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东北、华北、华南等12个省、市、自治区，还有参加第一批打招呼会议没走的上海、天津、河南等省、市领导同志。华国锋、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政治局委员都作了插话。华国锋在讲话中，宣布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灾难的反革命集团，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于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他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讲明了毛主席生前对“四人帮”进行的多次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情况，指出了我们党和“四人

帮”反党集团斗争的性质及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省委常委一致坚决地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我感到痛快极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他们是全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党中央为党锄了大奸，为国除了大害，为民平了大愤，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使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真是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21日和23日，哈尔滨市七八十万军民两次隆重集会和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我同其他常委和群众一道，手拿小旗非常高兴地参加了集会和游行。揪出“四人帮”，就像是搬掉了压在人们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像推倒了“三座大山”那样痛快，全省先后有1600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庆祝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情绪之激昂；气氛之热烈，是过去所少见的。

12月以后，党中央分三次发出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和之二、之三，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三个“战役”，打一场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四人帮”罪行的人民战争。在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中，省委在全省推广了大庆创造的“三大讲”经验，即大讲在“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经验和体会。我以为大庆“三大讲”的经验是好的。“四人帮”横行10年，害死了那么多人，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把国家弄到经济

崩溃的边缘，真是民仇国恨。那么，我们每个人又是如何对待“四人帮”的呢？是应该很好地想一想啊！

我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后，就开始想这个问题。我以为：在“四人帮”横行时，大体上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既有较高的识别能力，又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四人帮”那一套认识清楚，立场坚定，能顶得住，像大庆人那样，敢于同“四人帮”斗争，这样的人还是不少的。第二种，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实在过不去，也跟着说几句，基本上是不跟的。这种情况是大量的。第三种，是风派，是机会主义。第四种，是卖身投靠。

我想了一下，对对号，我基本上是第二种。有时也敢针锋相对的顶一下子，如在抓革命，促生产上。也有的明知不对也跟着说了，比如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中央未点名以前，就提前点邓小平同志的名，我在思想上是不赞成的，但又觉得这一定是有来头的，是脱不过的，反正早晚也得点，发言时也就点了名，这是很不对的。再如，1975年初的计划会议上，谷牧同志找一些同志座谈“为什么工业学大庆不如农业学大寨”时，我说农业有六十条，曾建议搞个工业《条例》。工业二十条搞出来以后，我是赞同的。后来，“四人帮”将工业二十条，连同《科学院汇报提纲》和《论总纲》打成“三株大毒草”，这期间，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对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我也照样讲了，这当然也是错误的。

对“四人帮”，我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前，对江青 30 年代的事也知道一点，她演的电影也看过几个。“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伯达当文革组长，江青当第一副组长，我有看法，心里想：中央文革里怎么都是一些文化人和没有实际工作锻炼的人呢，应该吸收几位老师或副总理参加就好了。内心不舒服，对别人还有所流露。后来在批判我时，这就成了一条主要罪行。对江青又哭又闹，强令要合同工都转正，煽动闹经济主义，后来又提出什么“文攻武卫”，搞打砸抢，我是很有意见的。

第二个阶段，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心里想：这回该好好批一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了，该解决他们的问题了。可是，一批林彪，“四人帮”就心疼，就说你“复辟”、“回潮”、“否定新生事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是不让你批。因为“四人帮”和林彪是一伙嘛！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我也是有看法的。这些人在中央，自己心情很沉重，像压了几块大石头似的。一个是想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党、我们国家怎么办？忧心忡忡。后来周总理病重，毛主席让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形势发展很快，我觉得又有希望了，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我心里还比较有底。江青叫听她的录音，我根本不想听，我还在起草小组会上说过不能搞“学小（小靳庄）不学大”。

第三个阶段，1976 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一段思想怎么也转不过来弯子，许多问题不理解。最大的担心是怕“四人帮”把权夺去，担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时候也想

自己怎么办？不外乎几条：一是退休，这样就不会当“走资派”了；二是少说话，随大流。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还能对党工作时怎么能退休呢？这怎么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呢？谨慎一点可以，但不能不坚持原则呀，结果还是得挺起腰杆子干，何时打倒何时算，打不倒就坚持干。

总结自己在党和人民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我感受最深的有四点：

一是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

二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上，立党为公，敢于革命，敢于斗争。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不随风倒，不投机取巧。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要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这一点对我们这些同志来说尤其重要。这几年，“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并不是都不能识别。如1974年批林批孔，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总理、叶副主席，诬陷邓小平同志；周总理逝世，不准下面开追悼会，甚至连戴黑纱、戴白花都限制。这些还识别不出来吗？这些连群众也看得很清楚嘛，用群众的话说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为什么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些坏蛋却看不出来，恨不起来，顺着他们说，跟着他们跑，还宣扬他们，吹捧他们，为他们抬轿子、吹喇叭呢？可见，有些人犯错误，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三是要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

四是要向广大群众学习，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样我们就能少犯错误。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广大群众觉悟提高得很快，有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

二、挑起第一书记的重担

1977年12月6日，汪东兴打来电话，通知刘光涛、张林池、杨易辰、于洪亮、李力安、陈雷6个人到北京开会。家里工作由陈剑飞负责。

12月7日晚21时，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接见了我们省的6位同志。中央领导同志谈话的主要内容有这样几点：一、中央考虑，对黑龙江省领导想调整一下，黑龙江省领导班子由杨易辰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二、对黑龙江的工作，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总的说是有成绩的。据大家反映，前一段工作搞的还是好的，但在“四人帮”问题上，主要是毛远新插手，也受到影响。三、中央要求把在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在适当范围搞清楚，扩大一点范围是必要的。黑龙江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四、中央对黑龙江省寄予很大希望，要把省委同志团结起来，把工作搞上去。黑龙江贡献很大，不仅是粮食，还有煤、木、油。现在粮食占有量下降了，不适应工业生产需要，黑龙江省工业越发展，越要重视农业，还有一亿亩荒可开，要恢复名誉。工业当然要抓，但首先要抓农业，抓

农业机械化。五、你们的班子，恐怕要加些人，提一些年青的，50岁左右的人。搞20多年了，干部总是要更新一下。在中央领导讲话后，我讲了黑龙江省的工作，认为与我们工作没搞好也有关，问题不完全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大家、特别是我自己工作没搞好。地方是好地方，基础也好，但没搞上去。

这次党中央决定，让我担任省委牵头的工作，开始华国锋、李先念就找我谈了。我表示到黑龙江工作23年，长期当助手，能力不够，经验不够，恐怕不能胜任，希望中央另外派人。但最后中央还是这样定了，我也只好承担起责任。

12月9日我们6人回省。12月10日上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于洪亮传达了中央领导对我省的重要指示，张林池宣读了党中央关于任命我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决定，表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加倍努力，把我们省的各项工.作搞上去，让党中央放心。我在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根据中央指示，首先抓的是对“四人帮”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简称“揭、批、查”）。

1977年12月12日，省委常委决定对原清查领导小组和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调整、加强，并改称为“揭批查”领导小组和“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省委领导下，统管全省“揭批查”和整党整风运动。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副组长李力安、于洪亮，成员有陈剑飞、张秀

芝、陈俊生、解云清、陈元直等。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陈俊生担任。由于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各级领导带头，大打人民战争，扭转了冷冷清清的场面。到1978年5月，全省清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与“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基本上揭露出来了，相当部分已基本查清。列为清查对象的663人，已查清261人，占清查对象总数的40%，基本查清169人，占25.5%。二、与“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事件，多数已基本查清。如：反大庆砍红旗，大反“三五会议”，大批“松涛曲”，冲击省革委八次全会，破坏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冲击省市市委和省军区机关，围攻揪斗省市市委领导同志；强抢省委文件，抢先点名攻击邓副主席，抢先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炮制“黑大理论组”等黑典型等等。三、“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在我省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基本摧毁。四、在揭批查中，省委调整、充实了68个县团级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省直23个部、办、委、局领导班子配齐了一、二把手，改变了一些班子不齐不力的状况。

1977年12月下旬，省委召开地市县和省直部办委负责人会议，张林池、陈剑飞、陈雷、李力安就当前经济工作和揭批查运动分别作了讲话。30日，我在会上就贯彻中央对我省的重要指示和1978年第一季度工作安排问题作了讲话。在谈到揭批查时，力安和我代表省委明确提出：县团以上单位在把省委的路线问题基本上揭摆清楚以后，要

顺乎自然地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进行“三讲一评”。评就是群众评论，开展批评，互相帮助。“三讲一评”是学习大庆“三大讲”和“路线对比”的经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的。“三讲一评”不是消极检讨，而是积极的总结经验教训，不是着重于追究个人责任，而是分清路线是非。

到1978年9月中旬，“三讲一评”基本结束。省直机关的70个部办委局有67个单位全部结束；15个地市委，14个单位已基本结束；82个县旗市委，有65个已经搞完。开展“三讲一评”的主要收获：一是以“四人帮”在本地区、本单位流毒最广、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路线问题基本分清了是非；二是领导班子团结增强了；三是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四是边整边改，推动了工作。

三、解放思想，落实政策

（一）突破禁区，解放思想。在“三讲一评”进行中，省委为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于1978年6月3日，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部办委局负责人会议。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对会议前两段李力安、陈剑飞分别作了小结。6月12日，我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

我首先讲了解放思想问题。为什么当时要讲这个问题？因为省委多次讨论，认为我们的各项工作有进步，但和先进省相比又有很大差距。省委感到，要使我们的工作有大

的突破，必须在思想上有个大的解放。就以1978年来说，从春天开始，由于各级干部大下基层，狠抓落实，春耕质量强于往年，播种面积多于往年，增产措施好于往年。工业一季度月月超产，1—5月工业总产值完成384.8亿元，比1977年同期增长15.7%。财政收入完成情况是1971年以来最好的，其它各条战线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同自己的历史比可以洋洋自得，同全国比，同先进地区比，就高兴不起来了。1978年1—4月全国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2%，我省只增长15.8%。农业1978年粮食总产要拿下300亿斤，遇到了干旱和低温，能否完成还是未知数。市场状况改变不大。科技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不够快。

为什么我们的发展速度慢，面貌变化不够大呢？省委和我当时感到，有外因，也有内因，但主要是内因，心有余悸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没有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面彻底解放出来。心有余悸就怕这怕那，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这也不敢抓，那也不敢动，不敢突破“禁区”，甚至还怕再出现反复，正确的不敢坚持，错误的不敢纠正，工作不敢负责任。心有余悸，就分不清是非界限，把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东西坚持不改，甚至对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持怀疑或者反对态度。

怎么解放思想？我当时主要讲了三点：一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并用来指导各项工作，区分各种是非”。我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根本问题是拨‘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之乱，正毛泽东思想体系之本。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

想体系，而不是不分时间、地点，抓毛主席的片言只语。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任务，也是全党的任务”。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对任何事情，解决任何问题，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黑的就是黑的，红的就是红的，左就是左，右就是右，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比如，我们复查一个案件，不能以那个文件谁批的为标准，必须尊重事实，按照事实做结论。不符合事实的，完全错了的就完全改，部分错了的部分改，不错的就不改。我们对于问题解决得对与不对，必须用实践来检验。我说：“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那种倾向现在依然存在。对‘四人帮’设置的那些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不敢去触及，对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不敢去研究、去解决，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无论是思想政治路线问题还是组织路线问题，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凡是错误的就纠正。要敢于面对现实，哪怕是最严酷的现实。是不是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般的问题，是真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假拥护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三是“要正确地看待 28 年的历史，林彪、‘四人帮’全面否定 17 年，把 17 年的一切都看成是黑的，谁要说个‘不’字，就是‘复辟回潮’；他们又把‘文革’十年的一切都说成是红的、不许批判他们‘文革’的罪行，谁要说个‘不’字，就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正本清源，才能拨乱反正。只有肯定 17 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承认林

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重大问题的路线是非才能分清”。

（二）肯定“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在6月2日总结讲话中，我代表省委郑重地给“文革”前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的省委平了反。我说：“过去只要谁说一句‘原省委’，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复辟’、‘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许说‘黑省委’、‘旧省委’。现在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委？应该肯定明确地说，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的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流，而是支流。”这个问题讲后，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使多年来压在党员、干部和群众身上的石头搬掉了，思想解放了。在省委的带动下，很多地市县委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也为“文革”前的地、市、县委平了反。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敢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用群众的话说：你们胆子不小，敢在全国第一个为“文革”前的省委平反！我想主要有这么三点：

第一点，是1977年5月3日党中央将邓小平同志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印发给县团级以上党委。邓小平在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又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问题。我认为，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过去林彪、“四人帮”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

万句”来歪曲、割裂、篡改毛泽东思想，用只言片语来骗人的把戏；打破了吓唬人的精神枷锁，解决了衡量是非的理论标准，这一下子把被“四人帮”禁锢 10 多年的思想解放了，大家可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观察、分析问题，去批判“四人帮”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制造的种种谬论了。1977 年 8 月，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过去 28 年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也都有错误路线的干扰。这就打开了两个“禁区”：一个是对林彪、“四人帮”全面否定 17 年不敢批判；一个是对 10 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敢批判。打破了这两个“禁区”，就为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供了大前提。大前提一解决，各条战线对“四人帮”的批判就势如破竹。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大胆地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把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

第二点，是 1978 年 5 月 15 日，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在北京逝世时，我说：现在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委，只要从悼词中看中央对欧阳钦同志的评价就很清楚了。

第三点，当时我就不赞成 1977 年 2 月 7 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公开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

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观点，赞成《光明日报》刊登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建议大家要注意学习研究报刊上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四人帮与林彪》、《科学与民主》等。我说这些文章对我们很有启发，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三）学习真理标准问题的三篇文章。1978年7月4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报纸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等文章，就真理的标准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开始讨论时我宣布：要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实行“三不”主义。大家在讨论中联系实际，踊跃发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大家认为，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需要清除余悸，解放思想，但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仍然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大家说，我6月12日讲话中说，欧阳钦同志所主持的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流。明确这个问题，对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省一些重大是非很有必要。在这次会上，也反映了下边有的人听后提出疑问（我的讲话于6月15日发至公社级）。他们说，既然原省委是红的，那么当时造省委的反，夺省委的权，是不是

错了？如果说错了，那么对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指示，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委会的批示，又怎样理解？有的同志还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说：毛主席路线在教育战线占统治地位，那么对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的指示如何看？既然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个领域占主导地位，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文化大革命”成立造反组织，所有党政机关统统砸烂，这样做是否必要？说红卫兵由于缺少经验往往选错造反目标，那么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又怎样看？问题提出来了，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敢于引导大家深入讨论，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是只提问题，而不表示自己的看法。有的同志在个别交谈时，还可以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但在会上却闭口不言。参加讨论的省委常委指出，这说明心有余悸，怕字很多，归纳起来有五个怕：一怕说自己反毛泽东思想；二怕说否定文化大革命；三怕说否定群众运动；四怕说否定解放军支左；五怕说否定新生事物，如红卫兵，造反派等等。而其中核心的问题，是怕涉及毛主席的指示及有关问题。

那么，为什么还存在心有余悸，不敢解放思想的问题呢？大家认为，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倒行逆施，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理论，搞乱了路线，在党内外搞法西斯专政，搞白色恐怖，把人们搞糊涂了，整怕了。党中央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这样做，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找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篡改、歪曲和伪造，可以

解脱林彪、“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句句是真理”的精神枷锁，实事求是地看待毛主席的某些指示。大家还谈到了消除人们的余悸，彻底解放思想，还必须要有组织上的保证。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三不”主义。最后，常委会一致通过一项决定，组织全省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中央报刊连续发表的几篇论述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7月7日以省委名义给县团以上单位发了通知。

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学习讨论情况，省新华分社社长孙铭惠同志于7月15日写了《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真理的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一文，登在新华社《内部参考》第79期。

7月28日，胡耀邦同志在孙铭惠同志写的这篇报道上批示：“这是一篇极好的情况。建议党校党委、中组部局以上干部，认真讨论一次。请党校理论动态，中组部研究室特别注意。”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萍同志7月28日批示：“按耀邦同志批示范围印发，并将耀邦同志的批示印上，请大家加以思考，作点准备，在一定的时间内开展讨论。”

从7月初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反映出来的问题，我觉得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决不可以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估计过低，放松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件大事。要拨乱反正，就必须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进一步解放思想。为此，我在8月份写了一篇《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对这篇文章耀邦同志很支持、很重视。文章的初稿，耀邦同志看过并提出修改意见。我作

修改后《人民日报》1978年8月23日刊登了。

这篇文章发表后，《湖南日报》、《解放日报》、《天津日报》、《辽宁日报》、《山西日报》、《大众日报》、《文汇报》、《江西日报》、《甘肃日报》、《宁夏日报》、《北京日报》、《河南日报》、《浙江日报》都给予了转载。省内的《黑龙江日报》和《学习》杂志等也都转载，在省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四）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我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作为当时省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对“文革”中发生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应该进行平反或过去平反不彻底的，都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和纠正。

1978年2月，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了王操犁、张瑞麟、李瑞和鲁光、吴琳涛、张向凌等13位同志所谓犯走资派错误的结论或严重错误路线性的结论。同时，还给51名同志的历史问题作了结论，给41名同志安排了工作。3月，对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所谓27人反革命大字报一案给予全部平反。

5月，省委作出了《关于落实党的政策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稿）》。《决定》共分9部分，分别讲了落实“文化大革命”中审干和清队遗留问题；落实老干部政策和注意培养青年干部问题；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落实老工人政策和搞好对青年工人的传帮带问题；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落实少数民族政策问题；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落实工矿企业中按劳分配原则和职工生活福利问题。

对落实每一项政策都提出具体要求，责成有关部门负责执行，并向省委汇报。

6月中旬，省委批转呼盟党委《关于进一步解决挖“新内人党”问题具体意见的报告》。所谓“新内人党”，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文革”时呼盟归属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原内蒙古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把一部分同志打成“新内人党”，造成一大错案，应予全部平反。

8月11日，省委作了《关于“一·三一反革命事件”冤案平反的决定》。关于“一·三一反革命事件”，省委曾于1977年11月11日作出平反决定。但平反不彻底，这次彻底平反。同日，省委还作出《关于给欧阳湘同志平反的决定》。1975年12月31日，省委曾批准省公安局《关于欧阳湘同志平反的一决定》。这个决定，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平反很不彻底。把欧阳湘打成反革命迫害致死，是一起严重政治冤案，这次公开地、彻底地平反，为欧阳湘同志恢复名誉。

12月初，省委撤销了1967年5月1日和8日以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名义印发的《告鸡西市人民书》、《再告鸡西市人民书》两个文告。对由于两个文告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2月18日，省委批转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中“三案”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清理“三案”，从全省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由于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或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副主席而遭打击和迫害的干部和群众；（2）潘复生等大搞“清队”扩大化，乱挖“三特一叛”，以及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而遭打击和迫害的干部和群众；（3）潘复生等搞不断“反右倾”、“反复辟”、“反复旧”，大抓漏网走资派而遭打击和迫害的干部和群众；（4）潘复生等搞以我划线，分裂革命队伍，支一派压一派而遭打击和迫害的干部和群众；（5）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敌人乘机报复或有人借机挟嫌报复而遭打击和迫害的干部和群众；（6）“文革”中，说了错话，写了错字，被无限上纲打成敌我矛盾的干部和群众；（7）其他种种莫须有罪名而遭打击和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这个意见下发，加速了“三案”平反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全省性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1979年1月8日我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代表省委常委按着历史的顺序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1）“文化大革命”初期，把哈尔滨市的郑依平、牛乃文、章子冈，哈尔滨日报社江村，哈尔滨话剧院刘相如等同志打成“牛鬼蛇神”、“反党黑帮”，是重大的冤案、错案。

（2）关于“八·一六”和“九·七”事件问题。1966年8月16、17日，省直和哈尔滨市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根据省委的“八·一六”通知进行辩论，认为省委是革命的，提出保卫省委的口号，这是革命的行动。1966年9月7日，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和第二工具厂的工人集体上访，要求制止武斗，反对乱揪乱斗，是革命行动。潘复生诬陷这些群众是“保守的”，是“反革命行动”等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3) 关于“八·二六”、“八·二七”大会问题。1966年8月26、27日，潘复生一手策划在哈尔滨市八区广场和省体育场召开揪斗省委几位领导同志的大会，致使省委全面瘫痪。从此，在全省刮起乱揪乱斗各级干部的妖风。这两次大会是错误的。

(4) 关于“地下黑省委”问题。1966年9月潘复生指使某些人接连贴出“地下黑省委”的大字报，并印发全省，流毒甚广。这完全是为了搞垮原省委，为后来篡夺省委领导权制造舆论，这是一起假案，纯属捏造。

(5) 关于“三军、一团、一队”的问题。潘复生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立的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打成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把“八·八团”、“赤卫队”打成“保守组织”也是错误的。

(6) 关于“一·三一”夺权事件。在“一月风暴”的反革命逆流中，潘复生等人，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于1967年1月31日夺了省委的权，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潘复生等人成了“东北新曙光”的核心人物。历史证明，“一·三一”夺权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夺了无产阶级的权，夺了共产党的权。当时“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的第一号、第二号《公告》和潘复生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诬蔑“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委、省人委是“一小撮顽固不化走资派盘踞的反动堡垒”，是“黑龙江省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黑根子”等，纯属诬蔑不实之词。

(7) 关于“炮轰派”的问题。在夺权以后红色造反团

又被潘复生分化为山上派、山下派，即捍联总、炮轰派，潘复生把炮轰派定为反动组织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

(8) 关于所谓“反党叛国集团”的问题。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假案，目的在于打倒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一大批革命的老干部，借以完全否定 17 年的历史。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受迫害同志的名誉。

(9) 关于“翻案集团”问题。1968 年，潘复生等人出于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的罪恶目的，把广大群众要求解放并使用省委的一些老同志，诬蔑为“逆流”，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杨易辰反革命翻案集团”、“王一伦反革命翻案集团”、“李范五反革命复辟集团”，这纯属陷害。对因此遭受迫害和受株连的人员，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0)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已有结论。在这期间，以省委名义召开的“三次理论讨论会”，1976 年 2 月间召开的“抢先点名批判”的地、盟、市委和省直部、办、委、局负责人会议，6 月间召开的“讲学习十八段指示体会”的地、盟、市委和省直部、办、委、局负责人会议和 8 月间省委召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等会议的指导思想 and 发言都是错误的，省委下发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和省委领导同志的那些讲话，一律撤销。贯彻执行这些会议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省委承担。

(11) 关于各地方的一些重大事件。例如所谓伊春、苇河、克音河“反革命叛乱”或“反革命暴乱”事件等，是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予以平反昭雪。

在平反上述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前后，省委

还进行了落实改正错划右派和中右分子政策；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落实宗教政策；落实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政策和贯彻落实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等等。1979年2月至5月，集中进行了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摘帽工作。

1982年6月，省委作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撤销1940年1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推倒强加给赵尚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同时，对因赵尚志的问题而被牵连的陈雷等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到1982年末，全省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基本结束。对“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以及非正常死亡的2318名干部，除一名外，全部进行了平反昭雪。对定为敌我矛盾的2430人，已平反纠正了2422人。对定为“死不悔改走资派”的4人、“走资派错误”的171人，还有严重错误（“路线性”）的997人，全部进行了平反。对定为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499人，纠正了422人；对定为严重政治错误的341人，纠正了320人。对在“文革”中以各种罪名被批斗过或蹲过“牛棚”、“反省室”的9.8686万名干部，采取各种形式为他们进行了平反和消除影响。“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凡单位和个人占用的，绝大多数退还了本人。对全省原定右派分子13614人，经过复查属于错划的1.3584万人已全部改正，不予改正的仅30人，也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对原定“中右分子”1.0789万人、“反社会主义分子”1527人，全部作了改正。全省被定

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因右倾错误被批判受处分的 4900 人,1962 年甄别了 3719 人;粉碎“四人帮”后又复查了 1181 人,全部纠正的 1129 人,部分纠正的 52 人。全省“四清”中的案件涉及 2217 人,复查了 1829 人,其中全改的 575 人,部分改的 374 人,不予改正的 880 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提高了党的威信,对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过程中,省委和中央也给我落实了政策。1978 年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撤销了 1971 年 6 月 13 日省核心小组第 73 次会议讨论定我为“走资派错误”的结论,同时撤销“走资派错误”结论的还有王一伦、李剑白、陈雷同志。1980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文给省委,文内称:“经中央批准,同意撤销 1954 年 6 月 30 日《关于杨易辰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

四、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美考察

我们这次访问美国,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1978 年 6 月 17 日,农林部、外交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说:“根据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关于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指示精神,为进一步了解美国、法国、西德等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情况和经验,包括技术装备、科研教育、农业现代化同

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关系，以增加我们对农业现代化的知识。”赴美中国农业代表团，提议杨易辰同志担任团长，赵辛初同志任顾问，由农林部何康、陕西姜一、山西王庭栋同志任副团长。该团于7月25日离京赴美。

这次访美，是应美国中西部12个州国际农业贸易理事会的邀请去的。后来，加利福尼亚州又发出邀请，所以共计参观访问了13个州。我们中国农业代表团，一行26人，除上边说的团长、顾问、副团长外，秘书长袁木，副秘书长马凌，团员有：郭凤莲、吴振、刘鹏、陈凌风、余友泰、白纪年、王焕举、王槐隆、丁巨波、李喜慎、潘伊正、王西玉、王克、谢允坚、黄永宁，翻译姜南方、倪耀礼，摄影师张伟英等。7月25日从北京出发，飞经欧洲，在巴黎逗留一天；归国途中在日本东京停留两天，参观了东京郊区鸡场、猪场和温室，9月8日回到北京，在国外共活动46天。

我们这次访问美国，概括起来有两个收获：

第一个收获，考察了美国农业现代化的情况和经验。代表团在美国共计40天，行程1.5万多公里。着重看了美国中西部的农业，这是美国著名的农业区，在自然条件上同我国北部省份比较接近。我们先后访问的13个州是：密执安、依利诺斯、俄亥俄、印第安纳、明尼苏达、密苏里、衣阿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北达科他、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亚。共计参观了102个单位，其中参观谷物农场21个，农场主合作组织4个，种子分公司2个；参观养牛养猪养禽农场15个；参观农业机械公司和工厂13个，

参观粮食贮存、运输、加工公司 10 个和油酒生产、蔬菜水果包装工厂 5 个；参观州立大学农学院 8 所，农业研究中心和试验场、园艺场 16 个；参观农业博览会 8 个。这次去美国，看的地方不少，可以说接触了美国农业的各个方面，比较广泛地考察了美国中西部各州的农业情况，了解了美国农业现代化的状况和经验。

第二个收获，做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工作。美国政府对我代表团这次访美是重视的。我们从北京出发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联络处举行了招待会。在我们出国和回国时，他还亲自到飞机场去送行和迎接，表现热情。代表团到华盛顿后，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长和参众两院农业委员会在国会大厦会见代表团，众议院两党领袖也都出席，并发表友好讲话。美国农业部长特意告诉我们，卡特曾专门指示他们和地方政府做好对我团的接待。这位部长在欢迎我团宴会上讲话时，强调扩大中美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并说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我们所到各州，绝大多数对代表团的访问都作了周到的安排。代表团的活动几乎每天电视都转播，报纸发消息和照片。

代表团在各州参观访问，会见与农业有关的各阶层人数达数千人。差不多每次宴会都是百人左右。所到之处，人们都热情接待，祝愿两国人民的友谊，期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气氛很浓。许多地方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迎接代表团，主人们在宴会上举杯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们身临其境，为祖国的声威大振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根据

中央指示的方针，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积极宣传党的外交路线，宣传粉碎“四人帮”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大好形势。有的美国人讲：了解是发展友谊的基石。多年来往甚少，互相都不熟悉。通过访问接触，可以互相了解。我们接触过的工商企业界人士，普遍要求同中国做买卖，扩大贸易。密苏里州，在代表团到达之前，就谣传我们去买他们的棉花，在宴会时，种植棉花的农场主，送给我们每人一包棉花样品，可见他们搞贸易心情之急切。

最诚挚热情的是美国人民。我们去机场、旅馆和其它公共场所接触到许多美国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客人时，有的主动前来握手，有的找代表团成员一起照像留念。许多农场、牧场，接待代表团像办喜事一样，把家里人找回来，把邻居、朋友请来，领着代表团到处看，包括他们的住宅、卧室。有的说，接待中国代表团，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一天。特别是美籍华人和访问过中国的美国朋友更是亲热，不少人从二三百里外驱车赶来看望代表团。一些美国中、下级官员也表现很友好。明尼苏达州农业专员从60英里远的农村把怀孕的夫人及其孩子接来见代表团，他说：我接孩子来见你们，就是让我们的后代也跟中国友好下去。我们离开美国的时候，陪同我们的美国官员和美国朋友，依依不舍，有的热情拥抱，有的热泪夺眶，情景很感人。

从我们接触的范围看，绝大多数人是热情友好的，也碰到个别不友好的。我们在密苏里州访问，路过圣约瑟市，这个市的市长参加过侵越战争，我们抵该市前，他在报纸

上发表谈话，表示不欢迎我代表团，但很不得人心。当天我们到达这个州的堪萨斯市，所受礼遇更高，市长赠给本市的钥匙，发给全团每人一分荣誉公民证；州农业局副局长让我们选一头最好的种公牛，要赠给我们。在堪萨斯市还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地方是杜鲁门的故乡，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光荣，要送给我们杜鲁门像作礼品。我们一想，这个礼不能接。我跟他们说：杜鲁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可是很不好，他发动侵朝战争，出兵占领我国台湾，这个礼免了吧！他们说：这点我们没想到，这个礼品我们不送了，但你们的礼品还送不送呢？我们说照样送！他们很高兴。

我们访问美国回来以后，美国中西部 12 个州组成美国农业代表团，一行 32 人，回访中国 21 天，于 9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我省参观访问了 3 天。

美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访问时，美国总人口 2.1 亿多，其中农业人口 780 万，占 3.6%。全国土地 140 亿亩，森林 43 亿亩，牧场草原 36 亿亩，耕地 28 亿亩，平均每人 14 亩，其中播种面积 20 亿亩。我们参观的 12 个州，地处大湖区，多数地方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雨量均匀，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是得天独厚的。我们概括这些地方的自然特点是：黑龙江的土质、华北一带的气温、长江一带的雨量。

美国是个近 200 多年来移民开发的国家，农业一直占重要地位。他们讲美国农业的发展，有两个革命：20 世纪初畜力耕种代替人力；50 年代机械耕种代替畜力，近 20 多

年整个农业实现了现代化。

从我们参观访问的印象看：

第一，美国农业机械化全面地高度发展。据美国农业部 1977 年统计，全国有拖拉机 438 万台，各类收割机 132 万台，农用卡车 318 万辆。从整地、播种、中耕、施肥、喷药、收获，到排灌、运输、烘干、贮存、加工，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喷撒农药普遍使用飞机，全国有农用飞机 1 万架。美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拖拉机向大马力发展。当时销售的拖拉机有一半是 100 马力以上的。二是宽幅高速、联合作业。一般作业幅度 10 米到 20 米，作业速度每小时 10 公里以上。三是难于用机械操作的生产项目（土豆、甜菜、棉花、西红柿、黄瓜、包心菜）开始突破。四是用电子仪器装备农用机械。当时全美国农场雇工 130 万人。全美国 275 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 1.5 个劳动力，耕地 2358 亩。

第二，有一整套现代科学技术用于农业。这方面主要包括良种、化肥、除草剂和农药。

第三，农业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美国各州根据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以一两种作物为主，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种植，以利于大规模地采用现代化机械和科学技术。

第四，农业生产社会化、商品化。因为是社会化生产，就有两个依靠，一是依靠工业提供生产资料，如农机、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二是依靠运输、加工和销售，面向国内外市场。

第五，农林牧结合。大力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大养其

牛，是美国农业的一大特点。从我们参观过的牧场来看，有三点印象比较深刻：一是改良品种，像搞杂交玉米一样，牲畜、家禽等都搞杂交；二是粗饲料和精饲料并用；三是机械化、工厂化。

第六，重视水土保持，发展水利。1933年，由于大量移民开荒，大片森林和草原被毁，水土严重流失，曾使美国多次发生“黑风暴”，遭到巨大灾难。1934年发生的一次最大的“黑风暴”，从美国西部干旱地区刮起，东西长1500英里，南北宽900英里，形成高2英里的黄色尘土带，连续刮了3天，越过美国三分之二的大陆，刮走了3亿多吨土壤。这次“黑风暴”灾害，使当年的冬小麦减产102亿斤，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从那以后，吸取教训，坚持不懈地搞水土保持。我们这次在美国参观访问，天上飞，地下转，几乎没有看到土地裸露的现象，一叫森林覆盖；二叫农作物覆盖；三叫草原草坪覆盖。无论城市、农村都种草坪，一点空地不留，马路都是柏油、水泥的，所以它没有风沙水土流失的问题。代表团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美国女人赤胸露体，土地却覆盖得很严实。

第七，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对先进东西兼收并蓄精神，是很可贵的。他们许多农畜产品的良种以及农用的仪器、设备，是从外国引进的。如中国的大豆、柑桔，日本的水稻，伊朗的核桃，英国、法国的肉牛，荷兰的奶牛，丹麦的猪，西德的面粉加工设备，瑞典的挤奶器，等等。

第八，农村和城市的差别缩小。

这些是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情况，这是它农业科学技术先进的一面。我们这次在美国各地参观访问，也了解一些美国社会腐朽、没落的一面。比如吸毒的人多，酗酒的人多，私生子多，离婚的人多，搞什么“独身主义”，当时美国大学一些有识之士向我们吐露一些真情，他们对这些现象深为忧虑。因为我们是农业代表团，受条件的限制，没有机会对美国社会状况作更多的了解。

美国农业对我有若干可以借鉴之处。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适合我们实际情况的就学，不适合的就不学的原则，感到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很多，集中起来当时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第二，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建立支农体系。第三，搞好农业生产社会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农业，在实现生产社会化方面，应比资本主义搞得更好。工业、商业和其它有关部门，应从四面八方农业伸出积极支援的手，很好地为农业服务，取得广大农民的信任。但是，现在我们做得很不够，在许多方面，为农业服务还没能做到像美国那样及时、周到，支农产品质次价高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有些部门不仅不支农，而且还在那里卡农、挤农、挖农、坑农。第四，搞好作物种植区域规划，建立作物的主产区。第五，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大力提高单产的同时，积极扩大开荒。第六，大力发展林业和畜牧业，实行农林牧相结合。第七，加速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工农县。第八，认真搞好教育、科研、农业三结合。第九，大力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一) 省委常委务虚会。1978年9月9日至30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李先念同志围绕怎样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这个主题，作了重要讲话。省委根据国务院务虚会精神，为进一步加快我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10月20日起，也开了18天的务虚会。

省委常委务虚会紧紧围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主题，采取就实论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办法进行。农林、工交、基建、财贸、科技、文教、组织、宣传、政法、计划、综合等部门，在大会上分别进行了汇报。他们对本战线本部门的情况和问题有具体的分析，有解决的措施，有历史经验的总结，有落实的实际步骤。特别是认真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和根本性措施。省委书记和常委们都在会上作了发言，既有建设性批评，又有诚恳的自我批评，对整个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一个很大推动和促进。这次会议，也带有党内整风性质，解决了某些思想和工作不适应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问题。

11月6日，在会议结束时，我讲了“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轨道上来”的问题。我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全党的工作重心要不失时机地转移到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战略任务上来。这

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转变，全党都必须为这个革命的转变，做好一切准备，满腔热情地、全力以赴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邓副主席在全国工会九大致词中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这个新的战斗，就是加速四个现代化，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我说，在这种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面前，每一个同志、特别是肩负领导责任的同志，都要认真地想一想：我们的认识是否跟上了形势的发展？我们思想和工作是否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接着，我从学会按客观规律办事、管理体制、组织机构、干部配备、思想作风、善于学习和政治思想工作等7个方面，阐述了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和促进这个伟大的革命转变。

（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0多人。会议分6个组。我和侯捷参加了会议，在东北组。这次会议首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而后的议题是：1. 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修改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讨论稿）。

2. 商定 1979 年、1980 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 讨论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的会议是多年来没有开过的。大家一致赞成，从 1979 年 1 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认为中央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适时的。对农业的两个文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我作了多次发言，侯捷也作了发言。对新的 60 条，大家认为，经过修改后可以带回去征求意见，对决定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在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问题时，陈云同志 11 月 12 日在东北组发言。他说：“从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他说：“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列举了关于薄一波同志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的问题；关于彭德怀的骨灰应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等 6 个问题。陈云同志的发言 11 月 13 日印发简报后，获得了与会同志的普遍赞同，反映了大家的心声。与会同志在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问题时，突破了原定的议题，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革”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11 月 25 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大家的意见做了回

答。

中央工作会议酝酿人事问题时，我在东北组会上说：陈云同志，我们在十一大时就提了。“文革”前他就是党的副主席，做了多年的组织工作，对我党的建设有贡献，他管经济工作多年管得很好，在党内威望很高，大家信得过。我不仅同意他进政治局，还同意他当党的副主席。邓大姐，进政治局是我们早就盼望的，在十一大时，我们东北组就共同提名建议她进政治局的。胡耀邦同志，通过长期斗争实践证明，是位很有才干的好同志，特别是这一时期，对组织工作管得好，对党校管得好，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也办得好，我们议论，组织部长做组织工作，还做宣传工作，对胡耀邦同志我们信得过。王震同志为人正直，斗争坚决，“宁可穿草鞋，也不穿小鞋”，按“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办事。我同意这几位同志进政治局。增补9位同志为中央委员，也都赞成。

12月3日，我在东北组会上发言，概括有“五大高兴”：（1）政治局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大得人心，大振人心，使人高兴；（2）天安门事件、61人的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大快人心，大顺人心，使人高兴；（3）国际形势大好，对我们加速四化十分有利，机会难得，形势这样好，使人高兴；（4）中央政治局常委酝酿，政治局要增加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重大贡献的老同志，一听名单大家都高兴；（5）这次会议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恢复和发扬了延安作风，大家高兴。以前，我们对“文革”中的一些

问题，有苦说不出。打倒了“四人帮”，这些问题应当解决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有人还主张按“两个凡是”办，不然就说是“砍旗”。这次会议，确实恢复了延安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实事求是地讲话了。过去有人讲“两头热、中间冷”，叫做“心肌梗塞”。后来经过调整，中间的问题解决了。但上边还有“脑血栓”堵着脑血管，这次把“脑血栓”的问题也打通了，盖子揭开了。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首先邓小平同志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这一讲话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后来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次会议，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和过去运动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功过是非；修改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原则上确定了明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建议。

（三）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和吴全清、赵兴元、魏兴致同志作为中委、候补中委参加了这次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晚8时，在京西

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开幕会。华国锋主持了开幕会，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就这次会议的任务和开法讲了话。他说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虽然开了5天，但会议讨论中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会议。这是因为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大家所接受，成了这次会议的基本指导思想。这说明，就党的指导思想来说，小平同志已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先传达到县，广泛征求意见，由省市自治区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定稿后，由中央正式发文。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这个《安排》由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并确定传达范围。全会一致原则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3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

追认。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 11 位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纪委的常委和委员 85 人。

12 月 22 日晚 7 时半，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

党的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结束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全会充分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纠正“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加强了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检机构，这又初步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参加这次会议深感与参加已往的会议不同，的确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是一次伟大转折的会议。

（四）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四次党代会的召开。为了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决定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各地、盟、市委，省直各部办委局，哈铁、齐铁、大专院校和省军区、驻军、中央驻省各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 189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从 1978 年 12 月 26 日开始，至 1979 年 1 月 8 日结束。会议共分四段：第一段，学习讨论公报和中央领导的讲话，传达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情况；第二段，学习讨论关于农

业的两个文件；第三段，讨论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第四段，讨论省党代会的报告。

与会同志完全赞同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致拥护这两个会议上所讨论和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组织问题和思想路线问题。它充分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都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满腔热情地、全力以赴地搞好这个伟大的战略转移。

省委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以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为榜样，充分发扬民主，大家各抒己见，许多同志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内生活的重大进步，对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传统、实事求是传统，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除对同志们提出的全省性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回答外，讲了当时需要抓的几项工作。一是认真传达、广泛宣传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在全省立即掀起一个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高潮，做到家喻户晓。二是要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建设。当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调整比例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解决比例失调的问题。主要是农业基础的稳固；工业方面问题突出的是煤电等先行工业。电力不足使许多企业停三开四，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严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欠帐较多，骨多肉少。不立即着手规划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想上上不去，想快快不了。

三是安排好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这是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四是要妥善处理揭批查运动中遗留的问题。从全省范围来说，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可以说是胜利结束，但在清查对象、定性处理、“三案”平反、落实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两打”斗争等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要求揭批查没有完全结束的地方和单位，要有部分领导力量继续抓运动，大部分领导力量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五是要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学会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工作方法上，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变过去那种单纯靠开会、发文件、自上而下灌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要深入下去，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一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都要坚决改变，不要再搞那种徒劳无效的大参观、大评比。

1979年1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049名。

我受省党的第三届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我在报告中，回顾了1971年8月召开省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回顾了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时应吸取的历史经验教训，主要是：第一，我们党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是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一直没能够实现把社会主

义建设做为中心任务的转变，相反，阶级斗争代替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政治运动代替了党的一切工作。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时，由反对政治落实到生产上到“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由“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到批“唯生产力论”，由批“唯生产力论”到破坏生产有理，发展生产有罪，结果政治运动成了一切。为什么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呢？这就是往往把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都看成路线斗争，把路线斗争又都看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又都看成敌我矛盾，从而夸大了敌情，颠倒了敌我，把好人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最危险的敌人”，把一小撮坏人当成革命的动力。因而几乎每次运动都伤害一大批人，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直到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缘。所以，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历史教训。第二，这些年来，我省国民经济之所以发展缓慢，除了主要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外，在经济工作本身上也有着深刻的教训，这就是没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由于多年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在全省的国民经济中造成了缺门短腿，出现了重大比例失调；“基础”不“基础”，“先行”不“先行”，只抓“骨头”不抓“肉”，欠帐很多，积重难返。直到1978年企业亏损仍达9亿多元，生产队欠银行贷款5亿多元，平均每个社员欠20多元，还有15—20%贫困队。当着我们工作着重点转移时，认真吸取这方面教训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前面讲到的那些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产生，长期得不到纠正，一个主要原因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第四，总结我们历史的经验教训，归

根到底集中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这里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最基本的是：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接着，我在报告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战略转移。它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向，民心所向。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为了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来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的。我指出，我们一定要坚决转，不转不行；我们一定要快转，转慢了不行；我们一定要转好，转不好不行。

我在提出到1985年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后，强调指出，要转得快转得好，必须用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武装全体党员和全省人民；必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迅速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必须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大会选出87名省委委员，48名候补委员。1月24日，中共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省委常委、第一书记和书记。选举我为第一书记；选举李力安、陈雷、李剑白、文敏生、王一伦、陈剑飞、陈烈民、王金籽为书记；选举王钊、王振扬、张世军、陈元直、陈俊生、赵兴元、侯捷、解云清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改进思想作风的决定》。

(五) 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盼望已久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已经开始出现。但是在当时，这个局面还不稳固，还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在影响着进一步安定团结。当时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1) 青年问题。有在校青年问题，有待业青年问题，但主要是上山下乡青年的统筹安排问题；(2) 群众上访问题。多数上访有理，也有少数无理取闹，扰乱社会治安。(3) “盲流”问题。从1970年到1978年盲目流入黑龙江的人口达178万，平均每年流入近20万人。一些“盲流”到处流荡，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治安。在林区、草原放火烧荒，乱砍滥伐的主要是这些人。(4) 战争影响问题。2月中旬到3月中旬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对群众鼓舞很大，而苏联在边境不断制造紧张局势，进行战争恫吓，对有些人的情绪稳定则影响不小。(5) 经济比例关系不协调，工业调整和工业改组中间产生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如当时市场物价有些乱，有些工厂开不了工，有些产品积压卖不出去。(6) 有些政策落实的不够。特别是对“四清”运动中遗留的问题认识不足，抓的不够。(7) 社会治安问题。城市治安不好，防范不严，打击不力，群众不满意，没有安全感。(8) 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在宣传工作上有些问题要注意内外有别、注意本省情况、防止片面性。这些不稳定因素，我们如果处理得好，就能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破坏已经出现的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影响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面对这种形势，省委一班人在处理各种问题时都

注意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来考虑办法。

3月下旬，我和刚到黑龙江省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赵德尊同志，省委常委、省农场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振扬，合江地委书记孙子源等同志先后到了红兴隆和建三江两个农场管理局及其所属的友谊、897、852、853、红旗岭、胜利、红卫、创业8个农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知识青年返城问题比原来了解的严重得多，是当时农场建设上一个突出问题。从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来，全省安置了180.6万多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接收京、津、沪、浙等省市知识青年37万名）。1977年末，省农场总局所属农场共有下乡知识青年30.5万多人；1978年返城5.4万人，大部分是这年冬季走的；1979年3月份前又走了7.4万多人，已办理返城手续待走的还有4万多人，共计16.8万多人，占原有知青总数的55.2%。可见，有一个“知青”统筹安排的重大问题。农场干部形容“势如十二级台风”，基层无法招架。广大干部群众非常伤心地望着大批知识青年返回城市，有些知识青年也是流着眼泪离开他们撒过汗水的边疆。

我和德尊等同志每到一个农场都讲知识青年返城问题，宣传上山下乡大方向在当时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这股返城风不是知识青年带头刮起来的，是受了错误舆论的影响，说什么上山下乡是错误路线、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等。这些说法违背了中央精神，也脱离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因而是不对的。今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不再需要城市青年下乡。但在当时，为了解决就业，下乡

是需要的。现在，有些青年返城后已后悔，有些青年要求回农场，回来的要热烈欢迎，妥善安置。对扎根农场、安心创业、顶住返城风的知青，要大力表彰。3月28日，我和德尊同志在853农场看望了哈尔滨市下乡知识青年杜翠华和她的爱人，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强调了对连职以上脱产干部的下乡青年，符合条件的，按照规定尽快给予定职定级，不要再拖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知识青年要授予荣誉称号，要提高工资待遇。如上海知青顾雪妹，创造出一人一年养1000头肥猪的高产纪录。农场要关怀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成长。当年3月底4月初，省委召开了地盟市委知青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5月12日，省委发出《关于当前知青问题的紧急通知》。经过一系列工作，初步煞住了知青返城风，并有一批青年返回农场和农村社队。7月10日，省委、省革委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积极分子表彰广播大会。全省各地设344个分会场，34万人参加了收听。

到了1981年，不安定因素转向待业人员安置，特别是青年待业人员安置，这是一个事关实现政治上安定的大问题。由于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1979、1980两年，全省安置122万待业青年就业，成绩是显著的。但1981年全省仍有54.1万人需要安置就业（其中上年结转27.6万人，1981年新增加的26.5万人），占全国待业青年总数的8%左右。待业青年安置出路何在？我当时首先是强调解决对“三结合”就业方

针的认识，改变重全民、轻集体，歧视个体的思想。扭转只依靠国家“统包统配”解决劳动就业的陈旧观念，明确不论是在全民、集体企业还是从事个体劳动，参加家庭副业生产，凡属有固定活干，有较稳定收入的都是就业，鼓励和大力支持待业青年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把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安置待业青年就业的主要出路。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城市“有活没人干、有人没事干”，做衣难、吃饭难、修补难的问题。

六、重振雄风，加快农业发展

如何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关于黑龙江要恢复名誉、加快农业发展的指示，始终是我和省委摆在工作首位的一个大问题。

(一) 必须改变农业单产不高、总产不稳的局面。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单产不高，总产不稳，经营单一，人均占有粮食和对国家的贡献下降。由于农业开发较晚，农田基本建设基础差，抗灾能力低，往往是“早盼下雨，涝盼晴天，秋天盼个自老山”，粮食产量总是随着自然灾害的轻重、大小上下波动。

从单产上看，1949年全省粮豆平均亩产142斤，1977年212斤，1978年大丰收，每亩也只有276斤，比全国平均亩产数低60斤。

从总产看，丰年歉年之间差数很大。如1976年和1977

年分别比 1975 年减产 57 亿斤和 53.9 亿斤。这种状况是：丰年有贡献，平年保自给，歉年挖库存。

多种经营是我省农业上的一条短腿。从 1969 年到 1977 年，9 年平均全省多种经营总收入占农业副业总收入的 15%。

人均占有粮食和对国家的贡献下降。1953 年每人占有粮食 1200 斤，1976 年下降到 702 斤，1978 年大丰收也只有 916 斤。“一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纯上交 29.6 亿斤；“二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纯上交 17.5 亿斤；“三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纯上交 31.8 亿斤；“四五”计划期间，下降到 16.4 亿斤。1976、1977 年还挖了库存，1978 年也只上交了 7.9 亿斤。

造成下降有两个原因：一是粮食产量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建国 29 年来，全国人口增长了 76.9%，我省增长两倍（矿林油区职工、支边移民、盲目流入、自然增长，当时叫“四路进人”）。我省非农业人口比重之大，居各省之首，仅次于京、津、沪三市。全国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5.4%，我省高达 35.3%。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粮食增长的速度，向国家提供商品粮的数量也就日益减少。所以，当时我总说一个黑龙江变成三个黑龙江，粮食增加只有一倍半。二是我省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水平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上，全国 28 年平均每亩投资 28 元，我省只有 12 元。在动力机械拥有量上，全国平均每亩为 0.107 马力，我省是 0.051 马力。在化肥施用量上，按自然吨计算，1978 年全国平均每

亩 38.8 斤，我省为 13 斤。在农村用电上，全国平均每亩 17 度，我省是 10.6 度。1979 年全国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50.24 亿元，按全国总耕地面积 15.4 亿亩计算，平均每亩投资为 3.26 元，我省平均每亩投资为 1.78 元。为改变黑龙江农业落后的状况，要控制人口增长，要增加农业投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发动群众，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全党大办农业。当前首要的是要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指示。

（二）“农业学大寨”和贯彻执行中央的两个文件。粉碎“四人帮”后，农业学大寨进入一个新时期。1978 年 2 月中旬，召开了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代表省委作了《恢复名誉，多做贡献，为把我省建设成为商品粮大基地而奋斗》的报告。我在肯定 1977 年以来农业学大寨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我省农业发展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党中央领导批评我们“黑龙江的农业这几年没有什么进步。”这完全符合我省的情况，从我们省委来检查：一是真学大寨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还没有真正拿到手上。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树立不牢，各行各业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特别是支农工业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二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得不好，经营单一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很多社队经济基础薄弱，收入减少，挫伤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是农田基本建设不过硬，靠天吃饭的状态没有多大改变。四是没有把高产多收和多种多收的关系处理好，

近几年忽视了扩大开荒，增加总产这一面。五是作风不实，深入实际，带头实干，认真解决实际问题很差。总之，省委在学大寨运动中的关键作用发挥得不好。我在报告中提出，到1985年，全省总耕地面积要由现在的1.3亿亩扩大到2亿亩，粮豆薯总产量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实现“三个一百”，即：每年向国家交商品粮100亿斤，大豆100万吨，糖100万吨。看来，由于对主客观条件分析研究不够，对国家投入要求过高，显然指标订的高了。

为推动黑龙江省农业学大寨和加速农业的发展，党中央1978年2月从山西调王金籽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还从山西派来李艾虎、范喜凤，分别担任合江、嫩江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2月中央决定，调赵德尊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4月中央又派王路明同志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德尊、路明同志都分管农业。

1979年1月11日，中央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要求把两个文件在春耕大忙之前，向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传达，组织他们学习讨论，然后试行，并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通过讨论试行，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

我看了这两个文件后，觉得这是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发展农业的经验教训，透彻分析了我国农业的现状，从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出发，提出和确定了发展农业的

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后,由于农村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普遍反映,党的政策“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壮了民气”,为我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恢复和建立生产责任制。1978年,从机关到社队,从干部到群众,人人都知道当年全省要拿下粮食总产300亿斤。但是,当时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端在很多社队并没有解决。因此,如何纠正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就是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1978年春,我和省委一些同志分别深入到嫩江、绥化、合江、松花江、牡丹江等地区,在抓春耕生产的同时,同县、社、队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讨论农村工作中的问题,集中起来有12个问题,这12个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进一步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倾向。我提出凡是适合制定劳动定额的农活,都要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可以自报公议,可以底分活评,可以“定额到组、评分到人”,少数农活也可以按定额计分到人。究竟实行什么办法,应根据本队条件,由社员民主讨论决定。不论男女老少、干部社员一律同工同酬。对有技术专长的劳动,可以给予适当的补贴。对集体贡献大的社员,可以给予政治表彰和适当的物质奖励。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最早提出的带有田间生产管理责任制性质的办法。

1979年7月,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推广了肇州县永胜

公社的“按季划组，责任到人，定额计工，按质奖惩”的田间生产管理责任制。永胜公社实行这种田间生产责任制，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管理面貌、生产面貌大变。1978年全公社粮食平均亩产408斤，上了“纲要”，不久成为全省产量高、贡献大的一个公社。各地在学习推广肇州县永胜公社田间管理责任制经验的同时，有的县在部分贫困社队试行了“统一管理，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绥化地区的肇源县、嫩江地区的富裕县等也实行了这种办法。我问过绥化地委书记包琮同志是否知道此事，包琮同志说：“知道，是我支持他们搞的，联产到组可以搞些试点吗？”我说：“可以试验，但面太大了。不过既然搞了，就不要再收了，要加强领导，总结经验。”在这之前，有些县试验搞包产到组，分地分车马，甚至要划场院，抢粪肥，矛盾很多，我和常委都认为不宜提倡推广。少数户数过多的后进队，群众要求搞包产到组的，可以允许；但总的还应坚持机械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除了搞包产到组的，也有的生产队搞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对这种责任制当时我同意在贫困队试行，但不允许大规模发展。

1980年春，我曾就责任制问题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3月省委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后，又留下15个县的县委书记进行座谈。提出实行责任制要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巩固壮大集体经济、有利于机械化出发，要因地制宜，可以采取同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形式，不要强求划一；提倡和推广肇州永胜公社的按季划组、定额计工、责

任到人、按质奖惩的田间生产责任制。在贫困队允许试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哪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要责任到人，计酬到人，奖惩到人，按照定额计算劳动报酬，防止“大帮哄”变成“小帮混”。1980年9月，省委农工部请一些地、县领导座谈时，统计全省有80%的生产队实行了各种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实行肇州县永胜公社田间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占60%；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占15%；实行专业分工、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占5%。座谈会认为，今后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各种生产都要走专业化道路。应大力提倡专业化生产责任制，组织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进行生产，按经营成果计算劳动报酬，即“四专一联”。在这次座谈会上，发现有些地方搞了“口粮田”。对已搞口粮田的，我讲过“我们不赞成，但也不许纠偏”，和下边商量着办。

（四）“阳关道”与“独木桥”。1980年9月中、下旬，我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

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走“阳关道”与走“独木桥”的问题。当时会上普遍认为，搞包产到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独木桥”；搞集体化、机械化的大农业是走“阳关道”。

会议开始后，杜润生同志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个说明。他说：“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穷落后的困难地区，长期‘三靠’的社队，集体经济办得很不好，维持不下去，可以包

产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可以搞包产到户的，用收入来表示的话，就是社员平均分配收入在50元以下的。”9月16日下午，内蒙古周惠同志发言谈到内蒙古在农村牧区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时，李先念同志说：“江苏、黑龙江就不要包产到户。东北就是一心一意搞机械化。”9月17日下午，贵州省池必卿同志发言。他说贵州省很穷，是全国倒数第一。全省在分配上，人均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45.5%，30元以下的占30%。在这种情况下，历来就有搞包产到户的。“我们和黑龙江的情况不同，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我们还得走我们的‘独木桥’。”池必卿同志发言后，吉林王恩茂同志作了发言。他在介绍吉林农业生产情况以后说：“一不搞包产到户，二不搞口粮田，三不搞分队；已经搞的也只好承认。”9月18日下午，我作了发言，在谈到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领导和宣传时，我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搞一个模式。有的地方搞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是适合那里情况的，是对的，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就不一定适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如果我们不从我们那里的特点出发，去搞划队型、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那我们就将失去我们的优势了。正如中央领导过去讲的：黑龙江搞机械化我赞成，在四川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有的中央领导在插话中说，东北土地面积大，机械化程度又特别高，一切责任制都要从机械化这个特点考虑，这是他们特别优越的地方。讨论中，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胡乔木、谷牧、彭冲等都作了插话。根据

会议讨论意见，中共中央于9月27日下发了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针对当时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于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纪要》还指出，“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

从北京开会回来，省里正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和机械化开荒工作会议。趁此机会，我于9月28日到会讲话，把中央召开的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向两会的同志作了传达。我说，在这次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讨论纪要已经讲明确了，各地按照中央文件精神，结合当地情况执行就是了。中央的精神总的就是坚持农业集体化这个大方向，各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要因地制宜，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我说，中央都承认了我们的这类做法，我们自己为什么还畏畏缩缩呢？我们更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上面。至于在农业上搞包产到组，

我们在去冬今春就明确提出，在那些困难的、薄弱的地方允许包产到组。总的说，省委不提倡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因为我们黑龙江有自己的实际情况。

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75号文件）下发后，向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传达，受到热烈拥护和欢迎，农村广大干部、群众把它看成“及时雨”、“定心丸”。但是，也出现一些模糊认识，有的认为：这个文件是政策放宽，谁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有的认为这个文件是“收”，政策变了，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也不敢干了；还有些干部群众总想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走“独木桥”。针对这些思想，省委决定，各地都要在1980年冬或1981年春用10天到半月的时间分期分批培训基层干部和党员，使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全面理解文件的精神实质。

11月10日至14日，召开中共黑龙江省代表会议。我在会上讲经济工作时，批评了那些要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思想认识。我说：“为了调动积极性，搞责任制，而把集体经济越缩越小，甚至缩到一家一户，就会破坏集体经济，这是一种倒退。至于外省有些地方，地少人多，十年浩劫，集体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农民甚至连温饱都受到威胁，在那里不得不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退一步进两步，当然是正确的。我们的条件比那些地方好多了，简直不能相比，有好些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办法来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来巩固壮大集体经济，为什么非得退到那一步呢？为什么放弃阳关大道不

去走，偏要学那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地方去走独木小桥呢？人家都羡慕我们有这样的优势，有这样的条件，我们有的人却硬要丢弃自己的优势和好条件，从已有的前进阵地上退下来，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贯彻75号文件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忘记我们黑龙江的特点和优势。”当时和我们省委看法相一致的省，据农业部《农业情况特刊》1980年12月10日反映，有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西、吉林等省市。1981年春，我和陈雷、李剑白、陈剑飞、王路明、王钊、陈元直、侯捷等同志先后于5月中下旬到我省西部肇乐、安达、杜蒙、龙江、甘南、克山、拜泉、明水、青岗等9个县及齐齐哈尔市和克山农场进行农村调查，历时半个月。这次调查很有收获。所到之处，群众兴高采烈，一片兴旺景象。一是地种得快，种得好，苗全苗壮，长得整整齐齐；二是群众、干部精神状态好，有一种振兴的精神；三是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四是杜蒙、拜泉、明水这3个贫县也是一片兴旺；五是工业调整、改革也很好。形势为什么这么好呢？群众说了这样一句话：叫做“人努力，天帮忙，政策对头，领导有方”。这说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中央先后发了5个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文件，个个合民心，顺民意，收到了明显效果。也说明我们省各级党组织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1981年6月5日上午、6日上午，我向省委第39次常委会议作了汇报。在汇报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时我说，一

路所见，各县都赞成以机械化为主来考虑责任制，搞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农机队承包联产责任制有所突破，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农机队单独承包，联产计酬；第二种是农机队同农业队（组）联合承包、联产计酬；第三种是农机作业和手工作业分别承包。在汇报到1979年出现包产到组、1980年又出现口粮田时，我说，我们当时认为，应当让这部分生产队休养生息，中央政策允许的我们都允许，尊重这些生产队干部的自主权和群众的意愿，由他们选择责任制形式，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口粮田、扶贫田都可以。我们加强了引导，强调了统一耕种，不改变生产队规模，不削弱集体。这也反映了我们黑龙江省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四川的“四专一联”责任制在我省推开了，顺畅发展。

在此期间，看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张劲夫到安徽省农村考察后，认为联产到劳这种责任制形式也普遍适用于河南省的材料；也看到了杜润生同志《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其中指出适于中间社队采用的一种责任制——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他认为这种办法“既保持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优势，又吸收了包产到户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好处”。我看到后觉得，联产到劳责任制，在我们这里也可以推广。在这之前，李力安在农村调查时，肯定了杜蒙县富岗子公社一个生产队的这种做法；省委农工部副部长雪浪也到3个县调查，认为在杂粮区应提倡和推广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并向省委写了报告。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赵德尊、王路明都赞成推广联产到劳责任制。到

1981年底统计，试行联产到劳（到组）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约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50%左右。

1981年10月上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黑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王操犁、王玉生等同志参加。10月27日省委常委召开会议，听取王玉生关于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我省贯彻意见的汇报。11月3日至13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松花江、绥化、嫩江、合江、牡丹江、黑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8个地市和10个县、5个公社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省直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50多人。12月9日，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印发《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针对我省地多人少，机械化程度比较高；资源丰富，生产项目多；合作化历史长，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都有一部分贫困社队的基本情况，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必须从有利于统一经营、分工分业、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1）大力提倡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2）积极推行农机队联产计酬责任制，其主要形式是农机队承包、联产计酬，联合承包、联产计酬，按亩挂分，联产奖惩；（3）继续推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到组）责任制；（4）在那些“三靠队”可以实行几统一下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5）积极试行农业科技联产责任制；（6）努力搞好干部岗位责任制。这个《纪要》的印发，表明我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迈出了一大步。

（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1982年，以包

干到户、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在全国迅猛发展。河南、江苏、山东、辽宁、吉林等省过去都是联产到劳、包干到组、专业承包等多种形式，从1982年秋冬大批转向包干到户。这5个省包干到户都将达到90%以上。“双包”的这种发展势头，对我省的一些干部和群众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社队面临新的挑战，他们感到联产到劳不如包产到户优越性大，因为包产到户能使农民在生产、经营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实惠。从发展趋势上看，承包到户的责任制将有很大增加，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这一点，从198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已感受到了。会议期间，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听取黑龙江省出席会议同志介绍关于我省农村经济改革的情况汇报时，他们肯定了我省一些地区实行机组承包、专业承包和包干分配等责任制形式，说这是黑龙江省的一大创造。同时指出，实行面积较广的联产到劳责任制并没有解决农民经营自主权问题。根据全国农业书记会议精神 and 上述情况，省委决定，派省委书记陈俊生率领一些同志到嫩江地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进行调查；派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长王玉生率领一些同志去辽吉和关内一些省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情况的考察。

12月20日，省委常委听取陈俊生同志关于嫩江地区5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调查汇报。陈俊生说，从5个县的情况看，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要求比较迫切的是承包到户。农民为什么欢迎这种形式？他说，开始我们

感到可能是受外界的影响，但是经过了解，还是这种形式本身对群众有吸引力。主要是能使农民在生产、经营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实惠。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平均主义的弊病，个人能多劳多得，集体能多积累，对国家能多做贡献。能把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和个人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他在汇报中，还澄清了一些认识与疑虑，如承包到户会不会走向分田单干？会不会破坏集体经济？会不会影响机械化作用的发挥？会不会影响多种经营的发展？会不会种花花田，不按计划种植？会不会影响征购粮任务的完成？会不会出现贫富过分悬殊？等等。他的调查，解决了我和常委对完全放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些疑虑。王玉生同志率6名同志先后考察了河南、安徽、江苏、山东、辽宁、吉林6省。考察中，曾从河南写回中间汇报，1983年1月13日又向省委写了全面考察报告。他们两个调查组的汇报，省委经过讨论，同意报告的意见，对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2年12月下旬，在省军区召开的各市、地、县军分区武装部第一政委会议结束后，省委于12月24日至25日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我代表省委以《新的一年要有新的进展》为题作了讲话。我说，我省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自身也还在发展当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实践中通过总结经验、分析对比而不断深化。这里我想主要谈一谈对我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过程的认识问题，和大家交交心。最近，我听说下面有一种说法，叫做：“上边

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这个“顶门杠”当然就是指省委，我是首当其冲的。

我说：最近，通过学习中央领导在全国农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使我们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看了俊生同志的调查报告和玉生同志从河南省写回的考察报告，受到启发，思想透亮了，认识提高了，对现在各地搞的承包到户和以前理解的那种“包干到户”大不一样了。我说，今后在几统一的前提下，不再分哪种形式是提倡的，哪种形式是允许的，把允许搞变成有领导地搞。无论哪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只要群众愿意实行，都要有领导的实行，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适合承包到队的则承包到队，适合承包到组的则承包到组，适合承包到户的则承包到户，适合承包到人的则承包到人。简言之：宜队则队，宜组则组，宜户则户，宜人则人。

我的这个讲话，传达下去以后，受到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全省就普遍落实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很大发展。在我1983年4月25日调走后不久，据省农办统计，全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7%以上。其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占85.3%；联产到劳占3.8%，专业承包、包干分配占3.3%；联产到组占2.2%；实行小段包工、按质计酬的生产队，只剩2.9%。

（六）关于“顶门杠”问题。在回顾这个问题时，我觉得有些问题应说清楚。第一点，“顶门杠”这套喀我讲了不

久，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他在第25个问题中说“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面对如此复杂的革命实践，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议论纷纷是好事，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可以使我们减少错误，至少不犯大错误。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某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兴旺发达，根本不热心，他们热心的是个人的利害得失。合乎自己口味的就办，不合乎自己口味的就顶着不办；自己有利而国家要蒙受巨大损失的竟然胆大妄为地干，自己无利而为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的，竟敢蛮横无理地扯皮到底。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重任和权力，看做自己称王称霸的资本。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有的形象地说：‘上面放（中央放手让大家干社会主义），下面望（广大群众有改革的强烈愿望），就是中间有个顶门杠！’有同志认为这是本位主义、部门利益作怪，其实这并不代表什么局部利益，而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是党内存在的为害最大的一种歪风邪气。”

耀邦同志的讲话，传达下去后，有些同志私下议论，耀邦同志对“顶门杠”批评的很严厉，性质也很严重，这是否在批黑龙江省委和杨易辰？以后也有的同志说，杨易辰是“顶门杠”怎么还调到高检去工作了？为此事，当时力安同志还专门询问了中央组织部，他们答复说，耀邦这里讲的是“泛指”，不是针对黑龙江省委和杨易辰同志讲的。

其实，“上边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这句话，发明权不在我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2年9月8日

编印的《情况通报》230 期刊登的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写的《关于当前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在讲到贵州省的情况时说：“到 1980 年春天，不仅包到组，并且有 30% 的社队包到了户。各县干部纷纷告急，省里决定承认现状。而后经过 9 个半天的热烈讨论，作出放宽农业政策的规定，允许人均收入 50 元下的，生产队管理实在无法维持原状的可以包到户。这一规定实际上没有得到执行。群众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是个顶门杠。到年末，省里终于又进一步下了决心，撤掉顶门杠，索性将大包干从‘副册’升入‘正册’。”可见，1980 年“顶门杠”这句话就已在贵州流传了。

第二点，耀邦同志指出的那种本位主义、部门利益、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抵制中央决定的“顶门杠”，在黑龙江是不存在的。我和黑龙江省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采取的措施，都是从黑龙江情况出发的，不是什么“顶门杠”问题。如果说从黑龙江实际出发也是“顶”的话，也要做具体分析，哪些“顶”错了，哪些“顶”对了，甚至还有哪些“顶”得不够。

首先，大家知道，黑龙江的农业种植业，和全国各省相比，有它明显的特点，除高寒地区、无霜期短外，第一，地多人少，全省人均 4 亩多地，如按农村人口计算，人均达 6 亩多地。第二，全省主要产粮区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土地平坦、地块很大。农场许多地块一条垄长达两三公里。第三，机械化水平高。地多需要机械化，地平适合机械化，因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在农业机械

化上下了很大功夫。1982年末。全省有链轨拖拉机2.7万台，轮式拖拉机3.2万台，各种配套的机引农具16.1万台，联合收割机7000多台。农机中，大型机械如50马力以上拖拉机占很大比重，还有一批100马力以上的重型拖拉机。全省有了一支28万人的机械化专业队伍，机耕面积已占总耕地面积的68.2%。全省机械化的典型是友谊农场的五分场二队和洪河农场，从选种、施肥、播种、中耕、灭虫和收割全部机械化，甚至粮食的干燥、储存，也使用机械化的圆形钢仓。在推行农业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地的办法，而应从自己的特点出发，采取适合自己情况的农村政策和方法。

经过省委常委讨论，一致认为对农村拖拉机站和各农机单位，可以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不能把农业机械承包到户或到个人，也就是不能把农业机械分掉、拆碎。1983年春在全省推行联产承包到户的责任制中，我对农机的情况仍不放心，曾于3月8日至23日去齐齐哈尔、肇东、拜泉、克山、龙江等10个市县考察，看到市县和农机部门的同志和省委的认识一致，都感到黑龙江的农业机械是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不但可以促进粮食的生产，而且可以解放大批劳动力，用以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工业。他们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也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以保证农业机械的正常运转，更好地为农业种植业服务。对此我是满意的，为正确地因地制宜地贯彻了中央决议而感到欣慰。如果有人说这就是“顶”，那我也认为是“顶”对了。可惜的是我还“顶”得不够，以后农业机械还是承包给个

人，或把配套农机具分开卖给个人，农机站大部不存在了。黑龙江的农机总值 18 亿元，相当大的一部分损失了。许多搞农机的同志同我谈起此事时，都感到痛心和惋惜。

其次，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过程中，对群众的思想和要求，确有认识不深，见事迟、行动慢的问题。

当时，我认为黑龙江农村社队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有 15%—20% 的边远山区和贫困社队。对这些社队一开始就是放开的，省委讨论也规定这些社队可以实行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提倡，但也有限制。二是对 70% 左右的社队，认为存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生产发展不快。解决的办法是分工分业强调专业承包到组，或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对包产到户、到人的，已经实行的可以允许，但不提倡、不引导。所说没有放开的，主要是这一部分。实际上群众是要求放开的，他们对社队的领导并不满意，感到有劲使不出来，想在包产到户后有了种植的自主权再大干一番。对这一部分社队顶着没有放开是错了的。黑龙江省按中央（1982 年）1 号文件要求，晚了一年，这个责任主要在我。三是还有 10% 左右的社队，大都是互助合作运动以来的先进社队，领导力量强，生产发展快，除粮食产量高以外，很多社队还有工业、牧业和林业，群众生活也比较富裕。对这部分社队没有想放，甚至向他们打招呼，希望他们在包产到户的风浪中稳住。但这一愿望没有完全实现，在包产到户的冲击下，只留下甘南的兴十四大队。这个大队在 1983 年时，粮食总产 548 万斤，总

收入 145 万元，人均收入 1250 元，村办工业 3 个，80% 的劳动力种地。到了 1994 年。粮食总产增至 683.7 万斤，总收入提高到 8413 万元，人均 5000 元。只有 2% 的人（6 人）种地，村办企业达到 30 个。对于这样的社队，我感到保留下来的太少了，如果多有几个兴十四大队那该多好啊！看来，当时我虽然“顶”了，但也“顶”得不够。

第三点，通过贯彻执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我对如何正确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和决议，又有了新的感受。

依照中央的一贯指示，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议下达后，作为地方党委，首先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弄通精神实质，即中央这些决策的出发点，所要达到的目的、要求和方法；而后，对本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本地的特点、优点和弱点，以便准确地把中央精神和本地情况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生动具体地贯彻中央决策，实行中央精神与本地情况相结合。由于各地情况不一，做法也会有所不同，对此应看做是创造性的工作，是一个党组织成熟的表现，而不应大惊小怪，更不能看做是违背中央精神的“顶门杠”。

在涉及千百万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变革行动中，切记不要“刮风”。刮起风来，跟风跑，随大流，人云亦云，照章办事，这是最省事也是最容易偷懒的方法，是什么事情也干不好的。刮起风来还会头脑发热，不调查，不研究，不作具体分析，甚至闭目塞听，不看客观事实，胡言乱语。比如 1981 年，黑龙江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 4900 万亩，其中绝产 2200 万亩。特别是三江平原，几天中连降百

年不遇的大暴雨，在万分之一落差的平原上，普遍水深一尺以上，成了一片汪洋，造成粮食减产40亿斤。我曾陪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乘直升飞机视察，并向灾民表示慰问。对此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有人竟说，如果当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不会遭受那样严重的灾害了。显然，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七）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1977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作了《全党动员，决战三年，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的总结报告。我省侯捷等31名同志参加了会议。1978年2月9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了全省农业机械化问题。

这次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加强党对农业机械化的领导问题。为加强党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的领导，对省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由陈雷任组长，陈剑飞、侯捷、阮永胜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由侯捷任主任，设在省计委，负责农业机械化的日常工作。

1979年5月下旬，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4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并对我省农业机械化问题作了部署。

我认为龙江要把农业搞上去，还是毛主席教导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实现机械化，主要是解决农机配套问题，逐步地用机械代替畜力，使两套成本变为一套成本，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在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国务院领导同志说，全国要建成12个商品粮基地，

黑龙江要排在第一号。我们提出农业机械化要以机代畜、以牛代马，解决农业上两套成本问题，小平、先念同志很支持，要我们尽快抓典型，提方案。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我又同有关部门同志到松花江、绥化、嫩江地区几个县做了进一步调查。经过省委讨论，认为：当前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机配套问题。1979年，全省总耕地面积为12994.8万亩，机耕面积为8746.8万亩；共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4791万台，是全国拥有拖拉机最多的省份，还有机引农具23.7万套，联合收割机1.1306万台。随着拖拉机数量不断增加，由于农机配套跟不上去，“犁后喘”（拖拉机拉旧犁杖，人扶犁跟着拖拉机跑）的问题喊了多年没有根本解决。后来绥化县创造了“一机多挂”、“两改造”、“两适应”的经验，为农机配套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农机配套仍然不全，还得一半用机械一半用畜力，还只是个半截子机械化。

由于机械不配套造成两套成本，开销大，增产不增收。群众说，这是“两套锣鼓一台戏，两套成本一块地，马吃草料机喝油，光增粮食不增收”。据典型调查推算，在农业生产费用开支中，机械费用一般占15%左右；马匹费用一般占30%左右。有些社、队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使机械闲马匹，或者使用马匹，封存机械。这些社、队的群众对此十分苦恼。他们说：我们现在是“闲着马，使着牛（铁牛），不是马匹干吃草料，就是拖拉机干喝油，叫我真发愁”。试点经验证明，把两套成本变为一套成本，农业生产费用可以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一匹马一年消耗的饲

料、饲草和挽具费用等，大约需要 400 元，全省近 200 万匹马就得 8 亿元。一匹马一年需要饲料 1000 斤到一千三四百斤，全省马匹消耗的饲料粮食一年就是 20 几亿斤。如果按一匹马的饲料养两头牛计算，全省用养马的饲料至少可以养四五百万头牛，一年养牛收入就可以达到六七亿元。如果把以机代马过程中节省下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劳动力，用于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那又将是一个飞跃。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农机配套、以机代马、以马换牛这个中心环节，带动农业生产的全局，就将使整个农村经济全盘皆活，这是一场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克山县北联公社黎明大队有 1500 人，9500 亩耕地，原有大中型拖拉机 6 台，1978 年他们已由生产队核算过渡到大队核算。但由于机械不配套，畜力不能减下来，机马并存，两套成本，造成很大浪费。1979 年，县里在这个大队搞机械化试点，新配备拖拉机 4 台，每台（加上原有拖拉机）平均负担耕地 1000 亩，机引农具基本配套。占粮豆作物 90% 的小麦、大豆，从播种、中耕到收获可以全部实行

不仅将增加一大笔收入,还可以干一些积肥种园田等零活。这个大队有劳力 550 人,过去直接投入农业生产的有 425 人,1979 年搞农业生产的只有 40 名机务人员和 60 名积肥员,还不到劳力总数的 20%。当时,接近黎明大队水平的还有甘南县音河公社兴十四大队和讷河县老莱公社胜利大队等单位。我省国营农场,1978 年用从美国引进的成套机械设备,在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搞了全盘机械化试点;还用国产机械装备了 10 个生产队,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1979 年 8 月 29 日,国家农机部杨立功部长来电话建议,根据中央关于黑龙江机械化先走一步的精神,我们考虑由你们省革委与农机部联合给国务院写个报告。大体内容是:要把农业搞上去有很多条件,但机械化是很重要的条件,而且搞的快一点也是完全可能的。争取 1983 年、1984 年,总之在 1985 年前实现机械化。如果杨易辰同志同意,请吕洪儒同志准备资料,部里将去几个人一起搞。我当然完全同意。请俊生同志回电话给杨立功同志,并问他报告怎么写。杨立功同志讲,这个报告主要写两个问题:(1)现在有人怀疑黑龙江提出的加快机械化的方针。据我从绥化、望奎、海伦的情况看,在黑龙江把机械化搞快一些,既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机械化的发展,促进农业的发展,也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有人说,是抓机械化还是抓多种经营?土地少的地方强调抓多种经营是对的,但是在东北,在黑龙江应该搞机械化。(2)要提出 1983 年或者 1984 年、1985 年,最好是在 1984 年前全省都基本化了,在机械数量上是有保证的,包括配套农具。当然还有资金问题。1979

年12月8日，中央农机部党组、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加速实现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的报告》就上报国务院并报中央。

1980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东北商品粮基地建设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东北三省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会议一致认为，中央确定在东北加快建设以粮豆为主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是完全正确的。在东北建设商品粮基地，重点靠发展机械化。黑龙江边境地区的17个县，麦豆产区的14个县，共31个县，条件较好，先走一步。吉林重点搞中长路两侧、长白山以西、包括现有9个商品粮重点县在内的21个县。辽宁重点搞17个县。三省合计69个县。1985年前，重点是解决田间作业从种到收的机械化。

1980年7月1日上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东北商品粮基地建设问题。会议由赵紫阳主持。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薄一波、姚依林、姬鹏飞出席会议。东北三省和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我省列席会议的有赵德尊、王操犁。会议确定，东北这件事一定要办，列入长期计划。这是中国农业长期规划中的一个重大措施。德尊、操犁回省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国务院关于在东北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加快以粮食、大豆为主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的决定。省委、省革委于9月下旬召开了全省农业机械化和开荒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增产增收，给国家多做贡献；同时使集体和社员尽快富起来。必须坚持实

行省委提出的先富先化，先化先富，边化边富，以化促富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采取先化边境，后化内地；先化麦豆产区，后化玉米杂粮产区；先化山区、后化平原；先化整地、播种、中耕、运输、深松、追肥，后化除草、收获作业。会议指出，国营农场要充分发挥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的骨干作用和示范作用。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省农业机械化发展较快。1982年末，全省总耕地面积有13079.5万亩，机耕面积为9882.1万亩；已拥有大中型拖拉机8.2895万台，小型（包括手扶）拖拉机4.9037万台，机引农机具31.1万套，联合收割机1.9483万台。

（八）发展多种经营与“三三制”的农业。回顾黑龙江农业的发展历史，多种经营一直是农业发展上的一条短腿。从1969年到1977年，9年平均全省多种经营收入只占农副业总收入的15%；1978年粮食大丰收，多种经营也只占15.8%。当时全省75个市、县中，多种经营收入达到30%以上的只有19个市、县，占四分之一，低于10%的有25个市、县，占三分之一。

黑龙江省本来是全国大豆重点产区之一，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但那时大豆种植面积缩小，单产下降，产量降低，贡献减少。所以，1978年2月我在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要建立油料生产基地。要把大豆从小比例间作的夹缝中解放出来，要扭转“虐待”大豆的倾向，要在适宜种植大豆的部分国营农场及松花江、嫩江、绥化、合江、黑河地区的部分县，建立大豆生产基地。

同时要大力发展小油料生产。

要建立糖料生产基地。黑龙江发展甜菜生产条件很好，是全国最大的甜菜产区，省委确定，要把适宜种植甜菜的两个盐碱地区尽快建成糖料基地。对全省 16 个糖料基地县，实行种植计划直接下达，物资直接供应，并相应调整粮食征购任务。省委还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分别建立亚麻、大麻、烤烟和其它经济作物基地以及各种中药材基地。还要求建立畜牧基地、林业基地。在城市郊区和工矿林区要求大办副食品生产基地。办好机械化、半机械化养猪养鸡场，发展郊区养鱼。由于过去多年来对发展多种经营不够重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甚至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潘复生就大批什么“两豆（土豆、黄豆）一疙瘩（甜菜）”、“老母猪肚子是小银行”，大批什么“跑马蹄、磨胶皮”和“三辣”的种植，严重影响农林牧副渔五业全面发展。在这方面农村干部群众受害很深，余悸未消。所以，当时省委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任务很重，工作很艰巨。1978 年 5 月上旬，我在省直部办委负责人和下乡工作队队长会上的讲话中，着重讲了正确处理“主体”和“两翼”的关系和正确处理农、林、牧三者关系的问题。所谓“主体”，是指农业；“两翼”是指多种经营和社队工业。当时尚志县抓“主体”促“两翼”，抓“两翼”保“主体”的做法省委认为很好，决定在全省大力宣传推广。因为当时全省多数地方是“主体”不牢，“两翼”很小。以绥化地区为例，1977 年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 14%；社队工业产值仅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12%；

多数县、社基本上还是处于农业单打一的状态。

1979年省委提出，要把平原的种养加、山区的种养采加搞起来，首先要把种养这个基础打好，以种养保加工，以加工促种养，形成种养加一条龙。发展种养要贯彻“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大办以粮、油、薯、糖、麻、林、果、菜、药、杂为主要内容的种植业基地；大办以牛、羊、猪、禽、兔、鱼、蚕、蜂、貂、鹿为主要内容的养殖业基地。还提出大办种养基地要和农业的区域规划结合，把培植资源和利用资源相结合。要求各地根据自然资源的特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草原利用草原，有什么优势就发挥什么优势。

1981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中央的批语中指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看了中央文件后，在4月14日批了这样一段话：“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这确实是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中央这个通知是关于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文件。必须要求全党特别是地、县委认真学习，并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推广典型经验，做出适当的规划，一定使我们农村的多种经营有一个大的发展。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单一抓粮食生产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不能广开生产门路，也有碍机械化的发展。搞机械化就闲下很多劳动力，就不得不放慢机械化的速度，这已是我们放慢机械化的一种理由了。我们一定要通过学习13号文件，打开我们的思想局限性，切实贯彻执行中央

指示的精神，使我们在多种经营上有个新突破、新发展，从而改善农村的经济结构，这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环节了。”

1981年5月，我和有关部门同志到西部9县进行调查。一路上多次讲到农垦部副部长杨煜同志的一句话：“看了关内感到农民实在难富；看了黑龙江，感到富起来实在容易。”这句话对我们有褒又有贬。我们确实应当进一步加深对我省资源优势的认识。肇东县涝洲公社过去光种大包米，是个高产公社。近两年因地种植，涝洼地改种水稻，沙包地改种花生，高岗地继续种包米，沟泡造池养鱼，全公社收入由320万元增加到520万元。半农半牧区的杜蒙赛罕他拉公社，把黄牛放给社员养，一繁殖，二改良，一头母牛生两个改良牛犊。1979年末，全公社黄牛2800头，到1981年5月已增加到5200头。赛罕他拉公社的经验，指给我们一条“黄牛大发展、全改良”的路子。当时我反复考虑，发展多种经营和经济作物，涉及一个农村经济结构问题。经过研究，提出粮食、经济作物、多种经营这三个方面，按产值计算，各占三分之一。全省各地区情况不同，不能完全一样，可以有多有少，但总的概括为“三三制”，即三三制农业，三结合的经济。我向常委汇报后，省委常委同意这一提法。

1981年8月下旬，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多种经营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黑龙江农业的发展战略问题》的讲话。新的农业发展战略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要改变单一的、自给的农业，建设大农业，商品性农业。我们要向那些多种经营搞得好、商品经济发达的省学习。第

二，紧紧抓住联产计酬责任制、多种经营和农业机械化这三个环子。胡耀邦同志讲，农业要重点抓住责任制和多种经营这两个环子，我们完全赞成。从我省的特点来看，应当加一个环子，就是农业机械化。第三，搞大农业、商品性农业的目的，就是实现人均 1000 美金左右的“小康社会”。

关于怎么处理好“三三制”之间的关系和实行“三三制”的农业结构，要从各地实际出发，主要是给干部和群众一个调整农业结构形象的概念，而不是让各地死卡比例。

这次会后，10月24日下发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若干政策的补充规定》，共 18 条。这次会议和这个规定，对全省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九) 让畜牧业有个大发展。1978 年黑龙江牲畜饲养量 1300 万头，比上年增长 2.6%，存栏达到 800 多万头，比上年增长 0.5%。其中，出售肥猪 239.6 万头，比上年增长 4.6%。但总的来说，畜牧业处于“一慢、四低、两少”的状况。“一慢”，就是发展速度慢。建国 30 年来，全国各种牲畜总头数平均每年递增 4.5%，我省只增长 4.1%。“四低”，就是牲畜的繁殖率低、出栏率低、商品率低、草原载畜量低。我省每头母猪年成活仅 5 个仔，牛四成犊，马三成驹，羊五成羔。猪的出栏率仅 50% 左右。“两少”，就是畜牧业的收入少，对国家的贡献少。黑龙江省是全国十大牧区之一，但畜牧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 13.9% 左右，只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针对这种状况，我多次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加快畜牧业发展问题。

1979年6月13日，省委在省畜牧局党组《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过去省委的提法是把我省建成商品粮大基地，现在经省委研究更加明确地提出，把黑龙江省建成以商品粮为重点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的农业大基地。省委同意把安达和杜蒙两县确定为牧业县，把粮食任务核减下来。各半农半牧县也要强调突出牧业，逐步过渡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全面发展。牧区、半牧区可以按牛羊猪禽的次序发展畜牧业。农区要在大力发展养猪的同时，根据以机代马的趋势，要逐步以马换牛，把养牛生产发展起来。省委在批语中还指出今后看畜牧业成绩时，要看总头数和商品率，把着眼点放在努力提高商品率上。省委同意《报告》提出的建立5个牧业体系和5个牧业基地。5个牧业体系是：（1）抓好饲料生产管理体系；（2）抓好牲畜繁育改良体系；（3）抓好畜牧业机械化的生产管理体系；（4）抓好畜禽疫病防治体系；（5）抓好科研、教育体系。建设好5个牧业基地是：（1）在安达、杜蒙、富裕、泰来、龙江、甘南、林甸、肇源、肇州、肇东、兰西、青岗、明水等13个县建乳肉兼用牛生产基地；（2）在滨洲铁路沿线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杜蒙、安达、肇东和双城等3市4县建奶牛生产基地；（3）在中部农区的双城、五常、呼兰、阿城、宾县、巴彦、绥化、望奎、海伦、绥棱、拜泉、克山、克东、依安、讷河、北安等16个县建商品猪生产基地；（4）在东部农区宁安、林甸、

海林、桦川、依兰、勃利、集贤、桦南、宝清、汤原等 10 个县建半细毛羊生产基地；（5）在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鹤岗、双鸭山、鸡西、七台河、伊春、绥芬河等 11 个市，建城市郊区牧业生产基地。省委认为，这些都是加快畜牧业发展，提高畜产品商品量的重要措施。要求各级党委要从指导思想、工作抓法、干部配备和资金、物资投放上，把畜牧业突出起来，真正把农林牧三者各放在应有地位。要求地、市、县、社各级党委和革委，都要有一名副书记、副主任亲自抓畜牧业。

1981 年，我省畜牧业生产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农村社、队和社员养畜的积极性很高。从农村到城市，出现了养奶牛热、养山羊热、养绵羊热、养鸡热。到 1981 年 6 月末，全省奶牛存栏 9.2 万头，比 1980 年同期增长 27.8%；奶山羊 18.7 万只，比上年同期增长 46.3%；绵羊 318.7 万只，比上年同期增长 15.6%。禽 2836 万只，比上年同期增长 24%。城市郊区养鸡有更大幅度的增长。据哈、齐、鹤、佳 4 市统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42.8%。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各种畜产品的商品量均创了历史新水平。猪的商品量 1978 年以前最高只有 180 万或 190 万头，1978 年突破 200 万头，1979 年、1980 年两年达到 300 万头。菜牛 1978 年 6 万头，1980 年达到 9 万头。菜羊 1979 年 4.9 万只，1980 年达到 27 万只。牛奶 1978 年 8.7 万吨，1980 年达到 12.3 万吨。全省人均占有畜产品的水平有很大提高，肉类由 1978 年的 17 斤，1980 年增到 24 斤；奶由 5.6 斤，增加到 8.7 斤。但就全面来说，畜牧业仍是农业经济

中的一条短腿。

1982年，胡耀邦同志开完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便于8月13日来黑龙江省视察。我从北京陪同耀邦同志一块前来，当时陪同胡耀邦前来视察的还有胡启立、杜润生等同志。耀邦先后视察了齐齐哈尔、克山、哈尔滨、大庆等市、县。视察中，针对我省发展畜牧业的诸多有利条件，要求我们把发展畜牧业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并着重强调发展奶牛生产。他几次讲：如果办法对头的话，黑龙江省10年或者15年搞到100万头奶牛，不一定是很困难的，你们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希望有关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都算算这个帐，在那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如果一户一头奶牛，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小康水平了。

省委为了贯彻落实耀邦同志的这些指导思想，责成省委研究室、绥化地委研究室、安达县委办公室向省委写了《安达县发展畜牧业的调查报告》；省委研究室还和齐齐哈尔市委研究室写了《齐齐哈尔市奶牛生产调查报告》。省委进行了讨论，认为，耀邦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完全符合我省实际情况，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要加快发展奶牛生产，重要途径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积极推行适合当地情况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充分调动国营、集体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当时经过初步预算，我省的奶牛生产搞好了，再加上黄牛改良，到1990年力争达到100万头的目标是可能实现的。为此，省委要求：（1）要提高奶牛在畜牧业中的地位；（2）实行国营、集体和个人饲养并举的方针；（3）大力推行黄牛改良奶牛；（4）认真搞好草原管理建设；（5）乳

制品加工业必须跟上奶牛生产的发展；（6）要重视奶牛生产的科学技术工作。

这之后不久，国家农牧渔业部畜牧局李勇、省畜牧局康宝中、新华社记者马成广等3位同志，对安达县火星大队的奶牛生产作了调查，写了一篇以《一个养奶牛专业村的兴起》为题的调查报告，刊登在新华社的内部材料上。胡耀邦同志看过以后，指示省委注意这个材料。我看到这个材料后，于1982年10月24日主持召开了发展奶牛专业生产问题座谈会，并形成了《关于发展奶牛专业生产问题座谈会纪要》，指出奶牛生产已进入一个向专业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的新阶段，养奶牛和种粮食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个经营方针问题；实行集体和个体饲养并举，并以个体为主的方针，仍是奶牛生产大发展全改良的关键；要注意饲养奶牛政策的稳定性；饲养奶牛专业生产队和专业大队的出现，以及饲养生猪、绵羊、家兔、蜜蜂、水貂等专业生产队和专业大队的出现，反映出我省畜牧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大好形势，应当引导顺畅发展。

（十）社队企业摆上各级党和政府的重要日程。1977年我主持省委工作后，省委、省革委对发展社队工业很重视。1978年1月上旬就召开了黑龙江省社队工业工作会议，陈剑飞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在当时是建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省性的社队工业工作会议。

为加速发展社队企业，1978年8月成立省社队企业局，9月任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计委主任侯捷兼任省社队企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当时黑龙江的社队企业虽取得一定成绩,但总起来说,发展缓慢,与先进省份相比差距很大。从1977年社队企业总产值看,江苏是55.7亿元(超过当时大庆产值),山东是45.3亿元,辽宁是22亿元,我省是7.9亿元,仅是江苏的七分之一,山东的六分之一,辽宁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居全国第14位。从县、公社、大队三级经济中公社、大队两级占的比例看,山东省是44.1%,江苏省是41.6%,全国平均是29%,我省是19%。

为了进一步加快社队企业的发展,1979年3月,我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省社企局关于加快发展社队企业情况和意见的汇报。讨论中,大家感到,我省条件好,多年来社队企业发展不够快,归结起来还是周总理批评我们的那两句话:“捧着金碗要饭吃,长袖不善舞。”我们的工业,大的多、国家的多、重工业多,地方工业少、赚钱的企业少、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和社队企业少。特别是对集体所有制和社队企业扶持不够。我们虽然总讲工业扩散,采取“分枝”、“下蛋”、“转让”等形式武装社队企业,但执行得差,有的“下个蛋”,搞好了就往回收,青年点办的工厂也往回收。1976年,全省财政会议就提出对社队企业要实行免税、减税政策,提出要“先养鸡,后吃蛋”。后来中央又发了〔1978〕47号文件,对社队企业实行免税和低税的政策,这些至今有些地方没有落实。还有些领导认为“粮食上纲,书记好当”,“粮食不上纲,社队企业顾不上”。省委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定期讨论研究社队企业工作。各地、市、县都要成立社队企业领导小组,都要

设立专管社队企业的机构，列行政编制，并要指定一名党委副书记或副专员、革委会副主任兼任社队企业局长，负责具体抓好这些工作。省成立社队企业领导小组，由陈雷任组长。

国务院于1979年7月3日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18条”。我说，这可是个好文件，要及早发下去。

1979年10月下旬，以省委、省革委名义召开了全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共1600多人参加，这在我省还是第一次。我在会上作了《社队企业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要来一个大发展》的讲话。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必须解决：（1）大办生产基地。（2）社队企业应以独立经营、“小而专”为主，也可以搞合营、联办。（3）贯彻经济合理原则。对那些社队能办的企业生产和项目，县以上就不要去办，已经办起来的要转让给社队去办。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的一体化，必须把社队企业产品的销售渠道搞畅通。（4）工业要发挥主导作用，支援社队企业。国营工矿企业可以与公社搞合营联营，工厂出设备、出技术，公社出劳力、出原料，为国营工业生产配套产品；也可以采取产品脱壳、“母鸡下蛋”的办法，把老产品、老设备让给公社。

经过一系列工作和调整，到1982年底，全省乡镇企业（不含城镇街道办企业）2.3万余个，从业人员64.9万人，公社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2.5亿元，1982年总收入16.6亿元，实现利润2.6亿元。有了很大进步，但和一些省比差距仍很大。

七、为使工业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一)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1977年2月9日，中共中央调任仲夷同志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后，省委书记改由我分管工业，省委常委陈剑飞同志继续分管工业。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为了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解决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对工业学大庆运动抓得很紧，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1977年3月23日至29日，省委、省革委会在大庆市召开了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3月25日，我在会上作了报告。根据省委常委讨论的意见，我讲了五个问题：(1)高举大庆红旗，坚持在斗争中前进。(2)紧密联系工交战线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企业内部要着重解决：(1)要不要党的领导？(2)要不要搞好生产？(3)要不要规章制度？(4)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5)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6)要不要有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3)抓纲治国，努力创办大庆式企业。(4)广泛开展以增产节约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面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5)全面规划，加强领导。3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在闭幕式上讲话。会上，省委向大庆27个先进单位赠送了锦旗，向哈尔滨水泥厂等55个大庆式企业、83个学大庆先进单位、8个

先进集体和 57 名“铁人式”模范标兵颁发了奖旗、奖状。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4 月 20 日在大庆开幕，5 月 13 日在北京闭幕。黑龙江省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 342 名，由我担任代表团团长，陈剑飞担任副团长。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后，省委常委用了几天的时间进行学习讨论，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5 月 13 日，召开了省直属机关工业学大庆誓师大会。为加强对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领导，省委成立了工业领导小组，在省工交办设立政治部，充实和加强政治工作机构，重点抓好学大庆运动。省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常委和工交办，要分别抓一个市、一条战线和一个重点企业。各局要坚决实行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蹲点，三分之一抓面，三分之一处理机关日常工作）。要有一二名局级干部蹲点。

7 月 8 日，省委、省革委会下发了《黑龙江省普及大庆式企业规划（草案）》。提出，到 1980 年，全省 1.2 万个企业，有二分之一建成大庆式企业，其中 569 个县团级以上企业，有三分之二建成大庆式企业。为此，省委要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地、盟、县、旗委在抓好农（牧）业的同时，抓好工业。市委要首先抓好工业，同时也必须把郊区农业搞上去，做好支援农业的工作。省、地、盟、市、县、旗委都要设专管工业的书记，没有专管工业书记的，今年要配上。省、地、盟、市、县、旗委建立和健全工交政治工作机构。省直工交各局设立和加强政治部（处）。

1978 年 5 月 20 日至 29 日，省委再次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会前，省委组织各地、盟、市主管工业的领导

同志和部分县旗以及重点企业的负责同志，到全国学大庆先进单位鞍钢进行学习。鞍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把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创办成大庆式企业。27日，在省委工业学大庆的会议上，陈剑飞代表省委作了《动员起来，加快普及大庆式企业步伐实现工业生产新跃进》的报告；28日，我作了讲话。

第一点，讲反骄破满，大批“外因论”，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进一步发展我省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当时省委觉得“揭批”运动处于停顿状态，有的单位走了过场，工作还是老样子，运动没有生气，工作没有朝气，群众感到不顺气。比如，省直机关几十个部、办、委、局，相当一部分是否真正把本单位问题的盖子彻底揭开了，真正把问题解决深透了，像冶金部那样大干快上了呢？这些单位群众说有“四不顺”：不顺眼、不顺气、不顺心、工作不顺手。这样的地方和单位工作怎么能大干快上呢？！省工交各局中，有的班子是散着的，有的连维持现状也维持不了，谈何大干快上？这些问题和省委领导下不得手有关系，我们是有责任的。再等、再拖，就要耽误大事了。据当时调查，学大庆真正学得好的，只占20%左右；对学大庆有认识，工作有成绩，但步子迈的不大，效果不够显著的，约占50%；还有30%的企业学的不好，甚至还没有上路。从工业生产的情况看，虽有较大增长，但远不如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快。所以，要反骄破满，大批“外因论”，把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不然在新的长征路上就迈不开大步。

第二点，讲在新时期中，我省工业所处的地位和担负的任务。我说，黑龙江省已经建成以石油、煤炭、木材、重型机械为主的国家重要工业基地之一。197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90亿元。大庆石油占全国的一多半；煤炭产量占全国第4位；林业商品木材占全国80%；机械工业和军工企业较多；以食糖、造纸为主体的轻工业也在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我省一年运往外地，支援全国的煤、木、油和机械工业产品，按重量计算达7000万吨，而运回我省的工业品只有700万吨左右。这说明，我省的大工业和重点企业是面向全国，为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以及缺煤少电、缺钢少铁、经营管理混乱等原因，这几年我省工业发展速度缓慢，同全国和先进省、市相比，我们的差距很大。从发展速度看，1970年至1976年间，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7.8%，我省只增长5.5%；从工业内部的关系看，发展不协调，主要是支农工业、轻工业，社队工业比重小，从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看，当时全省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产品质量不如历史最好水平，原材料消耗高于历史最好水平。由于劳动生产率低，消耗大，质量差，废品多，开支增加等主观因素，全省工业一年少收入约2.2亿元。这些都说明，我省工业同国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第三点，强调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说，我们要“像欧阳钦同志那样，看准目标，坚定不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各级领导干部要带领群众大干实干，

经过踏踏实实努力，使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面貌日新月异，年年有新的突破。如果你那个地区或单位，一年不见成效，应该受到批评，倘若3年过去了，还是山河依旧，面貌未改，那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你那领导当的有啥味道呢！用欧阳钦同志的话说，你就不要“占着茅楼不拉屎了”。

回顾粉碎“四人帮”后的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必须明确：第一，应充分肯定大庆的基本经验和大庆为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大庆不愧是我国工交战线的先进典型，大庆职工不愧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大庆的许多宝贵经验，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第二，我省工交战线学大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创建和命名的一批大庆式企业，绝大多数在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这也应给以充分肯定。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对工交战线在当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三，在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运动中，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如把大庆的经验几乎都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甚至把有些经验绝对化、模式化；在普及大庆式企业中要求过急，有形式主义、不从实际出发、生搬硬套等问题。中央说“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有关的上级领导”。就我省存在问题来说，也应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省委，特别是我的责任更大一些。

（二）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

字方针。1979年4月5日至28日，我在北京参加了24天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听取和讨论李先念同志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报告。他说，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国务院认真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现状，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必须在前两年经济恢复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集中3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这是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复酝酿、慎重考虑之后，作出的重大决策。

4月9日上午，我在会上作了发言。首先，我对先念同志的讲话表示完全拥护，认为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当前情况，也完全符合我省情况。我说先念同志讲的比例失调五个方面我省都有。从我省看，失调问题最大的是三个方面，就是“基础”不“基础”，“先行”不“先行”，“骨”“肉”不配套。一是农业基础不稳固。过去我省平均每年向国家上交粮食20—30亿斤，这些年垮下来了，现在是丰年有贡献，平年能自给，歉年还要挖库存。二是煤电等先行工业十分薄弱。全省缺电60万千瓦，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企业每周开工三四天，还有一部分企业停产待电，新建成的企业也缺电，如任仲夷所说，新厂建成之日，就是停产等电之时。我们西部电保了大庆，东部电保了四大煤矿，再加上重点企业，地方企业供电寥寥无几，连农业用电都得压缩，去年全省每亩耕地的用电量比1977年下降了7.7%。我省油是外调的，煤也是外调的，但同时我们也是严重的缺煤省，每年缺口400万吨左右。三是要补一些生活上欠

帐，使“骨”、“肉”关系逐步协调一些。总起来说，在调整中，农业、煤、电应当大补；人民生活欠帐，轻工业可以适当补，使这些部门的比例关系逐步得到调整。

4月21日到27日转入讨论小平同志的讲话。

对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回省后先向常委作了传达。接着于5月23日至6月1日召开省委第四届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我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强调按照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我说：“调整中有进有退，有上有下，退是为了进，下是为了上，因此调整是积极、前进的方针，而不是消极、后退的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要同时进行，要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力求取得全面效果。今年是三年调整的第一年。三年看头年，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好今年的调整任务。”“各地区、各单位、各条战线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决定应该上的项目，要坚决上得去，决定应该下的项目，要坚决下得来，真正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1979年8月上旬，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在会上我针对经济领域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还没有完全打破，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仍很严重，全省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财政方面，至今没有活起来，工业生产发展缓慢，财政上也很被动的情况，强调我们省委和各级党委如果不从指导思想上来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工作就活不起来。我说，调整国民经济，首先是调整工业同农业的比例关系，坚决把农

业搞上去。在三年调整时期，做好三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是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搞好农田基本建设，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二是要改变农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农林牧三者的比例关系。三是要搞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域规划，做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适地适种，发挥各个地区不同自然条件的优势。

其次要搞好工业内部调整。一是通过调整，把电力、煤炭工业搞上去，把农用工业搞上去，把轻纺工业搞上去，从根本上解决我省工业内部构成不合理的问题。二是在调整中，要逐步改变我省工业内部“三多三少”的经济结构。

关于工业的调整，我在1979年12月1日经济问题调查汇报会上又一次强调，非把轻纺工业调整上去不可。如何利用我省的优势，发展轻纺工业？我指出，主攻方向应当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1）大力发展以木制家具为重点的各种木制品，在木材综合利用上大做文章。林区要以吃“三个剩余物”为原料的综合利用，重点发展“三材”（小板材、小方材、木片材）、“四料”（门窗料、家具料、小农具料、炊具料）、“五板”（纤维板、刨花板、胶合板、木丝板、细木工板）。在木材上不仅要搞一次加工、还要搞二次、三次加工。家具要往高、精、尖、新上发展。（2）大力发展以麻、毛、丝、化为原料的纺织工业。（3）大力发展以甜菜为原料的制糖工业。（4）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工业。（5）大力发展以芦苇、稻草、麦秸、木片为原料的造纸工业。（6）大力发展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照像机这几大件和家用电器电子产品。

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到 1980 年底，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有了明显变化，经济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尤其是在加

工厂，使我省从原来的油、酒、米、面、铁、木、皮、麻的工业有了重大改变。这是很宝贵的，是我省经济前进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型结构的基础。

(2)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全国宣布两个半重工业基地，一个是辽宁，一个是我们黑龙江，半个是山西太原。那时我们感到很自豪，躺在22项上，重点发展了机械工业和石油、煤炭、森林工业，使轻工业长期成为一条短腿。

(3) 60年代初，周总理就批评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工业。根据总理的指示，当时我们也提出要补长轻工业和多种经营这两条短腿，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几次失掉时机。大跃进时期我们给钢铁元帅让路，没有把轻工业这条短腿补上来。

(4) 1962年第一次调整时期，我们应该转而没有转过来。相反的，把当时仅有的一些轻纺工业厂子有的也下马了，社队企业也搞掉了，省内的一点钢铁工业搞的光光的。

(5) “文革”期间，本来石油是近水楼台，可以把石油化工搞上来，但没有搞。几次机会都丢掉了。在分析了这些情况后，我提出这次调整，是一个转折的关键时刻，要把我省由重型结构转变为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结构，这是具有战略性的措施。我在讲话中还提出，机械行业过去提要少关停、多并转，现在还要提变关停为并转联，这样可以救活更多企业。就行业来说，特别要抓轻纺、食品工业，也就是“糖、纸、乳、革、麻、毛、丝、化、粮、豆、木、薯”12个字的内容。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支持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

我省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逐步扭转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经济效益有所改善,国民经济在调整中有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从1979年到1983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2%,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虽然增长速度不算高,但没有大的起伏,是步步上升,是实实在在的速度。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有所扭转。在工农业总产值中,1978年重工业所占比重高达54.8%,轻工业只占22.7%,农业只占22.5%,农轻重之间的关系很不协调。1983年比1978年,农业总产值增长39%,平均每年增长6.9% (“文革”10年平均每年增长3.8%);轻工业总产值增长64%,平均每年增长10.4%;重工业在调整中放慢了速度,1983年比1978年,重工业总产值增长19.5%,平均每年增长3.6%。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比例(以农业增长速度为1)是1:1.51:0.52。在工农业总产值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22.5%,提高到1983年的28.3%;轻工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22.7%,提高到1983年的23.8%;重工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54.8%,下降到1983年的47.8%,开始扭转多年来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从工业内部来看,轻重工业之间,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逐步扭转了互相脱节的状态。1983年与1978年比较,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3.6%,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0.4%,轻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6.6%上升到33.3%。从农业内部来看,逐步改变了过去“以粮为纲”所形成的单一的农业结构,农林牧副渔,粮食作物与

经济作物都得到了全面合理发展。1983年与1978年比较，在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9%的情况下，农业种植业和林、牧、副、渔产值分别增长4.7%、15.8%、10.6%、17.2%和30.3%；在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种植业所占比重由78.9%下降到71.3%，其它各业由21%上升到28.7%（其中林业由4.1%上升到6.1%，牧业由11.2%上升到13.3%，副业由5.5%上升到8%，渔业由0.2%上升到0.53%）。在农作物产值中，粮食及其副产品所占比重由85.5%，下降到79.1%，经济作物由14.5%上升到20.9%。

八、开创科技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1977年7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的决议。8月4日，邓小平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小平同志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他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这使我和省委的同志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认识有很大提高，树立靠科技和教育振兴经济的思想。

一、抓好对科技整顿政策和规划的三落实。根据中共中央《通知》精神，省委、省革委于1978年1月20日至26日召开了全省科学大会。与会代表1800名。是当时我省科技战线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省委书记王一伦同志代表省委作了报告；我到会作了讲话。据了解，当时在开展科技工作中，有些同志还心有余悸。有的同志对“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科研走在生产建设前面等等，不敢理直气壮地讲，不敢大胆地干；有的同志对中央指示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有成就、有突出才能的科技人员，在工作条件上要保证，要恢复技术职称等要求，不敢认真去落实；有的同志对中央规定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不敢积极去安排，等等。总之，怕这怕那，不外乎是怕说复辟，怕说否定“文化大革命”。头脑中有个“怕”字，怎么能不心有余悸！所以，我首先着重讲了彻底砸碎“四人帮”造成的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来个大解放，是当时发展科技事业的一个关键问题。其次，强调了科研和生产结合，科研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科研要为实现省五届人代会提出的八年奋斗目标服务，围绕这个目标制订全省科技规划，确定主攻方向，确定重点题目，组织、协调力量，开展攻关会战，早出成果。当时不少地方和单位的领导还没有跟上向科学进军步伐，用群众的话说是“两头热，中间凉”，即党中央高度重视，无比关怀科研工作，抓的紧、抓的实，这是上头热；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广大群众兴高采烈，大干实干，

这是下头热。中间凉说的是我们省委和一些地方、单位的领导同志，认识不高，抓的不紧，落的不实。据此，我强调从领导上，一个是要解决认识问题；一个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把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三抓紧”（抓紧搞好整顿、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紧制订科学技术规划）变成三落实。光停留在嘴巴上、纸上、会议上不行，要拿出切实的措施来，真正解决问题。

为了落实中共中央《通知》中提出的“三个抓紧”，我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采取了具体措施：1. 成立了省委科技工作领导小组，由王一伦同志担任组长。省科委由省委和省革委直接领导，管理全省科技工作。恢复了省科学院和省科学技术协会。充实、加强了省科委、省科学院和省科协的领导班子。2. 为了填补我省基础科学研究的空白，加强新兴技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将省石油化学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划回省科委领导。还筹建了省农业现代化综合研究所、自然资源考察利用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室、全省分析测试中心和计算中心、精密科学仪器研究所等。同时，准备扩大省技术物理研究所，增设激光研究室，扩建科技印刷厂，筹建科技出版社。3. 提出了全省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和重点项目讨论稿，并在全省科学大会上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与此同时，全省地、盟、市、县、旗党委普遍成立了科技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科技队伍的普查工作，对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对“文革”中受审查未作结论

或结论不适当的，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一些冤案给予昭雪。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已经恢复。不少地方和部门还晋升了一批科技人员的专业职称。在不断巩固发展农村四级农科网的同时，工业科学实验网也正在煤炭、林业系统逐步形成和发展。一些工矿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科研机构。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空前活跃。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正在兴起热潮。

在此期间，我和陈雷同志还指示省科委要在前段科技干部普查的基础上，对在哈的省直科研单位进行重点调查。他们经过调查提出了急待解决的8个问题，如一些科研机构的领导班子问题，科研工作条件问题，科技人员的住房问题，部分科技人员两地生活和落户问题，关于保证六分之五科研工作时间问题，一些受审查科技人员的政策落实问题，一些科技人员用非所学、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关于科技干部管理、晋升技术职称和科研津贴问题，等等。对这些实际问题，我和省委常委们都认为，一定严肃认真地逐步解决。但由于过去积累的问题太多，凡是当时能解决的，尽一切可能加以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要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明确分工，建立责任制，有步骤地抓紧解决。应该承认，有些问题解决的比较好，有些问题，由于主客观因素，解决得并不尽如人意。

1979年1月8日，我在中共黑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要转得快、转得好，必须大力发展科技事业。我指出：“党中央对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十分重视，我们的认识和工作远远没有跟

上。为了加速黑龙江省作为国家粮食、木材、能源、机械基地的建设，一定要把科学研究搞上去。”

197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国家科委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1980年3月4日，省召开了全省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省委书记李剑白代表省委在会上讲了话。当时全省科技干部有28.2万多人，科学研究机构400多处。由于党的政策落实，推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了1300多项科技成果。今年初，省委省政府奖励了104项重大科技成果。李剑白同志在讲话中在肯定科技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的同时，明确指出，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我省科技工作远不适应发展的要求。突出地表现在科学技术计划与全省国民经济计划结合的不密切，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工作不成比例，科学技术是个短线。科研与生产缺乏紧密的衔接，科技成果不能及时得到推广应用。有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是“墙里开花墙外红”，被外省外地采用去了。他强调：我省科学技术必须从我们的资源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科学文化条件出发，着重解决我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急需的科学技术问题，当然也要考虑到长远建设的问题。他还强调了注意抓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提出对“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科研人员，一定要配备符合他们心愿的得力助手。允许有特殊才能的科技人员在一定范围内交流。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科研、生产和教学单位的科技人员可以相互聘任和兼任”。最后他说：“省委、省政府对高级科技人员在副食、细粮和住房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给

予了必要的照顾，还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中级科技人员的问题。他们是我省科技工作的主力，他们工作任务重、家务重、收入少，生活困难多一些，要倍加体贴。对常年在野外搞科学实验的地质、勘探、农业、林业、水利等科技人员，要给予必要的劳保用品和野外津贴，抓紧解决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来，为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全省科技经费投资逐年增加。1983年投资总额1.21亿元，比1979年增长48%，平均每年增长12%。科学技术队伍不断扩大，1978年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科学技术人员23.3576万人，1983年10月末达到32.6371万人，总人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居第5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效。从1979年到1982年，经省政府奖励的重要成果共428项。这些成果的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仅1982年已推广的70项科技成果，就创产值3亿多元。

1979年以后，社会科学有很大发展。1979年3月成立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部分省直单位和地、市、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30多个社会科学研究单位。我调走时，全省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人员有4000余人。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到1982年6月已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我省知识分子在“文革”和反右派、反右倾中的冤假错案共12096起，已平反和改正12046起，占99.6%。三中全会以来，全省共吸收17348名知识分子入党，加上原有知识分子党员，已占知识分子总数的23.5%；

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基本得到了调整；各地一大批知识分子评定和晋升了职称；全省在知识分子中提拔的领导干部1.9373万名。初步改善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全省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教学楼、实验室等基建投资费用，每年递增10%左右。仅1982年从省地方财政中拿出1170万元补助高级知识分子建宿舍，加上各地、各单位的努力，使高级知识分子住房紧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南方籍的中级科技人员的细粮供应、保健问题给予了一些照顾。

同时应该承认，科技人员的政治待遇、住房、晋升技术职称、进修和工资奖励等方面都有许多问题解决的不好。加上一些领导干部还存在忽视科学技术的问题，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安心边疆工作，仅1980和1981两年，全省外流知识分子就达3250人。我省科学技术虽有一定基础，对促进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同先进的兄弟省市相比，差距很大。我省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能源浪费大，产品竞争能力不强，经济效益较差，科学技术落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同省里财力不足，导致科研经费不足，科技三项费用缺口较大有关。

二、科学技术基础在教育。关于教育工作。我对教育一向是关心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因为老伴肖塞长期在省教育部门工作，她常向我讲些教育部门的大事，遇到问题也找我共同研究，这有利于我对教育的了解。但真从省的领导人地位抓教育，那是在我重新工作以后的事。

1978年1月30日至2月3日，省里召开教育战线先

先进集体、优秀教师代表大会。表彰了全省教育战线 20 个模范单位、30 名模范教师、259 个先进集体、896 名优秀教师。他们邀请我参加会议，我欣然应允。1 月 30 日，我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我说，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科学靠教育，大学靠中学，中学靠小学，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类学校都是培养科学人才的重要基础。人民教师就是砌这个基础的工程师。我强调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支持教师的工作，尊重教师的劳动，并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要大造教师光荣的社会舆论，对教育事业做出优异成绩的教师，要大张旗鼓地表彰。我针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够的问题强调要抓紧工作，对教师的一切诬陷之词，必须尽快推倒；对教师的冤案，必须尽快昭雪；审干没有结论的要赶快作出结论；用非所学的要适当调整。在政治上要关心广大教师的成长和提高，教师听报告、看文件要和机关干部一视同仁。广大教师在生活上的困难，如工资低、住房紧张等，党组织是了解的，将逐步给予解决。我还针对一些党委和一些领导同志对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强调指出，搞好教育工作，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抓好教育是全党的大事，光靠教育部门不行。毛主席曾经指出：“省、地、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容许的。”我说：“从我们省委做起，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管教育，主管书记要抓紧抓实，党委的一班人都要关心，一年要讨论研究几次。计划、工交、财贸、农业等部门和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持教育工作。”

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省里于6月召开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我在会上又一次讲话。根据省委常委会议的意见，我讲了省委决定成立文教政治部，充实文教办公室，恢复省教育学院和教育科学研究所。为了解决全省顶编代课教师问题，每年增加一些劳动指标。在年底前解决各单位占用学校的房子；从省里自筹经费中，拨1000万元，补助教育经费不足；从省机动的基本建设投资中拨给教育1000万元，解决高等学校学生宿舍、中小学二部制和教职员工宿舍问题。李剑白同志最后作了总结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等教育结构进行改革。为什么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要把职业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上呢？这要从1978年我省中等教育结构现状说起。1978年全省普通中学发展到4065所，比1957年“一五”末期的211所，增加了19.5倍。而中等专业学校，1978年只有209所，只占中等学校的4.9%；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生只占中等学校在校生的2.4%。由于办学形式单一，普通中学发展过快，职业中学发展过少，带来的问题就是高中毕业生当时只有百分之四五能考上大学，这与“文革”前的情况不同。如1949年至1965年期间，高中毕业生最多的年份是1.1万人，大学招生平均6000人左右。1965年，高中毕业生1.05万人，大学招生6500人，录取比例不到2比1，需安排就业的4000多人。1979年，高中毕业生22.6万人，大学招生1.1万多人，考上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8000多人，除中专、技校招一部分外，城镇需安排就业的10万多人，相当于“文革”前的

20倍。初中毕业生能上高中的，当时只有28%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搞职业教育，就要有70%多的初中毕业生转入待业队伍。待什么业？谁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只有十五六岁，初中文化，又身无一技之长，国家也很难安排。我省每年高中、初中毕业生总计要剩下50万左右，长此下去怎么得了。问题很清楚，中等教育光搞普通教育不行，必须搞职业教育。当时办了那么多普通中学，就围绕4~5%升大学的人去转，我说，“我看这个路是越走越窄”。占95%以上的学生，考不上大学，没有就业本领，到工厂不会做工，到农村不会种地，靠这些人，工农业生产能快速发展吗？我们的教育制度，基础是中小学，重点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教育提到战略地位。

为进一步发展和办好城乡职业中学，省委、省政府于1982年6月下旬召开了全省城乡职业中学工作会议，这在我省还是第一次。侯捷作报告，我到会讲了话。我讲话的主要内容：一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把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上；二是在教育中又要把职业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上；三是改革教育制度必须同改革劳动制度相结合；四是关于农村办学中的普及和提高问题。省委、省政府7月29日批转了《全省城乡职业中学工作会议纪要》。省委在批语中指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把单一的普通教育发展成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教育制度，对于解决中等教育同经济发展结合，培养具有中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后备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全省各行各业，都必须提高认识，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采取多种途径和

多种形式，发展以职业中学为重点的多种形式城乡职业教育。

1982年10月22日，我在省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要实现经济的两个翻番，没有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办到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进一步提高对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的认识。当时提出在1985年前，要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并在城市和有条件的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发展以城乡职业中学为主的各种职业教育，争取到1985年全省城乡职业中学在校生达到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一半。要积极稳步地发展高等教育，在办好现有的全日制大学，逐步扩大招生的同时，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函授和业余大学，地、市和有条件的县可开办走读、不包分配的短期职业大学。要把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计划内。1985年前，企业的“双补”（补文化、补技术）任务一定要完成。对全省农民中近20%的文盲，要力争在三五年内完成扫盲任务。报告中还针对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在逐步提高教育投资的同时，推广海伦县“四个一点”（国家投点、县里筹点、各行各业支援点、社队拿点）的经验，各个部门都来支援教育，实现国办、民办、企业办相结合。

这些年，我省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78年全省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4所，在校学生3.32万人；1982年发展到31所，在校学生4.31万人。中等专业学校1978年75所，在校学生3.61万人；1982年94所，在校学生4.31万

人。中等教育经过调整，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虽有减少，但更巩固了，质量也更高了：普通中学 1978 年有 4065 所，在校学生数 258.6 万人；1982 年有 3137 所，在校学生数 203.7 万人。农业、职业中学 1979 年有 11 所，在校学生数 0.43 万人；1982 年有 297 所，在校学生数 13.98 万人。技工学校 1978 年 128 所，在校学生 2.52 万人；1982 年发展到 239 所，在校学生 4.46 万人。初等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等也有很大发展。

但是，总的说来我省教育事业还是不适应四化建设事业发展需要的。一是师资质量低。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教师不具备所担负教学任务要求的文化程度。二是校舍严重不足，实行二部制授课的班数占全国实行二部制授课总班数的 48%。三是教学设备短缺。四是教育经费缺额较大。五是教师待遇、住房、子女就业等方面问题也不少。我省教育事业的这种状况，主要是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解放前“北大荒”的文化教育是很落后的。解放后，人口增加太快，一个黑龙江变成三个黑龙江；而全国同期只增长 80% 多，我们人口增长 2 倍多。尽管当时省和各地作了很大努力，但因省的地方财力不足，教育经费额虽有增加，但每个学生占有教育经费数却大幅度下降。

九、加强党的领导，搞好党的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党的建设，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党的三中全会后，有些同志认为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今后不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了，因此政治工作也就可有可无了；有的认为搞生产建设主要靠经济手段，说什么“政治工作做到家，也不如奖金发到手”。由于存在这样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使得一些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不安心自己的工作，使得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削弱。因此，提高各级党委和政治工作部门对在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搞清楚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工作的关系、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分清楚党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林彪、“四人帮”破坏政治工作的谬论和罪行的界限，明确当时政治工作的方向、内容和主要任务，就是摆在省委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此，省委于1979年3月下旬发了《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1）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方针、

政策，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2)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明确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使人们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搞“自由化”。(3)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懂得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家底子还很薄，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必须艰苦奋斗；懂得我们国家经历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的浩劫，各方面的问题都成堆成山，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不能离开生产讲生活；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4)要充分发扬、健全民主集中制。要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不能抱着个人目的讲民主，不能把民主与法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破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当成民主。(5)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现行政策。不能把理想当成现实，用将来可能办到的事情来反对现行政策。(6)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本着向前看的精神，积极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

由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了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四中全会前后又分期分批轮训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初步统一和解决了党内外一些有关思想认识。

当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还有一个对形势的认识问题。因此，1981年1月13日，我在省委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针对有的对形势缺乏全面的认识，看到一些困难和问

题就悲观起来，甚至对四化建设丧失信心；有的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够，怀疑它的正确性，甚至有抵触和不满情绪，认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会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对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就是违反“双百”方针；有的看到我们党内某些干部存在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就把我们党看得一无是处，对党不信任，甚至有不满情绪，等等，强调了必须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以来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为此，要着重进行五个方面的教育：（1）加强形势教育；（2）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3）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4）加强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教育；（5）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同时，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残余影响，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谈话》和胡耀邦、胡乔木同志在中央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省委于1981年10月27日至11月6日召开了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省委决定，在1981年冬和1982年春，全省各级党组织都要用整风精神，抓住本地区、本战线、本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认真总结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经验教训，总结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的经验教训。在总结工作中，要大兴学习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1982年1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点进行讨论。我在讲话中，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进一步推广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织学生自学自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自己教育自己的经验。由于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及有关部门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断认真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研究解决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把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二）宣传“准则”，带头执行“准则”。1980年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3月中旬，省委召开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准则》。我和省委常委提出：省委要带头执行《准则》，为全体党员作出榜样。

当时违反《准则》的不正之风，主要表现在：一是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搞特殊化。有些领导干部和握有人、钱、物等实权的党员干部，在房子问题上、在安排子女亲属上和公私关系上，谋取私利或勒索卡要。二是拉拉扯扯，搞派性，“明无山头暗有礁”。三是官僚主义。四是弄虚作假，谎报成绩。五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六是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讲人情，拉关系等等。当时能把这些问题揭发出来，是党风党纪好转的一个标志，也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为了推动各地对《准则》的贯彻执行，省委于1980年8月召开全省贯彻《准则》经验交流会议。李力安同志到会讲话，传达省委的意见，要求县以上党委，要有一名副书记负责，组成一个由纪委、组织、宣传部门参

加的领导小组，具体抓好这项工作。要以《准则》、党章修改草案为主要教材，在全省搞好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教育。

1981年7月下旬，我在省委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进一步进行党规党法教育，坚决落实《准则》提出的各项要求。要从领导做起，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执行各项规定。要求各级党员领导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参加本支部的组织生活，并要在领导班子中过两三次组织生活，进行谈心活动。

贯彻《准则》，整顿党风，关键在领导。省委和几大班子领导对1979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是认真贯彻执行的。1980年10月，我们曾对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个领导班子41名省级干部生活待遇进行检查，除军队和由外地安排生活待遇的5人外，其余36人的生活待遇是：（1）在宿舍方面，多数住房偏紧。第一种是宿舍面积基本够用，并附设有办公室。属于这种情况的，包括我共有10人，占27%。第二种是宿舍面积偏紧。宿舍大多是50平方米左右。宿舍没有设会客室或办公室。属于这种情况的有24人，占66%。第三种是宿舍面积很小，只占一二间屋，急需调整解决，属于这种情况的有2人。当时除一间办公室外，都按规定缴纳房租、水电费等。（2）在交通工具方面，我和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和常务副主任、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和常务副主席按规定配了专车，主管外事、公安的领导同志和65岁以上的年老体弱的领导同志，当时没

有配专车，但保证用车。(3) 在服务人员方面，都是按中央文件规定配的。(4) 参加文娱活动，都按规定缴费。

在出国访问方面，几大委领导都自觉带头遵守文件规定。1980年有的省领导到罗马尼亚访问，中联部规定购买礼品的标准，他们只用了一半；罗马尼亚发给代表团成员的零花钱，也只花了一半，余款交给了我大使馆。还有，时间我记不太准确，可能是1979年在和平邨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恰逢一个什么节日，一些同志要求晚餐能给点酒喝，按会议规定没有备酒。我们常委只好每人拿5元或10元买的啤酒给与会同志每人一瓶，当时由省委常委会议秘书收的钱。有时比较熟悉的国务院的部长来我省检查工作，也经常是我们几个陪同吃饭。如我、力安、陈雷等，都是自己拿钱请客。应该说，我们是认真按《准则》和对党员领导干部要求办事的。下乡我们也是轻车简从，就乘一辆面包车。

关于省委常委过双重组织生活问题。1979年8月和1980年1月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曾两次研究过这个问题，要求每个常委自觉地参加机关组织生活。据省委组织部当时了解，1979年下半年，除二名病休（王一伦、肖一舟同志）、一名调出（张世军）同志外，其余17名常委共参加机关支部会、小组会48次，平均每人2.8次。1980年初到2月底统计，17名常委共参加支部会、小组会40次，平均每人2.4次。同时常委单独召开民主生活会两次。记得我当时是在省委办公厅综合处过组织生活。1980年1月22日，我在综合处过组织生活时，我说我过去参加组织生

活不太好，向大家作检讨，今后下决心坚持下去。领导干部和大家在一起过生活，有利于大家对领导干部实行监督，也有利于领导干部接触群众，了解下情。李力安是在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陈雷在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李剑白在省委宣传部办公室，陈剑飞在省经委办公室，赵德尊在省农业办公室，分别参加党组织活动。

1980年，我们充分利用“王、张、姜、姚”四个反面教员，在全省党组织中，进行党风教育，收到了良好效果。

王守信原是宾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她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乘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状态和是非颠倒之机混入党内。从1971年开始，她利用职权贪污50余万元巨款，于1979年10月20日被松花江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0年2月，省委纪检委等9个单位，联合给省委写了《关于王守信贪污案件的调查报告》，省委转发了这一报告，要求把它当作一面镜子，照一照我们党风不正、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方面的严重问题，照一照我们县委及省、地有关部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照一照某些经济部门在管理上漏洞百出的混乱现象，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张斌原是齐齐哈尔市帐篷厂厂长、共产党员。1979年12月上旬一天晚8时许，当一个女青年被歹徒威逼、走投无路，向张斌等4人呼救时，张斌不仅不救，反而喊回同伴，逃回工棚。他既不向公安部门打电话，又不组织在那里住宿的二三十名工人去抓歹徒，甚至碰到巡夜民警也不报告，竟然睡觉去了，造成女青年被强奸，衣物被抢走的

严重后果。这种只顾个人安全，贪生怕死，任凭犯罪分子横行无忌，坐视一女青年身遭祸害，受害者求救而不救的行为，不仅玷污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根本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而且也丧失了革命干部和工人阶级的品质，被齐齐哈尔市委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省委批转了齐齐哈尔市委向省委呈送的《关于对张斌等人所犯错误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进行讨论，从中吸取教训。《黑龙江日报》发表了《共产党员应该勇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评论。

姜世友原是哈尔滨市第一商业局干部，共产党员。1980年3月16日，姜乘公共汽车时被两名罪犯掏窃，其中一名罪犯当场被市公安局刑警侯培生抓获，另一罪犯为救同伙与侯搏斗。姜世友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当时又是被窃者，本应挺身而出，积极协助公安人员和罪犯斗争，但他竟临阵畏缩，特别是当罪犯拒捕抢枪，公安人员唤他协助时，他卑怯躲避；当罪犯持刀行凶、刺伤我公安人员时，他竟贪生怕死，见危不救；当罪犯劫车逃跑时，他还怕罪犯认出来，竟低头站着不敢动一动。姜世友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哈尔滨市一商局机关党支部给姜世友开除党籍处分。省委要求：教育党员干部，整顿党风，以侯培生同志为榜样，以姜世友同志为鉴戒，开展“假如我遇到类似情况应该怎么办”的讨论，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努力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

姚文发原是中共党员。1978年5月，《黑龙江日报》公

开批评他拒不拆除在国家征用土地内无照滥建的私房后，仍坚持错误不改，并且变本加厉，筑墙圈占国家建设用地。省委纪检委决定开除其党籍。《黑龙江日报》在发表消息时，配发了《要有铁的纪律》的社论。社论指出，通过姚文发这一案例，各级党组织要把整顿党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向前推进一步。对坏人坏事一定要敢于斗争和处理，对好人好事更要积极支持和扶持。只有严格党的纪律，才能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加强党的战斗力，才能统一全党意志，进而团结人民群众。

1981年9月下旬，省委召开了党风问题座谈会。我在会上作了《坚持不懈地搞好党风》的讲话。我在讲话中，强调要继续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推动纠正不正之风。建议省委纪委要选五六起重大的典型案例，通报全省。有的可以党内通报，有的可以登报公开处理。在抓反面典型的同时，也要宣传好人好事，表彰那些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与人民同甘共苦，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对不正之风敢抓、敢斗、敢管，刚直不阿的好同志。

我还说：省委和我一直强调各级党委和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党风，坚决和各种不正之风进行斗争。全省首先要从省委做起。省、地、市、县、社都要一级抓一级，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抓好本系统的党风建设，要把好自己的口子。各级党委、各个系统要来个比赛，看谁抓得好一些，哪一级抓得好一些，哪个地方抓得好一些。哪条战

线抓得好一些。哪个地方、哪个系统搞得不好，它那里的上级党委就要负责任。黑龙江省的党风搞不好，我们省委要负责任，我要负主要责任。各个地市抓得不好，地市委要负责任，要拿一把手是问。

经过三中全会以来几年的工作，全省党风有了明显的好转。省纪委对党风状况进行调查，对4084名党员、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征询了意见。认为党风有明显好转的1926人，占47.2%；有所好转的2074人，占50.8%；没有好转的84人，占2%。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地位、理解党风的内容和了解的情况不同，对党风好转的程度看法不一，但都认为党风确有好转。省委认为，虽然各地党风转变有快有慢，但就全省来讲，比三中全会以前，党风确实有了明显的好转。这点必须首先肯定。

（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进一步整顿党风。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一些干部甚至一些负责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1月13日，我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中央紧急通知精神。会议确定由赵德尊和解云清同志直接抓。当时查处经济大要案，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很多。除了认识不足、信心不足，怕虎头蛇尾、“翻烧饼”，任务重、人员少查不过来等问题外，最大的问题是保护层厚，干扰大，查处难。因此，省委常委会议确定，为了进一步加强我省贯彻中央紧急通知的领导，省委成立贯彻中央紧急通知领导小组，赵德尊任组长，解云清、卫之民、章林任

副组长。此后，各市、地、县也相继成立组织。省委还提出全省在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同时，必须集中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把财务和财经纪律大检查搞到底；二是把侵占公款公物建私房和倒卖房屋问题清理好；三是煞住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歪风；四是要纠正利用职权安插私人的问题。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重要表现。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决定》还指出，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决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无论是谁，一律要追究责任。对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个决定，我和省委都非常拥护，认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在全省迅速展开。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截至4月底的统计，全省揭露出投机诈骗、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犯罪案件4421起，其中大要案421起；金额3300多万元，非法获利649万多元，贪污受贿135万多元；涉及7725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136人，科级干部696人，党员1512人；现已结案488起，缴回赃款赃物434.2万多元。取得上述成绩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领导包案，建立责任制。我们7位省委书记

和省长包了 8 起重大案件，地市和省直厅局领导 165 人包了 173 起大案，县区领导 382 人包了 359 起要案。领导亲自包案，便于打破保护层，能保证办案质量，加快查处进度，推动斗争健康发展。再就是加强办案力量，光靠纪委查不过来。当时全省抽调一万多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实事求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和法律程序办事，并进行深入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政策威力。到 7 月底，全省立案查处的经济案件 8413 起，涉及 1.3286 万人，收缴赃款赃物 948 万元。

10 月 22 日，我在省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从揭露出来的案件看，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相当严重的，具有违法犯罪金额大、内外勾结、团伙作案、党员干部利用职权违法犯罪严重的特点。针对一部分同志的畏难和厌战情绪，指出，不能认为这场斗争“已接近尾声”，实际上是刚接火，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继续坚定不移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到 1982 年底，全省立案 1.1464 万起，结案处理 7644 起，占立案总数的 68.34%。其中大要案 1049 起，结案 536 起，占大要案总数的 51%。收缴赃款赃物 1473.5 万元。依法惩处了 1232 名经济犯罪分子。

（四）搞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1977 年 12 月，我担任省委主要工作后，一直关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当然抓的最多的是李力安同志和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

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高度，为搞好领导班子建设指明了方向。当时，按

着四化建设的要求，一些领导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软、散、懒、老、外”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1978、1979两年，省委组织部对全省县级以上领导班子普遍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两次较大的调整，重点是调整、配备好一、二把手。地、市班子调整、交流了76人，其中地市一把手12人；县级调整、交流了78人，其中一把手38人；省直部、办、委、局调整了87人，其中一二把手31人。对“文革”以来结合的群众代表和“选青”进入领导班子的，因不称职或群众不拥护的干部，做了调整。全省共调出340人，其中地、市级85人，县（处）级255人。对老弱病残、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地、市级24名老同志，调出领导班子，有9名当了顾问，有15名离休，对他们都做了妥善安置。选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地、市领导班子提拔了166人，县级领导班子提拔了230人，省直部、办、委、局及直属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选拔了298人，工厂、大学、农场、林业选拔了102人。

1980年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方针，地、市领导班子共充实提拔中青年干部18人，其中担任地、市委书记的2人，担任副书记、常委的7人，担任副专员、副市长的9人，18人中年龄在55岁以下的17人。县级领导班子共充实提拔中青年干部130人，其中担任县委书记的2人，担任副书记、常委的27人，担任副县长的93人。130人中50岁以下的有111人。还妥善安排了一批年龄大体质弱的老同志退居二三线，地市两级（包括

省直)共安排老干部249人。对一批不胜任现职工作的也做了调整。通过贯彻落实“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方针,使地、县两级班子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迈出可喜的一步。

这几年,虽然选拔了一些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还挑选一批优秀干部放到一定岗位上培养锻炼,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受一些老框框的束缚,视野不宽,路子也窄,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年龄偏高,人数也较少。针对这种情况,1981年7月,我在中共黑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谈到大力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时说,做好这项工作重要的是抓落实。一是各级党委都要有近期和长远规划。要定出三项规划:(1)地、市、县各级党委,1981年争取有三四名年轻干部进领导班子;(2)先做出5年选优计划;(3)再做出10年的培养计划。二是要全党动手,从省到地、县、社,省直从局到公社站都要层层选拔。光靠组织部门不够,党委要亲自来办。视野要开阔,我们要着眼于全省。省直各部门要着眼于整个战线,不能局限于机关或周围的几个人。三是要落实培养措施,搞好培训,有的要派到基层去锻炼。四是看准了的应尽快选拔起来。在这次会上,还把推荐较年轻的省委书记、常委人选作为一项议程进行了酝酿讨论。经过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投票推荐了9名比较年轻的优秀干部作为担任省委书记和常委的候选人。10月经党中央批准,由省委书记提为第二书记的一名(李力安),由副书记提为书记一名(王路明),由省委常委提为书记的3名(陈俊生、王钊、侯捷),

由地市委、大型厂矿党委、院校党委书记提为省委常委的4名（王斐、宫本言、王玉生、张向凌）。中央领导同志认为，黑龙江省委从上而下群体解决的经验值得重视。

经过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一系列工作，到1982年底，省、地、县优秀中青年干部共有6054人，比1980年增加了4倍。其中省级7人，地市和省直厅局级456人，县级5591人。在年龄上也都有几个层次，各级各类，方方面面人才比较齐全。1982年10月，在中央派驻我省的机构改革指导小组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省委对省直部委办厅局和地、市党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我1983年4月调走时，班子调整还在进行，到同年10月才基本结束。省直和各地、市党政领导班子职数有所减少，年龄有所下降，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治素质、整体功能都有提高，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

（五）进行整党试点。省委从1979年下半年抽调干部到13个工厂、公社、农场等单位，对不符合标准的党员进行教育和处理的试点工作。这13个试点单位包括一个县（海林），4个工厂（牡丹江造纸厂、伊春木材加工厂、哈尔滨玻璃厂、齐齐哈尔钢厂两个车间），一个煤矿（鹤岗市兴山矿），鸡西市轻化工业系统，4个农村公社（巴彦县松花江公社、海伦县向荣公社、北安县胜利公社、拜泉县兴国公社），两个农场（953农场2分场、二龙山农场）。

1980年又搞了143个单位的整党试点。9月18日，我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谈了我省整党试点情况。我说：“整党试点，在去年搞了13个单位的基础

上，今年又搞了 143 个点，各县都搞试点，为明年分批铺开摸经验，创条件。试点情况比较好。据嫩江地区 11 个试点单位 3200 多名党员分析，整党后，合格的党员由整党前的 36.4% 增到 51.3%；基本合格的由 45.8% 变为 42.1%；基本不合格的由 13% 减到 3.9%；不合格的由 4.6% 减到 2.7%；处理的（如劝退、取消资格等）占 3%；受各种处分包括开除的占 1%。试点证明，整党非搞不可，整党不搞运动的形式，而是用学习轮训，分期分批以小组为单位，搞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思想教育为主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讲到这里，胡耀邦、华国锋、李先念、胡乔木等都作了插话。胡耀邦说：“小平同志说过，是否用党员登记的办法进行整党，分期分批进行。我的意见，在党的十二大以后，学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看行不行。明年是党的六十周年，趁此机会搞个决定，用党员登记的办法整党。”

1981 年，又在 119 个单位进行了整党试点，其中县级党委 20 个，基层党委 75 个，共 1096 个支部，参加整党的党员 1.518 万名。全省共抽调 985 名干部参加整党试点，其中局处级干部 116 名。这批整党试点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进行的。由于各级党委抓得比较紧，比较实，做了大量工作，发展是健康的，效果是明显的。对整党试点，省委的决心很大。我和力安同志亲自抓，后来陈俊生同志也抓整党试点。1981 年 9 月，我在省委党风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整党试点要每年抓一批，正在搞的要下决心抓好，抓出新的水平。每批要抓两种典型：一

一种是抓党的建设比较好的单位，总结经验，带动一般；一种是多抓一些比较差的后进单位，通过整党，整顿党风，进行拨乱反正。对有问题的单位，不整则已，整就要整透，不煮夹生饭，不留后遗症，切实把党风整顿好，把党组织搞坚强。不仅要抓基层单位，还要抓领导机关，我们要把分期分批地整党整风作为经常性的组织建设来抓，按正常的工作秩序，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进行。”1982年1月，我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我省已经搞了3年整党试点，效果很好，应扩大整党试点时说，今年要多安排一些。省直搞一两个局，地区搞一两个县，市搞一两个系统或若干个大型企业。每个县要搞几个企业、一两个公社和若干个支部。

党的十二大后，我在1982年10月22日省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代表省委常委提出搞好整党试点的标准是：“按照新党章标准，清除‘五种人’，切实解决‘三个不纯’的问题，达到五个方面要求，即党员要合格（达到党章的一、二、三条要求）；干部要合格（达到党章规定的六条基本要求）；党组织要有战斗力（能够认真执行党章赋予各级党委和基层组织的任务）；党风要有根本好转；生产和工作要有新的面貌。”

1983年1月，中央组织部召开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整党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大会上介绍整党试点的有三个单位：北京市、黑龙江省和我省林甸县。会后，中央派出108名同志组成的调查组于2月20日分赴各省。中央调查组对我省整党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省整党试点,在全国没有统一部署前,坚持搞了4年多,这很不容易。当时,有些同志认为,中央没让搞,没有统一部署,你们搞整党试点是“土特产”,担心不符合中央精神,将来不算数。我们省委认为,这种“土特产”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要端正党风,解决党内存在的“三不纯”,改变社会风气,非得进行整党不可。对这个问题,省委讨论过多次,我和力安、陈雷、俊生和省委其他同志都认为,要贯彻落实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搞四化建设,归根到底还得解决党内的问题,因为一切工作都得落实到党的身上,党解决不好,别的一切都解决不好。所以,整党不能等也不能拖,中央有部署我们要搞,没有部署发现问题也得解决。中央开十二大时,我们9个常委没等开完会就往家里发电报,要求各整党试点单位按十二大精神进行补课。我省整党还有一个特点:除了抓试点之外,还注意面上的工作,强调点面结合。点上是综合治理,集中整顿;面上是单项治理,积累式整顿,积累式整顿主要是抓住党风问题、组织问题、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1979年至1982年4年试点905个单位,进行党员登记的453个,占50%;正常组织处理的367个,占40.5%,走过场不算数的85个,占9.5%。4年整党处理党员4577名,占党员总数的4.42%,其中出党(包括不予登记、开除、劝退、退党)1265名,出党面为1.22%;其它处理(包括缓登、留党察看、撤销职务、严重警告、限期改正)3312名,处理面为3.2%。

总的看，对整党试点，党内外反映是很好的。群众形象地说：“经过整党，党员露出来了”（即不混同于普通群众，起作用了）。这几年的整党试点，为全省后来根据 1983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进行的整党，作了准备，提供了经验。

第九章 出任共和国 第四任检察长

1983年4月初，我接到中央的电报，决定调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并要我立即到北京接洽。我由哈尔滨赶到北京，首先见到的是宋任穷同志，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任穷同志向我讲了中央关于我任职的安排，并要我去见陈丕显同志。丕显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不久又担任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他对我讲，中央决定调我到高检院接替黄火青同志任检察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前先任高检院党组副书记，要我回去把工作交待一下，尽快到任。回哈尔滨作简短告别之后，4月底我就到高检院报到了。

其时黄火青同志正在江西搞调查研究，接着还要到浙江去，一个多月后才能回京。我就决定不等黄老回京，直接到江西去见他。在南昌和黄老谈了3个半天，听黄老详细介绍了检察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高检院机构、领导班子情况，算是对高检院的工作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在江西期间还抽时间到向往已久的井冈山、庐山看了看，途中曾吟诗一首：“飞车游两山，得偿多年愿，山川景物秀，伟业开新端。”

1983年6月20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我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6月26日，党中央任命我为高检院党组书记。从新中国设置最高人民检察署（后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来，继罗荣桓、张鼎丞、黄火青同志之后，我成为共和国的第四任检察长。这使我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促成了我个人政治生命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一、念一本经，唱一台戏

（一）小平同志提出要开展“严打”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但当时很多地方的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峻。一些犯罪分子恣意伤害残杀无辜群众，寻衅滋事，打群架，捅刀子，“大刀队”、“棒子队”横行霸道，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蹂躏妇女，罪恶行径令人发指。这些严重情况，在一些地方还有蔓延发展的趋势，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危害，群众缺乏安全感，对社会治安状况很不满意，要求尽快改变“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好人怕坏人”的不正常现象。

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和彭真、刘复之等同志谈话时严肃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得住。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

专政。小平同志还讲，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彭真同志也指出，现在到了党中央下决心，全党下决心的时候。党不下决心，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治安不能根本好转，社会风气、党风也受影响。

7月20日，高检院召开了党组会。我在会上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党组一班人听后都觉得很畅快。因为大家一直搞政法工作，对社会治安的状况比较了解，心里也很着急。同志们都认为只有小平同志才有这样的气魄，在关键时刻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小平同志的讲话一致表示拥护。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央政法委员会起草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指示的报告》。7月26日下午，中政委召开扩大会，讨论了这个报告。决定立即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斗争，并连夜对报告作了修改，27日上报中央。中央书记处对这个报告进行了讨论，认为刑事犯罪、恶性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打击不力。在非正常状态下，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坚决打击，一网打尽。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7月29日至8月2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公、检、法、司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贯彻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部

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斗争。

(二) 全力以赴投入“严打”。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的检察长留下来，在8月3日召开了全国检察长座谈会。这个会原定10月份召开，考虑到开展“严打”斗争是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贯彻得越快越好，所以我提出，最好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后增加几天专业会议，贯彻中央精神，各系统具体部署一下。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法各部门的响应，各家都准备会后立即召开专业会议，原定时间是3天。后来我和郑天翔同志（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商量了一下，觉得没有必要再开3天了。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大家的认识也是一致的，而且各地的同志都急着回去安排布置，坐不住了。因此，这一次的全国检察长座谈会只开了半天，其它部门的会议时间也很短。

这次座谈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中心内容是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要“念一本经，唱一台戏”，全力以赴投入“严打”斗争。所谓“一本经”，就是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经”；“一台戏”就是各级检察机关都要在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与其它政法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集中力量搞好“严打”斗争。不能分台唱戏，更不能唱对台戏。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对这场斗争的性质、方针、政策、重点和组织领导、行动部署，作了明确的规定。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

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分别修改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加重了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刑罚，缩短了处理重大刑事案件的时间。全国上下一致拥护中央的重大决策，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严打”斗争迅速展开了。

这场斗争的第一战役第一仗是从1983年8月到12月，5个月内收捕了一大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摧毁犯罪团伙几万个，有10万多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浮在面上的犯罪分子大多数被扫荡了。经过集中打击，社会治安状况开始好转。1983年9至12月，平均月发案比前4个月下降了45%。大案平均月发案下降28%，其中18个大城市大案平均月发案下降43%。这些情况说明，“严打”的第一仗，社会震动很大，取得了明显效果。

随着斗争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983年8月到9月，我到黑龙江、辽宁两省了解开展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情况。从调查的结果来看，第一仗虽有准备，但不很充分，有的地方是被“推”上来的。特别是某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在胜利的形势下头脑有些发热，出现了扩大化和其它违背政策法律的现象。有的地方把过去判刑偏轻，但在服刑中表现较好、没有发现新罪的人，又拉出来重新处理，甚至判死刑。

调查回京后，我就这些情况给中央政法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提出这场斗争要有计划、有步骤、从容地一仗一仗地打，一网一网地撒。一仗和一仗之间，一网与一网之

间要拉开档，这样既有震动，又较为稳妥；而无准备地、忙乱地仓促出击，难免要煮夹生饭。对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第一仗，既要看到取得很大成绩，但又不能对这些成绩估计过高。一是因为这次收捕的犯罪分子多是浮在面上的，藏在深处的后台和教唆犯还没有挖出来，而这些人又是最危险的；二是社会治安出现的相对稳定，是暂时现象，犯罪分子在强大攻势面前有所收敛，风一过他们又要兴风作浪，有的还在行凶报复；三是过去积压的一些大要案基本上还没有破获。所以，应在第一仗基本结束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打好第二仗，乃至第二个战役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中政委对这个报告很重视，摘发简报在小范围内传阅。后来又进一步了解到，这些问题当时在各地有一定的普遍性。

11月7日至14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政法委员会又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在充分肯定第一仗的明显效果和主要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巩固成果，准备打好第二仗，特别是怎样改变第一仗中存在的“粗”的问题。要求各地尽量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保证斗争质量，严格按照中央的方针和部署，坚定地把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同时还要抓住有利时机，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

紧接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具体落实政法会议精神，研究如何从检察环节，做好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工作，保证“严打”斗争的质量。提出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坚决反对轻视法律程序的思想，在“严打”斗争中，

既要从重从快，又要按照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办案；既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联合办公制度，又要坚持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原则，注重从检察环节防止和减少错捕、错诉案件，解决第一仗中存在的“粗”的问题，保证“严打”斗争顺利健康进行。我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讲了话，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两个教训，一个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群众运动中往往发生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另一个是近几年来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的教训。

此后，各地都纷纷开始打了第二仗，有条件的地方还打了第三仗。高检院也分两批派出了20个工作组，到全国各地调查情况，指导工作，帮助和引导各级检察机关正确掌握“严打”斗争的法律政策界限，效果不错，第二仗和第三仗中所办案件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就是1983年11月份，根据中央的要求，全国开始进行整党。12月主要是学习中央关于整党的文件，到1984年，就是对照检查阶段了。高检院机关为了搞好整党，工作安排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在2月份连着召开了17个半天的座谈会，号召大家对检察工作和高检院机关的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党组的同志外，还有高检院各厅、室的负责人。大家半天开会，半天工作，我们把这叫做“下跳棋”。在工作部署上，也讲“三股洪流汇成一股”，即把整党和打击刑事犯罪、打击经济犯罪结合起来，用整党带动“两打”，通过“两打”促进整党，保证整党的成果。

1984年2月，为了加强对“严打”斗争的指导，中政

委草拟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巩固发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的成果和准备第二战役的一些设想》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转发各地。这个文件分析了开展“严打”斗争半年来治安形势的变化，一方面肯定了“严打”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社会治安情况大有好转。另一方面指出，对治安情况的好转不能估计过高，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总结前段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行第二战役的设想。强调在继续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方针的同时，要加一个“准”字，保持清醒头脑，防止扩大化和违背政策法律的行为，保证斗争健康地深入发展；在继续集中打击的同时，把综合治理的其它各项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从1984年9月前后到1985年，是“严打”斗争的第二战役，这是最具关键性的一个战役，是“严打”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所在，因为它的重点是深挖隐藏较深的犯罪分子，既要深挖穷追，又要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集中打击的声势。而1986年的第三战役，基本上是扫尾工作了。

从1983年8月到1986年，在整个“严打”斗争的三个战役中，各级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170多万人，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160多万人。总的说来，检察机关在这场斗争中，贯彻中央的精神是坚决的、认真的，从始至终紧密地和中央保持了一致，“念一本经，唱一台戏”，与政法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动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随时注意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切实加强了对

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的监督，确保案件质量，从检察环节保证了“严打”斗争的健康发展。

到1986年底，“严打”斗争的“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结束，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基本上扭转了非正常状况。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是一些重大恶性案件上升幅度较大，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城镇的发案率还比较高；青少年犯罪和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犯罪增多；卖淫、贩毒、赌博等现象在一些地方有所蔓延。这说明，全国性的战役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仍然要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放松。

因此，高检院在部署1987年检察工作任务时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注意防止和克服自满松劲的情绪，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不能认为打击刑事犯罪不再打全国性的战役就可以不抓紧了，而是要继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党委领导下，与公安、法院等部门一起，组织规模不等的专项集中打击和区域性的专项集中治理，解决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并同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相配合，争取社会治安的进一步好转。

（三）“打、改、防、教、建”综合治理。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们国家的一贯方针。我对打击犯罪和综合治理其它工作关系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1982年我在黑龙江工作的时候，在抓综合治理时也提出了要造成让犯罪分子改也得改，不改也要逼着他改的形势，当然这里也有打击严重犯罪的含义，但对二者辩证关系认识是不够全面的，强调帮教的一面多了，强调打击的一面少了，没有

抓住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到最高人民法院以后，在实践中我逐渐体会到在社会治安不正常，刑事犯罪很猖獗的形势下，只强调帮教、感化是不能奏效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应该是综合治理的首要一环，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环节，才能把罪犯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综合治理其它措施结合起来，综合治理才有效果，帮教活动才有更大的作用。所以，对这场“严打”斗争，我当时的想法是，第一战役要以严厉打击为主，一仗一仗地打。第二战役应该是把严厉打击和综合治理其它工作相结合，在一仗一仗打的同时，一项一项地抓综合治理其它工作的建设。第三战役则是在坚持严厉打击的情况下，主要进行综合治理其它工作的建设。

1984年底我到南方某省搞调查研究，发现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还没有落到实处。许多地方的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在搞经济承包责任制后治保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帮教组织很多都散了架，或者是名存实亡，不起作用。很多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放在社会上没人管，在押罪犯的改造质量差，出来的“次品”多。“两劳”人员释放后，帮教工作跟不上，有的被原单位开除了，不能就业，生活无着落。不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不知法、不懂法，不知道什么是犯罪。这个省第二战役第一仗收捕的人犯中，有70%以上是初次犯罪的，很多地方“两劳”人员释放后重新犯罪的高达20%以上，有10%左右是在逃犯、流窜犯（据了解，其它各省市基本上也是这个比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情况更坚定了我的想法，光靠打击是不行的，

必须坚持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抓好综合治理的其它措施,在治本上下功夫。

1985年4月,我到河南了解“严打”第二战役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情况。河南的工作总的说搞得不错,特别是在综合治理方面,有的地方成立了统一的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有些地方实行“双承包”,即经济承包和安全保卫承包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记得有个监狱在狱中为人犯举行婚礼,教育、感化犯人,落实帮教措施,社会反响很不错。我曾让河南省检察院就这件事的经验和社会各界、人犯及其家属的反映写了一个报告,呈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阅。从河南的情况看,社会治安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不稳定,起伏大,大案要案连续上升。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综合治理工作做得不好。当时全国多数地方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有些具体的综合治理措施没有落实,特别是安全保卫措施与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挂好钩。一些领导对如何具体抓综合治理的思路还不太清楚,工作中感到无从下手。

从河南回来后,我根据调查中了解的情况,把综合治理工作归纳为“打(击)、改(造)、防(范)、教(育)、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打,即继续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改,即加强劳改劳教人员的改造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防,即预防犯罪,这是全社会的工作,也是搞好社会治安的基本功。其中包括健全制度,堵塞漏洞,发展安全保卫责任制;加强对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管理等防范措施;加强民事调解,防止矛盾激化;军民

共建文明村、厂、店；妥善安置待业人员和“两劳”释放人员就业，做好“接茬”帮教工作，等等。教，即进行法律常识的宣传教育，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纪律的教育。建，首先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要加强政法各部门的基层组织建设。说到底，就是各级党委要有统一的领导，各部门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明确任务，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定期检查，使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都能够有人抓，抓到底。这样，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才能实现。

由于高检院一直比较重视综合治理工作，并作了一些部署，所以，各级检察机关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在检察工作这个环节上，总结和摸索了不少综合治理工作的新途径和新经验。一是结合办案，开展“检察建议”活动。针对发案单位在政治思想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和业务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及时在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检察建议”，促使他们加以解决和改进，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预防和减少犯罪。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第一道防线”。结合创建文明村、文明单位的活动，对于发案多、治安状况不好的地区和单位，主动提出建立联系点，帮助制定文明公约，健全调解组织和治安保卫组织，以维护治安秩序。三是在处理公民的申诉和控告中，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四是对免于起诉的人员进行定期考察和教育改造。对于依照法律规定免于起诉的人员，不是简单地履行法律手段，而是要抱着负责到底的精神，主动地同被免诉人员的家属、单位和当地居民委员会取得联

系，落实帮助和教育的措施，并且进行定期考察。五是结合办案，积极开展法律宣传和教育。六是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总结和推广治安承包责任制和安全保卫责任制相结合的经验，把综合治理的措施落实到基层，等等。

从我的工作体会来看，实行综合治理，无疑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方针。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又是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分子、预防犯罪的前提。不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全面的综合治理工作开展不起来；不抓综合治理各方面的工作，打击犯罪的成果也不能巩固。我始终坚信，只要我们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政法等机关积极努力，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把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保持比较稳定的社会治安状况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二、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 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

（一）“两打”并举，突出打击经济犯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总结了建国3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有领导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正确决策，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好势头。与此同时，经济领

域和干部队伍中的许多消极腐败现象也乘隙滋长，各种经济犯罪大量增加，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危害。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指出这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加重了对严重经济犯罪的刑罚，其中包括对各种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的经济犯罪分子处以死刑。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各级检察机关根据中央精神，积极开展了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形势一度很是喜人。1982年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高潮，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万余件，比1981年上升近80%。到1983年下半年，由于搞“严打”斗争，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无形中有所放松，1983年和1984年立案数分别是2.4万多件和2.2万多件，出现下降的趋势，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出现了不少新的情况。当时，我国经济工作重点是抓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经济战线上的改革已经全面展开，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地区到内地，形成了一股潮流。可以说，检察机关自成立之日起，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改革确实给我们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那时候检察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我国在1979年颁布

并于1980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部法律主要是适应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制定的，到了1983年，虽然时间不长，国家的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经济活动大量增加，有的事，从改革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但与现行法律不合，政策界限不够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好区分。加之当时在我们内部也存在人为的干扰，有的党政领导同志说打击经济犯罪是阻挠改革，有的还因为本身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这项工作更是不支持了。不少检察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情绪波动，心里想不通，也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去办经济案件了。当时有人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三句话，叫“贪污案件积极办，行贿受贿等等看，投机倒把不能办”。

1983年12月中旬，我先后看到几份材料，介绍陕西省采取经济清查办法，消除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死角”、“死面”的情况。为了学习推广他们的经验，我带了一个调查组于1984年1月到陕西做了一些调查，听了省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又到西安市的阎良区、莲湖区和铜川市、延安地区和渭南地区的大荔县，同当地党委和政法部门的同志们进行座谈。

陕西省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也同样是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1983年9月，中纪委召开会议，提出要清除打击经济犯罪的“死角”、“死面”，陕西省及时重新部署，通过开展经济清查活动，发现犯罪线索，并以查处大案要案为突破口，然后抓住“死角”、“死面”，分期

分批打歼灭战，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逐步打开了局面。但“死角”、“死面”仍然存在，有些单位和行业还基本没有触动。铜川市和大荔县的同志反映，在地方上的中央和省属企业动得不如当地的市县属企业，基本建设系统动得不如其他系统。铜川市委书记说，打击经济犯罪还大有文章可做，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

这次去陕西，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在时隔45年后回延安。看到宝塔山，当年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的情景犹在眼前，心情十分激动，即兴写了一首诗：“梦怀萦绕想延安，四十五年又重还，旧时窑洞觅不见，一片新城满山环。”

从陕西回京后，我们又陆续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就当时掌握的情况来看，在全国大多数地方，打击经济犯罪远没有像打击刑事犯罪那样打开局面。我感到，这首先还是一个思想上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定一个认识，即打击经济犯罪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责无旁贷。在改革时期，一方面，检察机关要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和促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正确执行。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对做得对的，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法律规定给予支持和保护；对以改革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的，要坚决依法处理。这些想法，我在1984年8月上旬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提了出来。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

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检察院要加强对经济犯罪行为的检察工作”。这对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取得实际经验，增强感性认识，1984年底我带了一个调查组，到广东省做了为期22天的调查。在穗期间，先后听取了广东省、广州市检察院的汇报，走访了深圳、珠海、海南岛（当时海南尚未建省，属广东省管辖）等8个市县，还在广州市郊区和电白县召开了两个小型座谈会。所见所闻使我们感受颇深。

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很快，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生产总值1978年约1.9亿元，1984年就达到18亿元，6年间增长了近9倍，到处是一派日新月异，丰富多采的喜人景象。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以及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增多，新的犯罪因素在不断增加，经济犯罪案件越来越多，案值越来越长。当时广东省经济犯罪活动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走私活动严重，并且趋向集团化和高档化。二是投机倒把活动有所发展，突出的如海南各系统各单位利用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大批进口汽车转手倒卖，牟取暴利。三是套汇情况普遍。四是索贿受贿的案件突出。一些检察干部反映，打击经济犯罪斗争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打击不力，重视不够，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不像打击刑事犯罪那样抓得紧，

打得狠。二是一些政策界限不清，无法下手。从全国来讲，广东省的情况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

12月12日，我在和深圳市检察院的同志们座谈时提出，根据深圳市的具体情况，检察机关要把打击经济犯罪放在第一位。这个提法，在我从广东回来后，给中央作了汇报，并有了一些发展。报告中说：我认为检察机关必须强调“两打”并举，在继续抓好打击刑事犯罪第二、第三战役的同时，突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经济特区和其它经济犯罪猖獗的地区，要把打击经济犯罪放在首位。1985年初，高检院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检察长会议，对这个工作作了部署。同年6月，鉴于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和经济犯罪的严重情况，我们又进一步提出，检察机关要在绝不放松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主要任务来抓，更加直接地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是调整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是把打击刑事犯罪作为主要工作来抓的。

（二）依法处理孙永根贪污、受贿案。工作部署调整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打开局面。自1984年下半年以来，新的不正之风泛起，经济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少数地方和单位还出现了为犯罪分子鸣冤和要求给予平反的情况，说检察机关打击经济犯罪是给改革亮“红灯”，有的将已办结的案件公诸报端，要求进行公开讨论。搞得不少检察机关不敢办案，怕将来“平反”。针对这种情况，高检院抓住孙永根贪污、受贿案等几个在全国有

影响、有争论的案件，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查清犯罪事实，坚决依法处理，并通报各地，有力地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

孙永根原是江苏省江阴县新桥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兼新桥毛纺厂党支部书记，因犯贪污罪、受贿罪由江阴县人民检察院侦查起诉，并于1983年2月2日经江阴县人民法院判决和同年12月5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判处有期徒刑8年。

1984年7月12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刊登该报特约通讯员王若望、黄寿祺、记者谢军关于《农民呼吁为勇于改革的孙永根平反》的报道，《民主与法制》第8期发表了上述3作者就同案写的调查报告《六“8”奇案》（按照3作者的说法：因办厂8个，按公社合同规定，得奖8888元，被判刑8年，故有“六‘8’奇案”之称）。江苏省委办公厅和无锡市委认为，上述报道严重失实，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调查。

我也考虑，一段时间里，一些报刊曾多次报道过司法机关在打击经济犯罪中办的案件。有的案件在司法机关办结后，仍然有人为犯罪分子鸣不平，硬要在报纸上公开讨论，有的将行贿行骗分子当成“开拓者”、“改革先锋”来吹嘘，闹得一些检察干部不敢秉公执法，怕将来翻案。孙永根案较为典型和轰动，依法处理好这个案子，对引导各方面正确理解和认识改革与打击犯罪的关系问题有很大意义，所以也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孙永根案进行调查。

1984年9月6日上午，中央政法部门的有关领导同志

开会，听取了江苏省、无锡市检、法两院关于孙永根案的汇报，会议由我主持。与会同志共同商定，由中纪委、中政委、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组成中纪委、中政委孙永根案联合调查组，由高检院二厅一位副厅长任组长。

调查组对这起案件做了大量的调查，听取了包括王若望、黄寿祺、谢军 3 作者以及孙永根案的辩护律师等在内的各个方面的意见，全面审查了一、二审情况和有关材料，进行了反复的讨论研究。认为孙永根贪污受贿一案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和量刑也是适当的。王若望、黄寿祺、谢军 3 作者在采写稿件过程中，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孙永根贪污受贿案件，既不向承办此案的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做调查，也不向所属省、市、县委了解情况，单听罪犯和少数人一面之词（而罪犯又进行了许多串供和伪证活动），不少问题都是主观臆断、无中生有的，而且还使用了一些诋毁性的语言，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光明日报》在发表这篇报道前，既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也没有征求有关市、县委和司法机关的意见。《民主与法制》虽曾将《六“8”奇案》稿样分别寄给有关省、市委（限定在 5 日之内答复），但当江苏省委和无锡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指出“此稿严重失实，不应发表”后，他们仍照样发表。这些做法是很不慎重的，严重地背离了中央有关指示精神。

10 月 24 日，调查组就调查的详细情况向中纪委、中政委、中宣部和“两高”作了书面报告。认为《光明日报》和《民主与法制》都是在全国发行量很大的报刊，对孙永根案

件严重失实的报道，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案件的范围。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件事，关系到是否坚持贯彻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两手抓”的方针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保卫经济体制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关系问题。建议《光明日报》和《民主与法制》编辑部要在各自的报刊上，就上述报道公开澄清事实，以分清是非，挽回不良影响。对王若望、黄寿祺、谢军3人，有关部门应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作出适当处理。

12月5日，中纪委和中政委以政法〔1984〕13号文件转发了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同意调查组提出的建议，要求有关部门加以落实。但王若望、黄寿祺、谢军3位作者继续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情况，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认为联合调查组的报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结论是片面的。光明日报社和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也表示要进一步澄清事实，才能全面执行中纪委、中政委的文件。对此，中央有关部门和调查组都做了不少解释和说明工作，但效果不大。

1985年3月22日，中政委召集会议，研究孙永根案件和中纪委、中政委文件的贯彻问题。对中纪委、中政委文件下发后，光明日报社和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一直未公开澄清和全面执行文件提出了批评，要求他们总结经验，尽快表态。4月17日，《光明日报》加按语发表了“光明日报关于无锡市孙永根一案的报道严重失实，决心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搞好今后的批评报道”一文，《民主与法制》也在1985年第5期上刊登了编辑部“关于报道孙永根一案的自我批

评”的文章，表示要加强组织纪律性，杜绝报道失实情况，进一步搞好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维护法律尊严的宣传报道。

孙永根等案件的正确处理，对打破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沉闷局面，起到了及时的、关键性的作用。

针对当时办案中存在的某些法律、政策界限不清的问题，高检院还加强了具体应用法律、政策的研究、解释工作，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制定了《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于1985年7月18日公布，对办理贪污、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案件的一些法律政策问题做出司法解释，为惩治犯罪提供了法律武器。

（三）抓系统，系统抓。“抓系统，系统抓”的经验，是河北省检察机关在打击经济犯罪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调查研究，选择发案较多，问题严重，上下都有同类问题的系统和部门，以大案要案为突破口，发动整个系统自行调查，发现经济犯罪案件线索，检察机关依法办案，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同时，促进有关单位健全制度，堵塞漏洞，预防犯罪。我到河北调研时，听了省检察院同志的介绍，觉得这个经验确实不错。检察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通过处理孙永根案件、加强司法解释等一步步的努力，可以说是初步打开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及时推广河北的经验，对推动全面工作的发展是很必要的。所以，我一回到北京，马上着手在全国推广了河北的经验。应该讲，这个经验是比较成熟的，以后几年中，

它一直是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经济犯罪检察工作的主要做法。

当时的情况是，一些企事业单位和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司，以搞活经济为名，倒买倒卖紧缺物资、利用签订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很突出，其间还伴发了许多贪污、受贿等犯罪。粮食、供销、银行等系统的经济犯罪尤为严重。如粮食系统，有些粮食部门利用粮食购销过程中的不同价格做手脚，平价转议价，议价转超购价，票购票销，买空卖空，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中饱私囊。石家庄地区15个县中有13个县的粮食部门有这类犯罪活动，1984年全地区“平转议”、“议转超”的粮食达1.69亿斤，折款570多万元。估计河北全省约有8至10亿斤。犯罪分子往往是内外勾结，互相利用，其中不少是有组织、有领导地搞。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针对这些情况，以粮食、银行、供销、外贸、运输、基本建设等系统和部门为重点，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和部署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党中央提出纠正新的不正之风后，各级检察机关在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and 清理、整顿公司工作中，及时掌握案件线索，查处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85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超过了1983年和1984年，虽然比1982年略少一些，但各地都陆续突破了一批有影响、有震动的案件，大案要案立案数相当于前3年立案总数的84%。较为典型的有：

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倒卖汽车、外汇案。检察机关立案侦查212件292人，其中个人非法所得5万元以上不满10

万元的有12件23人，10万元以上的有19件30人。原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在此过程中受贿4.4万元，被依法查处。

广东省佛山市刘浩然诈骗案。刘自1984年11月至1985年3月，以所谓“中华国际技术开发公司烟台分公司”等单位的名义，伪造印章、证件，先后同17个省、市的88个单位签订假合同110份，总金额计人民币78亿多元，美元4亿多元，港币2000多万元，日币3000多万元，骗取预付款1970多万元，案发时已挥霍100多万元。

另外，还有福建省福州市杜国祯投机倒把、诈骗案，晋江假药案等。

(四)杜国祯案。杜国祯原是福建省公路局建筑队以工代干的办事员，1983年离职经商。1984年6月至1985年初，在承包福州市建新乡建红公司和与福州市郊区外经委联营裕丰公司期间，伙同一些人大搞投机倒把、走私、诈骗等经济犯罪活动。投机倒把金额达1.7亿多元，非法提取现金113万元，诈骗货款8716万余元，骗取银行贷款1000万元，走私物资金额1924万余元。另外，还走私外币美金10万余元、港币61.9万余元，向党政机关、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民币一万多元、港币17万余元。这是一件在当时轰动全国的重大案件，一审涉及被告人20多名，其中有6名直接参与了违法犯罪活动，有受贿和玩忽职守行为的县处级以上干部。

1985年2月28日，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杜国祯案立案侦查。福建省委、福州市委分别成立了杜国祯案件领导

小组，高检院于7月份派出了工作组，驻榕指导办案。

这个案子被揭露后，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在《整党简报》第4期刊登了“须要防止可能出现只惩办杜犯，而对同流合污者不严肃处理结局”的文章，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对此案作了指示，要求不仅要查清杜国祯本人的问题，特别要下功夫查清内部问题，对为杜国祯诈骗开放绿灯的，都要严肃处理。

11月下旬，我到福建考察工作时，专门听了省检察院同志的汇报，就处理杜国祯案件讲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后来都报送了中央领导同志。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主要是要防止认识上不去，下不得手，偏松偏宽。对触犯刑律的干部，要坚决贯彻从严精神，不能降低法律标准而纵容他们。二是杜国祯案是全国闻名的大案，金额大、涉及面大，牵涉的干部多，所以我们处理好这个案件的意义也大。对这6个县处级以上干部的处理，是此案的关键。打苍蝇易，打老虎难，我们要苍蝇、老虎一起打。对这6个干部的处理，一要严，二要准。三是要做好杜国祯案的总结报道工作，运用典型案例，教育干部和群众。

198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对杜国祯案进行了报道，并加发了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按语和评论员文章。按语指出：“这个投机诈骗犯手中的招数，概括起来无非是两个：一是行骗，二是行贿。可是在他这一骗一贿面前，我们相当一部分单位的一些干部居然

言听计从，为他服务，有的甚至同流合污，走上犯罪道路。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过程中，完全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见利忘义，丧失了共产党人的党性……这些活生生的教训还不发人深省吗？”

杜案侦查工作基本结束后，1985年10月至1986年5月期间，福建省、福州市两级法院、检察院分别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此案。对杜国祯一伙人的定性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在对刘阿顺、杨有志等几名县处级以上干部是否定罪的问题上，各方面分歧较大。主张不定罪的基本观点是：动机良好；改革没经验，错误难免；对干部犯罪要可上可下的下，可推可拉的拉；根据当前政策情况可以不定。

关于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意见，我曾在就此案召开的讨论会上和任建新、林准同志（当时均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都谈过，在北戴河又同郑天翔同志谈过，主张定罪。198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形成了《关于杜国祯案的基本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主张对刘阿顺（福建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杨有志（福建霞浦县委书记）等人都不定罪。看到报告后，我又给最高人民法院几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示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对杨有志、刘阿顺等应该定罪，并详细谈了这样考虑的出发点。

1986年11月17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投机倒把罪、走私罪、诈骗罪、行贿罪，判处杜国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告刘阿顺、杨有志等7人无罪，其他人犯都作了有罪判决。12月1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判决，除改变一审判决对个别人犯的定罪量刑外。基本上维持了一审判决。12月28日，杜国祯被执行死刑，《人民日报》又在头版作了报道。

1987年3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杜国祯案中对一些人犯的判决提出抗诉。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驳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维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至此，关于杜国祯案的法律程序基本结束了，但这个案子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回想起来，既有遗憾，也有思索。从历史的经验和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来看，对领导干部犯罪必须切实体现从严精神，依法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够警醒干部，教育人民，才能使我们的党和政府保持廉洁，取信于民，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不断前进。

（五）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经济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下去。当时，对我们提出检察机关要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主要任务，有些同志包括少数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有不同看法。他们的疑虑一是怕冲淡“严打”，二是怕对搞活经济不利。要求检察机关开“绿灯”、“松绑”，不要做“灭火器”、“绊脚石”。

针对这些工作中的思想障碍，我想应该着重解决检察干警本身的认识和外部执法环境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检察干警的思想认识方面，主要强调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破除两个对立论：一是处理好“两手”的关系，破除把开放、搞活与打击经济犯罪对立起来的观念，树立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思想。二

是处理好“两打”的关系，破除把打击经济犯罪与打击刑事犯罪对立起来的观念，正确认识依法打击经济犯罪，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更是保证正常的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高检院也进一步重视加强业务指导和督办工作，解决具体工作中“打击不力”和“下不了手”的问题。1985年，我带队到河南、河北、广西、福建4个地方，各位副检察长也分别带队到全国各地，高检院还多次派出工作组到重点地区，了解情况，调查研究，都是为了统一认识，指导和督促各地查办案件。

在外部执法环境问题上，我觉得仍然有一个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的问题。一方面，我把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另一方面，准备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多做一些宣传和解释工作。应该讲，中央对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是非常重视和支持的。1986年1月13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了我作的《关于检察机关打击经济犯罪工

认识到当前经济犯罪这样严重,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状况。要在一年左右时间里把这种嚣张气焰压下去。三是明确依靠党委领导,打一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总体战的思想。要认识到打击经济犯罪也和打击其它刑事犯罪一样,检察部门、司法部门责无旁贷,但是必须全党全社会都重视和行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四是明确把检察工作特别是打击经济犯罪工作,同端正党风、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的的思想。这段话,在为我们提出的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的指导思想作宣传和解释的同时,还给全国检察机关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经济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提出这个任务,主要是从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来考虑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个决定,是当时指导全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985年,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这种全面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虽然全面改革总方向、大原则都有了,但具体的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确立起来,要

有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因此，在改革进程中，党风、社会风气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多了起来，钻改革的空子坑害国家的犯罪也多了起来。

从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情况看，大部分发生在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的时期，这段时间是经济犯罪发案的高峰期，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反映非常强烈。虽然经过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检察机关也调整了工作部署，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主要任务，但消极腐败现象仍在发展蔓延。这使一些人对改革产生了一些错误看法，认为改革就是不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根本矛盾。这种看法，在我们的党内有，党外也有，甚至关心中国命运的某些外国友人也这么看。

198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小平同志的讲话，把“两手抓”的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提出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经济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下去的目标。

1986年，各级检察机关为实现压下去的目标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全年共立案侦查经济犯罪案件数量，比1985年增长72.5%，大要案增长1.2倍。原安徽省省委常委、秘书

长洪清源受贿案，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受贿案都是在这期间突破的。成绩虽然不小，但一年左右压下去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看来，当时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是过于乐观了，打击经济犯罪毫无疑问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实际的情况是，老案没有办完，新案又不断发生，各地办的经济犯罪案件，新案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且有了新的动向，“假、冒、骗”犯罪，贿赂犯罪，偷、抗税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相当猖獗。一些犯罪分子为牟取暴利，大量制售伪劣商品，从假酒、假烟到假药、假种子、假化肥、假鱼粉、假味精，名堂越来越多。仅1987年1月至4月，温州市查处的“假、冒、骗”案件就有1900多起。全国因喝假酒致中毒死亡的近百人，造成失明等伤残的4000多人。江西省上高县发生的“假盐”案，中毒群众近千人。有些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偷、漏税的占50%左右，个体工商户偷、漏税的占70%以上。一些地区以标会、抬会形式搞金融诈骗活动，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危害。福建省平潭县1986年10月出现抬会，有会头2000多人，会员遍布全县城乡，资金发生额2至3个亿。1987年3月倒会后，会员资金无法收回，引起县内秩序混乱，发生打砸抢事件4000多起，抓“人质”114起。

因此，我们在部署1987年的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时，在要求进一步实现压下去的目标的同时，提出要抓住重点，解决突出问题。重点打击那些严重危害国家经济管理秩序、败坏社会风气、侵犯人民利益的“假、冒、骗”案件，偷税、

抗税案件，受贿行贿案件。并提出，各地要采取专项集中打击和区域性集中治理的办法，从当地实际出发，在一定时间内，哪一类经济犯罪较突出，就集中力量打击哪一类犯罪，哪一个行业或单位经济犯罪严重，就重点查处哪一个行业或系统。

（六）海燕电器厂案。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和建国以后一度对民主与法制建设重视不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少数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仍然存在。检察机关在办理一些经济犯罪案件时，排除干扰阻力要比查处案件本身难度更大，有的案件就是因为干扰阻力太大而得不到依法处理。1985年4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我就表示在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要“坚决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对于那些牵涉面宽、保护层厚的大案，一办到底，绝不手软”。人大代表们对这番话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反映非常强烈，认为“很有气势，说出了人民的心愿，对检察院这种态度表示敬意”。同时，希望我们能说到做到，要兑现。

1985年，我直接处理了开封市海燕电器厂厂长王纪善等人贪污案。这是一起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但人为地复杂化了的案子。王案是1982年3月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斗争开始后，经群众检举，由开封市龙亭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在法院开庭审理期间，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王彪给当时的市委书记写信，认为对王纪善等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市委认真研究后，未采纳这个意见。龙亭区法院于1983年2月24日，以贪污罪分别判处王纪善等5名被告5年以下有期

徒刑。4月26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裁定。

此后，被告人到处申诉，王彪等记者通过“内参”、“情况摘编”途径不断向上反映，中央和省里的一些同志就他们反映的情况作了多次批示。有关部门根据领导的批示都进行了调查，一直认为海燕电器厂属于集体经济，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1985年4月，一份内部材料登载了一篇题为《要维护个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文章，反映的是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的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工作经验交流会的一些情况。该文列举了不少事例，其中就有开封市海燕电器厂王纪善等人贪污案。文中写道：“河南开封市海燕电器厂无故被查封，厂长王纪善等5人被捕，中央有两位领导人曾批示要对此案进行查处，但至今没有解决。”随后，一些记者又通过内部材料登载了“民办的海燕电器厂产品好收入多，人员被判刑，工厂被查封”的文章。9月5日，中央办公厅致函河南省委，要求认真了解和研究此案的情况，尽快妥善处理。

1984年9月25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厂系“个体经济联合体，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为由，改判5名被告人无罪释放。中央和地方的一些报刊就此发表了消息报道和记者的文章，毫无根据地点名批评了龙亭区委和有关办案人员。开封市有关政法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改变该厂企业性质的理由不能成立，该厂系集体企业，原判王纪善等人有期徒刑是正确的，改判不对，因此多次向

高检院等领导机关写信，要求澄清是非。

1985年4月份我到河南搞调查研究。4月28日上午和开封市检察院的同志进行座谈时，市检察长谈起此事，非常气愤，强烈要求高检过问，正确解决这个案子。我听了有关同志介绍该案的案情后，表示有意见可以复查，并说回京后要进一步研究。河南省检察院将我的意见报告了有关部门，经河南省委、省政法委员会同意，着手对海燕电器厂案进行重新审查。

7月8日，新华社记者王彪等人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送了一份材料，题目是《开封市人民检察院向杨易辰汇报假情况，企图把已平反的“海燕电器厂案”再翻过来》。此件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后转到我手里后，我把“海燕电器厂案”的详细情况向中纪委副书记韩光同志作了通报，韩光同志表示坚决支持我把这个案子办到底，并于9月份通知河南省委派人来京向中纪委汇报此案的查处情况。韩光同志在汇报会上作了指示，对河南省政法机关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随后，河南省委“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省法院和省检察院又共同对“海燕电器厂案”进行了复议，对此案争论的焦点即海燕电器厂的企业性质做了认真分析和研究，再一次认定海燕电器厂是具有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资格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

1986年1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联合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关于开封市海燕电器厂王纪善等人贪污案件的复议报告》，认为1984年9月25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厂属“个体经

济联合体，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改判王纪善等人无罪释放是错误的，应当改判纠正。“两高”批复同意省法院、检察院的意见，并指出：“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王纪善等人无罪释放是错误的，应依法予以纠正……对不应发还给被告人的赃款赃物，也应如数追回。”随后，我们又就此案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作了书面报告。

（七）建立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各检察机关在打击经济犯罪斗争中，十分注意发动群众的工作，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1988年3月8日，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成立了深圳市经济罪案举报中心，这是全国检察机关第一个举报中心。3月28日，我看到广东省检察院上报的关于举报工作试点的报告，觉得这是检察工作自身改革的有益尝试，是一条在新时期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新路子，应该在全国进行推广，即将报告批示给高检院分管的副检察长：“举报中心试点，我看应该搞，现在广东开始试点，可考虑摘要刊登简报或情况反映。如何推广，高检院要加以安排，好好抓一下。”后来，这一新生事物，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1988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设立举报中心，以及时揭露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贿赂、贪污、偷税、抗税、挪用公款、出卖国家机密以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1988年4月，我的任期届满，在我之后的新一届高检院党组的领导下，不到一年时间，全国检察机关就建立了3600多个举报中心。举报工作的最大

优势，就在于把公民的民主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现在，“举报”这个词，已是家喻户晓，成为人民群众同贪污、贿赂等犯罪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检察机关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主要来源和渠道。

查办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是反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说，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主流是好的，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消极腐败现象确有滋长和蔓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这已引起我们党的高度重视。我相信，只要我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牢记历史经验的启示，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痛下决心，扎扎实实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增加党的生机与活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把法纪检察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一）明确法纪检察工作的指导思想。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案件、渎职案件，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这类案件绝大部分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或严重不负责任引起的，在检察机关内部的业务分工中属于法纪检察工作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比较重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十年动乱

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肆意践踏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许多干部和群众蒙受不白之冤。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认真汲取了十年动乱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完善法制，才能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1978年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三部宪法，1979年又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个法律，设置了对公民民主权利的刑罚保障和诉讼保障。

人民检察院从1978年重建开始，就依法开展了法纪检察工作。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十年动乱的后遗症。检察机关法纪检察工作的重点是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1983年我任检察长后，一段时间里精力主要放在“严打”斗争上，没有更多地考虑如何开展法纪检察工作的问题。高检院在1984年的一份文件中也指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高检院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安排的不好，抓得不力，需要改进。也希望各级检察机关对这项工作认真领导，按照党和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把法纪检察工作加强和开展起来。”

1984年下半年，“严打”斗争第一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后，在研究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斗争的同时，我开始思考整个检察工作的全面发展问题。1984年8月份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就是一次部署全面检察工作的会议。这是我到高检院后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检察长会议。在研究开展“严打”斗争的第二战役的同时，讨论了各项业务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法纪检察工作是实现法律监督很重要的一个部

分，要把这个问题看重一些。现在它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在这之前，制约法纪检察工作发展的，还有两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关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我国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人们的民主意识比较淡薄，许多人不认为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是严重的问题，出现错案，往往认为是难免的。特别是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一些干部中仍然不自觉地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强调专政，轻视民主。这种思想，反映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就是把保障公民民主权利同打击刑事犯罪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在打击刑事犯罪的时候，就不能够查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案件，否则就会束缚干部的手足，影响打击刑事犯罪；反映在检察工作上，就是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出为保障公民民主权利而斗争，对于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姑息迁就，斗争不力。

二是关于法纪检察与一般监督的区别问题。一般监督，就是对国家管理机关、组织、公职人员和公民执行法律的情况实行监督。这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检察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具体体现。我国在1954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也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但不久就受到批判，说这种做法是“凌驾于党政之上”。到1979年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就没有再写一般监督，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和渎职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就是现在所说的法纪检察。有些人误将法纪检察当作过去的一般监督，对此心有余悸，不

敢大胆行使职权。

1985年1月，高检院召开了全国法纪检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大成果是澄清了一些理论上的误区，明确了法纪检察工作的业务指导思想，就是要自觉服从于、服务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秉公执法，严肃法纪，立足办案，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保卫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奋斗。会议强调在全面承担法纪检察工作任务的同时，要突出工作重点，根据我国法制建设发展的形势和党中央一再强调要严肃查处以权谋私、严重官僚主义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案件的要求，法纪检察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结合整党，配合“两打”，重点查处玩忽职守、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诬告陷害、徇私枉法等案件，特别要认真查处国家工作人员中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大案要案。高检院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印发了《关于加强法纪检察工作的意见》，一直发到基层检察院。

（二）河南调研。1985年3月15日，湖南省检察院法纪检察处处长姜锋同志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法纪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内容是法纪检察工作局面没有打开，困难重重。一方面是法纪案件难办，比如对国家干部特别是公安干警严重违法乱纪案件，甚至致人伤残、死亡的重大案件，无法按自己的

职责主动去调查处理。某些案件虽然在上级机关的支持下，检察机关经过艰苦的努力勉强作了处理，但上级领导干部写张条子就可以“平反”。另一方面是法纪检察工作处于无人领导的地位，因此有的干警说是“不好干、干不好，不干好”。姜锋同志在信中还就如何搞好法纪检察工作提出了四条建议。中办信访局将这封信转给我，我觉得姜锋同志信中反映的问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有的地方甚至比信中反映的还严重。于是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法纪检察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之所以至今没有解决，主要是我没有尽到领导责任，有些则是我们检察系统所不能解决的。今后，我们一定要重视并认真解决姜锋同志信中所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做好法纪检察工作。

姜锋同志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个触动。为了取得实际的经验，1985年4月，我带了一个调查组到河南进行调查。河南省检察机关的法纪检察工作一直开展得比较活跃。从了解的情况看，办理法纪案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查处这类案件困难多，阻力大。在法纪案件中，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报复陷害案件居多，犯罪主体多是政法公安干警和基层干部，其中有些又是在执行公务中的违法犯罪，因此查处起来要比办理一般的刑事案件难。有的刚刚立案，说情人就找上门来，有的即使事实查清了，也处理不下去。还有一个问题是对法纪案件普遍判刑偏轻。开封市尉氏县张市乡原党委委员刘某，带领乡计划生育小分队成员吴某，将曾骂过吴的4名社员捆绑以后拴在摩托车后面拖，一直拖了4里路，拉到乡派出所后又用皮带抽打，致一人左眼瞳

孔变形，视力为眼前指数，这样一起严重犯罪案件，3名案犯都被判处缓刑。看来，冲破“关系网”、“保护层”是查处法纪案件，打开法纪检察工作局面的关键。工作中要有走艰难的道路、做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

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高检院对1985年的法纪检察工作只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就是一要办准，二要坚持，在这个基础上有所突破。经过检察机关的努力，1985年的工作成绩很大。全年共立案侦查法纪案件5800件，比1984年增加了10%。

为了总结推广开展法纪检察工作的经验，1985年8月，高检院又在河南郑州召开了办理法纪大要案经验交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河南、湖北、湖南等11个省级检察院法纪检察处的处长，还特别邀请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赵文隆同志作了专题发言。会议着重交流了领导重视，坚持原则，敢于碰硬，上级职能部门坚决支持下级依法办理大要案的经验。会后，高检院印发了会议纪要、赵文隆同志的发言和河南、湖北、浙江等省检察院的经验材料，在检察机关全面推广了一些法纪检察工作的成功经验，对推动和指导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 全面承担法律规定的法纪检察职能。198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法纪案件9000多件，其中重大法纪案件1700多件，有一些是在当地和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如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原预审科副科长葛林等人刑讯逼供案，南京市副市长丁永安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案，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徇私舞弊案等。总的来说，势头不错。但

工作还是刚刚开始,其重要性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认识,在整个检察工作中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从检察机关本身的工作来看,也有不少问题。一些检察院的领导并没有把法纪检察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上,全国还有一定数量的区县检察院没有立案查处法纪案件。有的地方畏难情绪较大,对法纪案件查处不力,起诉率低、免诉率高的问题比较普遍,有的该抗诉的没有依法抗诉,不少法纪检察干警有“只要法院判刑就是胜利”的思想,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强法纪检察工作,高检院党组又在1986年10月份再次召开了全国法纪检察工作会议。这时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刑讯逼供、非法拘禁、非法搜查、诬告陷害等严重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的案件上升,发生了不少致人伤残、死亡的事件。二是在经济领域,重大玩忽职守案件往往与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造成的经济损失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三是全国一些厂矿、企事业单位和乡镇企业,特别是个体、联营的小煤窑中,爆炸、火灾等重大责任事故不断发生。因此,这次会议强调要突出办好三类案件:即刑讯逼供、非法拘禁、诬告陷害等严重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的案件,玩忽职守案件和重大责任事故案件。根据中央关于“一要坚决,二要慎重”的指示,结合办理法纪案件的特点,会议提出办理法纪案件的原则应该是“坚决、严肃、慎重”。

会议还提出四条衡量法纪检察工作的标志:一是是否把法纪检察工作列入党组的议事日程,定期研究法纪检察

工作情况，及时讨论法纪大案要案，改变了法纪检察工作的薄弱环节；二是检察长是否认真抓法纪检察工作，敢于支持法纪检察干警大胆工作，对重大案件亲自过问，主管检察长是否对法纪大案要案认真组织力量查处，经常研究和解决法纪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三是是否扭转有案不办的被动局面，办理了一批震动大、影响大的案件；四是是否充实和加强了法纪检察队伍，确保办案力量的稳定。

这次会议，明确了法纪检察工作的重点，办案的原则，还提出了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是一次比较全面地部署法纪检察工作的会议，对各地开展工作指导意义很大。

在1987年3月份全国检察长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我又进一步强调了搞好法纪检察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继续提高认识，把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际工作同党和国家切实加强和发扬民主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增强责任感，提高自觉性。要从思想上、领导上、力量上把法纪检察工作摆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切实加强工作，同各种压制和破坏民主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以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至此，经过3年左右的时间，各级检察机关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使法纪检察工作基本摆上了应有的位置，成为检察机关的主要业务工作之一。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把法纪检察工作纳入规范化轨道，1987年11月，高检院又在山东济南市召开了全国法纪检察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总结了各级检察机关在法纪检察工作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提出1988年必须大力加

强法纪检察工作，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继续抓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案的查处，集中力量突破大案要案，同时全面地担负起检察机关管辖的16种法纪案件的查处工作。特别是加快业务建设的步伐，逐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加强业务指导，实行办案责任制，逐步建立和健全案件管理制度。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在思想上、理论上、工作实践中明确了法纪检察工作的任务、地位和作用，将法纪检察工作初步纳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从此，检察机关真正地、全面地依法担负起了法律赋予的法纪检察职能。

（四）平反沉冤30年的文炳衡案。1987年4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李克如（原甘肃省人大副主任）和兰州军区离休干部文景山来高检院找我，要求复查甘肃省合水县“文炳衡反革命诬告案”，为文平反。我仔细听取了他们介绍的情况，也看了他们带来的材料，觉得确有复查的必要，同时感到案情复杂，加之年代已久，许多当事人已去世，难度很大。遂于4月15日给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的乔石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由中央出面，中政委、高法院、高检院派人组成联合调查组，查个水落石出。乔石同志很快批示“同意由几个部门先查清事实再定”。5月，中政委出面组织了联合调查组，由高检院一位厅长任组长。调查组立即赴甘肃开展工作。6月，我到甘肃期间，又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

文炳衡是解放初期的全国劳动模范，1958年以“反革命诬告罪”被判处死刑。80年代初，甘肃省委曾组织复查

并作过维持原判的结论。但省里一些同志和文的亲属认为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应该平反。

文案起源于1953年春。文炳衡之弟文景山春节时从部队回家探亲，听到文炳衡和其他人谈论当时的合水县县委书记唐凤仪的一些问题，在返部队途中，路过兰州，于3月5日向省委写了一封反映唐违法乱纪的信，此后又有几封署名、匿名的检举信，先后向毛主席、西北局、省党代会和地委检举唐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包庇反革命、“三反”中逼死县公安局长等问题。

各级党委对这些反映都十分重视，庆阳地委根据上级要求，6次派了8名地委机关的部门负责同志前往合水县调查。经过前后两年多时间的调查，认定唐凤仪有违法乱纪问题，地委曾决定给予党纪处分，检举信中有些问题失实，如受贿和与人贩卖大烟问题始终查证不实，成了悬案。

1955年12月上旬，甘肃省委派出工作组进一步调查，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集团诬告陷害革命干部案，并于破案当天逮捕了文炳衡，将全案移送司法部门侦查处理。随后，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和几级法院判决、复核，合水县于1958年5月28日召开公判大会，将文炳衡执行枪决。文临刑前仍在喊冤。

对“文案”的判决，文炳衡的六弟文景山、其女文惠贞等多年申诉，一直不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景山等更是频繁申诉。

联合调查组根据我提出的“先核查事实，不议是非”的意见，在两个多月的复查工作中，翻阅有关“文案”的各

种会议记录本十几本，审查“文案”案卷十九卷，向处理“文案”时担任各有关部门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参与查办此案的干部和与此案有关的证人等60多人做了调查，多方听取了意见，并提出了初步看法：一是“文案”原定罪事实有重要出入。特别是作为“反革命集团”首犯文炳衡的“反革命罪恶”事实出入很大，有组织有计划地诬告唐凤仪的事实不清，缺乏充分、确凿证据。二是原判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文案”各被告人没有“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共同故意”，不具备犯罪集团的构成条件，定为“反革命集团”是错误的。至于向上级机关反映县委书记唐凤仪的问题，按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及党的政策、国家法律，进行的也不是“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对于诬告陷害问题，就现有材料来看，既不好肯定，也不好否定，只能作为历史悬案。因此，就全案讲，应当实事求是，依法予以纠正，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分考虑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做好善后工作，以维护法制尊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1987年9月，中政委开会讨论了关于文炳衡案件复查意见的报告，认为文案定性不准，量刑不当，应撤销原判，依法予以改正。1988年初，甘肃省庆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文炳衡无罪。

1988年4月，我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提到这个案子时，代表们报以长时间的鼓掌。会下，有不少同志找到我，都认为这个案子办得好，检察机关真正是为民作主的。之后，还有不少报刊对文案作了更加详细

的报道。

文炳衡冤案的平反，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也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在不断健全。人民群众通过沉冤 30 年的文炳衡案的平反，看到了党的英明，法律的权威，看到了检察机关在维护人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起案件的处理，也有力地推动了法纪检察工作的发展。

四、建设一支忠于人民、秉公 执法的检察队伍

（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早在 1982 年 4 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就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是改变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检察机关重建的时间较短，整个队伍的素质很不适应工作需要。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通晓法律，熟悉业务，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检察队伍，是一项比其它部门更为迫切的任务。

首先是政治素质。我们要求检察干警要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秉公执法”。这 4 句话 16 个字，是我们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工作实际出发，反复琢磨出来的。

党和国家对检察队伍的建设一直较为重视，中央多次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员应当配备政治上坚强，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敢于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具备相当文化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懂得法律，有检察工作能力的干部担任。并且提出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般应当按照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人的副职一级干部配备。

提高检察队伍的政治素质，实现革命化，是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前提，是为了保证把国家的检察权真正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司法机关，检察干部作为国家的执法者，其行为关系着国家的形象。对一个执法者，最为基本的就是应该不畏权势，清正廉明，不能徇情枉法，更不能贪赃枉法。这样才能体现国家法律的权威。

察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有了不少提高，但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专业干部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检察机关在“文革”期间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被迫解散。重建后从四面八方调进大量干部，5年时间全国检察系统就已达到11万人。当时的检察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从军队转业和从其它党政机关调入的干部，大多没有受过法律专业培训，也缺乏从事政法工作的经验；二是检察机关解散后被分配到其它地方工作，又重新归队的老干部；三是政法院校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实际上，后两部分人占的比例很少。“文革”时期的法律教育也受到干扰和破坏，许多法律院系长期停办，以致法律人才十分缺乏。所以，有人形容当时的检察队伍是“一高一低”，即年龄偏高，文化素质偏低。我到高检院工作时，机关里只有一名50岁以下的副处长以上的干部，当时的队伍状况可见一斑。

检察队伍的年轻化，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年轻化，是一个关系到检察事业后继有人大问题，联系检察系统整个干部队伍的结构来看，也是检察队伍建设中最急切的问题。必须尽快实现领导班子中新老干部的交替，选拔那些政治坚强、文化程度较高、懂得业务、具有开拓精神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形成合理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

1983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全国检察系统人事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人事问题，研究成批选拔年轻干

部。这次会议对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促进很大。到1984年，经过调整，省、市、自治区一级检察院的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由1980年的60岁下降为54岁，县、市一级检察院领导班子中45岁以下的干部，由原来的17.4%增加到45.6%。进入领导班子中的中青年干部，一般都是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慎审的考察而任用的，大多数都具有思想解放、勇于改革、熟悉检察业务、政治和文化水平较高等优点，他们为各级领导班子增添了活力，发挥了骨干作用。

但是，干部队伍年轻化的任务仍很艰巨。到1984年，省级检察院领导班子里50岁以下的人很少，没有40岁以下的年轻同志，与中央的要求和工作需要都是有差距的，还要在这方面做很多工作。我提出，在进一步调整、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加快“第三梯队”建设的过程中，要解决好“提”和“让”两个问题。“提”就是要敢于破格，加快速度，把符合“四化”条件的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让他们在工作中增长才干，在挑重担中得到磨练。“让”就是老同志要当“开明人士”，主动让出位置来，不然新干部就上不来。

当时有人说：“30撒欢，40升官，50打蔫，60靠边，70、80冒烟”，有的主张把50多岁的同志一律换下来，在队伍中引起了一些混乱。这种提法，我一直是不赞成的。在人事工作座谈会上，我提出，检察机关领导班子年龄偏高、文化偏低的情况是长期形成的，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实现年轻化不能一蹴而就，要采取

“多倒几把”的做法，逐渐把老同志替换下来。当时 50 多岁的同志在检察队伍中还是年富力强的，他们经受多年的锻炼，工作上有经验，是我们队伍中的骨干，是工作上的主力。他们正处在承上启下，新老交替的交接口上，要准备一批人接替他们。50 多岁的同志，既要挑好当前的重担，又要选好接班人，这是老干部应尽的责任。老同志不但要把年轻同志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甘为“铺路石”，甘当“人梯”。

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努力，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在 1984 年至 1987 年 4 年间，高检院机关提拔了 7 名 50 岁以下的厅级干部，其中有 1 人还不到 40 岁，提拔了 51 名 45 岁以下的处级干部，其中有 28 人不满 40 岁。地方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年轻化也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整个检察队伍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35 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比例到 1988 年已超过一半。

（三）制定《全国检察干部教育初步规划要点》。到 1984 年，在全部检察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 8.2%，其中法律专业毕业生仅有 3100 多人，平均每个检察院不到 1 名；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 41%，其中法律中专毕业生只占 1.4%；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50% 以上。从各级检察院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看，地方各级检察院的正副检察长共有 8758 人，其中学法的大中专毕业生 677 人，只占正、副检察长总数的 7.7%；各级检察院担任检察员和科、处长职务的人员，共有 38397 人，其中学法律的大中专毕业生只有 1155 人，占 3%。按照规定，

各级检察院正、副检察长、检察员和科、处级干部，是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承办各类案件的专业人员和业务骨干，只有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法律专业知识，才能胜任所担负的工作。但当时干部的知识状况很不适应工作的实际需要，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加强对干部的培训，逐步做到培训工作正规化、经常化和制度化。

检察机关一直没有自己的干部学校和培训基地，要进行专业训练，在师资、经费、校舍、教材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困难。为了解决干部培训的问题，高检院在1985年制定了《全国检察干部教育初步规划要点》，提出争取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干部队伍的文化、专业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凡45岁以下、不具备法律专业大专水平的各级检察院正、副检察长，检察员，正副处、科长都要接受正规化教育。到1990年，检察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达到法律大专水平的应达3.4万人，全国检察系统干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总计要达到6至7万人。还有一批干部要接受中专教育和业务轮训。后来了解到，这些目标基本上都实现甚至超过了。

（四）建立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和兴城休养所。在抓检察干部培训过程中，我很强烈地感到，要想使检察队伍的培训走上正规化，按检察工作特点来培训检察干部，关键的还是要建立一所专门培训检察人员的高等院校。因此，从1985年开始，我就考虑要在北京建一所中央检察管理干部学院（即后来的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

1985年12月23日，高检院向国家教委报送了《关于建立中央检察管理干部学院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成立筹备组，选校址。按照当时首都建设规划的有关规定，北京市政府只同意学院建在北京市的远郊区。我考虑到，这个学院是全国检察系统唯一的高等院校，要建成检察系统干部培训、理论研究和刑事侦查技术研究的中心，同高检院机关业务工作联系密切，在师资、教学等方面，也需要得到在京的各政法院系的帮助和支持。如果建在远郊区，对学院的发展是不利的，也难以实现成立学院的目的。同时，筹备组经过多方联系，得知石景山区的八大处饭店因经营状况不佳，准备出售，而这个地方又比较适合办学。1987年8月，我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等同志写了一封信，请北京市批准我们在石景山区建校。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选址的事终于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接着，为了立项的事，我又给国务院姚依林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依林同志非常支持，很快就批示同意了。1988年，学院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开始了边办学边筹建的历程。直到1991年6月27日，才正式成立了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当时我离开高检院已经3年多了。检察系统终于有了自己的高等学府，这是我倍感欣慰的事情。

检察机关重建后，在当时的干警中，建国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所占比例较高，有相当一部分到80年代末要离退休；在几年的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有些同志还致伤致残，这些同志需要很好地休养，同时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干部休假

制度在建立和完善,在职干部的休养问题也需要妥善解决。但当时检察系统没有一个干部休养所。1983年,我听说中央打算在辽宁省兴城县建立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休息的基地,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这个时机,待别人都建好了,兴城热闹起来,再征地建房从经费到手续都较为困难,所以是越快越好。遂派人与辽宁省兴城县有关部门协商,征得了兴城县的同意。1984年9月27日,高检院向国家计委报送了《关于筹建检察干部休养所的报告》,得到了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两年的筹建,这个休养所于1987年正式投入使用。

(五)始终把检察队伍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是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担任了几十年的领导职务,深感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对检察机关来说,这更有着重要的意义。检察队伍中,党、团员占80%多,把党的建设抓好了,政治素质就有保证。检察工作是党的工作,所以队伍建设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党的建设。

1987年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撤销党组,这是针对当时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的情况而采取的措施。但决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使党摆脱许多具体的事务、具体责任,而能够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这个报告的草稿中原本也写上了撤销设在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党组,在征求意见时,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经过认真研究,共同认为法院、检察院系统工作有其特殊性,撤销党组这件事要慎重,最好再看一看。我

个人则是坚决不赞成的。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十三大报告中没有做撤销法院和检察院党组的决定。在我看来，检察机关上下级是领导关系。因此，检察机关的党组织不仅要抓好本机关的工作，还要通过一定的方式领导下级检察机关的工作，检察机关绝大部分是党员，不能没有党的组织。为了要管党，没有党组也要有党委。但当时有些检察院的领导思想上存在混乱，某市一个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在中央关于十三大报告的决议发表后，当众宣布，我们这个党组撤销了，党组书记我也不当了。我对这种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认为这是政治立场不稳的表现。实践证明，在检察机关设立党组，对切实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是必要的。

1988年4月，我的任期届满，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复之同志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离职卸任之时，我已经74岁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5年，体会颇多，感慨颇多。

5年来检察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监督的结果，是各级检察机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结果，是广大检察干警努力拼搏的结果。5年来的体会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1. 坚持党的领导，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坚持党的领导，接受人大的监督，其基本点就是正确贯彻党的政策，严格执行法律，始终把检察工

作置于党的领导下，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主动向各级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强有力地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才能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2. 坚持从保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出发，确定检察工作的重点。1983年8月，当社会治安出现非正常状态，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决定在全国开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时，检察机关提出“念一本经，唱一台戏”，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场斗争。1985年下半年，检察机关针对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期间经济领域的犯罪十分猖獗的状况，提出了在绝不放松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主要任务，及时调整部署，集中力量，沉重打击了经济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只有把保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作为自己的目标，认真开展各项检察活动，才能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

3. 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实施法律监督。要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同违法犯罪和干扰依法办事的行为进行斗争。在打击犯罪的活动中，从实际出发，依法开展检察活动，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该严的则严，该宽的则宽，正确地执行法律。在办理各类案件中，坚持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搞“联合办案”，避免职能上互相混淆，互相代替。只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律监督，才能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4. 坚持检察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把检察活动建立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依靠群众，调查案情，收集证据，揭露和打击犯罪，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依靠群众，与有关单位相互配合，开展综合治理工作，预防犯罪。在工作中，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认真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舆论监督，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

5. 建立一支忠于职守、秉公执法的检察队伍，是正确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组织保证。在组织上，始终注意抓好领导班子建设，把一些优秀中青年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政治上，教育干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和国家的法律，自觉地为改革开放服务。在思想上，加强“四有”教育，倡导干警树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的职业道德，开展“争先创优”活动，表彰秉公执法的检察官。对于极少数经不起考验，违法乱纪，徇私枉法的干警，进行严肃处理。在业务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训干部，提高干警的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

后 记

帮助我收集资料和整理回忆录的有：徐昶暎、卢昌鸿、战风翰、徐漫、王振琦、常好礼、陈玫、张德利、王光辉、王正清、曲守本等同志。张印奎、殷毅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在回忆录整理过程中，得到张向凌、何首伦、赵培兴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中共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岳岐峰、田凤山、马国良等同志对回忆录的整理、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央文献出版社、哈尔滨花园邨宾馆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特别是还得到了薄一波、宋任穷等老领导的热情指导，在这里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的回忆录，讲到70年间的事。我年纪大了，好多事记不大清楚了。和我同一个时期工作的人，有的不在了，有的也老了说不清楚了。因之，难免有失误和错误的地方，这都由我负完全责任。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杨易辰回忆录

作者 =

页数 = 4 4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